马列毛主义者基础书单之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编

2023

声明

本 pdf 文件由志愿者制作，内容搜集自 telegram 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其频道链接是 t.me/proletarianstruggles。

编者简介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是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我党主张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本报作为全国性质的政治报，通过建立代办员网络、进行全面的政治鼓动，宣传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群众。

斗争报将力图对一切引起关注和争论的斗争事件按马列毛主义的精神进行评论，坚决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当中。

联系方式

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是从民族主义者、自由派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一切资本主义政党的敌人。因此，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们必然会用尽各种办法攻击我们党，可以预见到阶级敌人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表面上假扮成支持我党**的口吻，**事实上却肆意编造谣言来歪曲我党的主张**，甚至**冒充我党党员发表反动言论，把我们从未说过的话强行按在我们头上**，把我党抹黑成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赤匪或者极端“左”倾的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红卫兵，借此欺骗恐吓小资产阶级群众远离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派，迫使群众对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保持一无所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预先发布下列联系方式和 GPG 公钥，以便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联系我党和了解我们的立场，摆脱资产阶级的谎言。

我们的**公开群组**对所有进步群众开放，只要不发表反动言论都可以留在群内。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审查每一个加入群组的人的真实身份，不可能把警察、自由派、机会主义者等等绝对排除在公开群组以外，这些反革命分子必然潜藏在群众里伺机而动。因此，各平台的**公开群组**里鱼龙混杂，**群成员的言论仅能代表发言者个人，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立场**。不论在墙内还是墙外，只有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和《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上公布和验证过的宣传平台能够代表我们党的正式立场，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能代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骗子。

一、网站

佳士工人声援团官网

jiashigrsyt1.github.io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proletarianstruggles.github.io

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

二、邮箱

佳士工人声援团联络邮箱

jiashigrsyt@protonmail.com

斗争报邮箱

douzhengbao@protonmail.com

三、Telegram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t.me/proletarianstruggles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t.me/JSshengyuan

管理员电报账号

https://t.me/jsgrsyt

https://t.me/zgmzdzygcd

四、Matrix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频道

https://app.element.io/#/room/#proletarianstruggles:matrix.org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https://app.element.io/#/room/#JSshengyuan:matrix.org

管理员 Matrix 账号

https://app.element.io/#/user/@jiashigrsyt:matrix.org

https://app.element.io/#/user/@mcpc:matrix.org

五、Keybase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团队

https://keybase.io/team/douzhengbao

管理员 Keybase 账号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

六、XMPP

“声援佳士工友”群组

jsshengyuan@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管理员 XMPP 账号

jsgrsyt@conversations.im

mcpc@yax.im

七、GPG 公钥

https://keybase.io/jiashigrsyt/pgp_keys.asc

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files.wordpress.com/2023/11/pgp_keys.asc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pgp_keys.asc

目录

斗争的最近目标……1
老一套的把戏……3
注释：……5
新的"国内和平"……7
注释：……9
国民议会……10
注释：……13
正是如此……15
注释：……17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8
后记……55
注释：……60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63
注释：……66
怎样组织竞赛？……67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76
一……76
二……76
三……77
四……77
注释：……78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80
注释：……81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 83
注释： 86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87
注释： 88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89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89
当前的总口号 92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93
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100
提高劳动生产率 103
组织竞赛 105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108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115
结论 118
注释： 119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125
注释： 125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26
序言 126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128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138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145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151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157

苏维埃宪法......164
什么是国际主义？......172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184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45]......205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209
注释：......215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235
1 报告......235
2 关于报告的总结发言......249
注释：......255
论“民主”和专政......257
注释：......261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62
1 代表大会开幕词......262
2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64
注释：......279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283
1 开幕词......283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284
3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298
4 闭幕词......299
注释：......299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303
在一般政治方面......307
民族关系方面......310
军事方面......311
司法方面......312
国民教育方面......313
宗教关系方面......315
经济方面......315
农业方面......318
分配方面......319
金融和银行方面......320
财政方面......321
住宅问题方面......321
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322
人民保健事业方面......323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325
1 贺词......325
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328
一......328
二......333
三......337
四......343
五......354
注释：......359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363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368
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372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共产主义星期六）......372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380
注释：......393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397
当前的主要任务......397
向人民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398
做好应征者的工作......399
做好逃兵的工作......400
直接帮助军队......401
缩减非军事工作......402
前线地区的工作......404
对军事专家的态度......406
肃清后方的反革命......408
动员全民参战......410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411
论国家[1]......413
注释：......427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429
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435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443
一......443

二……444
三……445
四……446
五……449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452
一……452
二……455
三……458
四……460
五……464
六……469
注释：……472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1]……478
注释：……482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484
注释：……486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487
注释：……496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497
一、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498
二、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处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500
三、纠正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的路线以及部分地改变其成分……507
青年团的任务[1]……511

注释：......525
关于“出版自由”——给Г.И.米雅斯尼科夫的信......528
十月革命四周年......534
注释：......541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542
注释：......559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1]......564
注释：......586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589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589
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592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593
论原则分歧......599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602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609
结论......618
注释：......625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627
论我国革命......631
一......631
二......633
注释：......634

斗争的最近目标

国际派（斯巴达克斯派）

本文是斯巴达克斯同盟在 1918 年 11 月 8 日—9 日散发的传单，题为《斗争的最近目标》（Die nächsten Ziele eures Kampfes），署名为国际派（斯巴达克斯派）。

工人们，士兵们！

现在，你们行动的时刻来到了。经过长期的忍耐和沉默之后，你们行动起来了。简而言之，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你们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工人们，士兵们！现在行动的时刻已到，你们决不要后退。那些“社会主义者们”与政府狼狈为奸达四年之久。几周前，他们还天天用“人民政府”、议会化和其他破烂货安慰你们。现在，他们却竭尽全力，要削弱你们的斗争，镇压这场运动。

工人们，士兵们！要像基尔、汉堡、布莱梅、吕贝克、罗斯托克、弗伦斯堡、汉诺威、马格德堡、布伦瑞克、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的同志们和战友们一样，取得成功。因为，你们那些兄弟们在当地取得的胜利，全世界无产阶级赢得的成就，也都取决于你们奋斗的结果，取决于你们斗争的顽强精神和斗争的成就。

士兵们！要像海军的水兵兄弟们一样行动起来！同你们的工人兄弟们联合起来！千万不要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的兄弟！千万不要听从军官们的命令，不要向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开枪！

工人们，士兵们！你们斗争的最近目标应是：

1．释放全部民事犯和军事犯；

2．取消各邦，废除各王朝；

3．选举工人士兵苏维埃。为此，应在所有工厂和部队选举代表；

4．立即同德国各地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建立联系；

5．由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全权代表接管政府；

6．立即同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同俄国工人共和国建立联系。

工人们，士兵们！现在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现在是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运用力量的时候了！

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国际万岁！

老一套的把戏

罗莎·卢森堡

本文以《老一套的把戏》（Das alte spiel）为题发表于《红旗报》第 3 期，1918 年 11 月 18 日。

“李卜克内西在施潘道屠杀了两百名军官。”

“李卜克内西在施潘道被杀。”

“斯巴达克斯匪帮袭击了宫廷马厩[1]。”

“斯巴达克斯匪帮带着机枪，企图闯入《柏林日报》报社。”

“李卜克内西洗劫商店。”

“李卜克内西给士兵发钱，引诱他们参加反革命行动。”

斯巴达克斯派成员赶往众议院的时候，进步人民党正在里面开会[2]。当大会得知这个消息时，所有人惊慌失措，拔腿就跑，想躲开即将降临的大难，留下了热气、雨伞和各种在这些日子里很难找到替代品的贵重物品。

几周来，这些关于我们组织的最荒诞不羁的谣言一直在柏林流传。听见窗户破裂或轮胎爆胎的声音，非利士人的头发立刻竖起来，浑身发抖，因为他知道“斯巴达克斯匪帮”就要来了！

许多人苦苦哀求李卜克内西，求他放过自己的配偶、侄子、姨妈，不要让他们遭到据说冷血无情的斯巴达克斯匪帮正在策划的大屠杀。这是在德国革命的头一个月里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听说了这些故事，不禁让人想到《魔笛》[3]里可笑的一幕：流氓莫诺斯塔托斯被帕帕杰诺的影子吓坏了，满怀恐惧地唱起来：

呼！这准是恶魔！

呼！这准是恶魔！

我要是只耗子，

该往哪里躲？

我要是只蜗牛，

就缩进自己的壳里！[4]

所有这一切荒诞的谣言、荒唐的幻想、疯狂的故事和无耻的谎言当中最令人恶心的一方面，便是它们都是系统地炮制出来的。对斯巴达克斯派的污蔑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些谣言被特意炮制出来，灌输给公众，企图散播恐慌，搅乱公民的思想，恐吓和误导工人和士兵，创造一种屠杀斯巴达克斯派的氛围，以便在我们向群众提出自己的政策和目标之前就阻止我们。

这都是老一套的把戏了。我们全都记得四年前那些疯狂的故事，什么金色汽车、法国飞机、井里投毒、刺瞎眼睛，全都是战争贩子的特务在战争爆发之际故意散播的，以便把盲目的民族主义仇恨灌输给工人，诱使工人充当炮灰。现在，我们又看见他们对斯巴达克斯派重施故技。他们欺骗人民，煽动人民的仇恨，这样他们就能让人民毫不犹豫、不问是非地对付斯巴达克斯派。

我们都知道这是个什么把戏，也知道是谁干的。是不独立的社会民主党人[5]，是谢德曼，是艾伯特，是奥托·布劳恩[6]，是鲍威尔[7]，是列金，是鲍麦斯特[8]，他们故意用无耻的谎言污染舆论，挑唆人民对付我们，因为他们——很正确地！——害怕我们的批判。就在革命前一星期，他们还谴责在德国发动革命的主张是犯罪，是冒险主义，是“盲动主义”，还在宣称马克斯亲王当上首相、谢德曼入阁并与艾尔茨贝格尔平起平坐之后，德国就已经民主了。现在，这些人又向群众宣称革命已经结束了，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革命继续发展，保卫资产阶级财产和资本主义剥削。这就是他们宣称要保卫的“平静”与“秩序”，使之免遭我们的破坏。这就是他们造谣污蔑的原因。这就是他们如此害怕我们、仇恨我们的原因。他们非常清楚，我们不会洗劫商店，但我们唾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不会袭击宫廷马厩或众议院，但我们要为了工人利益而坚决推动革命。他们蓄意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把它们说成游民无产者的冒险。这一切都是

为了误导群众。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时，他们大谈特谈政变、暗杀之类的鬼话。他们企图通过消灭斯巴达克斯派来消灭无产阶级革命！

然而，他们一定会失败。他们无法让我们沉默。也许他们能发动一些被他们蛊惑的工人和士兵来对抗我们。也许反革命分子的进攻会把我们逼回刚刚逃出来的牢笼。但革命的铁一般的进军是不可阻挡的。

我们会让群众听到我们的声音，会让群众理解我们，他们会把满腔怒火转向那些企图用谎言煽动屠杀的始作俑者。将要承受他们的怒火的，不会是宫廷马厩、商店或非利士人，而是你们——资产阶级反动派和马克斯亲王的前盟友，资本主义剥削的保卫者，反革命的马前卒：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注释：

[1] 宫廷马厩（Marstall）是柏林的皇家马厩；在革命期间被用作行政中心。——编注

[2] 进步人民党是一个存在于 1910—1918 年的自由派政党。这指的应该是该党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1918 年底，该党与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为德国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编注

[3] 《魔笛》（Die Zauberflöte）是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1791 年 9 月 30 日在维也纳首演。莫诺斯塔托斯（Monostatos）和帕帕杰诺（Papageno）都是剧中人物。——中译者注

[4] 这几句台词来自歌剧《魔笛》中的不同部分。——编注

[5] 这是对社民党的嘲讽，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相对应。——编注

[6]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 年 1 月 28 日——1955 年 12 月 14 日），社会民主党人，1913 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 年在魏玛参加国民议会，1920 年—1932 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7]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Gustav Adolf Bauer，1870 年 1 月 6 日——1944 年 9 月 16 日），出身于法官家庭，在律师事务所当过职员，1895 年创建德国职员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 der Bureauangestellten Deutschlands），1908 年至 1918 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副主席，在社民党内属于右翼，支持一战。1918 年 10 月参加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任劳工大臣。十一月革命后在菲利普·谢德曼政府中继续担任劳工部长，1919 年 6 月谢德曼辞职后，于 6 月 21 日继任总理，1920 年 3 月，在卡普暴动失败后不久，于 3 月 26 日辞职。——中译者注

[8] 康斯坦丁·鲍麦斯特（Konstantin Baumeister，1887 年 1 月 27 日——1962 年 11 月 24 日），社民党人，当过小学教师。1919—1921 年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新的“国内和平”

卡尔·李卜克内西

本文以《新的“国内和平”》[1]（Der neue Burgfrieden）为题发表于《红旗报》第 4 期，1918 年 11 月 19 日。

“现在没有什么党派之分了，大家都是德国人。”这是世界大战开始时的谎言。这些要求一切阶级神圣团结的鬼话欺骗了人民，甚至把工人变成了疯狂呼唤战争的爱国者，爆发出了嗜血的疯狂。这就像是一场洪水，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阶级觉悟冲了个一干二净——这一切就发生在只有无产阶级的反帝阶级斗争才能使世界免遭日后的暴行与屠杀之戕害的时候。

“神圣的团结”使群众落入了战争投机商的虎口；“神圣的团结”就等于大屠杀、成百上千万人的悲惨遭遇、文化的大破坏和地狱。最有效、最认真地鼓吹“神圣的团结”的宣传家，是那些捍卫国内和平的社民党政客：谁敢向无产阶级发出警告，揭发这些叛徒，就会被打成碍事者、捣乱分子、卖国贼和破坏分子。

“现在不分什么社民党和独立党了，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是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谎言。新的国内和平的旗帜已经升起来了。有人正在针对那些不愿接受这种新的“团结”呓语的人散播疯狂的仇恨。叫嚷得最大声的人，仍然是谢德曼和他的同伙。

他们在士兵当中获得了强烈的支持。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士兵并不都是无产者，而戒严、书报审查、国家宣传和灌输都在士兵身上留下了痕迹。尽管如此，大部分士兵还是具有革命的情绪，拒绝军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的；但是，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他们依然分歧重重、犹豫不决、不够成熟。

和工人一样，许多无产者出身的士兵也曾经屈服于这种已死的社会帝国主义宣传。这就是说，他们相信了革命已经胜利的说法。现在他们担心的是和平条约和复员。在经历了长年的折磨后，他们非常渴望得到一点平静，然而，他们却看

不到这一点：直到目前，“革命”——在实践中，国家的大小官吏不得不容忍它——仅仅意味着“疯狂的”1848 年的专制残余的覆灭[2]；换句话说，我们目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无产阶级也许掌握了政权。但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阶级统治，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算是正确运用了政权。士兵们看不到这一点：只有在无产阶级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和平、复员和经济发展等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团结。没有人比我们更想要团结。团结意味着无产阶级足够强大，足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不是一切团结都会让无产阶级变得强大。火与水的团结只能浇灭火，让水变成蒸汽。狼与羊的团结只会让羊变成狼的口中餐。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团结等于驱使工人去送死。与叛徒团结就等于失败。只有目标一致的几股力量，才能通过团结变得强大起来。把背道而驰的几股势力绑在一起，就会让它们失去力量。把目标一致的几股力量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的夙愿。而现在鼓吹团结的那些使徒却想把背道而驰的几股势力绑在一起，从而束缚革命，转移革命的方向。那些在大战期间鼓吹团结的传教士也怀着同样的目的。

政治就是行动。共同行动需要共同的目标和策略。与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策略的人，我们都会把他们当作斗争中的同志，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真正的团结，意味着精神上、思想上、目标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团结，是花言巧语、自欺欺人和背信弃义。如今那些鼓吹团结的人，只想让刚刚开始的“革命”尽早结束。他们想把革命这艘大船开进“平静的水面”，拯救资本主义秩序。他们企图重建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捍卫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从工人手中夺回权力。他们一直在用团结的鬼话来欺骗无产阶级。

斯巴达克斯派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计划构成了威胁，是因为我们真诚而严肃地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那些明明为资本主义剥削者充当代理人，却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家伙，难道我们能赞同他们吗？难道我们能跟他们团结，而又不至于沦为他们罪恶勾当的帮凶吗？跟这些人团结，就等于杀害无产阶级、葬送社会主义和叛卖国际。这些人不配得到兄弟般的握手。他们不配得到团结——只配得到斗争。

劳动群众是社会革命的创造者。清醒的阶级觉悟，对自身历史任务的明确认识，执行历史任务的坚定意志和坚决的行动，是必要的素质。这就意味着：今天的首要任务是驱散关于“团结”的弥天大谎，痛斥一切虚情假意和曲意逢迎，揭露一切工人阶级的假朋友。

只有无情的批判才能使思想清晰起来。只有清晰的思想才能带来团结。只有信念、目标和决心上的团结一致，才能使我们获得建立社会主义新世界所需的力量。

注释：

[1] 原文为 Burgfrieden，直译为“城堡和平”，这个词是用来描写一战爆发时德国各政党一致拥护战争的情形的。——编注

[2] 在德国，1848 年革命经常被称作“疯狂年代”（tolleJahr）。——编注

国民议会

罗莎·卢森堡

本文以《国民议会》[1]（Die Nationalversammlung）为题发表于《红旗报》第5期，1918年11月20日。

从《德意志日报》、《弗斯报》和《前进报》到独立党的《自由报》，从雷文特洛[2]、艾尔茨贝格尔、谢德曼到哈泽和考茨基一致地发出要求召开国民议会的呼声，并同样一致地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思想面前发出胆战心惊的叫喊声。

据他们说，全体“人民”，整个“民族”负有这样的使命：经过多数表决来决定革命今后的命运。

统治阶级的公开的和经过伪装的代理人提出这个口号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既不会在国民议会内、也不会越过国民议会去同资本主义的现金保险箱的守护人进行讨论。

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这个决定性问题上也同资本的守护人站到一起去了。

像希法亭在《自由报》上所说的那样[3]，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使革命避免使用暴力和充满恐怖的内战。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他们把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社会革命的过程设想成为这样一种形式，即不同的社会阶级聚集一堂，相互进行一种美好的、心平气和的和“有气派的”讨论，然后进行表决——或许还会采用著名的“分门表决法”[4]。那时，如果资本家阶级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它作为恪守纪律的议会政党会叹息一声说：“有什么办法！我们看到，我们被多数票否决了。好吧，我们认输并把我们的全部土地、工厂、矿山，我们所有的保险柜和大笔的利润都交给工人。”

的确，拉马丁、加尔涅—帕热斯、赖德律—洛兰之流[5]的1848年小资产阶级幻想家和空谈家品种并没有绝迹；它在考茨基、希法亭和哈泽身上以枯燥的、学究气的和费解的德国版复活了，却没有任何新鲜的光泽、才气和魅力。

这些根底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

他们忘记了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议会政党，而是一个统治阶级，它占有全部经济的和社会的权力手段。

只有在革命政府满足于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上贴一些小小的美人痣的时候，容克地主和资本家先生们才会安安静静。只有在革命是规规矩矩的，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雇佣关系、利润这些资产阶级统治的生命线和动脉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规规矩矩。

一旦危及利润，一旦向私有制开刀，一团和气的局面也就结束了。

目前的田园生活场景——狼与绵羊、老虎与羔羊就像在诺亚的方舟里一样和平地并排吃草——只会维持到开始认真地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一分钟也不会更长。

只要出色的国民议会真的决定完全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连根铲除资本统治，斗争也就会开始。如果资产阶级被射中心脏——它的心是在现金保险箱内跳动的——它将为它的统治殊死战斗，将千百次公开和秘密地反抗社会主义的措施。

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战胜、击退、克服它，不管有没有国民议会。人们忧心忡忡地力图从革命中排除出去的那种“内战”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内战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别名。不用阶级斗争，经过国会多数表决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可笑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那么，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走国民议会这条路会得到什么呢？加强资产阶级的阵地，用虚无缥缈的幻想削弱并迷惑无产阶级，在狼和羊羔之间的“讨论”上浪费和损失时间和精力，一言以蔽之，给所有这些人帮忙，而这些人的目的和企图是诱使无产阶级革命放弃其社会主义的目标并把无产阶级革命阉割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国民议会的问题不是时机合适与否的问题，不是更加“方便”与否的问题。它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革命是否具有社会主义自觉性的问题。

在法国大革命中，决定性的第一步是在 1789 年 7 月把三个分开的等级联合成一个共同的国民议会。这项决定给事件的下一步的整个进程打上了印记。它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战胜中世纪封建的等级社会的标志。

与此完全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是由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以及它本身任务的阶级特性的标志就是应当执行这一任务的政治机构——工人议会、即城乡无产阶级代表机关的阶级特性。革命的政治机构必须反映革命的阶级性质[6]。

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已经过时的遗产，是没有内容的空壳，是关于“团结一致的民族”、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时代的一件道具。

今天，谁抓住国民议会不放，谁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革命拖回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谁就是一个经过伪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一个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

围绕国民议会的斗争是在“不是民主就是专政”的呐喊声中进行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也顺从地接受了这个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却没有注意到这种二者必择其一的情况是为了煽动而捏造出来的。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像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

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加强这种觉悟，锻炼这种意志，组织这种行动，需要一个阶级的机构，这就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全国议会。

召集这样一个工人代表机构来代替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的国民议会，这本身已经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行动，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过去的历史决裂，是唤醒无产阶级群众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是第一次公开而严峻地向资本主义宣战。

不要寻找借口，不要模棱两可，应当确定方针了。议会痴呆症昨天是一个弱点，今天是一种暧昧态度，明天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注释：

[1] 此处借用了《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20—523 页，于沪生译，殷叙彝校）的译文。为了与全书保持一致，本书中译者参照英文版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把“国民会议”改为“国民议会”。——中译者注

[2] 恩斯特·雷文特洛（Ernst Reventlow，1869 年 8 月 18 日——1943 年 11 月 21 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参加德国海军，晋升为海军少校，因与法国女人结婚而被迫退役。退役后当了记者。1920 年创办《卫国者》（Der Reichswart），在 1923 年曾与拉狄克有过接触。1924 年退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成立了德国人民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1927 年退出人民自由党，参加了纳粹党。——中译者注

[3] 参看鲁·希法亭《革命者的信仰！》。载于《自由报》（柏林）1918 年 11 月 18 日第 6 号。——《罗莎·卢森堡全集》德文版编者注

[4] 分门表决法（Hammelsprung）是议会中的一种投票方法：投票前，议员必须先离开所在大厅，然后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组从三个不同的门分别再进入大厅以计算各组的票数。——《卢森堡文选》编者注

[5] 阿尔丰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埃蒂安·若瑟夫·路易·加尔涅—帕热斯（Étienne Joseph Louis Garnier-Pagès，1801—1841）和亚历山大·奥居斯特·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Auguste Ledru-Rollin，1807—1874）都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客。——编注

[6] 《卢森堡文选（下卷）》的译文中没有这句话，故按照英译文补上。——中译者注

正是如此

卡尔·李卜克内西

本文以《正是如此》（Das, was ist）为题发表于《红旗报》第 6 期，1918 年 11 月 21 日。

直到现在，德国革命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仍有重大矛盾。这个矛盾必须解决。其实，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这个矛盾的解决。革命的政治形式是无产阶级行动；它的社会内容是资产阶级改良。

就连它的政治形式，在一开始也是以军事行动为主，而它的无产阶级性质也是很可疑的。它的主要成因，不是无产阶级的惨状，而是整个社会的痼疾。工人和士兵能够获胜，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旧政权的内部腐朽。此外，给革命打上印记的，不只有无产阶级行动，也有统治阶级的活动；统治阶级如释重负，把德国破产的责任推给了无产阶级，企图用这种方法来避免社会革命——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充满了恐惧。

为了克服这个矛盾，现在的"社会主义"政府企图让无产阶级形式屈服于资产阶级内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职责则正好相反：它必须去改变革命的内容。它必须给革命填入最进步的内容；换句话说，必须把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

"目前，德国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治权力。"这句话是否符合事实？没错，德国所有大城市确实都已经成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但是，在这些城市里也成立了许多资产阶级苏维埃。在较小的城镇，一切几乎原封未动，或者只有一些表面上的改变。成立了一些"农民苏维埃"，但它们没有一个掌握在农业无产者手里；它们都被大中型农场的业主控制着。

就连"工人苏维埃"也往往不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因此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在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事例中，小商人或资产阶级的有力人士设法说服了工人，混入了工人苏维埃。在许多事例中，当选的工人都缺乏阶级觉悟，没有受过教育，不够可靠，犹豫不决，软弱无力。结果，他们的苏维埃没有革命性，他

们的权力也就不能真正压过旧体制的代表。我们还发现，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宣称自己属于工人。他们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工人苏维埃，把工人苏维埃变成了一种按照职业区分的人民议会，实现了冯·海德布兰德[1]先生的梦想。

士兵苏维埃的情况更加糟糕。它们吸纳了所有社会阶级的成员，尽管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士兵苏维埃的委员中却只有一小部分是愿意参加阶级斗争的革命工人。士兵委员会往往是由军官甚至贵族任命的，他们狡猾地企图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并让自己入选士兵苏维埃。

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考虑：士兵苏维埃仍比工人苏维埃更有影响力，这反映了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政府维持着、甚至是重新任命了整个资产阶级国家行政机关和旧的军事机器——这些机构几乎都不受工人士兵苏维埃控制；统治阶级的大量经济权力几乎原封未动，他们的一些社会权力仍将存续很长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粮食供应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地主手中。这一切表明，目前我们在讲到无产阶级权力的时候，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当然，现政府是由六人内阁和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构成的，而执行委员会又是由大柏林的各个工人士兵苏维埃选出的，大柏林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成熟度，很可能反映了全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平均水平。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形式任命或资格证书并不是政治权力，要掌握真实而强大的权力手段，保护掌握政权的人不受敌人攻击，这才是政治权力。

11 月 9 日，工人和士兵掌握了国家政权机器。当时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掌握经济权力机器。但是，他们很快就把夺过来的政治权力拱手让出了。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无产阶级在 11 月 9 日夺取的政治权力，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而且每小时都在继续流失。

在无产阶级越来越虚弱的时候，阶级敌人却团结了起来，集中力量进行斗争。在许多城市里，反革命正在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无耻地进行动员。我们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其它一些邦得到消息，当地的议会、政府机关、市长、警官、政府职员、学校教师、律师、工厂主和农民与富裕阶级建立了联盟，而且他们的联盟还在日益壮大。这个联盟对农业无产者的影响越大，就会变得越危险。

有人正在策划一场战争，想用饥荒来对付革命中心的无产阶级，如有必要，他们会搞出一个德国的旺代。这种危险正在迅速加剧。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否则无产阶级的希望就会在几周内化为瓦砾。劳动群众必须积极行动起来，阻止权力流失，制止政府蓄意夺走工人权力的行为。他们必须大声疾呼："够了！"同时，他们还要保卫到手的成果，进一步夺取权力，迫使统治阶级屈服，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犹豫不决就会失去一切：失去已经赢得的一切成果，失去有待争取的一切成果。犹豫不决就等于为革命送葬。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

注释：

[1] 恩斯特·冯·海德布兰德（Ernst von Heydebrand，1851—1924），德国保守党主席。——编注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列宁

（1917 年 9 月底—10 月 1 日〔14 日〕）

再版序言

从下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 1917 年 9 月底开始写，10 月 1 日写成的。

10 月 25 日的革命，已经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问题从理论的领域转到了实践的领域。

现在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理论根据，是不堪一驳的。这些论据已经被推翻了。现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证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活跃的正直的农民，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

1917 年 11 月 9 日于彼得堡

从《言语报》到《新生活报》，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到半布尔什维克，总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派别在哪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呢？

在以下这点上：布尔什维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连一个极短暂的时期也保持不住。

如果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热者”才会认为这个问题是现实的，那么我们只要把负有最重大责任、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别的言论一字不改地引来，就能驳倒这种论调。

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听策列铁里部长的一次发言时当即在席位上大声插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2]。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

现在，我们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半布尔什维克（我倒更愿意称他们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在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

9 月 16 日《言语报》的社论说：

“……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笼罩着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刊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十分明确而且毫不隐讳。在民主会议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维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词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们除一小部分狂热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嘴上勇敢。他们的本意并不想夺取‘全部政权’。他们这些地道的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骨子里却是一群胆小鬼，他们内心里深知自己腹中空洞无物，深知他们目前的成功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象我们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们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们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们按本性来讲是一些毫不负责的人，按方法和手段来讲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永远

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要不是意识到这种试验是不能容许的，有招致毁灭的危险，真可以豁出去试一试这种有英雄气魄的办法。我们再说一遍，好在这些可悲的当代英雄自己也决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建设性的工作都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因此，他们的十分明确和毫不隐讳的态度，只能表现于政治讲坛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谈。实际上，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的立场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场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结果：它把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别联合起来反对自己……"

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现在请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 月 21 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编辑部的社论中：

*"……如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据民主会议批准的纲领同民主派合作，那么，**联合内阁就应当从民主会议的成员内部产生出来**。这对拥护联合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牺牲，**但是，宣传政权'清一色路线'这种主张的人也应当作这样的牺牲**。不过，我们担心在这方面可能达不成协议。那就只有第三种即最后一种办法了：政权由民主会议中**原则上**拥护清一色政权的主张的那一半成员**负责**组织。*

*明确地说，就是**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布尔什维克极力把仇视联合的思想灌输给革命民主派，答应在消灭'妥协'以后给他们各种好处，并且说妥协是我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如果布尔什维克了解自己**鼓动**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欺骗群众**，那么**他们**就**有责任**兑现到处随便开出的支票。*

问题非常明显。

希望他们不要枉费心机用匆忙炮制的关于他们不能夺取政权的理论来掩饰自己。

民主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理论。

同时，主张联合的人应当保证给他们以充分的支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办法，三条道路，其他的办法和道路是没有的！”（黑体是《人民事业报》原来用的）

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议论的。最后，请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如果脚踏两只船也可以称作立场的话）。下面这一段话摘自 9 月 23 日《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社论：

“……如果再同柯诺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组织联合内阁，那就只能意味着民主派又一次投降，意味着撤销民主会议的关于根据 8 月 14 日的纲领建立责任政权的决议……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清一色的内阁，就象联合内阁里负有责任的社会党人部长一样，很难感到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政府不但不能把革命的‘活跃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且也不能指望从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稍微积极的支持。

但是组织另一种清一色的内阁，即组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简直是死路。诚然，这样的口号谁也没有提出过，只有《工人之路报》在偶尔发表的不那么大胆的意见中提到过，后来才不断加以‘解释’。”（这些负责的政论家连 9 月 21 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论也忘掉了，居然“大胆地”写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

“现在，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的苏维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取消的。现在不仅可以认为‘苏维埃路线’是经过校正的

路线，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一条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其实，苏维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整个民主派绝大多数人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维埃成为在组织成分上同民主会议所组织的‘预备议会’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论断是最无耻的谎话，这等于说，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是“几乎相同的东西”：预备议会是**伪造的**，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库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维埃在民主会议上反对联合的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在一起，其结果也足以使**联合彻底垮台**。第三，“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农民苏维埃的政权主要会扩展到农村去，而在农村中贫苦农民可以稳占优势。）“……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只是掩饰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那么这样的政权正是意味着革命的破产和失败。

不仅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而且也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无产阶级，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使它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运转起来，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民主派内部真诚联合的政权。”

※　　　　※　　　　※

请读者原谅，我们摘引了这样多的话，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确切地介绍一下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场。必须确凿地证明一个极为重要的事

实：**所有**这些党派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十分现实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所持的理由。

堂堂的《言语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话把布尔什维克痛骂了一顿。顺便说一下，我们引用的话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语报》在“挑动”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因此说什么，“同志们，要当心，敌人建议我们干的准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估计到一般的用意和具体的用意，就“相信”这是资产阶级在“挑动”我们去夺取政权，那我们就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资产阶级无疑永远会恶毒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嚣“要一下子‘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把他们彻底打垮。”这种叫嚣也可以说是一种“挑动”，不过是出于相反用意的挑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决不是“建议”我们而且从来没有“建议”我们夺取政权。他们只不过想用政权面临的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来**吓唬**我们。

不，我们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嚣吓倒。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至于马上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作为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这些**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如果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夺到了政权，那么它就能保证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

我们要完全实事求是地讨论那些会使某一时机变得不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疯狂的叫嚣吓倒，同时也不能忘记，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问题确实成了十分**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对我们的党有莫大的危险，比我们认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要危险得多。在这方面，

现在决不可能说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也许只有一两件例外。

对《言语报》的恶毒的谩骂，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背诵几句诗：

我们听到的赞许声

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

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资产阶级对我们这样切齿痛恨，这也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正确地**给人民指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和方法。

※　　　※　　　※

非常难得，这一次《人民事业报》没有赏我们一顿痛骂，但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指出“将由布尔什维克负责组阁”的前景，企图用这种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来**吓唬**我们。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吓唬我们的时候，自己却着实被吓倒了，被吓坏了的自由派的幽灵吓得魂不附体了。我可以同样肯定地说，在某些特别高级和特别腐朽的机关里，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类似的“联络”（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触的，老实说，就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勾勾搭搭的）委员会里，社会革命党人也能吓倒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第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等等这一切机关里，空气坏到极点，臭得令人作呕，长久地呼吸这种空气对**任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着实的惊恐是有感染力的，着实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个别革命者一时变成庸人。

尽管“按人之常情”来说，一个过去不幸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当部长或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能当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着实被吓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别人把我们吓倒，那就是犯了政治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很容易弄到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步。先生们，把你们的切实的理由摆出来！别以为我们会被你们的惊恐吓倒！

※　　　※　　　※

这一次，我们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说，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3]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辩护士的角色更合适些。

这位辩护士提出了**六条**理由：

（1）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2）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

（3）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

（4）无产阶级“不能使”这个机构“运转起来”；

（5）“环境非常复杂”；

（6）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新生活报》提出第一条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说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说，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说无产阶级现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说法显而易见是十分荒谬的。

很难设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象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请注意，这是指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争辩的材料中，我们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们说明了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也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会议的“各选民团”赞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试以苏维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

	赞成联合的	反对联合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	83	192

农民代表苏维埃	102	70
总计	185	262

可见，多数人总的说来拥护无产阶级的口号：**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同时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在增长。要知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民主会议，是由苏维埃的**昨天的**领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会议！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实际的**优势，在这里是**被缩小了**。

无论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目前都已经得到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里的**多数**的拥护，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 月 24 日的《工人之路报》第 19 号转载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4]第 25 号上发表的关于 9 月 18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消息。在这个会议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 4 个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萨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 **3 个**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和黑海省）和 **2 个**集团军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 **23 个**省和 **4 个**集团军的执行委员会。

可见，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

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是 3 个边区省（萨马拉省、塔夫利达省、黑海省）和 4 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这 3 个边区省份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富裕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 4 个工业省份中，农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农民最“**富裕的**”那些省份里的**贫苦**农民的资料，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40 票对 15 票。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之流对俄国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采取兼并政策，横施暴力的政策，已经自食其果了。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他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忠于这一事业。

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切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没有**脱离”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从而不仅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一下子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那种地主对农民、大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残酷压迫，不是共和制度下那种在花言巧语掩盖下继续实行类似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伦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一切），而是见诸行动的热烈同情，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措施，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所以，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永远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在和平问题这个当今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全**民族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活跃的和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

夺到政权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革命的**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叫嚷无产阶级脱离其他阶级，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在人们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　　　　※　　　　※

第二条理由是所谓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这大概“讲的是希腊语”，——法国人遇到这种场合常这么说。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适合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说冠冕堂皇、八面玲珑、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话，这种空话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赞成新生活派认为无产阶级脱离民主派真正活跃的力量的说法，因为这种话的**言外之意**是（或者说，这种话他们一听就明白说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和克伦斯基之流是“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是僵死的力量。这一点已经由联合的历史证实了。

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重大差别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右**翼，如《人民意志报》和《统一报》等等当作“活跃的”力量。而我们认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的教训因而抛弃联合的力量，才是活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积极的活跃的力量”

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以后），是无产阶级**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

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的向左摆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 9 月 24 日的声明就是向左摆的证明，他说他那一派不赞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联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的代表中中派一直占绝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摆证明：上面引的《人民事业报》关于民主派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保证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无论如何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绝重新同基什金联合的事实，以及外省**孟什维克护国派**（高加索的饶尔丹尼亚等）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证据，证明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群众将支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恰恰没有脱离民主派**活跃**的力量。

※ ※ ※

第三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这也许是最常见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所以它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毫无疑问，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使我们这些自称为社会党人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逃避**完成这种任务，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同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差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促使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

国家机构首先指的是常备军、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说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构，这就暴露出他们非常愚昧无知，他们既不肯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愿考虑布尔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说明的道理。

《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学识的社会党人。可是，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一本小册子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册已经印好，不日即可问世，书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1 卷。——编者注］）。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1917 年 4 月 4 日以来，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几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谈到过这一点。当然，《新生活报》本来可以声明他们根本不赞成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象这样一家经常傲慢地责骂布尔什维克对困难问题采取了所谓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却对这个问题完全避而不谈，这无异是证明自己思想贫乏。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构”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这样谈理论，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理论领域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中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确实**不需要**任何新的国家机构，那么苏维埃也就失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权利了，那么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消灭苏维埃的意图也就**是正当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新生活报》在彼得格勒市杜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经同他们结成联盟）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地方，所以《新生活报》这种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

发骇人听闻了。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会议上宣读的那份苏维埃多数派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所建立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构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机体，以代替旧制度国家机构衰朽的机体……”

这未免说得过分漂亮了一点，就是说，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思想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维埃**还没有**代替旧“机体”，而且这个旧“机体”并**不**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既是**沙皇制度的**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我国 1905 年的苏维埃，可以说只是腹内的胚胎，因为它们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苏维埃的全面发展。在 1917 年的革命中也还谈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时间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糟蹋了**苏维埃，把它们变成了清谈馆，变成了这些领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属品。苏维埃在李伯尔、唐恩、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领导下活活地腐烂了，解体了。苏维埃只有在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育起来，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力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或者仍不过是个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或者成为一种玩物。“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意味着苏维埃的瘫痪。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创造力没有建立起苏维埃，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构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涤罪所”，即苏维埃实际领教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历史。但愿这个“涤罪所”没有使苏维埃受到损伤，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

※ ※ ※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照新生活派的意思直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得出的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的空话，实质上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极巧妙地**收买**格沃兹杰夫、尼基京、普罗柯波维奇、策列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帮歹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这里我们就涉及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

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政府用一道命令就能够而且定会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象资本主义的看门狗白里安等资产阶级部长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员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之成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并不那么复杂的**记录**工作。

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监察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一贯天真得可爱的彼舍霍诺夫是一个真正的“政界的黄口小儿”，他早在 1917 年 6 月就咿咿呀呀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无产阶级一定会认真地把**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狂言**变成现实**。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监察**，使所有的季特·季特奇之流都受到**包围**，就象一个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董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季特·季特奇的名字。他们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 10 个甚至 100 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帐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注：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辛迪加化的意义。（见本卷第 181—226 页。——编者注）］

※　　　※　　　※

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条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使它运转起来。新机构苏维埃则借助“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已经**运转起来了。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

在它身上的**羁绊**。这个机构**已经**在运转，不过必须去掉那些妨碍它全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瘤。

为了补充以上所述，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方面加强民主制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和它整个历史创造活动一样，是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所有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力量，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现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

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贱民”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人联合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每周或每隔一定时间必须从该联合会取得他们工作踏实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一切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银行业的和企业联合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愈来愈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在过渡期间将保留这些专家较高的报酬，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我们说，整个资本家阶级一定会进行最顽强的反抗，但是苏维埃把全体居民组织进来就能粉碎这种反抗，对特别顽强和拒不服从的资本家自然必须惩办，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把他们关进监狱，只要无产阶级胜利了，象我今天在《消息报》上看到的那种事情就会**多起来**。我们这样说，当然丝毫不会陷入空想主义，不会离开极其冷静而实际地估计情况的立场。今天的《消息报》说：

“9 月 26 日有两个工程师到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声明说，有一批工程师决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协会。鉴于现在实质上已经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该协会愿意听从工人群众指挥，并且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愿同各个工人组织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回答说，理事会愿意在自己组织中成立工程师部，该部应当把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要点列入自己的纲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和社会主义者工程师团体的发起人近日将举行联席会议。”（1917 年 9 月 2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 ※ ※

有人对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

1905 年革命以后是 13 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管理的方法就是对 15000 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

而 24 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不能为了替穷人谋福利、为了反对富人而管理俄国。这 24 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 100 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都证明，就连彼得格勒杜马 8 月的选举也证明，党员人数同党的得票数的比例正是如此。可见，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 20 日领取大笔薪俸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妙法”，这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这个妙法就是吸引劳动者，吸引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了说明这种妙法是多么简便，效果是多么灵验，我们且举一个尽可能简单明了的例子。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让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常有的事，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

资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失去了干活的人而缴不起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一大帮法警、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要派一个哥萨克分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法警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们知道，撵人搬家的场面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濒于绝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愤怒，激起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随时都可能把法警和民警队打成肉酱。需要大量的兵力，而且一定要从某边远地区调几个团到大城市来，这样士兵就不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不致“传染上”社会主义。

假设无产阶级国家要让一个极其贫苦的家庭强行搬进富人住宅。假设我们的工人民兵分队由 15 个人组成：2 个水兵，2 个士兵，2 个觉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 1 人是我们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 1 个知识分子和 8 个劳动贫民，这 8 人当中至少必须有 5 个妇女，而且要有仆人、粗工等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 2 男 2 女住着 5 个房间，于是说：“公民们，请你们挤在两个房间里过冬吧，腾出两间房让住在地下室的两家搬进去。在我们还没有在工程师（您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们必须挤一挤。你们的电话要 10 家共用。这样可以不必跑遍各家铺子等等，可以节省 100 来个工时。其次，你们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轻劳动而没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 岁的女公民和 14 岁的男公民。他们每天要值班 3 小时，监督供应 10 家的食品的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记。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学生公民马上就把这项国家的命令抄成两份，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字据，保证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同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

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我们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把民主制教给人民。立宪民主党的女士们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最好的资料给女仆们作关于妇女平等的讲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讲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吻前任部长策列铁里。感激不尽的人民将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什么叫作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

是的，我们承认，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策列铁里按照他们的方式忠于民主制，并且在人民中间宣传这种民主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民主制有某种不同的概念，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看来，为了减轻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负担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子中那种根据贫民利益分配住房的**革命**措施。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对食品、衣服、靴鞋等等的处理，以及在农村对土地等等的处理都应当**这样**。我们可以**立刻吸引** 1000 万人，甚至 2000 万人组成的**国家**机构从事**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管理，而这样的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这样的机构只有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受资本主义的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兵并**逐渐**把它扩充（要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

自然，这种新机构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经营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

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产者、官吏和“社会党人”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 7 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实践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眼界狭窄的旧官僚分子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对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逼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来讲，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

※　　　　※　　　　※

同国家机构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扎罗夫同志在 9 月 27 日《新生活报》第 138 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十分有力又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巴扎罗夫同志是这样推论的：“苏维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构”，因为 7 个月的经验已经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经济部有几十份、几百份文件资料”已经证实，苏维埃虽然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消除经济破坏方面，并没有能取得稍微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门划分的、在每个部门内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心”的机构。“请看，问题不在于更换旧机构，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一直讥笑持有这种计划的人……”

巴扎罗夫同志所有这些同资产阶级论调一模一样、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断，简直是软弱无力得令人吃惊！

确实如此。说苏维埃在俄国某地某时曾享有“充分权力”，这简直是可笑的（即使这不是在重复资本家出于阶级私利的谎言）。所谓享有充分权力，就是要有支配全部土地、所有银行和所有工厂的权力；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经验以及有关政治同经济的关系的学术资料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小小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法就在于它**不**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对苏维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骤都**暗中破坏**，继续把持政府，保留支配土地和银行等等的权力，却又把经济破坏的罪责推在苏维埃身上！！联合的全部惨痛教训也在于此。

苏维埃从来没有掌握过充分的权力，它的措施除起缓解作用和加剧混乱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们全党的信念、纲领和策略来讲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证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简直是多此一举。《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了解我们对他们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生活派没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嘴巴上**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一面背诵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一面却时时抱着理论上是可笑的、实践上是反动的“超阶级观点”，并把这种为资产阶级的效劳叫作“全国性的”计划。

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更通俗一点讲：我们不是讥笑那些“计划”，而是讥笑巴扎罗夫之流不懂得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

从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对过苏维埃的**集中制**，反对过苏维埃的统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反对按生产部门成立工厂委员会，反对工厂委员会的集中化。巴扎罗夫在**无的**放矢。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讥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计划”，而是**改良主义**。因为在有了联合的教训之后，你们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谁说问题“不在于更换机构，而在于改良”，谁就是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所作的尝试。

我们所讥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说：“是呀，正是呀，我们恰好不反对改良，我们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们完全同意。”而巴扎罗夫由于没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细加思索，就上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扎罗夫**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间”立场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一向如此，将来还会永远如此。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不能理解阶级斗争，他们的政策是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可爱的公民们，去拟订“计划”吧，那不是政治，不是阶级斗争的事情，在那一方面你们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经济学家。请你们同那些准备研究调节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工程师及其他人联合起来吧，请你们的大“机构”（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认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银行和辛迪加等等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们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

们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别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讥笑，而会得到工人的感谢。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让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之下**来拟订“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来节省劳动的办法，探索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们要发给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为劳动者的利益**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不给他们饭吃。

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反对**剥削者而调节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我们只同意把所谓“全国性”理解为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权交给大多数人民，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也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

※ ※ ※

第五条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政权，因为“环境非常复杂……”

真是聪明人！他们也许愿意顺应革命，但只能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向往这种革命而发出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哀鸣。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06 页。——编者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5]才会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

第五条理由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因为这里既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没有任何别的思想。这里有的只是革命使之感到忧愁和恐惧的人们所发出的叹息。为了说明这种叹息的性质，不妨谈一下我个人经历的两件小事。

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个工程师曾经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被吓坏了，对情绪激昂、无法制服的工人充满愤恨。他（一个有学识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能和德国工人一样就好了，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在战争造成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

要是历史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正点到达社会革命，他是愿意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到了。请全体下车（Alleaussteigen）!"那时，有什么理由不从季特·季特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

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平静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大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在嘴巴上**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

七月事变后，承蒙克伦斯基政府的特别照顾，我有幸转入了地下。掩护我们这种人的当然是工人。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

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再给坏面包了。我们早就不指望在彼得格勒还能买到好面包。”

对七月事变的这种阶级估量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由于什么形势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是没有想到的。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要通过政治分析这种非常复杂的途径才会想到一切的根本，想到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

而被压迫阶级的人，哪怕是待遇很好和十分有知识的工人，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而且说得那样朴实直率、斩钉截铁、观点鲜明，令人感到惊奇，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我们”劳动者和“他们”剥削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资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斗。要砍树木就别怕木片飞迸。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们把‘他们’压了一下，‘他们’已经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赖，了。我们再压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压倒。”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　　※　　※

第六条，即最后一条理由：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会连带消灭整个革命)”。

先生们，请别吓唬人，你们吓不倒谁。我们已经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克伦斯基执政和它没什么两样）领教过这些敌对力量和它们的进攻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是怎样消灭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别富有、同革命特别“敌对”的地方小土地占有者阶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

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记得的。9 月 30 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会议召开（在对付起义农民的“军事措施”保护下召开！）以前要“容忍”克伦斯基执政（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列铁里布里根杜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条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暴徒、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请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无论《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觉悟的工人。你们说：“克伦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简单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克伦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竟敢说什么这将是“国内战争”，这将是“可怕的前途”！

不，先生们，你们欺骗不了工人。这将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绝望的骚乱。就是说，他们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想不顾一切地挑动人民大规模地重复在维堡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那种行动，**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想**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克伦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触怒人民。不过，先生们，你们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

真是卑鄙无耻到绝顶了：他们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马，利用伪造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选举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蹂躏人民的意志，蹂躏**工农的意志。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他们竟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农民起义象滔滔大江到处泛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主共和国中，竟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

9 月 30 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在 9 月 29 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为消灭俄国中部农村中仍**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做**什么事**。”*

同一家《人民事业报》在 9 月 29 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斯托雷平那套作风”在“革命的部长们”的办事方式中“依然清晰可见”。换句更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京、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 7 月 8 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 9 月 17 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顾**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推迟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 11 月底，而不是象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 10 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即将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会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会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的政府，对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明目张胆地进行**庇护**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竟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们说：“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的政府！”

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 6 月 19 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事情弄到了这种地步，还在一味地空谈和平而**不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还在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说：“必须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一个月，而他们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场……“必须容忍”。

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吗？？

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是骗不了士兵的！

工人和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克伦斯基政府了，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府将**立刻**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因此**一定**能立刻实现停战并迅速缔结和约。

我们农民军队的士兵就连一天，就连**多**一个小时都不会容忍这个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农民起义的克伦斯基政府违反苏维埃意志存在下去了。

不，社会革命党老爷们，克伦斯基的同党们，你们再也骗不了工人和农民了！

※　　　※　　　※

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问题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的那种进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逻辑上和政治上的非常惊人的错误，只有那些已经让别人吓得几乎神经失常的人才看不出来。

你们说："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会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说得好。不过可爱的同胞，你们都是些经济学家和有学识的人。你们都知道，拿民主派同资产阶级作对比是荒诞的和愚蠢的，这就象拿斗同尺作对比一样，因为世上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非民主派的（能参加旺代叛乱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各种敌对力量"，这是一句空话。而阶级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拥护它的还有地主）。

俄国也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分成三种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正是这三种主要"力量"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在俄国），不仅早已为科学的经济分析所证明，而且也为**一切**国家的整个现代史的**政治经验**、为 18 世纪以来欧洲**所有**革命的经验、为 1905 年和 1917 年**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了。

那么，你们是想恐吓无产者，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会把他们的政权消灭吗？你们的恐吓就是这个意思，也只有这个意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

好吧。比方说，如果资产阶级能够消灭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那剩下的就只是“联合”，也就是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或妥协。任何别的都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要知道联合已经试验了半年，已经遭到了破产，并且你们这些可爱而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自己也已经**放弃了**联合。

结果怎样呢？

《新生活报》的公民们，你们吓糊涂了，你们让别人吓得甚至连最简单的议论都不能自圆其说了，**连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数目**都弄不清了。

或者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这你们早已不赞成了，甚至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敢提了，因为它知道，在 4 月 20—21 日，人民用肩膀一撞就把这种政权撞翻了，现在更是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打翻这种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资产阶级，即由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愿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经济科学证明了的。经济科学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资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间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试用过不下几十种方法，但还是失败了。

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而不是归资产阶级，以便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还没有尝试过，而这是你们《新生活报》的先生们**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们用自己畏惧资产阶级的心理去吓唬人民。

第四种办法是连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

这就是说，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阶级政权仿佛可能被资产阶级搞垮而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等于**暗地里回到**同资本家**妥协**的立场!!! 很明显，谁害怕反抗，谁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谁教导人民说，“你们

应当害怕资本家的反抗，你们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谁就是**以此**号召重新同资本家妥协。

现在，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联合，同时他们又得到资产阶级的保护，而害怕无产者和贫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涂，《新生活报》也象他们一样，糊涂到了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地步。

※　　　　※　　　　※

害怕资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被人看作社会主义者——多么可耻！被机会主义败坏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在思想上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论调！

资本家的反抗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资本家比其他阶级更有觉悟，他们一下子就理解了苏维埃的意义，马上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谣诽谤的手段，制造军事阴谋，**来破坏苏维埃**，消灭苏维埃，糟蹋苏维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维埃变为清谈馆，长年累月地用无聊的空话和玩弄革命的把戏使农民和工人厌倦。

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23 页。——编者注］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只有那时，如果工人阶级政权有 **1 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顽抗的敌人，就会有 **100 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们斗争，而这些新战士至今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他们一直在贫困折磨和绝望状态中苟延残喘，

不敢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生活的权利，不敢相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全部实力也会为他们服务，不敢相信无产阶级民兵分队会完全信任地召请**他们**直接地经常地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

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办法**糟蹋**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他们觉得反正都一样**，因为一个挨饿的人不会去区分共和国和君主国，一个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去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

但是，一旦无论哪个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娘，随便哪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向财富卑躬屈节，而是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让无家可归的人强行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受工人监督；百万富翁隐匿财产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

如果我们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权交给无产阶级，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

※　　　※　　　※

担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即保证能得到贫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阶级政权会被资本家先生们“消灭”！这是多么近视！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

多么虚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属于“上等”（这是按资本主义的尺度，而实际上是**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讲到“正义”这个词，自己并不相信，而是习惯于把它当作一种空话，并不赋予它任何内容。

这里有个例子：

彼舍霍诺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派分子，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更志同道合的人了。没有哪个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阶级效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热烈地拥护“联合”、拥护同资本家的妥协！

请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读作：布里根）会议上的发言**不得不**供认：

“有两个纲领。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阶级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纲领。最坦率地维护这个纲领的是布尔什维克。而民主派其他部分的人也很难拒绝这个纲领。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视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民主派难以同布尔什维克决裂，拒绝这些阶级要求，首先是因为这些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我们在革命前为这个纲领奋斗过，为这个纲领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们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纲领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现在，这种危险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的要求多么正义和强烈，一概不予以满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须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 月 17 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当资本家们还掌权的时候，他所保卫的**不是**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私利。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资本家，和**他们的**秘密条约，和**他们的**兼并（侵占别人土地），和**他们的**银行的金融诈骗行为断绝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

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在**断绝这种关系**之后**，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绝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约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资本的枷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银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的国家的防御力量，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许多倍**。

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诺夫先生**不**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认它的要求是“**劳动群众**”即多数居民的要求，那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立场，**放弃了**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全部立场。

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纲领。

要知道，彼舍霍诺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统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们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或者克伦斯基的军队（他们是一路货）打败了布尔什维克，这些老爷们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维克的眼珠。

就连这样的一位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的要求的“正义性”。

在他看来，“正义”不过是空话。但是在半无产者群众看来，在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看来，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是关系到会不会饿死、能不能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挨饿者和破产者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妥协”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定会**得到**这些**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妙**”这个堂皇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正是在目前，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构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 25 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支持下有计划地掌握这种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记

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 月 1 日的《新生活报》社论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论，这套妙论特别危险，因为它是隐藏在同情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的，隐藏在“不要受人挑动”这种深奥的庸俗议论的烟幕后面的（可别落入这种关于挑动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维克，使他们**不要**夺取政权）。

这套妙论说：

“无论是 7 月 3—5 日运动的教训，还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场，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那它就要失去一切中间的、动摇的分子而遭到失败。”

如果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套议论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让步，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

因为发表这种议论的作者在谈到国内战争（这个话题恰好是通体漂亮的太太搭得上话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训**曲解到了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奠基人卡尔·马克思谈到**这些**教训，谈到**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时是这样论述的：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 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决心干到底（直译：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全部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须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军队〉；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 年德文版第 118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102 页。——编者注］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6]，我们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们有这样两种长处：温

和和谨慎”。在“我们”看来，世界历史的经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1917年两次运动的经验——透过莫尔恰林[7]的眼镜被歪曲了的经验。

让我们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镜来看看这个经验吧。

你们拿7月3—5日的事变同“国内战争”相提并论，是因为你们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佩列韦尔泽夫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先生们的特色（尽管他们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7月3—5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做过一点事情）。

我们姑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雏形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胚胎，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们就这样假定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训证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转入进攻，因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转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拿下许多东西。如果说这是国内战争（《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不是**如实地**看作自发的爆发向4月20—21日那种示威的转变），采取防御正是他们的弱点。

由此可见，“教训”同《新生活报》那些聪明人所说的**相反**。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连起义的打算都没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提出，它并**不在**我们和《新生活报》争论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争论的是“国内战争”即起义的**教训**，而不是革命政党由于显然缺乏多数人的支持而放弃起义的念头。

因为大家知道，1917年7月**过了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49%以上的选票），可见，得到的“教训”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那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们，请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内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争得多数，那就谈不到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间分子阵营中，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间分子的阵营中发生大摇摆。

为什么《新生活报》谈到 7 月 3—5 日事变的“教训”，却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呢？那是因为谈论政治问题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小团体中被资产阶级吓倒了的人们。

还有，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 7 月 3—4 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列铁里先生之流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是**自己的**先进战士而“社会联盟派”是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才开始**垮台**的。他们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格勒 8 月 20 日的选举所证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败。（《人民事业报》不久前**隐瞒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但这是欺骗自己和欺骗读者；根据 8 月 24 日《日报》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来看，立宪民主党人得票的百分数从 22%增加到 23%，绝对票数减少了 40%；布尔什维克得票的百分数从 20%增加到 33%，绝对票数只减少了 10%；所有“中间”党派得票的百分数从 58%下降到 44%，绝对票数减少了 60%！！）

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事变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垮台，也为两党中的“左”翼人数几乎增加到 40%这一情况所证实，这真是替遭到克伦斯基先生之流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报了仇”。

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 7 月 3—4 日事变中**赢得了**许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群众**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背叛**。这就是说，得到的“教训”和“新生活派”所

说的完全不同，这个"教训"就是：决不能离开沸腾的群众而去迁就"民主派的莫尔恰林们"，如果是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转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新生活报》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把精确估计**客观**形势作为策略的基础，而是荒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会议"混为一谈吗？

先生们，这简直令人可笑，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任何逻辑的嘲弄！

如果在**客观**形势中**没有**使阶级斗争激化到"国内战争"程度的根据，你们在**谈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这里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读者说明并且证明，在客观形势中**没有**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应该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议会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立宪会议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认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会议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哪怕只是可能性是以目前的客观形势为根据的，如果你们不是"信口"谈论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么，怎么能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会议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简直是嘲弄挨饿的和受蹂躏的群众！难道挨饿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吗？难道你们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经济破坏会允许"等待"到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在我方没有采取争取和平的重要步骤（即没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约）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许"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或立宪会议吗？难道你们有这样的材料，使你们能够断定，从 2 月 28 日到 9 月 30 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 10 月 1 日起到 11 月 29 日[8]

就会发展得极其平静、和平、稳步、合法，而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吗？难道前线的军队，由**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代表前线正式宣布“不会再打下去”的那个军队，会平静地忍受饥寒，直到“预定的”日子吗？难道由于你们把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暴行”，由于克伦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镇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吗？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在农民**国家**里镇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平静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作吗？

先生们，你们不要讥笑“斯莫尔尼学校张皇失措”[9]！你们张皇失措的程度并不小些。是你们在用张皇失措的言语和可怜的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染上了这种情绪，那他们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

尼·列宁

1917 年 10 月 1 日

正文和后记载于 1917 年 10 月《启蒙》杂志第 1—2 期合刊

再版序言载于 1918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本文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4 卷第 287—339 页

注释：

[1]《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是在维堡写的，最初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刊物《启蒙》杂志 1917 年 10 月第 1—2 期合刊。——[282]。

[2]1917 年 6 月 4 日（17 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发言中说：“现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走开吧，我们将取而代之。俄国没有这样的政党。”列宁当即在席位上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反驳说：“有的！”接着又在自己发言

时讲到这个问题，宣布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240 页）。——[283]。

[3]通体漂亮的太太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以制造流言、搬弄是非为能事的女人，见于该书第 1 部第 9 章。——[289]。

[4]《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和文学报纸（日报），1917 年 8 月 23 日（9 月 5 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担任该报编辑的有Б．В．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达·卡姆柯夫和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该报起初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机关报，1917 年 11 月 1 日（14 日）第 59 号起成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机关报，1917 年 12 月 28 日（1918 年 1 月 10 日）第 105 号起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1918 年 3 月 15 日迁往莫斯科。1918 年 7 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后被查封。——[291]。

[5]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12]。

[6]“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是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326]。

[7]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他夸耀自己有两种长处：“温和和谨慎”。——[327]。

[8]2 月 28 日（3 月 13 日）指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 月 30 日（10 月 13 日）是临时政府最初规定的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这个日期后来被它改为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330]。

[9]这句话出自《新生活报》上刊登的俄国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雷声又响了》一文。

斯莫尔尼学校即斯莫尔尼宫。1917 年 8 月 4 日（1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从塔夫利达宫迁到这里。它的一个房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办公处。1917 年 10 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也设在此地。列宁在这里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30]。

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

列宁

（1917 年 12 月 24—27 日〔1918 年 1 月 6—9 日〕）

“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经济破坏所造成的地狱。”资本家同他们的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拥护者就是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的。

我们回答说，布尔什维克执政虽然才两个月，可是已经向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只有那些不愿意联系起来看历史事件或者不善于联系起来评价这些历史事件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到，军队、农村和工厂里的各种不民主的制度，在几个星期内就几乎被彻底摧毁了。不经过这种破坏，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不愿意看到，那种在拖延战争、用秘密条约掩饰掠夺和侵略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帝国主义谎言，在几个星期内就被争取真正民主和平的真正革命民主的政策代替了。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实际成果，即实现了停战和百倍地加强了我们革命的宣传力量。他们不愿意看到，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

有些人看不清历史的前景，他们被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他们被旧事物的急剧破灭、被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建筑崩溃倒塌的折裂声、巨响和“混乱”（表面上的混乱）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被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即变成了内战的阶级斗争吓坏了，而这是唯一合理的、唯一正义的、唯一神圣的战争，这不是神父所说的神圣战争，而是凡人所说的神圣战争，即被压迫者要推翻压迫者，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实质上，所有这些受到束缚的、被弄得目瞪口呆的、被吓坏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手下的职员”，常常不自觉地以那种“道听途说”的、陈旧的、荒谬的、温情的、知识分子庸俗的关于“实施社会主义”的观念为指导，抓住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重复着被那些

不学无术和一知半解的人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把这种“实施”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计划，硬加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

这种思想是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更不用说这种计划了。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施”的；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助产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的前提和含意就是被抑制着的战争的状态，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斗争措施的状态。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责备过公社，认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不够**坚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02 页和第 206—207 页。——编者注]

实质上，知识分子对于镇压资本家的反抗而发出的这种种号叫，说得“客气”一点，不过是旧的“妥协主义”的复活。如果使用无产阶级的直率的说法，那就得说：是继续向富人讨好的奴才行为，这就是反对现在工人对资产阶级、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可惜还太弱，还不够坚决）的号叫的实质。一个妥协派的部长，好心肠的彼舍霍诺夫在 1917 年 6 月曾经宣布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这个好心人甚至没有怀疑过，反抗确实应该**被粉碎**，它**一定会**被粉碎，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种粉碎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镇压资本家的反抗，因而也就是系统地对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使用**暴力**。

富人的贪婪，肮脏的、狠毒的、疯狂的贪婪，他们的食客的那种惊惶万状和奴颜婢膝，这就是现在从《言语报》到《新生活报》的知识分子大肆叫嚣，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使用暴力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叫器，他们的抱怨的话，

他们关于“自由”（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自由）的虚伪叫喊等等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假如人类能够来一次精彩的跳跃，一下子就跳到社会主义，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没有剥削者的切齿痛恨，没有剥削者用迂回办法维护或恢复旧制度的多种尝试，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对这种尝试作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毛皮一刻不湿，他们“愿意”进水洗一洗。

当资产阶级和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职员、医生、工程师等等采取最极端的反抗手段时，这些知识分子就吓坏了。他们怕得发抖，他们更加凄厉地哀号必须回到“妥协主义”上去。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对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的反抗手段只能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商议和规劝，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起来，掌握好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学会**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剥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剥削者对他们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他最后的藏身之所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滋生（而且必然滋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厚颜无耻的肥壤沃土。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成长壮大、学习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旧亚当”[1]。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

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载于1929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91—194页

注释：

[1]“旧亚当”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记》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199。

怎样组织竞赛？

列宁

（1917 年 12 月 24—27 日〔1918 年 1 月 6—9 日〕）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私人进取心及其他绝妙的品质和魅力。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品质的意义和不顾“人的本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稍微**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而且还意味着排斥竞赛，而代之以社会阶梯上层的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下一步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

他必需品的贸易。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工人都不抱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他们经受了这些磨炼，他们知道要粉碎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丝毫没有染上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和其他废物的幻想，这些人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指骂"资本家、"痛斥"资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去掉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象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用全国广大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被迫劳动，——这种伟大的更替除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方面的**即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仍旧要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

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富人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工具。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的。从**一己私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神父、录事、果戈里笔下的那类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的那种伟大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自我安慰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的卑鄙私利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借掠夺来管理，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

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 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象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头脑的农民和劳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么，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

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这前后两种人，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在这种社会中，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

完全能够做到和完全能够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范围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学问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干什么事都是开一个头但又半途而废，——这是"有学问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低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缺点和失策，这些东西在我国革命的错误、缺点和失策中占了不小的地位。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的意见是不行的。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建议和意见是一回事，组织**实际的**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建议和意见，可是他们"笨手笨脚"到了可笑、**荒谬**和丢脸的地步，没有本事去**实行**这些建议和意见，**切实监督**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

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3 页。——编者注］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放开手脚，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这就是必须**实际**安排好的事情。我们的“公社”、我们的来自工农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

者，应当为这些**实际**成就而自豪（这里加上**尤其**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习惯于而且**过分**习惯于以自己的空泛的意见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切实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成千上万种方式和方法，应当由公社本身、由城乡基层组织在实践中来创造和检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具有活力，保证成功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标，即**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肃清**骗子这种跳蚤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有的地方会监禁十来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各个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有的地方会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在他们监禁期满后发给黄色身分证，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改过自新以前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加以监视。有的地方会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还有的地方会想到把不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例如，把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方式愈多，共同的经验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看哪一个公社，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看哪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看哪里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给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和协作社以及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应当通过这些工作让**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且把他们提拔上来，参加全国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载于 1929 年 1 月 20 日《真理报》第 17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5 卷第 195—205 页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列宁

（不晚于 1918 年 1 月 3 日〔16 日〕）

立宪会议决定：

一

1. 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 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 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 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 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 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三

1．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这次空前的罪大恶极的战争的血泊之中，立宪会议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争取在各国人民之间缔结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的和约。

2．为了同一目的，立宪会议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

立宪会议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出军队、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2]。

3．立宪会议认为苏维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立的债约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资本即金融资本的第一个打击，并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

四

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的，当时人民还不可能全体都起来反对剥削者，还不知道剥削者为保护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进行的反抗会多么激烈，还没有实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立宪会议认为，如果它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即使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也是根本不正确的。

而就问题实质来说，立宪会议认为，现在正是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刻，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立足之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全部任务就是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同时，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不过它的任务只限于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而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

载于 1918 年 1 月 4 日（17 日）《真理报》第 2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5 卷第 221—223 页

注释：

[1]《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草案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18 年 1 月 3 日（16 日）会议上提出的。草案以多数票（有两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后，交协商委员会最后审定。《宣言》发表于 1 月 4 日（17 日）《真理报》第 2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 号。1 月 5 日（18 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了《宣言》，并建议批准。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拒绝予以讨论。《宣言》于 1 月 18 日（31 日）被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后来被写入 1918 年俄罗斯联行宪法，作为它的第 1 篇。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时，删去了原稿中涉及立宪会议的地方。

斯大林和尼·伊·布哈林参加了草案的起草：列宁手稿的第 2 部分中，有斯大林的修改；第 4 部分第 2 段是由布哈林起草、列宁审定的。——224。

[2]1917 年 12 月 6 日（19 日），芬兰议会通过了宣布芬兰为独立国家的宣言。12 月 18 日（31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芬兰独立的法令。列宁亲自把法令文本交给了芬兰政府代表团团长、芬兰政府首脑佩·埃·斯温胡武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1917 年 12 月 22 日（1918 年 1 月 4 日）批准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府根据12月2日（15日）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停战协定，向波斯政府提出了关于制定撤退波斯境内俄军的总计划的建议。

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并公布于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真理报》第227号。——228。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

列宁

（1918 年 1 月 6 日〔19 日〕）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些阶级为争取它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苏维埃一直在增加、发展和巩固，它根据本身的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这种决裂的表现，便是举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

根据十月革命前拟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反映了过去在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当时，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候选人的票时，还不可能在拥护资产阶级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应该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拚命反抗，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劳动阶级根据经验确信：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

在 1 月 5 日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由于前面提到的情况，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的党占了多数。当然，这个党拒绝讨论苏维

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议，即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样，立宪会议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因此，目前在苏维埃中显然占有绝大多数、并得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退出这样的立宪会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在立宪会议外面，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在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激烈的斗争，它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说劳动阶级为了摆脱剥削而对剥削者的反抗进行必要的武力镇压是非法的暴行，它们替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怠工分子辩护，甚至还赤裸裸地号召采取恐怖手段，而"一些不知名的团体"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手段了。因此，留在立宪会议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显然只能是给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解散立宪会议。

载于 1918 年 1 月 7 日（20 日）《真理报》第 5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5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5 卷第 235—237 页

注释：

[1]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1 月 6 日（19 日）会议审议了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会议前一天，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初稿（见本卷第 451—452 页）。在会议召开前，列宁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法令提纲。会议逐条宣读和批准了提纲。根据人民委员会记录，对第 2 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并指出穆斯林党团的一部分人也退出了"。对其余各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

1 月 6 日（19 日）深夜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多数票（有 2 票反对、5 票弃权）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列宁发表了关于解散立宪会

议的讲话（见本卷第 242—246 页）。列宁的草案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的基础。——239。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

列宁

（1918 年 1 月 6 日〔19 日〕）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是由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而这个革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任务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 1905 年的事变之后，毫无疑问，沙皇制度已经末日临头，只是因为农村的落后和愚昧，它才爬出了深渊。1917 年的革命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党因大势所趋而变成了共和党，另一方面出现了苏维埃这种民主组织。苏维埃在 1905 年就建立了，那时社会党人就已经懂得，随着这些苏维埃的建立，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正在形成。由人民完全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是一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制形式。

革命产生了两种力量：群众为推翻沙皇制度而实现的联合和劳动人民的组织。当我听到十月革命的敌人叫嚣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时，在这种场合我总是向他们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苏维埃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世界革命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们抱残守缺，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所以反对这种世界上任何革命中都不曾有过的强大组织。而反对地主的人都参加农民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容纳了所有致力于创造性工作而不愿无所事事的人。人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国，它分布得愈密，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可能就愈小，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繁荣是不相容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他们反对我们的苏维埃，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

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因此，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群众愤怒的加剧是某一个党、某一个人引起的，或者象有些人叫喊的那样，是“独裁者”的意志引起的，这再可笑不过了。革命的烈火完全是由俄国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点燃起来的，战争尖锐而严峻地向劳动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奋不顾身地勇敢前进，或者是毁灭——饿死。

革命之火的光辉就表现在建立了劳动者革命的支柱苏维埃。俄国人民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从沙皇制度跃进到了苏维埃。这是一个确凿的、任何地方还不曾有过的事实。各国资产阶级的议会，由于被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锁链束缚，从来没有对革命运动给予过任何支持，而苏维埃却燃起革命的烈火，它坚决地命令人民：斗争！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组织起来！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力量所唤起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错误和失策，但是谁都知道，任何革命运动都免不了会产生暂时的混乱、破坏和无秩序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等于战争，等于屠杀，这种现象引起并且加剧了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之间的冲突。谁要是说我们以前拥护过立宪会议而现在却把它“驱散”，那他就是没有一点头脑，只会说一些漂亮的空话。因为过去，同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的共和国相比较，立宪会议在我们看来，要比那些臭名昭彰的政权机关好，但是，随着苏维埃的出现，这种全民的革命组织当然无可比拟地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议会，这种现象我还在 4 月间就已着重指出。苏维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所有制，促进彻底的革命，即扫除一切资产阶级制度残余的革命，推动我们去引导人民建设自己的生活。我们已经着手从事这个伟大的建设，我们这样做好极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呈现在人民面前就那样纯洁、平稳和完美无缺，不可能不引起内战、怠工和反抗。谁要是向你们证明事情不是这样，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套中人[1]。（热烈鼓掌）4 月 20 日的事变是人民自己独立地起来反对妥协的政府，并没有“独裁者”或政党的任何指示，这种现象说明资产阶级的基础在当时就是薄弱的、不稳

固的。群众已经感到自己的力量，因此有人为了讨好群众，开始玩起有名的更换阁员的把戏，以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但是，人民很快就看穿了，特别是在克伦斯基的两个口袋装满了同帝国主义者签订的掠夺性秘密条约和他调兵进攻以后。被欺骗的人民逐渐明白了妥协派的全部行径，他们不能再忍耐了，结果便爆发了十月革命。人民尝够了拷打、死刑和大屠杀的滋味，从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刽子手们要他们相信，劳动者起义要怪布尔什维克或什么“独裁者”，那是枉费心机。人民群众内部的分裂和各种会议上的分裂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一直在领会十月革命，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次革命实际表明，人民应当怎样把土地、自然富源、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夺到自己手中，工农国家手中。我们说：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斗争。人民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于是我们召集了立宪会议。但是，人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名声显赫的立宪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们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要打倒怠工者。当我从沸腾着的、充满生机的斯莫尔尼来到塔夫利达宫时，我觉得好象是置身在死尸和木乃伊的中间。他们使用了所有的办法，采取了武力和怠工来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把人类最大的骄傲——知识也变成了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他们这样做虽然稍微打乱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但是他们不能并且永远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苏维埃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不是用老爷方式，而是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方式去摧毁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

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就等于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俄国苏维埃把劳动群众的利益置于改换新装的叛卖性妥协的利益之上。从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这些过时人物的演说中，发出了一股陈腐发霉的臭味，他们仍旧在哼着令人厌倦的停止内战的老调。但是，只要卡列金仍旧存在，只要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仍旧藏着一个“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我们就无法避免内战，因为我们决不会为换取世上任何东西而让出苏维埃政权！（热烈鼓掌）立宪会议再次表

示要拖延苏维埃向它提出的一切迫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任务，我们已经给了回答：一分钟都不能拖延。根据苏维埃政权的意志，现在解散不承认人民政权的立宪会议。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大本营被粉碎了，他们的反抗只能加速和引起内战的重新爆发。

立宪会议立即解放，苏维埃革命共和国一定胜利。（热烈鼓掌，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载于 1918 年 1 月 9 日（22 日）《真理报》第 6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5 卷第 238—242 页

注释：

[1]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44。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列宁

（1918年2月21日）

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我们的军事谈判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傍晚离开列日察到德文斯克去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拖延答复。它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人民委员会决定：**（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2）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务必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3）所有铁路组织及与之有关的苏维埃，必须全力阻挠敌人利用铁路设施；在退却时必须破坏轨道，炸毁和烧掉铁路建筑物；全部车辆——车厢和机车——立即开往我国东部内地去。（4）凡有落入敌人手中危险的全部谷物储备和存粮以及一切贵重财物，应当无条件地销毁；责成各地苏维埃监督执行，并由各苏维埃主席亲自负责。（5）彼得格勒、基辅以及新战线沿线所有城镇乡村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动员起来组成挖壕营，在军事专家指导下挖掘战壕。**（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7）一切反对革命的国防事业而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以及想利用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挖掘战壕和修筑其他防御工事。**（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2 月 21 日于彼得格勒

载于 1918 年 2 月 22 日（3 月 9 日）《真理报》第 32 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31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5 卷第 357—358 页

注释：

[1]《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一法令于 1918 年 2 月 21 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2 月 22 日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并印成了单页。——366。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列宁

（1918 年 4 月）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和平（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固的和平），因而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

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 1918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决议第 4 段（第 4 部分），在谈到劳动者的自觉纪律以及同混乱和组织涣散现象作无情的斗争的那一段（或那一部分），已经把这个任务向一切被压迫劳动群众明确地提出来了。[注：见本卷第 114—115 页。——编者注]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和平不稳固，自然不是由于它现在想要恢复军事行动；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等等）外，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会想到这种事情。和平不稳固，是由于在东西两面同俄国接壤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主战派随时可能占上风，俄国的暂时虚弱使他们跃跃欲试，仇视社会主义和酷嗜抢劫的资本家们也在怂恿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纠纷，对于我们说来，才是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和平保证。这种纠纷一方面表现在西欧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重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为日美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的帝国主义竞争极其剧烈。

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

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使国防力量真正有所增强。

同样很明显，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

顺利解决我们当前首要的组织任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劳动群众中一切觉悟的分子，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纪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受资本剥削的群众由于自身的涣散和不成熟，当时的反抗极其微弱，而且还在于自发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 1917 年 10 月 25 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

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

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无论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同克伦斯基之流、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这个任务都曾占据首要地位。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远未完成（而且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但是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因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明显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个任务也远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对这个任务不能忽视，因为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和走卒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然试图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镇压剥削者反抗这个任务，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到（大约）1918 年 2 月或者说到鲍加耶夫斯基投降这个时期中，已经大体上解决了。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当然，我们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可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内战形式进行反抗，管理的任务**不可能**成为**主要的中心的**任务。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

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应该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一项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前的总口号

条件极其苛刻和不稳固的和平，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其代表为克伦斯基和支持他的孟什维克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遗留给我们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观形势，必然使广大劳动群众十分疲惫，甚至精疲力竭。他们迫切要求（也不能不要求）一定的休息。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活动和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行径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排除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实际解决这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看来好象是一种怪论，但事实上，在上述客观条件下，这却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由于当前形势的具体特点，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关于土地社会化、工人监督等等法令，实际解决这些最基本的任务同克服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已经成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一方

面，劳动**群众**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那些鄙夷地拒绝把这些如此“陈腐的”和“庸俗的”口号提到首要地位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仅仅一年、摆脱克伦斯基之流还不到半年的小农国家里，当然还有不少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每一次长期的和反动的战争带来的野蛮残暴行为更加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还产生了不少悲观绝望和无端愤怒的情绪；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走狗（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挑拨政策，那么，非常明显，要使群众的情绪完全转变，要使群众转到正规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优秀的和最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需要作出多么长期而顽强的努力。只有贫苦群众（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实现了这种转变，才能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尤其是最顽固的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处于 1793 年和 1871 年达到的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水平，并且在一个方面无疑还超过了一些，这就是用法令确认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最高的国家**类型**——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而不做到这一点，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虽然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规定当前任务就会不确切，不具体，其中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

这一点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好比一支打胜仗的军队的状况，它已经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比如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地盘，它必须暂停进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和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军队暂停进攻，正是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地盘，即为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暂停”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所谓“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只能是带引号的，只是个比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暂停进攻的通令，可以实际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也谈不上我们不再继续剥夺资本。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

监督的工作，我们就能解决这个任务，就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但是，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是否等于承认某些事情做错了呢？丝毫不是。我们再拿军事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兵就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就完全可以想见，要超出这个限度，就有必要调来重炮兵。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兵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不是承认轻骑兵的胜利的进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走狗常常责骂我们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这种责骂是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走狗之口。因为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是**当时**的情况所绝对要求的：第一，**当时**资本是通过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鲍加耶夫斯基等人进行军事反抗（格格奇柯利直到目前还在进行这样的反抗）。粉碎军事反抗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支配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他们或者是在鲍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或者是还能用**怠工**不断进行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粉碎了怠工。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势之下都是适当的，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同资本作斗争呢？这样想是幼稚无知。我们用轻骑兵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兵。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

我们一分钟也不放弃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已经胜利地结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它绝不能再生长任何资产阶级这种时代已经来到的时候，还把“赤卫队式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应该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具体些说，用**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而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迅速地在全民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的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粉碎了怠工以后，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专家也完全服从我们。由于整个计算和监督工作搞得相当“晚”，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上班”了，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

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2]。

自然，资产阶级的走狗，尤其是象孟什维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帮下等奴仆，会因为我们承认后退了一步而耻笑我们。可是我们丝毫用不着去理睬这种耻笑。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要努力及时做完尚未完成的事情。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遭受过局部的失败，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暂时后退过。而我们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

我们从实际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需要 1000 名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假设应当付给这些“头等明星”——当然，其中大多数叫喊工人腐化叫得最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受资产阶级道德腐化最深的人——每年每人 25000 卢布。假设这个总数（2500 万卢布）增加一倍（假定对成绩特别优良而迅速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组织技术任务的人给以奖金），或者甚至再加三倍（假定还要聘请几百个要价更高的外国专家）。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

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花费 5000 万或 1 亿卢布，能不能说是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数十亿卢布，而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能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我们的**工作的程度。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正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都会认识到：要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是办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 5000 万或 1 亿卢布的“贡赋”（因我们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就只有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资本主义遗产”、“拘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公产盗窃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产”）。如果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来，有了纪律，振奋起精神，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免除这项“贡赋”，甚至在这之前，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的提高，就能缩减这种“贡赋”。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了解目前时局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任务是一个关键。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银行

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征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适当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规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整个计算和监督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自然，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一项任务，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形下，这项任务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进行投机活动和投机买卖。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要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做出下列的实际成果：增加人民银行分行的数量，吸收存款，简化储户存款取款的手续，消灭“排队”现象，逮捕和**枪毙**受贿者和骗子等等。先把最简单的事情切实做好，把目前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再准备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巩固并且整顿那些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事业（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等），借此准备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没有这种垄断，我们就不能用交纳“贡赋”的办法“摆脱”外国资本[3]。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一般的征税工作，特别是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工作，我们也非常落后。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这是一项在原则上完全可行并且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措施）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仍然更接近于夺取的方法（为了穷人，从富人手里把俄国夺取回来的方法），而不是管理的方法。可是，我们要想更加强大，要想更稳固地

站住脚，就必须转而采用这后一种方法，就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但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4]。

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过迟再一次表明，当前迫切需要着手的正是组织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是要彻底巩固已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准备一次“包围”资本并迫使它“投降”的战役所必需的。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但在实行时应当十分慎重，逐步进行，用实际经验检验每一步骤，而且，第一步当然是**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对每个资产者（农村资产者也在内）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将是进到完全“包围”敌人和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真正全民计算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步骤。

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遗产”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尖锐。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的**苏维埃的**经验）并且**感受到**：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和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而主张“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神圣的”私有企业不可侵犯。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的论点是多么正确，这些思潮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努

力把由**苏维埃**即国家实行监督和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破除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事，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斗争。

我们已经把工人监督制定为法律，可是它刚刚开始深入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刚刚开始深入他们的意识。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没有表报，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对计算和监督漫不经心就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之流，因为**只有**在我们解决不了计算和监督的任务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在鼓动工作中说得不够，先进的工人和农民也想得不够，说得不够。可是只要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只要先进工人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对监督掉以轻心的人组织并开展胜利的和无情的斗争，就不能从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工人监督）进到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 7 小时或 6 小时以至更少。这就非搞好对**粮食**和**粮食生产**（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不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一种便于过渡到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计算和监督的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在俄国，这种组织不象在先进国家里那样发达，可是还是拥有 1000 万以上的社员。前几天颁布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5]，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清楚地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形势和任务的特点。

这个法令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以及仍然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合作社达成的一种协议。说它是协议或妥协，是因为第一，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不仅参加了法令的讨论，而且实际上还取得了表决权，法令中有一部分条文因受到这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删掉了。第二，这种妥协实质上就是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入社的原则（这是唯一的彻底无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还放弃了一地全体居民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放弃这个同消灭阶级的任务相符合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原则，就给了“工人的阶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这种场合叫“阶级合作社”，只是因为它们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继续存在的权利。最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完全排除出去的条文也大大放宽了，只禁止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的老板进入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那时我们就能通过各地苏维埃的粮食部门，通过各地苏维埃下设的供给机关，使居民都参加统一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社，而用不着资产阶级合作社的协助，用不着对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让步，这种原则使得工人合作社仍然与资产阶级合作社**同时并存，而不是**使这个资产阶级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把两种合作社合并起来，**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权，**自己**监视富人的消费。

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这种协议时，具体确定了自己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策略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向前进展的条件，这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缓慢些，但是会更稳固，能更可靠地保证根据地和交通线，更好地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苏维埃现在能够（**而且应该**）用一种非常明显、简单、实际的尺度测量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绩，这就是看合作社的发展有多少村社（公社或村庄、街区等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包括全体居民。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我们苏维埃政权正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它已经战胜了剥削者——从克伦斯基到科尔尼洛夫，因而有可能立即开始解决这项任务，直接着手执行这项任务。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可以只花几天工夫，在这个大国的各个角落镇压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可以只用几个星期，而要切实地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至少（尤其是在极其残酷和带来极大破坏的战争以后）需要几年的工夫。这个工作的长期性完全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需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条件非常优越，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也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矿石（乌拉尔一带）、燃料（西西伯利亚的煤、高加索和俄国东南部的石油以及中部地区的泥炭）、极丰富的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卡拉布加兹湾）等等。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就是：第一，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现在这一工作正在突飞猛进，那些被资产阶级陈腐观念所蒙蔽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了解，由于存在苏维埃组织，现在人民“下层”中的求知热情和首创精神是多么高涨。第二，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情况特别不好，要是相信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或为私利而替资产阶级效劳的人的说法，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些人不懂得，从来没有而

且也不会有一种革命是不被旧事物拥护者责骂为崩溃和无政府状态等等的。自然，刚刚摆脱空前残酷压迫的群众，他们的情绪是沸腾激昂的；要群众培植出劳动纪律的新基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完全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这种工作甚至还不可能开始。

我们绝不受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保住自己旧有的特权已经绝望）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掩盖明显的坏事。恰恰相反，我们要揭发它，加强用苏维埃的方法同它斗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不能战胜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克伦斯基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复辟的真正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便不能设想。

俄国无产阶级最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6]。这项工作应该加以支持和全力推进。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7]，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

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

组织竞赛

说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意义，这是资产阶级谈到社会主义时喜欢散布的一种谬论。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通过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对群众的奴役，第一次开辟了真正大规模竞赛的途径。正是苏维埃组织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上的民主转到劳动群众实际参加**管理**，才第一次广泛地组织竞赛。在政治方面实行竞赛比在经济方面容易得多，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正是经济方面的竞赛。

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方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这点，实际上却使报刊受资本的支配，拿一些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琐事供“小百姓”消遣，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8]，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在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必须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那些满篇谎言和无耻诽谤的资产阶级报刊，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我们差不多还没有着手进行这种艰巨的然而是能收效的工作——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在生产粮食衣服等等的过程中实行表报制度和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表报变成生动的实例（既有使人厌弃的例子，也有令人向往的榜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在资本主义社会，统计纯粹是“官府人员”或本行专家的事情；我们则应该把它带到群众中去，使它普及，让劳动群众自己能逐渐懂得和看到应该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样休息，休息多久，使各个公社经营的**业务成绩的比较**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和研究的事情，使优秀的公社立即得到奖赏（如在一定时期内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提供许多文化或艺术方面的福利和奖品等等）。

一个新的阶级作为社会的领袖和指导者走上历史舞台时，从来没有不经过极大的“颠簸”、震撼、斗争和风暴时期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选择适合新的客观环境的新方法上，也从来没有不经过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时期的。趋于灭亡的封建贵族在报复战胜和排挤它的资产阶级时，不仅施展了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种种图谋暴动和复辟的活动，并且还不断讥笑那些没有王公贵族那种长期执政的素养而胆敢执掌国家“神圣大权”的“暴发户”、“无耻之徒”的低能、笨拙和错误，——现在，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和

马尔托夫之流，所有这帮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或资产阶级怀疑论的英雄，对于“胆敢”夺取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也正是采用这种报复手段。

不用说，新的社会阶级，而且是以前一直受压迫、被贫困和愚昧无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级，要适应新的地位，认清环境，搞好自己的工作，选拔出**自己的**组织家，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显然，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过去不可能取得从事大规模的、包括千百万公民的组织事业的经验和技能；要把旧的、差不多完全从事鼓动工作的技能改造过来，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情。可是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们明确意识到必须转变，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标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在“老百姓”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被资本摧残、毁灭和抛弃，而我们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现、鼓励、扶持、提拔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没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着手学习这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学会。

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杂在没有经验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瞎忙乱干、杂乱无章、空忙一阵的现象，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9]——从别洛鲁索夫到马尔托夫，为采伐古老森林时多砍下一块碎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路，力求尽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样的人，经过多次考验，让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然后才应提拔到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的负责岗位上来。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注：见本卷第 114—115 页。——编者注］。现在大家都乐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 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作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 1917—1918 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

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唯有**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验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象铁，却很象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

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强制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作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

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10]，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作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要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

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象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象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

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前进报》[11]、《人民事业报》或《我们时代报》[12]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苏维埃的**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 年 10 月以及 1917 年 2 月和 10 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

滥，汹涌澎湃，漫过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

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 8 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十分独特，因为他们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又在两者之间意味深长地加上一个词：“飞跃”（有些人想起从恩格斯著作中看到的片言只语，作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补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08 页。——编者注]）。“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加以钻研的大多数所谓社会主义者，都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 10 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所谓“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

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 60 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13]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会议，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赞同和支持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

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结论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退却；这是等待西欧极其缓慢地成熟起来的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现在必须用全力抓住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的任务，直至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这下一个环节闪耀着特别的令人向往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

我们可以把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这些口号同通常流行的“革命家”这个概念放到一起试试看……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不禁义愤填膺，他们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了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专家妥协，同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改良主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可怜的革命家的不幸就在于，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自然，对我们党持**这种**“正式”反对态度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集团和阶级的代表人物中，个人的例外当然是有的，而且总是会有的。可是，各类社会代表人物始终是存在的。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

锐地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折关头都会犹豫和动摇，由1917年3月间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转到5月间的颂扬“联合”，转到7月间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或者为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痛哭流涕），又转到10月底小心翼翼地回避布尔什维克，再转到12月间支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1918年3月和4月间，这种人物又常常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说：“我可不是那种为‘机关’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精神唱赞歌的人。”

这种人物的社会来源就是小业主，他们被战争的惨祸、突然破产以及饥荒和破坏的空前折磨弄得暴怒发狂，他们疯狂地东奔西窜，寻求出路和解救办法，他们摇摆不定，时而信任和支持无产阶级，时而又爆发绝望情绪。应该清楚懂得和明确了解：靠这种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转变时刻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狂热。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匀整的步伐。

载于1918年4月28日《真理报》第83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85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165—208页

来源：《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

注释：

[1]《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列宁受党中央全会的委托于1918年4月间写的，手稿中标题为《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6日，中央委员会讨论并一致批准了这个《提纲》，决定以文章形式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并出版单行本。——[150]。

[2]指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1页）。按照这个决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额每月是500卢

布，另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每人补贴 100 卢布。这大体上相当于中等工人工资水平。

1918 年 1 月 2 日（15 日），人民委员会为答复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询问在列宁起草的一项决定中解释说，1917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1 日）的法令并不禁止付给专家以超过规定界限的报酬，这样就批准了对科学技术专家支付较高的工资。——[161]。

[3]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对对外贸易实行监督。最初，由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调节对外贸易，审查进出口商品申请和监督海关活动。1917 年 12 月 29 日（1918 年 1 月 11 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由工商业人民委员部监督对外贸易。但是仅仅靠监督和关税保护，还不可能可靠地保护苏维埃经济免受外国资本的侵害。1917 年 12 月，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草稿的第 11 条中就提出了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444 页）。1918 年 4 月 22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法令。——[164]。

[4]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强征和特别税曾是补充预算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地方上尤其如此。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俄政府采取了向正规课税过渡的措施。1918 年 5 月 17—21 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财政部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必须实行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建议，并选出专门的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了相应的条例。1918 年 6 月 17 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对 1917 年 11 月 24 日的直接税法令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了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严格制度（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441—443 页）。——[165]。

[5]指《关于消费合作组织的法令》。这个法令的最初草案是列宁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12—213 页）。粮食人民

委员部根据列宁的草案拟了一个详细的法令草案，由粮食人民委员亚·格·施利希特尔签署，公布于 1918 年 1 月 19 日（2 月 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14 号。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机关领导。人民委员会为了利用现有的合作社机构来开展商业工作和搞好对居民的粮食分配，不得不对合作社工作者作了一些让步。1918 年 3—4 月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和粮食组织三方代表举行谈判，重新制定了法令草案。4 月 9 日和 10 日，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经列宁作了补充和修改后通过。法令的第 11、12、13 条完全是列宁写的。4 月 11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同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指出这个法令是妥协的产物，有一些重大缺点，因而是作为过渡性措施通过的。法令公布于 4 月 13 日《真理报》第 71 号和 4 月 16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75 号。_____[167]。

[6]为了适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产的需要，1918 年 3 月 27 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总的劳动纪律条例草案。4 月 1 日，在列宁参加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关于劳动纪律的决议，建议把决议改写成法令，并在改写时考虑列宁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见本卷第 195—196 页）。4 月 3 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劳动纪律条例》，发表在 1918 年 4 月《国民经济》杂志第 2 期。《条例》要求一切国营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严加惩处。各工厂根据这个《条例》都制定了各自的具体的章程。这对整顿社会主义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是率先实现列宁关于实行计件和奖励工资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示的单位之一。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讨论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时，

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坚持把必须实行计件工资制写进提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4 月 1 日审查的决议中。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的决定，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于 1918 年 4 月向所有基层组织发出了关于在金属工业中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的指示。——[170]。

[7]十月革命后，在苏俄，计件工资几乎完全被计时工资所代替，这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巩固劳动纪律起了消极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政权首先在第一批国有化企业里推行计件工资制。在和平喘息时期，计件工资制得到广泛推广。到 1918 年 7 月，彼得格勒各企业已对四分之一的工人实行计件工资。1918 年 12 月颁布的苏维埃劳动法典最后肯定了计件工资原则。——[170]。

[8]商业秘密指资本主义企业对其一切生产、贸易和金融业务及全部有关文据保守秘密的权利，这种权利受资产阶级立法的保护。十月革命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 1917 年 11 月 14 日（27 日）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从而废除了商业秘密。——[171]。

[9]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174]。

[10]指人民委员会《关于铁路的集中管理、保护和提高运输能力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交通人民委员对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在运输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不得直接干预他的命令。所有联邦一级、区域一级及其他各级地方苏维埃组织都无权干预运输事宜。

这项法令的制定过程是：人民委员会于 1918 年 3 月 18 日审查了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各机关不得干预铁路部门事务的法令草案后，责成专门委员会根据列宁提出的下述要点改写这个法令：“1．大集中。2．根据铁路组织的挑选任命各个负责人，即每一地方中心的执行者。3．对他们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4．军

事警卫队在保障秩序方面的独裁权力。5．立即核查流动人员及其分布的措施。6．建立技术部的措施。7．燃料。”对专门委员会改写后提交人民委员会3月21日会议讨论的草案，列宁又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之后，草案被政府批准。由于法令受到在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下的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反对，交通人民委员部3月23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修改这个法令的问题。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这个法令取消了全俄铁路员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而代之以委员的个人权力。列宁批驳了这种攻击，指出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消除铁路上的怠工和松垮现象，并对法令又作了两处修改。3月23日，法令被政府最终批准，由列宁签署，公布于3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7号（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8—20页）。——[178]。

[11]《前进报》(《Вперёд》）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该报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都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该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5月14日，该报改称《永远前进报》，出了1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1919年2月，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最终查封（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180]。

[12]《我们时代报》(《Наш　Век》）即俄国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言语报》。《言语报》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用《我们时代报》以及《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等名称出版。——[180]。

[13]关于伊·谢·屠格涅夫对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为表谢忱》一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1 年俄文版第 4 卷第 122—123 页）。——[186]。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列宁

1918 年 5 月 23 日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 布鲁耶维奇

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不向我说明为什么从 1918 年 3 月 1 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 500 卢布提高到 800 卢布，鉴于您直接破坏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23 日的法令[132]，在取得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同意后擅自提高我的薪金这一公然违法行为，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处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 1933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21 卷

注释：

[132]指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1 日）通过、11 月 23 日（12 月 6 日）发布的《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决定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01 页）。根据这一决定，人民委员每月薪金最高标准为 500 卢布，有无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者每个成员每月另增 100 卢布。 列宁对人民委员会秘书尼 •彼 •哥尔布诺夫也给了同样的严重警告处分。——155。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列宁

（1918 年 10—11 月）

序言

不久以前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1918 年维也纳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公司版，共 63 页），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说明第二国际正象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党人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经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提到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从战争一开始，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了。1914—1916 年间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2]和《共产党人》[3]上的许多文章，都是阐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已收进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反潮流》文集（1918 年彼得格勒版，共 550 页）。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 1915 年日内瓦出版的、随即译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册子[4]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就是说，变成一种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学说，只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点俄国著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

—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 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 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5]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6 卷。——编者注］1915 年日内瓦版第 13—14 页）

其次，我在 1916 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 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说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7 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编者注］

最后，我在 1917 年 8 月和 9 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 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 6 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中，我着重谈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把它篡改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注：同上，第 31 卷第 113 页。——编者注]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详细揭露过的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

这几点事先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并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这样提出问题：“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 3 页）

顺便说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党人，是根据他们的**名称**，即根据字眼，而不是根据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啊！这一点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应该谈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所谓“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这一伟大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论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应当说，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吗？然而考茨基象个照本宣读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员那样，顽固地背对 20 世纪，面向 18 世纪，在许多章节中无数次地枯燥无味地搬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专制制度、同中世纪制度对比的旧道理！

真象是在说胡话，听来叫人生厌！

简直是文不对题。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说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视民主”（第 11 页）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话来抹杀和混淆问题，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问题，只谈一般民主，而不谈**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拼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们这位空谈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 63 页中的 20 页，来大谈其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 20 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 60 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如

下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 1875 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用的就是 des Wortchens！！）。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1 页。——编者注］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会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至 1891 年这 **40 年间**，考虑到 1848 年革命尤其是 1871 年革命的经验而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耍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战争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大有长进，他那一套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本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20页）*

我们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

好极了。用什么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认真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提出**自己的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明确和直截了当。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想回避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要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谈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谁都知

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骚动，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间**的民主，即**对**奴隶主的民主没有呢？谁都知道，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骗人的论断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论断，就必须说：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论断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给专政下定义。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话吧：

“……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象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在这里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但他还是没有给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说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谎话，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语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说明了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说明显然不对，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喜欢从 20 世纪转向 18 世纪，又从 18 世纪转向古代，我们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以空谈专制来回避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欺骗行为。

总之，我们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谈论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记忆从他的“小抽屉”中拿出马克思论专政的一切言论。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者实质相同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象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资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这帮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我们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第二国际领袖们奴才气十足，他们已经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换把戏，公然胡说八道，说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换把戏！）说，“可见”，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请注意这个形容词——“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请看，他说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作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象我们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他在该书下一页即第 21 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说），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

了。“统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骗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骗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象“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显而易见，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加以区别，这是荒谬可笑的。在这里谈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们倒需要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谈论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拙劣地伪造马克思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分明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7 页。——编者注]。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遁词。

遁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

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乡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 19 世纪 70 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 19 世纪 70 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 20 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

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遁词之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说：“……在马克思看来〈或者照马克思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第 21 页）

考茨基的这个论据异常滑稽可笑，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derichesses （驳不胜驳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的精华、大本营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赛去了。在凡尔赛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说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都参加了公社是骗人。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营垒，其中一个营垒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资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说成是“全民投票”的“纯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赛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谈得上“纯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马克思认为公社没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银行是一个错误的时候［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5 页。——编者注］，难道他是从“纯粹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出发的吗？？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们“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会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纯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评价：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

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44 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纯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谈论“纯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 19 世纪 40 年代在法国以及 1914—1918 年在全欧洲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该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绩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55 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 1872 年对《共产党宣言》这个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注：同上，第 18 卷第 105 页。——编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取消了军队和官吏，取消了议会制，破坏了“寄生赘瘤——国家”等等；而绝顶聪明的考茨基却昏头昏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们说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纯粹民主”的童话。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 1914 年 8 月 4 日[6]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了！

遁词之三。“如果我们说专政是管理形式，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是“组织”或“政党”。

“糊涂顾问”先生，您在胡说，完全胡说八道！专政不是“管理形式”，您这是可笑的胡说。马克思讲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国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说阶级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胡言乱语，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议会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执政党”什么也看不到的“议会迷”

才说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给考茨基提供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例子，如中世纪地主的例子，虽然他们的组织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歪曲，把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纯粹民主”，粉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的“解释”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96 页。——编者注］。“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注：同上，第 19 卷第 7 页。——编者注］“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8 页。——编者注］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

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注：同上，第 21 卷第 197 页。——编者注］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注：同上，第 17 卷第 358 页和第 360 页。——编者注］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 1918 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象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

不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 15 页。而在第 16 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 18 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7]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大之吻[8]，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 18 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9]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10]中，在 1917 年 4 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 20 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 18 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 1912—1914 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象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

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象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象夏洛克[11]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 14 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

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 21 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 22 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35 页。——编者注］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44 页。——编者注］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

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注：同上，第 19 卷第 7 页。——编者注］

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

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

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 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象奥吉亚斯的牛圈[12]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

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 6 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俄国革命的经验，谈谈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同立宪会议之间的分歧——导致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分歧。

苏维埃不得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一个著书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真正研究过这个现象（而不是重复小资产阶级对专政的哀怨，象考茨基重弹孟什维克的老调那样），就会先给专政下个一般定义，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苏维埃，把苏维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加以评论。

既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作了一番自由主义的“加工”，当然不能期望他会提出什么重要见解。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样研究苏维埃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在回想 1905 年苏维埃的产生时写道：苏维埃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形式中最能包罗一切的（umfassendste）组织形式，因为它包括了全体雇佣工人”

（第 31 页）。1905 年苏维埃还只是地方团体，而在 1917 年却成了全俄国的联合组织。

考茨基继续说："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还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面对金融资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versagen；德语这个词的意思比"不够"稍强，比"无力"稍弱〉。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产生一些任务，用这些方法不能解决，而只有把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手段集中起来，才能奏效。"（第 32 页）

接着他谈到群众罢工，谈到"工会官僚"同工会一样是必要的，但"不适于领导那些日益成为时代标志的强大的群众战斗……"

考茨基得出结论说："……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 年 11 月〈指公历，按俄历为 10 月〉革命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道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消灭了俄国人民在 3 月〈指公历，按俄历为 2 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与此相适应，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第 33 页，黑体是考茨基用的）

凡是看过俄国孟什维克著作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样盲目照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施泰因之流的言论。的确是"盲目"照抄，因为考茨基为了迎合孟什维克的偏见，竟把事实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顾到向他的情报员，如柏林的施泰因或斯德哥尔摩的阿克雪里罗得打听一下，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具有国家组织的作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提出

的。如果考茨基做了这样简单的查问，他就不会写出这段令人发笑的话来，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4 月提出的，例如我的 1917 年 4 月 4 日的“提纲”[13]就提出过，就是说，是在 1917 年十月革命（更不用说 1918 年 1 月 5 日解散立宪会议）以前很久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来的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就是整个苏维埃问题的关键。关键就在于：苏维埃是应该力求成为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4 月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年同月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又声明他们不以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满足，他们需要的是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还是不应该力求这样做，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而应该照旧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马尔托夫就是这样说的，他是用天真的愿望来粉饰这样一个事实：在孟什维克领导下苏维埃是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马尔托夫的话，抓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理论争论中的片断，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论问题、一般欧洲问题上去。结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议论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们向欧洲所有的工人说明事实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们（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除外）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象熊那样给马尔托夫帮忙[14]，十分明显地把马尔托夫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请看考茨基究竟说了些什么。

苏维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面对金融资本，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苏维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好极了。“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呢？

完全不是。绝对不是。

在“决”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苏维埃不应该成为国家组织！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一个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动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好极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就象一切自由派那样承认它，就是说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能允许，就是不能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调和一切、用空话避开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要么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要么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注：同上，第22卷第228页。—

—编者注]，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人们，斗争吧（对这点资产者也“同意”，因为工人反正都在斗争，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把他们利剑的锋芒磨去），——斗争吧，但是不得胜利！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谁真正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承认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谁多少琢磨过这个真理，他就决不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说什么能够战胜金融资本的无产阶级组织不应当变成国家组织。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出了小资产者的原形，小资产者正是认为国家“终究”是一种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东西。究竟为什么可以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去同那不仅统治着无产阶级而且统治着全体人民、全体小资产阶级、全体农民的资本进行决战，却不允许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把自己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呢？因为小资产者害怕阶级斗争，不能把它进行到底，直到实现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说得乱了套，结果露出了马脚。你们看，他亲口承认，欧洲正去迎接资本同劳动的决战，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够了。而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由此可见？……

考茨基不敢进一步去想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侈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别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马尔托夫的论据，却没有觉察到马尔托夫的这个论据是以考茨基所没有的另一个论据为依据的！马尔托夫说（而考茨基则跟着他重复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把苏维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组织，为时尚早（应读作：在孟什维克领袖们帮助下，把苏维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欧洲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考茨基在 1909 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现在不能害怕革命为时过早，谁因害怕失败而拒绝革命，谁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点。结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资产者的极度愚蠢和极度怯懦暴露无遗的谬论：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正在走向资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却不能把战斗组织（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组织），即把被压迫者的先锋队、组织者和领袖无产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

苏维埃作为战斗组织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变成国家组织，——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论方面还要荒谬得多。甚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寻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资产阶级经常搬出他们的老一套，说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象苏维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贫苦的农村居民的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由于简单的攻守“逻辑”，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想采取中间立场，“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的说教已经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维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说教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维埃说，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组织，这就是宣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

的斗争中，这种立场除了可耻的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在理论上，他假装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同意机会主义者，其实在实践上，他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上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问题。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这部著作满篇都在暗示布尔什维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话）。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经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考察这个问题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 1917 年 12 月 26 日《真理报》上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63—167 页。——编者注]。这看来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讨论问题的最好证明了。不过还是看看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吧。他没有说这个提纲有 19 条，没有说这个提纲既提出了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的分歧有其历史的问题。所有这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谈，他只简单地对读者说，“其中〈在这个提纲中〉有两条特别重要”：一、社会革命党发生分裂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但在立宪会议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 5 条）；二、一般说来，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会议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说出这是提纲第 3 条）。

就是这第 3 条，考茨基才完整地引用了它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论点：

“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注：附带说一下，

考茨基多次引用了“痛苦最少地”过渡这几个字，显然是想来讽刺讽刺。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页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伪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谬的话加到论敌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回避论据的实质，即只有把全体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为苏维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才有可能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通常”一词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话：“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讽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们只是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结论。从前谁也没有象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考茨基的书第 31 页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 1917 年 4 月 4 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 年 1 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15]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 年 4 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16]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

—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注：附带说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维克式的谎话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怀着仇恨的孟什维克写的诽谤性的小册子。］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

我们就假定说，考茨基当时不愿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到布尔什维克有关决议和声明的译文，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否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满足。我们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 30 页上是直接提到过我 1917 年 12 月 26 日的提纲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纲的全部，还是只知道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给他译出的那一部分？关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前是否意识到、是否向人民说过苏维埃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根本问题，考茨基引用了第 3 条。但是考茨基绝口不谈第 2 条。

第 2 条是：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 1917 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黑体是我用的）

为了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在书上一个地方用过这个说法，但不记得他是在讲什么问题时说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纲直接提到“多次”声明这一点向德国读者隐瞒起来了！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把理论问题避开了。

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低于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苏维埃类型的共和国，这对不对呢？这是问题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谈。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所说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记了”。他还“忘记了”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28 日写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特别明白易懂地表达了跟马克思同样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7 页。——编者注］

请看，这就是第二国际最卓越的理论家，他写了一本专著《无产阶级专政》，专门谈到了俄国，却闭口不谈俄国曾经直接地多次地提出过的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国家形式的问题。这实际上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有什么区别呢？

（附带说一下：在这里，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国孟什维克跑的。在孟什维克中间，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种引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从 1917 年 4 月至 1917 年 10 月，再从 1917 年 10 月至 1918 年 10 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一下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17]，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 1917 年 12 月 26 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如果说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作为历史学家也许会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吧。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背离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

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就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他们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盘踞在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 18 条和第 19 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里曾多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 16 条和第 17 条）。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 1—3 条），不仅谈到了使 1917 年 10 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 1917 年 12 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 4—6 条），而且谈到了 1917 年 10—12 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 7—15 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 14 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

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就应该进行这种批评，而不应该去写那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论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段历史，就连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考茨基连这段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 1917 年 2 月底至 10 月，也是同“全国性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事实，他那一整本小册子就是证据。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就等于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一直在干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财产资格的人”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 年 2—10 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一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才把事情说成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力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

（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试验，使人民看清了他们的努力毫无所获，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象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倒塌了，象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代表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它集中反映了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完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 1917 年 2 月 28 日（俄历）至 10 月 25 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还不算许许多多各级地方的（县、市、省、区域的）代表大会。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连一次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都没有召开过（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愤恨的“民主会议”[18]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19]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 年 1 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 年 10 月）代表大会[20]和第三次（1918 年 1 月）代表大会[21]，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因此，单从苏维埃的表面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看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只要公道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历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人数	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	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 年 6 月 3 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 年 10 月 25 日）	790	343	51%
第三次（1918 年 1 月 10 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 年 3 月 14 日）[22]	1232	795	64%
第五次（1918 年 7 月 4 日）[23]	1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替立宪会议辩护，或者谈论（象考茨基那样谈论）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苏维埃宪法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 1917 年春至 1918 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不顾历史事实，无视那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天真，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这种天真倒很可爱，但如果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蠢才的人，这种天真就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也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是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的意志的。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派”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派”（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啊，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您该知道，“反对派”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象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24]那样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用“反对派”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战问题，这真是笑话。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象“糊涂顾问”考茨基那样，昏头昏脑地把组织杜托夫、克拉斯诺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并且付给怠工者千百万金钱的资产阶级，看作合法的“反对派”。啊，多么深刻的思想！

考茨基只是对问题的形式方面法律方面感到兴趣，所以一读到他对苏维埃宪法发表的议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尔的一句话：法学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考茨基说：“实际上，单把资本家变为无权的人是不行的。从法律上看，什

么是资本家呢？有产者吗？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非常进步、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也会使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商业三大部门中的从业人员及其家属，属于职员和雇佣工人这一类的约有 3500 万人，属于独立经营者这一类的有 1700 万人。可见，党在雇佣工人中间完全可以成为多数，但在全体居民中间则占少数。”（第 33 页）

这是考茨基的典型议论之一。这难道不是资产者反革命的抱怨吗？考茨基先生，您明明知道，俄国极大多数农民不雇佣工人，因而也没有被剥夺权利，您为什么把全体“独立经营者”都算作没有权利的人呢？这难道不是捏造吗？

您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引用您所熟悉的数字，1907 年德国同一个统计材料里关于农业中各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数字呢？您为什么不把德国统计材料的以上数字给那些读您的小册子的德国工人看，让他们知道剥削者有多少，知道剥削者在“农户”总数中只占少数呢？

这是因为您的叛徒立场使您变成了一个纯粹是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

你们看，资本家原来是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于是考茨基在好几页上攻击苏维埃宪法的“专横”。这位“郑重的学者”容许英国资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其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学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法律解释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啊，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

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普通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一天比一天更纯粹的“纯粹民主”。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开来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受到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炽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一帮吸血鬼，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大叫起“专横”来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著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茨基之流和明哲练达的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 1918 年 4 月 28 日的讲话［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50—188 页。——编者注］中引了一句话：“……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纯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论道：

“……可见，每个选民会议大概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 37 页）

说这种话，同资本家雇用的文痞所谓群众在罢工时压迫“愿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这种叫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由资产阶级－官吏决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横呢？为什么起来同历来的剥削者作斗争的群众，

在这场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的群众，他们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资产阶级偏见熏陶的官吏、知识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们可别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诚。他热烈地坚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识分子市侩和昏头昏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剥削者作激烈斗争（绝对不要进行内战）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温和谨慎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们这位极其博学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25]义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说，1918 年 6 月 14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们开除出苏维埃。[26]义愤填膺的犹杜什卡·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了某种罪行的某些个人……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不受侵犯的问题。在这里，被开除出苏维埃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 37 页）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是不可容忍地背弃纯粹民主，而我们这位革命的犹杜什卡·考茨基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规则干革命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应该先保证萨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恩[27]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28]）不受侵犯，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有权根据这个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开除出苏维埃。不言而喻，通过萨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恩之流或依靠他们的鼓动从英法资本家手里领取金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诺夫分子，在我们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乖乖地坐在那里，并且会象最纯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派"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们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愤。他写道：“带一个学徒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第 36 页）

这是怎样的背弃“纯粹民主”啊！这是怎样的不正义啊！固然，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剥削雇佣工人是最不讲良心和最贪得无厌的，但犹杜什卡·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谁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剥削者。人们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希特尔虚构出来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得分文不剩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希特尔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29]；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带一个学徒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象同一个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够指望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去冒险，使工人有可能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

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用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欢迎［注：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30]（1918 年 10 月 22 日第 293 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转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十分满意。当然啦！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在一篇专论[31]上说，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的实行背叛的小人去痛骂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吧。这样很好，因为这会加速和加深欧洲革命工人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拉姆赛·麦克唐纳之流的分裂，同社会主义的老领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压迫阶级的群众，他们的觉悟的忠诚的领袖革命无产者，一定会赞成我们。只要让这些无产者和这些群众了解了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他们立刻会说：这才真正是我们的人，这才真正是工人政党，真正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象上述一切领袖们欺骗我们那样用改良的空话欺骗工人，而是认真同剥削者进行斗争，认真实行革命，真正为工人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既然苏维埃在一年的“实践”之后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真正是被压迫群众的组织，而不是卖身给资产阶级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组织。既然苏维埃剥夺了剥削者的选举权，那就是说，苏维埃不是小资产阶级同资本家妥协的机关，不是进行议会空谈（如考茨基、龙格和麦克唐纳之流的空谈）的机关，而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剥削者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机关。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几天前（今天是 10 月 30 日）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书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让他们来声讨这个早已成了“发臭的死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先生在书末（第 61 页和第 63 页）伤心地说：“新理论〈他这样称呼布尔什维主义，不敢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象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也找到了拥护者。”“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论”，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的严重教训使得革命群众愈来愈讨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们”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们忽然又要抛弃它！

“我们”，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 年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转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当时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将解散任何议会，如果这个议会成了反革命的议会。[32]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任何人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中都看得出来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国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论，他们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议会制，讳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贯彻到底。

“我们”对资产阶级说过：你们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谈民主，同时却在各种场合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们抓住你们的话，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把群众训练好去进行打倒你们这些剥削者的革命。如果你们剥削者企图反抗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无情地镇压你

们，把你们变成没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给你们粮食吃，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没有权利，将没有饭吃，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谢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的和还要说的话，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们、同我们在一起，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什么是国际主义？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谢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党人"。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维克辩护（他没有公开说支持他们，但是在全力宣扬他们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货色了。考茨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诺布斯、格里姆、格拉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等），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维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33]（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维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维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战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们力图强行实现这一点，于是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第 27 页）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而应该满足于立宪会议。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就是：要求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没有接受没有兼并和赔款这个口号以前，继续支持这个

政府，继续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派也好，考茨基派（哈阿兹等）也好，龙格派也好，都屡次表示过这种观点，声称他们是主张“保卫祖国”的。

从理论上说，这完全是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划不清界限，这完全是在保卫祖国问题上的混乱观点。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去，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而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论是在君主国或在共和国，也不管此刻敌军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国境内），所以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就是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以前沙皇同英法资本家订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维克把这样一场战争称为防御战争或革命战争，就是卑鄙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政策，就是赞成欺骗人民，赞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绑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车上来为资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实，并向群众灌输这种荒谬思想。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问题是要考察他们的诚意，把他们的言论和他们的行动加以对比，不要满足于唯心主义的或骗人的空话，而要彻底弄清阶级现实。要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依靠骗子、空谈家或市侩庸人提出甜蜜的“口号”，而只有实际打倒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甚至千绳万索的）经济联系的阶级，只有真正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掌握政权。不然就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和平。

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的对外政策，宣布这个政策是国际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政策，第一，这样他就充分表明了机会主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腐朽（难怪我们齐美尔瓦尔德左派[34]当时就同这个多数派划清界限了!)，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就从无产阶级立场转到了小资产阶级立场，从革命的立场转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

无产阶级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则争取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例如在 1909 年写《取得政权的道路》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说革命纪元正在临近。1912 年的巴塞尔宣言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正是德英两个集团间的那种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果然在 1914 年爆发了）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可是当 1918 年战争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革命的时候，考茨基却不去说明它们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认真考虑革命的策略，考虑准备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维克的改良主义策略叫作国际主义。难道这不是叛徒行径吗？

考茨基赞扬孟什维克主张军队保持战备状态，责备布尔什维克加紧“瓦解”本来已经瓦解得很厉害的“军队”。这也就是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战备状态，就等于保持而且确实保持了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支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式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在小处进行修补粉饰（“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得“瓦解”军队，而且不这样做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坚硬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服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18 页。——编者注］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注：同上，第 17 卷第 358 页。——编者注］。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赞成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谢德曼之流为“政府派社会党人”呢？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阁，同样也是政府派社会党人。只要考茨基一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统治阶级的问题，他就绝对回避不了这个结论。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提出的关于统治阶级的问题，因为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论说：社会主义是以各民族的平等、自由、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们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敌军侵入我国领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论上看，这种推论或者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或者是骗人的遁词；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

推论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即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间的任务连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论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35]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问题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赞成革命战争。战争有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 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价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种估价。谁不这样看战争，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既然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如果这样说，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角度对整个战争的估价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我的国家受欺凌了，其他我一概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这正象一个人明明看见在对个人使用暴力，却说：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假如这样说，就是背叛社会主

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本国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不考虑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链条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象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梯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论的：敌人在我的国家，其余我一概不管。[注：社会沙文主义者（谢德曼、列诺得尔、韩德逊、龚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谈“国际”。他们认为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们赞成本国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种种“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象凶言恶语的资本家和甜言蜜语的资本家的差别一样。]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给俄国人民造成多少苦难和领土损失（原文为 Verstümmelungen，词义是肢体残缺或残废），对民族自决将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当然都无所谓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要谁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呢？”（第 28 页）

往下考茨基不厌其烦地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们所期待的革命的到来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第 29 页），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

我们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话，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样“巧妙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是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

内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 年 8 月 20 日）中直接同这种愚蠢思想划清了界限，我说，我们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注：见本卷第 62 页。——编者注］。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36]论战的时候（1918 年 1—3 月）不止一次发挥过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和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其所以必须，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计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形势，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没有犯的一种错误的小问题，偷换了关于整个革命策略的原则的大问题，从而安然无事地背弃了整个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论上甚至不能提出关于革命策略的客观前提的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如果欧洲有革命形势存在，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指望欧洲革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势时和没有革命形势时是不可能一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问题，他就会看到，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反对他的。在战前很久，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战争一定会造成革命形势。当考茨基还不是叛徒的时候，他在 1902 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 1909 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明确地承认

过这一点。用整个第二国际的名义发表的巴塞尔宣言也承认了这一点。难怪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即动摇于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中派”）都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地害怕巴塞尔宣言中有关的声明！

可见，期待欧洲革命形势，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意见。考茨基大谈布尔什维克“向来相信暴力和意志的万能”，以此来回避这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正是用无聊的空话来遮盖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势问题的可耻行为。

其次，革命形势真正到来了没有呢？这个问题考茨基也没有能够提出来。经济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在各地造成的饥荒和经济破坏就意味着革命形势。政治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从 1915 年起，陈旧腐朽的社会党分裂的过程，无产阶级群众离开社会沙文主义领袖向左转，转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绪、革命领袖方面来的过程，在所有国家里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在 1918 年 8 月 5 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见这些事实。现在呢，在 1918 年 10 月底，大家都看见，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视的庸人（象马克思所讥笑的 1847 年的庸人一样），看不见日益迫近的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的这个问题。考茨基象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论：“全欧洲的革命”来到了没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正象现在有时混进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丝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说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帮助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

考茨基把谬论加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说他们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内到来，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谬论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话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欧洲革命在 1918 年 8 月 5 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考茨基提到的这个日子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 8 月 5 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径，他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责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您错了！您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准的“的”究竟是谁。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装不知道，是谁在这样责备，这个责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37]，即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在责备，而且现在还在这样责备。这种责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认识：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这种责备首先和主要不是针对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针对谢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领袖，因为这些领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克服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领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一直蕴蓄着的革命本能和革命倾向。谢德曼之流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们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看着当前的强

者的脸色行事。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扬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责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论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完全可以成为表明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中间”领袖象市侩那样愚钝的历史见证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的书报检查条件下，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几乎只有通过这种“责备”，才能表示他们是在号召德国工人打倒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踢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不管他们，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他怎么能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呢？难道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考虑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场合的发展条件吗？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顾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其余一切都“无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愿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计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巨大的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决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功劳，而是由于世界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在具体内容、实际内容上有别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主义彻底粉碎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韩德逊和麦克唐纳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这些人今后只会互相妨碍，步调不一，虽然他们梦想“统一”，使死尸复活。布尔什维主义为第三国际建立了思想

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

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词先从拉丁文译成俄文，以后又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经验、最缺少教育、最缺少组织习惯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广得多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创造活动。

布尔什维主义在实际上十分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日益清楚地看到，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没有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充当雇佣奴隶的处境，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典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则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吗？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即使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结，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即使出现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况，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

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叫作《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的旧调重弹》。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论”，即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1905 年被考茨基驳倒的歪曲！），现在又被我们这位理论家捡了起来。不管这个问题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们还是得谈一谈。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1905 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派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接着，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 1905 年写的《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编者注] 一书，重新刊载于 1907 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 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争论[38]，他就当时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质问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特别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刊物的讥笑。现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争论（害怕他自己的话揭露他自己！），从而使

德国读者根本无法了解问题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 1918 年不能告诉德国工人，他在 1905 年曾怎样主张工人同农民联合而不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自命不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为让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解释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引证是用来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的，而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较 1789—1793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一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125—127 页。——编者注］

谈到考茨基的“经济分析”的主要“论据”和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要指出，作者开头几句话就表现出思想的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们这位“理论家”一本正经地说：“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约占 4/5，甚至可能占 5/6。”（第 45 页）第一，可爱的理论家，您想过没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间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 1/10，而在城市中还要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较为发达。极而言之，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产者是剥削者，没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百分之六十六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数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维埃政权，就是说，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维埃政权，到 1918 年 7 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冒险进行暴动，原来的党也就发生分裂，另外组成了两个新党，即“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39]（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曾经由旧党推举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

扎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耶夫）。可见，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说的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话。

第二，可爱的理论家，您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记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论”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

现在来看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的“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说，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 34 页）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被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 35 页）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智的推论，于是就想挖苦一下，他说：“这样看来，痛苦最少地实现社会主义，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 35 页）

我们这位理论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者马斯洛夫许多非常深奥的话，来极详细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对农民有利的是粮价高，是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说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真正的新现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的叙述就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现象就是：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别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妙极了，考茨基先生！据您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为银，闭口是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 48 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还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裕农民的余粮。这些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 48 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办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那种无与伦比的、令人叫绝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种办法〈剥夺富裕农民〉只会把不安宁和内战这种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又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 49 页）

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亨利希·维贝尔（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

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赞成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而且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裕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同时他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支离破碎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 1905 年就完全阐明了。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 1905 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拼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们，结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观点上的混乱，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 1905 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 1917 年，从 4 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们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们就已公开说过并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

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 1871 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06—207 页。——编者注］、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正是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财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党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

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 1917 年 10 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 1918 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 1918 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跟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流合污（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40]，等等）；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由于城市缺粮情况严重，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 1917 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耶夫、谢·马斯洛夫伙同克伦斯基、策列铁里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件事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件事实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得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两个首都把一队队武装工人，首先是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苦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说，我国农村本身只在 1918 年夏秋两季才经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转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贫苦农民的奋起、“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发展所代替。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军官、工人出身的师长和集团军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 1918 年的七月危机[41]和资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在资产阶级后面“使劲跟着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维克快要被农民推翻的时候，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的范围“缩小了”（第 37 页）的时候，

布尔什维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大，因为千百万贫苦农民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们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千百万贫苦农民［注：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 年 11 月 6—9 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有 967 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 950 人，有发言权的代表有 351 人，其中布尔什维克占 335 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占总数 97%。］。

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在这个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它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 1917 年 10—11 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42]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在这个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把一切都弄乱了，而在实践上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问题，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甚至更加混乱。这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则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际进行得是否恰当？西欧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是在看了最重要的文件之后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我们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论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在实践方面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读者来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一看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您用您认为“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不同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即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谢·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43]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党人”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党人的是谁。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记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

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象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罗列出来，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有农业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社耕种制的问题，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一贯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革。

对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则默不作声。更有甚者，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偷梁换柱手法，在摘引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声称：“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立宪会议会成为能够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论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只有苏维埃有权威，立宪会议已经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说：

“在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规定：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就作出结论说：

“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这始终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 47 页）

请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评”的范例！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读者暗示：布尔什维克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维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

其实，考茨基引用的 1917 年 10 月 26 日（俄历）颁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外加“委托书”八条，其中并指出这份委托书“应该作为指南”。

法令第 3 条说：产业转“归人民”；必须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说：“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不得分割”；“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一切土地都归入全民地产”。

其次，在解散立宪会议（1918 年 1 月 5 日）的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现在已纳入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编者注]。宣言第 2 条第 1 项说：“废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财产”。

可见，提到由立宪会议解决，并没有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表机构负起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责任。

其次，1918 年 2 月 6 日（19 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给苏维埃当局支配，由联邦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支配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规定：

“减少个体经济，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来说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第 11 条第 5 项）

这个法令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谁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第 20 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的为：（一）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等各级政权）机关。（2）社会团体（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和批准）。（二）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协作社。（5）农村团体。（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向德国读者介绍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已经面目全非了。

一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本问题，考茨基甚至提都提不出来！

这些问题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

（2）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

（3）共耕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下列两个基本事实：（一）布尔什维克在估计 1905 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6 卷《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编者注］）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要求民主的进步意义、革命意义，1917 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明确地说过这一点。（二）布尔什维克在通过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曾经十分明确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通过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

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命，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要求民主的革命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维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论上说，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只能到此为止。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的不足，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的不足和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愿回避问题……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读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中把公社和协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乱套了，连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一方面，他不敢说无产者在平均使用土地问题上应该同农民分道扬镳，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荒谬的（而且考茨基在 1905 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论，这位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说小资产阶级争取平等、争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来看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的观点混乱到了极点。请看，他（1918 年）坚持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他（1918 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而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这种小资产阶级改革（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含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和庸人一样不善于考虑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却不愿意看到孟什维克党 1917 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维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坚持实行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坚持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谢·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没有看见，彼·马斯洛夫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是反动的和空想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掩盖孟什维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许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考茨基枉费心机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俏皮话："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 50 页）

多么俏皮啊！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没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没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裕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国内战争。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富人都没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搬弄那些旧道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请问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经营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他们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论说服"吗？———

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问题。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否认我们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废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连理论问题都提不出来，或者是（这就更糟）故意回避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问题上早就有过争论。

考茨基硬说，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

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将土地占有方面的中世纪制度完全肃清！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

究竟为什么只把大田庄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用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派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却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 20 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资产阶级最彻底的口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第 39 页。——编者注］。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在内）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 1905 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大多数农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 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它就实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同考茨基对我们的凭空指责刚好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思想家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

的分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从 1917 年 10 月 26 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学说，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混乱思想，他指责布尔什维克不懂得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作“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共耕制的必要性认识得够不够。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 50 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象考茨基那样堕落到用文字骗人。他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1899 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

产阶级国家拥有使小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 1918 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协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不够的。可是考茨基回避这个事实难道能够叫作“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为无产阶级国家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妙不可言！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工厂单独经营，那是可以这样设想的。”（第 52 页）考茨基补充说：“正是今天，8 月 5 日，当我写这段话时，莫斯科报道了列宁 8 月 2 日的一篇讲话，说他在讲话中提到：‘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注：见本卷第 25 页。——编者注］‘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第 52—53 页）

我们把这段议论全部抄下来，好让从前尊敬过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国工人亲自看看投降资产阶级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真难以设想，8 月 5 日俄国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工厂国有的法令，而且没有一个工厂被工人“据为己有”，所有工厂都归共和国所有，可是在这个 8 月 5 日，考茨基竟用明显的欺骗手法来解释我的讲话中的一句话，想使德国读者相信俄国

把工厂交给了一个个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几十行里喋喋不休，说不能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

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诬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法。

工厂应该交给国家，或者交给地方自治团体，或者交给消费合作社，——考茨基再三这样说，最后他补充道：

“在俄国，人们现在也试图走这条道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指8 月吗？为什么考茨基不能请他的施泰因、阿克雪里罗得或俄国资产阶级的其他朋友哪怕译出一个工厂法呢？

“……在这方面走了多远，现在还看不出来。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但是这一方面现在还完全处于朦胧状态。法令并不缺……〈因此考茨基忽视了或对读者隐瞒了法令的内容！〉可是关于这些法令实施的情况，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全面的、详尽的、可靠的、报道迅速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建立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而且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实行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第53 页）

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考茨基从资本家和杜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这个超阶级的“郑重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象套中人那样顽固，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统计，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的革命，没有激烈斗争的革命，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

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请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视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结论"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会议——后者也同苏维埃一样，大多数代表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58页）

这不是妙得很吗？我们奉劝考茨基的信徒们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广为传播，因为这是考茨基提供出来说明他在政治上堕落的最好不过的材料。工人同志们，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党人"，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只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据为己有"的那个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抢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连听也不愿意听的；至于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谦虚地隐讳不谈了。这还叫作"经济分析"呢！……

最后还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9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41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让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说：9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说要在四年毁灭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绝无差别，丝毫没有差别。用"社会主义"作招牌的甜言蜜语，不过是在重述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话。

上面这些，是我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写的。当天午夜得到了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说已经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44]

本来还要给这本论述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现在也就多余了。

尼·列宁

1918 年 11 月 10 日

附录一 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45]

（1917 年 12 月 11 日或 12 日〔24 日或 25 日〕）

1．过去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预备议会时，曾用许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搞了假选举。

2．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 1917 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4．按照 1917 年 10 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我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召集立宪会议。

5．第一，只有在各党派名单符合人民真正分属于这些名单所反映的各党派的实际情况时，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我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从 5 月到 10 月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农民中最受拥护的党是社会革命党，它在 1917 年 10 月中旬提出了统一的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在 1917 年 11 月，即在立宪会议选举以后，会议召开之前，这个党发生了分裂。

因此，立宪会议的当选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6．第二，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别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经济的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无法知道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即在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维埃革命的全部规模和意义。

7．十月革命为苏维埃夺取了政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治统治权，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我们看到这次革命正经历着自身循序发展的各个阶段。

8．革命是从 10 月 24—25 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的，当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无产者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先锋队——第二次代表大会，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然后，在 11 月和 12 月间，革命席卷了军队和农民的全体群众，这首先表现为撤销和改选旧的上层组织（集团军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经走过的、妥协的阶段，即资产阶级的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必然要在更深更广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直到现在，即 1917 年 12 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结束，而还没有闭幕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种阶级力量的划分情况，在 1917 年 11 月和 12 月间，实际上根本不同于 1917 年 10 月中旬各党派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同样也说明（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说明），在乌克兰拉达、芬兰议会等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各该民族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正在重新划分。

13．最后，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叛乱所挑起的内战，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使历史向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向工人阶级和农民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14．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叛乱（其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运动）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叛乱，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变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不考虑苏维埃政权，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全体人民已经完全明白，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和平问题是人民生活中特别尖锐的问题之一。争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在俄国只是在 10 月 25 日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

公布秘密条约，缔结停战协议，开始就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普遍和约进行公开谈判。

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现在才真正地、充分地、公开地得到机会，看到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果。

在立宪会议选举时，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显然，就从这一方面来看，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上述所有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存在的那些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会议，必然同 10 月 25 日开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利由于立宪会议法没有规定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已经遭到破坏。

17．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察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

18．由于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际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种改选的法令；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营垒中来。

19．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

载于 1917 年 12 月 13 日（26 日）《真理报》第 213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5 卷第 162—166 页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 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两本书作个比较。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 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饰，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典型地表现了在罗马语国家——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即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比较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

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我们的看法。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非常热中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引了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被他们的实践纳入纯议会斗争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05 页。——编者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通过粗暴的伪造来干这件事。王德威尔得则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干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节即第 4 节中，专门用（ b ）分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再说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讲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 73 页）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 年，他们签署了巴塞尔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 1914 年爆发的那种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明确宣告这种革命将要到来。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论断毫无二致。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许多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对它们却一概不提。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什么第三种类型的）的必要性，说明作好进行这种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声誉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我们从理论上来提出问题。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争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用什么手段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叛徒行径之所在。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没说的，真是渊博的著作！——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摘抄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放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e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绝对的论断，会有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否认绝对真理，是要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中主义者不愿意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他们那种市侩庸人的愿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之后将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细，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会想到“一般地”否定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象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 89 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标记，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中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标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这只能造成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掩盖和冲淡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派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能沉醉于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言论[46]，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1918 年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235—338 页

注释：

[1]《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卡·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而写的。

1918 年 8 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 9 月 20 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 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又于 10 月 9 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见本卷第 102—111 页），发表在 10 月

11 日《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别尔津和沃罗夫斯基尽快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译成德文后，于 1918 年和 1919 年分别在伯尔尼和维也纳发表；1919 年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 1918 年 11 月 10 日写成，12 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 年用外文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出版。——229。

[2]《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 年 2 月在俄国创刊，第 2—32 号（1909 年 2 月—1913 年 12 月）在巴黎出版，第 33—58 号（1914 年 11 月—1917 年 1 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 58 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 年 6 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 12 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 80 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229。

[3]《共产党人》杂志（《Коммунист》）是列宁创办的，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资助杂志的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共同出版，尼·伊·布哈林参加了杂志编辑部。杂志于 1915 年 9 月在日内瓦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个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曾打算把《共产党人》杂志办成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机关刊物。可是在杂志筹办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布哈林、皮达可夫、博什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杂志创刊以后，分歧愈益加剧。这些分

歧涉及对民主要求的作用和整个最低纲领的作用的估计。根据列宁的提议，《共产党人》杂志只出这一期就停刊了。——229。

[4]指《社会主义与战争》。

《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是列宁为筹备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而写的一本小册子。参加写作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这本小册子在 1915 年 9 月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前夕用俄文和德文出版，并分发给了与会代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小册子用法文在法国出版，并用挪威文在挪威左派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上全文刊载。列宁当时还曾试图用英文在美国出版。

1918 年，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出版了这本小册子。——229。

[5]巴塞尔宣言即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 1907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30。

[6]1914 年 8 月 4 日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德国帝国国会表决军事预算时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该党完全背叛了 1912 年《巴塞尔宣言》所阐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242。

[7]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 17 世纪 70—80 年代。

辉格党起初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19 世纪中叶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后，组成英国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地主和英国教会上层僧侣的利益，同时也依靠中、小僧侣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它维护旧的封建传统，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19 世纪中叶，在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246。

[8]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 26 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246。

[9]德雷福斯案件指 1894 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 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幅斯。但直到 1906 年 7 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247。

[10]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 1916 年爱尔兰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起义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詹姆斯·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格兰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247。

[11]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250。

[12]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 3000 头，30 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56。

[13]指《四月提纲》。列宁于 1917 年 4 月 4 日（17 日）先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然后又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提纲。同年 4 月 7 日（20 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个提纲（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113—116 页）。——260。

[14]熊的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260。

[15]指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189—204 页）。这本小册子曾用英文刊载于 1918 年 1 月 15 日美国《晚邮报》和 1917 年 11—12 月《阶级斗争》（美国社会党左翼的杂志）第 4 期，并出版了单行本。

《晚邮报》（《The Evening Post》）是美国资产阶级报纸，1801 年起在纽约出版，1801—1832 年称《纽约晚邮报》，现称《纽约邮报》。——267。

[16]指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列宁起草的（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407—408 页）。——267。

[17]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 1917 年 6 月 14 日（27 日）宣布立宪会议选举定于 9 月 17 日（30 日）举行。8 月 9 日（22 日），临时政府又把选举日期推延到 11 月 12 日（25 日）。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让小资产阶级群众通过自身经验来消除资产阶级立宪幻想的方针。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 1917 年 11—12 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

于 1918 年 1 月举行。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得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反革命势力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1918 年 1 月 5 日（18 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开幕。以维·米·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多数派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穆斯林代表也退出了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18 年 1 月 6 日（19 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269。

[18]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 年 9 月 14—22 日（9 月 27 日—10 月 5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 1582 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 300 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 200 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 120 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 230 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 月 20 日（10 月 3 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

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 10 月 7 日（20 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被赤卫队解散。——272。

[19]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17 年 6 月 3—24 日（6 月 16 日—7 月 7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090 名，代表 305 个工兵农代表联合苏维埃，53 个区、州和省苏维埃，21 个作战部队组织，8 个后方军队组织和 5 个海军组织。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和支持它的一些小集团，当时在苏维埃中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只有 105 名代表。列宁在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和战争问题发表了讲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会上号召加强军队纪律、在前线发动进攻、支持临时政府，并试图证明苏维埃不能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大会讲台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策略，对每个主要问题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决议案。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下，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支持临时政府，赞成前线的进攻，反对政权转归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了由 320 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272。

[20]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17 年 10 月 25—27 日（11 月 7—9 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 649 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 390 人，社会革命党人 160 人，孟什维克 72 人，统一国际主义者 14 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6 人，乌克兰社会党人 7 人。

代表大会于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晚 10 时 40 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

－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 14 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 7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 1 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凌晨 3 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 5 时 15 分结束。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晚 9 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 1 票反对，8 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101 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 62 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29 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 6 人，乌克兰社会党人 3 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 1 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凌晨 5 时 15 分，代表大会闭幕。——272。

[21]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18 年 1 月 10—18 日（23—31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起初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有 1046 名代表。1 月 13 日（26 日），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加上陆续到会的其他方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共有有表决权的代表 1647 名（其中有布尔什维克 860 多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219 名。

在代表大会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讨论这两个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中，专门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并对他们表示完全信任。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赞同人民委员会在和平问题上的政策，授予它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广泛的权力。代表大会听取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基础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并宣布俄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土地法令制定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代表大会赞同解散立宪会议，并把苏维埃政府的名称由“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大会选出了由 322 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 305 人，候补委员 17 人。——272。

[22]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 1918 年 3 月 14—16 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为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 1232 名，其中布尔什维克 795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283 名，中派社会革命党人 25 名，孟什维克 21 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11 名。副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向代表大会介绍了和约的内容后，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批准和约问题作了报告。波·达·卡姆柯夫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作了反对批准和约的副报告。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经过辩论，大会以 784 票赞成、261 票反对、115 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批准和约的决议。“左

派共产主义者”投了弃权票。和约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大会还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18 年 2 月底作出的关于把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决定，选出了由 207 人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3。

[23]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18 年 7 月 4—10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1164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 773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353 名，最高纲领派 17 名，无政府主义者 4 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4 名，其他党派成员 3 名，无党派人士 10 名。乌克兰、拉脱维亚和外高加索等被占领区也有代表出席。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列宁作了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代表大会对两个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完全信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对苏维埃政府表示不信任、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改变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决议案被否决。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于 7 月 6 日在莫斯科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代表大会的工作因而暂时中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全体成员被逮捕，与叛乱无干的后来获释，其中约有 200 人回来继续参加会议。代表大会于 7 月 9 日复会后，听取了政府关于 7 月 6—7 日事件的报告，完全同意政府为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所采取的果断行动，并指出赞同自己上层领导观点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能再留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内”。

代表大会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肯定粮食垄断制的不可动摇，认为必须坚决镇压富农的反抗，赞成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规定了在劳动者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组织和巩固红军的措施。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了俄罗斯联邦的第一部宪法，选出了由 200 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273。

[24]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274。

[25]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此人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78。

[26]1918 年 6 月 14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鉴于（1）苏维埃政权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同时受到各条战线上的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俄罗斯共和国内部的同盟者的攻击，国际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从最无耻的诽谤到阴谋活动和武装暴动，来反对工农政府；（2）苏维埃组织内部存在着明目张胆地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政党的代表，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3）以前发表的以及这次会议上宣读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直至最负责的人员，确实在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顿河流域同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在乌拉尔同杜托夫，在西伯利亚同谢苗诺夫、霍尔瓦特和高尔察克，以及最近又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和依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黑帮分子）相勾结，组织反对工农的武装暴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决定：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建议各级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这些党派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清除出去。"——278。

[27]李伯尔唐恩由孟什维克米·伊·李伯尔和费·伊·唐恩两人的姓氏缀合而成，出自俄国诗人杰·别德内依的同名讽刺诗，是诗人给十月革命前夕鼓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李伯尔和唐恩及其一伙起的绰号。——278。

[28]“积极派”是指以米·伊·李伯尔、亚·尼·波特列索夫、谢·拉·瓦因施泰因等为首的一批孟什维克，他们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就开始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加入各种反革命阴谋组织，支持反革命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阿·马·卡列金以及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并与外国干涉者的军队相勾结。1918 年，在孟什维克党的支持下，“积极派”以讨论粮食状况为借口，开了几次所谓“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实际上提出了取消苏维埃的要求。——278。

[29]指 1910 年 9 月 20 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列宁的《两个世界》一文（《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0 卷）。——279。

[30]《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80。

[31]指 1918 年 10 月 21 日《前进报》第 290 号的社论《是专政呢还是民主？》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76 年 10 月创刊，先后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1895 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宣传。1933 年停刊。——280。

[32]指格·瓦·普列汉诺夫 1903 年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普列汉诺夫说：“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作为个人意见，我要说，甚至

对于普选权原则也应当用我上面指出的那个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去看待。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会反对普选权。意大利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曾经剥夺过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命的胜利是最高的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就是在议会任期的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一种 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和《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88—190 页）中都引用过普列汉诺夫的这次发言。——281。

[33]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 1915 年 9 月 5—8 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芬兰、瑞士等 11 个欧洲国家的 38 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283。

[34]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根据列宁倡议建立的国际组织，于1915年9月4日，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在出席代表会议的左派社会党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最初参加者即9月4日会议的出席者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瑞士代表弗·普拉滕，德国国际社会党人组织主席尤·博尔夏特，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扬·安·别尔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卡·伯·拉狄克，瑞典代表卡·霍格伦，挪威代表图·涅尔曼。9月4日这次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批评了多数代表的中派和半中派观点，提出了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叛卖行为和指出积极进行反战斗争的必要性等决议案。他们的决议案被中派多数所否决，但是经过斗争，决议案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仍写入了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对宣言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个特别声明中指出了宣言的不彻底性。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声明，它将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独立的工作。在1916年4月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力量有所发展，它在43名代表中占了12名，它的一系列提案得到半数代表的赞成。1917年初，随着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公开背叛，列宁向左派提出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决裂的问题。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立本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84。

[35]托尔斯泰主义者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列·尼·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宗教空想主义社会派别。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通过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社会，宣传“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主义者正好是把托尔斯泰学说中最大的缺点变成了教条。——287。

[36]“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 1918 年 1 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阿·洛莫夫、瓦·瓦·奥博连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格·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列宁在 1918 年初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认为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力主当时还没有军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把德国革命将会爆发设想为在最近某个短时期内就要爆发，认为德国政府很快会被德国革命所推翻。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冒险主张时多次指出，相信德国革命成熟和宣布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列宁说：“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是我们的伟大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411 页）。1918 年夏末，“左派共产主义者”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290。

[37]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 年 4 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聚在这个杂志的周围。1916 年 1 月 1 日，在柏林召开了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1918 年 10 月，该派定

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 年 4 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 年 11 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 月 14 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 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 1918 年 12 月 30 日—1919 年 1 月 1 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293。

[38]指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由列宁编辑并作序，1906 年 12 月用俄文出了小册子。列宁的序言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4 卷。——297。

[39]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是在 1918 年 7 月 6 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见注 4）之后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

民粹派共产党成立于 1918 年 9 月，领导人有 г．д．扎克斯等。民粹派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活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措施，赞成布尔什维克党联合中农的方针，虽然由于它本身的民粹派观点残余而同布尔什维克党在策略上有分歧。民粹派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出版《劳动公社旗帜报》。它的许多党员参加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1918 年 11 月 6 日，民粹派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解散该党并同俄共（布）合并。

革命共产党于 1918 年 9 月组成，领导人有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革命共产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革命共产党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共产党从 1918 年 9 月起出版《劳

动意志报》，12 月该报改为杂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 1920 年 9 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 10 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298。

[40]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 1918 年 7 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叛乱有密切关系。根据叛乱者的计划，穆拉维约夫负责发动东方面军的军队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汇合后向莫斯科进军。穆拉维约夫于 7 月 10 日由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喀山率领一支将近千人的部队进抵辛比尔斯克，声称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通电人民委员会、德国大使馆、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对德宣战，自称为“抗德集团军总司令”。受他蒙蔽的部队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和电台，包围了执行委员会大楼和红军辛比尔斯克集团的司令部，逮捕了包括第 1 集团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苏维埃的和党的工作人员。穆拉维约夫命令东方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向西推进，佯称抗击德军的进攻。7 月 11 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揭露了穆拉维约夫行动的反革命实质，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在省委会主席约·米·瓦雷基斯领导下对士兵和城市居民进行了大量解释工作，把原来支持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争取了过来。7 月 11 日晚，穆拉维约夫应邀参加辛比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会议，以为执行委员会要向他投降。当会上宣读他关于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停止军事行动的电报时，共产党人要求将他逮捕。穆拉维约夫拒捕，被当场击毙，他的同伙纷纷就擒。——304。

[41]列宁所说 1918 年的七月危机是指 1918 年夏天在俄国中部各省、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发生的多起富农反革命叛乱，这些叛乱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外国干涉者的支持下组织的。——305。

[42]布朗基主义是 19 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潮，因其创始人路·奥·布朗基而得名。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306。

[43]指临时政府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不久以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出的一个法案。1917 年 10 月 18 日（31 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人民事业报》以《土地委员会调整土地和农业关系条例》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法案。法案规定，土地委员会掌握一批专供出租的地产，国家和寺院土地均属这类地产。地主土地占有制保持不变，地主只把以前出租的土地拨归临时出租的地产，而且农民交纳的土地租金应归地主。列宁在《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一文中写道："谢·列·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说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而完全效忠于地主了。"（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420 页）

逮捕土地委员会委员是临时政府为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而采取的反革命措施。——307。

[44]指 1918 年 11 月德国爆发的革命。

德国十一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经济的崩溃和人民与军队遭受的苦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这场革命以 1918 年 11 月 3 日基尔港海军舰队的水兵起义为起点，首先席卷了德国北部沿海城市，然后又迅速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和南部地区。11 月 9 日，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举行总罢工，罢工很快就发展成武装起义。当天中午时分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往国外。

在起义的过程中，各地纷纷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夺取了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11 月 10 日，在柏林苏维埃全体

会议上，成立了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菲·谢德曼等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胡·哈阿兹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退出了政府），其纲领是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进行社会改良。12 月 16—21 日，柏林举行了全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们设法在会上通过了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并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交给政府的决议。

斯巴达克派接受了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决定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实行决裂，于 1918 年 12 月 30 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镇压下去。1919 年 1 月初，艾伯特政府把属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柏林警察总监免职，意在挑动工人举行为时过早的反政府武装起义。1 月 6 日，为回答政府的挑衅，柏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叛卖策略，他们与艾伯特政府商谈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艾伯特政府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于 1 月 8 日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部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队伍随即对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杀害了包括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德国资产阶级接着又用暴力把各地的革命工人血腥地镇压下去。1 月 19 日，德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各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胜利。

十一月革命没有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它在德国历史上仍是一次重大事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这是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和手段进行的革命，其结果是推翻了君主制，成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了起码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通过立法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次革命给了苏维埃俄国以极大支援，为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创造了前提。——320。

[45]《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63—167 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918 年的版本中，《提纲》标有下列字样：“载于 1917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彼得格勒《真理报》”。——321。

[46]指莫·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用法文写的《民主和政党》一书。此书于 1903 年在巴黎初次出版，1927 年和 1930 年出了俄文本第 1 卷和第 2 卷。书中用英美两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327。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

列宁

（1918 年 11 月 27 日）

1 报告

同志们，我想谈谈在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提出以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任务。毫无疑问，最近的事变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如布列斯特条约的废除、德国的革命、德帝国主义的崩溃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瓦解，不能不使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理论基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理遭到破坏。俄国的军事形势，英、法、美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能不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部分人多少倒向我们这一边来。今天下午我想谈的，也就是我们的策略应作的改变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让我从几个基本理论原理谈起。毫无疑问，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经济基础的主要社会阶层，在俄国就是中农。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因此，我想首先提请大家注意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的基本原理是怎样形成的。为此，我把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说的几段话念一下。这篇文章出了单行本，写于 1895 年或 1894 年，当时社会党关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纲领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日程，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代表大会要讨论这个纲领。当时恩格斯是这样说明无产阶级的态度的：“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第一，法国纲领的原理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第二，同样明显的，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

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80 页。——编者注］

其次，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还说：“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们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注：同上，第 582 页。——编者注］

最后一点，我要向你们提到的最后一句名言，就是关于富裕农民、关于大农（俄语叫作“富农”）即关于非使用雇佣劳动力不可的农民的论断。如果这些农民不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忙也帮不上的。我们的职责仅仅是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85 页。——编者注］

这就是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无疑也是每个共产党人都知道的几个原理。从这些原理我们看到，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在大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国家中和存在着小农、中农、大农这种落后状况的国家中，决不会一样。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说对地主剥削者进行战争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十分正确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对待中农，我们说，决不使用任何暴力。对待大农，我们说，我们的口号是要他们服从粮食垄断，如果他们破坏粮食垄断，隐藏粮食，就同他们作斗争。不久以前，我在一个几百人的会上，向那些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代表们（他们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同时来到莫斯科的），重申了这些原理［注：见本卷第 170—177 页。——编者注］。在我们党的出版物中，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态度上的这种差别，虽然大家在理论上都同

意，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十分迅速地作出了相应的政治结论。我故意从所谓远处谈起，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关于阶级相互关系的经济概念为依据，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提出我们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策问题。毫无疑问，在俄国，这种小农阶级（我们把不出卖劳动力的农民称为中农），这种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形形色色政治派别的基础的主要经济阶级。在我们俄国，这些派别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关系最为密切。在俄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同这两个政党作过长期斗争，西欧社会党人经常把这个斗争看作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斗争，也就是看作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顺便提一下，这种看法甚至在很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中也时常流露出来。

今天正好有人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一封信交给我。他是以自己在奥地利的革命行动而闻名的一位人物。他的信写于 10 月底，今天收到，信中只有一个请求：是否可以把孟什维克从监狱中放出来？在这种时候，除了这个请求以外，他再也找不出更明智的话来写了。诚然，他预先声明他不熟悉我们的运动等等，但这终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西欧社会党人所以犯这种可笑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向后看，不向前看，并且不了解，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宣传社会主义）都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 1917 年革命期间只是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始终未能采取正确的立场，就好象故意要提供一个实例来说明马克思的下述原理：小资产阶级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没有能力采取任何独立的立场。

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即从它创立苏维埃的时候起，就本能地表现出明确的阶级立场，因为它创立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动摇不定。1917年春天和夏天，他们自己的朋友称他们为“半布尔什维克”，这不仅是俏皮话，而且是正确的评价。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例如在苏维埃、农村革命运动、直接夺取土地、前线联欢、支持或不支持帝国主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孟什维克和社

会革命党人总是今天“赞成”，明天“反对”。他们一方面帮忙，另一方面又不帮忙，是毫无主见、软弱无力的典型。他们向居民散布“拥护苏维埃”的空谈（要知道，他们一直把苏维埃称作“革命民主”，以与他们所谓的有财产资格的人对立起来），这不过是他们狡猾的政治手腕，而听信他们那一套的广大群众却倾心折服：“这是拥护苏维埃呀！”孟什维克的宣传也曾部分地为我们效力。

这个问题很复杂，说来话长，我把它简要地点一点就够了。我们亲眼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政策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论点：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错误的。他们也许只在口头上和记忆中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

以上我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中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应当改变我们过去的、在革命的前一时期的口号，以便正确地估计目前的转变。你们知道，在 10 月和 11 月，这些分子是动摇不定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不调和的态度是对的。我们说，我们要消灭无产阶级的敌人，要在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代议制、苏维埃政权等基本问题上进行战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妥协是完全正确的。

这以后，事变的进程向我们提出了和平问题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你们知道，布列斯特和约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离开了我们。

我们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我们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幻想作了无情的斗争，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由于这两种情况，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然离开了我们。你们知道，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发生动摇，一部分铤而走险，一部分互相谩骂，一直骂到现在。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当然，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我们当时的政策

是绝对正确的。现在来证明这一点，就是旧事重提，因为德国革命已经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人们责备得最多的，我们从觉悟低的工人群众那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认为我们毫无根据地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而这个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德国革命驳倒了所有这些责难，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德国革命必然到来，我们在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应当进行民族战争，而且应当进行宣传，从它内部进行瓦解。事变已经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再也用不着去证明了。关于立宪会议也是一样，在这里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的正确，因为现在西欧已经开始的一切革命都是在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下进行的，都在建立这种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这就是各地革命的特征。苏维埃已经从奥地利和德国传到荷兰和瑞士（传到具有最老的民主主义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甚至在同德国相比时也把自己称为西欧）。这些国家都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遭到历史性破产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臆造，而是绝对的历史的必然。远在几百年前，瑞士和荷兰就已经有了政治斗争，现在那里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这就说明，我们对目前情况作了正确的估计。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策略的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不着再来谈了。需要弄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抱有极深偏见的一个问题。只要回想一下西欧国家都经历过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议会制发展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这种偏见在 40 年代，在各国旧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曾经占过统治地位。这种观点在法国保持得最久。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小资产阶级在议会制问题上是最爱国的，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它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跃，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范围的商业周转。因此，可以料到，正是在议会制问题上，小资产阶级肯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俄国的情况就是

这样。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我们的革命同爱国主义作了斗争。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这个革命一定会到来，它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如果你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就应当有信心。

很明显，我们这样说，当时只能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很明显，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当时都不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那时不能指望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怎么会接受我们的观点呢？当时我们不得不实行最严峻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经历了几个月迷恋于幻想的时期。如果你们看看西欧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幻想在那里几十年都没能消除。你们看看荷兰、法国、英国等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当时我们必须粉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什么人民是一个统一体，什么人民的意志可以通过阶级斗争以外的东西来体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任何妥协，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纵容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立宪会议幻想，我们就会葬送整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而牺牲国际革命的利益，国际革命是循着布尔什维克道路前进的，因为它不是民族革命，而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离开了我们。他们跑到了街垒的那一边，落到了我们的敌人那一边。当杜托夫分子开始暴动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杜托夫分子、克拉斯诺夫分子和斯科罗帕茨基分子中有同我们作过斗争的政治力量。在我们这边的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

你们知道，当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极其猖獗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富农暴动。只是城市无产阶级同农民的亲密团结才使我们的政权得以巩固。只有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才坚持了反对一切敌人的斗争。而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杜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一边。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采取战争的恐怖手段。不管人们怎样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谴责这种恐怖主义（我们从一切动摇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都听到过这种谴责），我们很清楚，恐怖手段是由激烈的内战造成的。它是由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倒戈造成的。他们用各种手段，用内战、收买、怠工等等来同我们作战。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恐怖手段势在必行。因此，我们不应该后悔，不应该否定恐怖手段。我们只是应当清楚地了解，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哪些条件造成了斗争的尖锐化。这些特殊条件是：当时我们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必须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代替立宪会议。

国际政治一发生转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状况也必然发生转变。我们看到他们那个阵营里人心正在变化。我们从孟什维克的宣言中看到他们在号召放弃同有产阶级的联盟，这是孟什维克向自己的朋友，向那些同杜托夫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人、英国人结成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发出的号召。他们向这些人呼吁，要他们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除了英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克政权相抗衡。这种动摇也发生在社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中间。本来知识分子所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最多，爱国主义的成见最深，现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

现在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阶级关系确定自己的策略，要确实弄清这个问题，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性，是无主见的表现，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动摇呢，还是相反，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过程。在考察这整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想一想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想一想我国革命的历史，那就可以肯定地回答，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不是个人的**。它关系到俄国千百万处于中农地位或相当于中农的地位的人。这种转变关系到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曾经带着疯狂的愤恨情绪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当时不得不损害他们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而历史现在竟使爱国主义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很明显，不用外国的刺刀就推翻不了布尔什维克。以前人们希望英国人、法国人、

美国人会是真正的民主派，并一直抱着这种幻想，现在英、法、美对德奥两国提出的和约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好象是特意在证明布尔什维克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

因此，在同我们作过斗争的党派中间，例如在普列汉诺夫的营垒中间，就有人说：我们错了，我们原来以为德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而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会给我们带来民主制度。事实表明，这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和约的污辱性、贪婪性和掠夺性比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要厉害百倍。事实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是扼杀俄国自由的刽子手和宪兵，过去起过同样作用的有俄国刽子手尼古拉一世，还有充当刽子手来扼杀匈牙利革命的帝王们，现在这个角色由威尔逊的代理人来担任了。他们绞杀奥地利革命，他们扮演宪兵角色，他们向瑞士提出最后通牒：你们要是不去同布尔什维克政府作斗争，我们就不给粮食。[2]他们对荷兰说：不得接受苏维埃使节，否则我们就要实行封锁。他们的武器很简单，就是一条饥饿的绳索。他们就是用它来绞杀各国人民的。

最近的历史，即战时和战后的历史，发展得异常迅速。它证明英法帝国主义是和德帝国主义一样卑鄙的帝国主义。不要忘记，美国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那里的帝国主义同样凶残，在那里，国际主义者不仅遭到私刑拷打，而且被暴徒拖到街上，剥得精光，浇上沥青，活活烧死。

这些事件非常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苏维埃政权，要么是英法用武力把革命完全扼杀掉。这里已经谈不上同克伦斯基达成协议了。你们知道，他们把克伦斯基当作挤干了的柠檬扔掉了。他们同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勾结在一起。现在小资产阶级度过了这段时期。现在爱国主义把它推向我们这一边，——结果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迫使它行动的。我们大家都应当注意世界历史上这个大量存在的经验。决不能保卫资产阶级，决不能保卫立宪会议，因为它实际上只对杜托夫和克拉斯诺夫之流有利。这看来很可笑：立宪会

议怎么竟成了他们的口号。可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因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还在台上的时候召开的。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的机关，而资产阶级是站在实行反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帝国主义者一边的。资产阶级不顾一切，要用最卑劣的手段扼杀苏维埃政权，只要能消灭苏维埃政权，把俄国出卖给谁都行。

正是这种政策引起了内战，并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我们。当然，这部分人的动摇永远是不可避免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刚刚打了几个胜仗，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散布流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军必然胜利。他们从莫斯科发出电讯，说莫斯科已被包围，就要失陷。我们很清楚，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打几次哪怕是小小的胜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首先张皇失措，开始散布敌人会胜利的种种流言。但是革命表明反帝国主义的起义必不可免。现在我们的“盟国”成了俄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主要敌人。如果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巩固，俄国就不可能独立，也不会独立。这就是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由于这种转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定自己的策略。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和解，小资产阶级在反对我们，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要求我们使用恐怖手段。现在，谁要想把那个时期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口号机械地搬过来，他就大错特错了。现在这样做，就不是立场坚定，而不过是愚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够理解。当我们必须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从狭隘的爱国主义来看，这一步骤是背叛祖国；而从世界革命来看，这却是对世界革命帮助最大的正确的战略步骤。世界革命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成为全民制度的今天爆发的。

现在，虽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在动摇，但是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我们当然应该估计到这种情况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从前我们持另一种观点，当时小资产阶级站在捷克斯洛伐克军一边，非使用暴力不可，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我们就得象在战争中那样行动。可是现在，这些人开始转向我们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以前我们的传单和报纸上提的是另一个口号，就避开他们。既然看到他们朝我

们这边转了一半，我们就应当把传单重新写过，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我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说：欢迎欢迎，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如果你们以为我们只会使用暴力，那就错了。我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那些顽固守旧、满脑子资产阶级偏见的分子，一切合作社工作者，一切同资产阶级联系最多的劳动者，是可以转到我们这边来的。

拿整个知识界来说吧。他们从前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于养尊处优。既然他们动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那边去了，我们的口号就是**无情的斗争，实行恐怖**。现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情绪有了转变，我们的口号就应当是**实行妥协**，建立睦邻关系。当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一批人表示他们想对苏维埃政权保持中立时，我们就应当说："中立"和睦邻关系，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这些都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但是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来加以讨论。我们向来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切实的建议我们应当讨论。

我们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过，无产阶级应当是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阶级。我们不可能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以前消灭阶级差别。阶级将仍然存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消灭剥削者，即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我们正在无情地剥夺他们。但是对待中农和小农，又当别论了。在无情地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同时，我们应当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过来。当他们说他们愿意中立、愿意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回答说：我们也只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期望你们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继续站在无情地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立场上。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情的，是不可能搞什么调和妥协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法令都不能使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这里需要通过事变进程逐渐做到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些分子永远也不会成为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成为地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在

看到没有出路的时候，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现在他们看到：欧洲已经垮下来，帝国主义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救不了命，只有实行苏维埃政权才是出路。所以，现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中立态度和睦邻关系，不仅不使我们感到可怕，而且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如果从实行专政的阶级的代表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更多的指望。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你们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而我们拥有国家政权。孟什维克先生们，在你们发表了关于“同盟者”的言论以后，我们很乐意使你们合法化。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党内还有孟什维克“积极派”，对待他们，我们的斗争方法仍然照旧，因为“积极派”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朋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军还没有被赶出俄国，你们仍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只保留在自己手里**。对那些同我们保持中立关系的人，我们是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对他们讲话的，这个阶级手中掌握着政权，把自己那锐利的武器完全对着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如果你们愿意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军和克拉斯诺夫分子那边去，那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是怎样进行斗争的，而且今后还要斗下去。如果你们愿意学习布尔什维克的榜样，那我们就走同你们妥协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不通过一系列妥协，反复加以检验、审查和对比，国家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这条道路，例如我们通过了土地社会化法令，并逐渐把它变成一种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我们周围去反对富农的手段。今后只是随着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中的胜利，我们才会逐步过渡到由集体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土地。除非依靠农村中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否则这个任务是无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毫无疑问，这里只有实际经验、只有现实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

同中农、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同合作社工作者妥协的任务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对象是那些还保存着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和习惯的协会，这个任务就会有所改变。如果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任务又会有另一些改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不定，但他们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我们知道，只有利用大资本主义文化因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因素。我们过去不得不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事变的进程，是事变进程使得一切"民主主义者"和一切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离开了我们。现在出现了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事变和相互关系的客观进程促使他们对我们采取中立立场，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我们永远也不会依靠知识分子，我们只会依靠率领着全体无产者和全体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是不可能有其他的依靠的。但是依靠体现专政的阶级是一回事，而统治其他的阶级又是一回事。

你们记得恩格斯甚至在谈到如何对待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时说过，这样的农民也许不必全都加以剥夺［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85 页。——编者注］。我们的做法是普遍加以剥夺，在我们的苏维埃中就没有富农。我们压制他们。当他们钻进苏维埃，企图凭借它来压迫贫苦农民时，我们就在肉体上镇压他们。你们看到，这里是如何实行一个阶级的统治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统治。但实行统治，对小农是一种方式，对中农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地主不同，对小资产者又不同。全部任务在于我们要懂得国际条件所促成的这种转变，要懂得过去半年的革命历史中习惯了的口号必须加以改变，因为这里谈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应当说：我们要把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的口号是妥协，但我们曾被迫使用恐怖手段。合作社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先生们，如果你们真正同意和我们保持睦邻关系，那就请你们完成一些任务。

如果你们不完成，那就是违法者，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同你们作斗争。如果你们主张保持睦邻关系，又能完成这些任务，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有坚强的后盾。你们的软弱性我们从不怀疑。但我们需要你们，这点我们也不否认，因为你们是唯一有文化的分子。

假如我们不必利用资本主义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任务就容易得多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就在于我们不得不利用被资本主义完全侵蚀了的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也就在于，实行过渡必须有专政，而专政又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才能领导。因此我们说：路线将由受过严格训练、已经成为一支能够粉碎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量的无产阶级来决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的阶层，我们对他们的政策现在应当纳入我们在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轨道，而且现在我们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我们面前有一系列的任务，一系列的妥协和技术性的任务，我们作为实行统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当能够提出这些任务。我们应当能够给中农提出一项任务：帮助商品交换，揭发富农。给合作社工作者提出另一项任务，他们拥有大规模进行产品分配的机构；我们应当把这个机构利用起来。对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提出完全不同的任务；他们已无力继续怠工，现在想做**我们**最和睦的邻居，我们应当使用这些知识分子，给他们一定的任务，监督和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对待他们就象马克思所说的对待巴黎公社的职员那样："每一个雇主都会给自己挑选适当的助手、会计，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善于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不合用，就用新的好的工作人员代替他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60 页。——编者注］我们用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的分子建设政权。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我们就无法建设政权。现在我们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当作受到国家政权严格监督的好邻居对待。在这里，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懂得，实行统治并不意味着由他自己去完成这一切任务。谁这样想，他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窍

不通，就是在一年的革命和专政时期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这样的先生，最好还是进学校去学点东西。谁在过去这段时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就会说：现在我就是要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搞建设；反正我有农民这个坚强的后盾。我们应当记住，只有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和妥协的试验，才会创造出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建设形式。

我们记得，恩格斯说过，我们应当采用示范的办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80 页。——编者注］。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但是我们必然会确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现在的每一个星期的收获，胜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来的半年，是对我们不利的动摇不定的时期。西欧的革命开始效法我们，它一定会加强我们的力量。我们应当估计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估计到一切因素，不存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动摇者仍将是动摇者，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话。这个日子也许不会来得那么快，虽然德国革命事变的进程使人相信，事情的发展将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快。德国革命的发展同我国革命的发展情况一样，但是更加迅速。总之，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同英美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他们感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力量，因此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来扼杀我们，想首先消灭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然后再消灭本国的布尔什维克。

我们应当利用那些被帝国主义者的兽行推向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你们很清楚，在战争中无论什么援助，即使是间接的援助，也不能忽视。在战争中，就连动摇阶级的状况也有巨大的意义。战争愈激烈，我们就愈应该去影响正在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由此可见，我们已经实行了半年的策略应当有所改变，以适应在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个不同阶层方面的新任务。

如果我能使党的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促使他们通过一步一步的试验去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可以认为我的任务是完成了。

载于 1918 年 12 月 5 日和 6 日《真理报》第 264 号和第 265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207—224 页

2 关于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最后还要谈几点意见。首先，我想回答这里涉及的所谓教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66 页和第 584 页。——编者注]，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作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其次，谈谈斯切克洛夫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同谁妥协，是同司令部呢，还是同群众？我的回答是：首先当然是同群众，然后是同司令部，至于什么时候必须同司令部作斗争，一切由那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一点就回头要谈，可是现在，我着不出有同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妥协的任何实际可能性。有人对我们说：妥协就意味着要放弃些什么；你们要放弃什么呢，你们将怎样背弃基本路线呢？这样做就是变节，但如果这只是指实际做法，那并不新奇。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原则。现在来谈这一点没有意义。15 年前，关于基本路线和原则发生过争论，可惜那时我主要是在国外而不是在俄国进行这种争论。现在说的是国家权力，而放弃国家权力，即使是一点点，那也是根本谈不到的。难怪威尔逊宣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全世界的资产者都在这样说。既然他们准备向我们进攻，就说明他们已经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

世界的现象。布尔什维克要是提出同资产阶级搞某种妥协，那就既可笑又可怜了。何况革命的烈火已延烧到许多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

瑞士的资产阶级在最近的事变发生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是俄国人，我们决不把政权交给你们。赞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沙杜尔大尉写道，他看到俄国资产阶级的令人吃惊的驯服甚为惊讶，说他们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这样。那里的资产阶级会凶狠得多，内战一旦爆发，必定会采取最残酷的形式，这是毫无问题的。

一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在实际上把问题完全解决了，现在没有一个农民、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同资产阶级妥协。至于说妥协不是什么新东西，我完全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商量这些问题。

使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离开我们的那些情况，如在德帝国主义进攻时期争取布列斯特和约的无情斗争，已经过去了。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如果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胜利，仍然会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小民主派再度动摇，散布惊慌情绪，实行倒戈，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同他们妥协，只是为了在一定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果。这种策略既不会引起争论，也不会引起惊异。可是它并不为人所理解，这一点已为很多人，甚至象马克西莫夫同志这样有影响的莫斯科苏维埃委员所证明。马克西莫夫同志说，同欣丘克不应该妥协，而应该合理磋商。当我们在春天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他们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我们对他们作了让步。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妥协，这种政策也不能叫作别的什么。如果每个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能经常对自己说，对一切同志反复说，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理磋商，把这作为一条守则，那我就很满意了。

迄今为止，我们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地方工作中，距离合理磋商还很远。相反地，我们往往不是进行合理的磋商。有人责难我们那样要求，他们不了解，不

那样做就无法进行新的建设。那种没有学会建设就能建设新生活的天才是没有的。正当需要同实践家进行合理磋商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个本事。要开一个小铺，就得懂行。需要有行家。我们布尔什维克很少有机会在这种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己的知识。我们很少有缺乏鼓动员的情况，而最感缺乏的，是实际的领导者，是组织者。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但这种情况至今还存在。任何人，只要他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只要他提出中立和睦邻关系的口号，就要同他合理磋商。如果他会开小铺，会分配商品，如果他能教会我们哪怕是一点儿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实践家，这就算人才难得了。

任何人都知道，从我们胜利那天起，布尔什维主义的“朋友”中就有许多敌人。我们队伍里经常混进一些非常不可靠的、骗人的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总是动摇、出卖、背叛、变节。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不会因此改变主张。这从历史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孟什维克责备我们，说苏维埃职员中间有大批混进来的、连普通公民都不如的分子。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到哪里去物色好人呢，我们怎样做才能使好人一下子就信任我们呢？那种一下子就能取得胜利、征服人心，一下子就能取得人们信任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了，而在其他国家人们对它还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国革命是一场恶梦、一团糟，他们对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的有组织的“乱糟糟的”会议不抱任何期望。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需要征服的领域还很多。因此，当人们说欣丘克会开小铺，应当跟他合理磋商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跟其他人也要磋商，要使用那些会办许多事情的小资产者。

如果我们能让地方工作人员牢牢记住“要磋商”这个口号，如果我们懂得觉醒起来掌握政权的是一个新的阶级，从事管理工作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事情的人，他们自然会犯错误，——如果这样，我们就不会惶惶不安了。我们知道，要管理就免不了犯错误。然而在错误之外，我们还看到人们不善于利用政权，把政权仅仅当作权力来行使，他们说，权在我手里，我下命令，你就得听。

我们说：对工会、农民和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对这一大批人不要用这个口号，现在它已经用不着了。因此，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同知识分子合理磋商，——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我们是依据我们的纲领来磋商的，我们是作为政权来磋商的。

我们说：你们是真的从敌对立场转到中立和睦邻关系的立场上了吗？你们是真的不再同我们敌对了吗？如果不是，我们是不会马虎过去的，我们要坦率地说，要打仗就打吧，我们过去就是象在战争中那样行事的。但是，如果你们由敌对转为中立，如果他们讲睦邻关系（这话我是从那些并不属于共产主义者阵营而昨天还很靠近白卫分子阵营的人的声明中引来的），那我说：既然有大批的人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我们就需要继续自己的宣传。

赫梅尔尼茨基同志没有必要担心孟什维克会用自己的宣传来指导工人阶级的生活。我们谈的不是那些不懂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谈的不是他们，也不是小资产阶级官僚；同孟什维克就是要进行思想斗争，进行不调和的战争。对孟什维克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且你愈是心平气和地向孟什维克证明这一点，他就愈加暴跳如雷。如果认为我们会把自己既得的地位让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那就错了。我们一丝一毫也不会让的。

施米特同志所举的例子证明，甚至比较接近资产阶级的那部分无产者（如印刷工人）、在工商企业中办事的小资产阶级职员和资产阶级银行职员，都因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蒙受很大的损失。我们查封了大批资产阶级报纸，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堵塞了银行职员靠投机致富的许多门路。但是，就在这个阵营中，我们也看到了动摇，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转向我们。如果说欣丘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会开小铺，那么银行职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通晓金融业的技术。我们中间很多人虽在理论上熟悉金融业，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暴露出实在太差。对于一个通晓这门技术并声称自己已从昨天的敌对转为今天的中立和睦邻关系的人，我就要同他磋

商。我们说：同任何人都要合理磋商。在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中，如果杰出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马克西莫夫同志能实行他主张对知识分子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实行的那种策略，那我就心满意足，喜出望外了。

下面谈谈合作社问题。按斯切克洛夫同志的说法，合作社搞得很糟。马克西莫夫同志关于合作社问题则说，不应该写出人民委员会最近颁布的那种法令。我们在实际工作方面意见不一致。只要小资产阶级不采取敌对态度，就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同他们妥协，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如果旧的规定不合用，那就应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合作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合作社机构是一个供应机构，它依靠的本来不是资本家的个人主动性，而是劳动者的广泛参加。考茨基在他成为叛徒以前很久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合作社。

如果我们真想建立监督工作并且实际组织几十万人的经济，我们就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富有实际经验的托拉斯领导人对他们是会有用处的。现在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分子已从敌对转为中立。同时必须明白，他们会开小铺。我们不否认，欣丘克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的，而且他们这些人都有这种味道，但同时他们也有实际知识。就思想方面来说，所有的大炮都在我们这边，他们一门大炮也没有。既然他们说，他们不再敌对，要转为中立，那我们应该考虑到，现在同成千上万个不如欣丘克有本事的人也在进行合理的磋商。我说，必须善于同他们磋商。在实际建设方面，他们的知识更多，本事更大，应该向他们学习。让他们向我们学习如何影响国际无产阶级，而如何开小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一行我们不会。这里各个方面都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

关于合作社，我不明白，为什么说那里糟得很。我们在通过第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法令的时候，曾邀请了一些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在立场上很接近白卫分子

的人到人民委员会来参加讨论，我们同他们商量，问他们：这条你们能接受吗？他们说：这条可以，那条不行。如果只看表面，不仔细想，当然就会认为这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竟邀请了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代表，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删去了法令中的几项条款。例如删去了关于免费使用和加入无产阶级合作社的条款。我们觉得这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他们却拒绝接受我们的提议。

我们说，我们应该跟他们妥协，这些人开小铺的本领比我们强得多，这一行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决不放弃斗争。在我们颁布了另一个同样的法令的时候，马克西莫夫同志说：不必写出这样的法令，因为法令上说，关掉了的合作社要重新开张。这就说明，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中间，也象在我们中间一样，存在着某些误解，即使为了消除误解，也需要举行象今天这样的会议和座谈。我们曾经指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打算不仅利用一般的工会，而且利用工商业职员联合会，而工商业职员向来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但这些人既然跑来向我们表示同意保持睦邻关系，那就应该热情相迎，握住他们伸出的手，别怕你的手会断。我们不会忘记，明天英法帝国主义者一进攻，他们就会掉过头去，最先跑掉。但只要这班人、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没有逃跑，我们就要反复申明：应该同他们接近。因此我们通过了星期天公布的那个法令，马克西莫夫同志不喜欢这个法令，表明他还在使用旧的、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共产主义策略。我们昨天写了这个法令以后已经收到了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3]作为答复，如果我们在转变已经开始、情况已经变化的时候还说搞的不是时候，为什么还写这个法令，那我们就成傻瓜了。

武装的资本家会愈来愈顽强地进行战争，因此，在实际建设中利用这个即使是暂时的转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政权都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不关掉合作社，而且让关掉的重新开张，因为我们是在合作社帮助白卫分子进行鼓动的时候把它们关掉的。可是任何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变得僵硬而不符合需要。在

全国各地掀起关掉合作社、围剿合作社的浪潮，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合作社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它同中农保持着联系，它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农民阶层联合起来。这些欣丘克做的是一件由资产阶级分子开创的有益的工作。当这些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说他们已从敌对转为中立、转为睦邻关系的时候，我们应当说：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来吧，好邻居，我们来合理磋商吧。我们尽力协助你们，让你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研究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各种特权，不过你们也得执行我们的任务。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一点，那你们别忘了，肃反委员会的全部机构都在我们手里。如果你们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执行我们的任务，那么整个国家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里，我们会把你们看作国家意志的违犯者。你们应该把每一戈比的用途给我们报清楚，违反这一条，就要以违犯国家意志和国家法律论处。

全部监察机构都在我们手中，但目前把这些人吸引过来，即使是暂时地吸引过来——这一任务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虽不算艰巨，对我们说来却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加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我们没有象样的后方。这可以使我们获得道义上的胜利，因为可以让西欧帝国主义看到，他们在我们这里将会遭到有力的反击，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反对进攻俄国的工人无产阶级反对派。因此，我认为，根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意见所能作出的判断，我们感到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即使还有分歧，那也不是重大的分歧，因为大家都承认必须同整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知识分子、合作社工作者以及尚未承认我们的工会合理磋商，同时又决不放弃政权。如果我们在整个冬季坚定地执行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一定会使整个国际革命事业得到很大的好处。

载于 1929 年《列宁全集》俄文第 2、3 版第 23 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225—233 页

注释：

[1]1918年，俄共（布）中央经常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以讨论当前政策中的重大问题。由于当年秋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向了苏维埃政权方面，11月27日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大会讨论了关于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并在讨论结束后作了总结发言。——202。

[2]这里很可能是指由于美国公使进行了要挟，瑞士政府将以扬·安·别尔津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处全体人员驱逐出瑞士一事。《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11月13日和20日）都报道了这件事。别尔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1月25日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驻瑞士全权代表处的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件事。

列宁在下面谈到的关于荷兰政府拒绝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入境一事，见注74。——211。

[3]指载于1918年《职员通报》杂志第11—12期合刊的全俄职员工会理事会给人民委员会的呈文。其中指出有必要吸收职员工会会员参加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法令（见注84）所进行的组织供应的工作。——225。

论“民主”和专政

列宁

（1918 年 12 月 23 日）

莫斯科收到的几期柏林出版的《红旗报》和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呐喊报》（Weckruf）[1]向我们表明，社会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支持者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遭到了德奥两国革命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应有的回击。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两家机关报，它们显示了第三国际的活力和它的成长。

看来，现在不论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所有代表人物，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拥护立宪会议，并称自己的观点是捍卫“民主”（考茨基甚至说是“纯粹民主”）反对专政。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我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刚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注：见本卷第 229—327 页。——编者注] 这本小册子中作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简要地阐述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了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程。

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政权机构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吧！资产阶级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作“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用来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然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人民面前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利的，必需的；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抛弃无产阶级的观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 1872 年），认为必须特别提醒工人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05 页。——编者注] 叛徒考茨基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本小册子，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本小册子受到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热烈赞扬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的人就是这样赞扬的。

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不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且被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而资本家和投机商继续掌握着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遗憾的是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他们的忙）赞同这种谎言、这种伪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予以揭穿，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国、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彻底认清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富人的民主是谎言、欺骗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也就是使工人和贫苦农民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

（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这些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日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由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来捍卫的，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排除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谎言，就是伪善，因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占有”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等等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些外国的同道者，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大叫起来，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

我们回答说：不对！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人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人即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完全消亡的唯一道路。

资产阶级的伪善的朋友们即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天真的小资产者和庸人们问道：为什么不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民主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小业主必然始终动摇不定，软弱无力，愚蠢地幻想“纯粹”民主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因为，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只能靠被压迫阶级的专政。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是由于只有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了并且“训练出来了”，只有它能够把那些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吸引过来，或者至少能使他们保持“中立”。因为，只有甜蜜蜜的市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过程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欺骗工人。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反抗还没有公开地展开，因为对剥夺者的剥夺暂时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剥夺一经开始，剥夺者就会拚死地、疯狂地进行反抗。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对自己和工人隐瞒这一点，就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紧要关头放弃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立场而采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采取“社会和平”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调和的立场。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99 页。——编者注］。革命迅速地教育着人们。德奥两国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主义叛徒”，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就象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的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统治得愈厉害，无产阶级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关于

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他的思想）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和战争。

1918 年 1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载于 1919 年 1 月 3 日《真理报》第 2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388—393 页

注释：

[1]《呐喊报》(《Der weckruf》)是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 年 11 月起在维也纳出版。1919 年 1 月 15 日起称为《社会革命报》，同年 7 月 26 日起称为《红旗报》。1920 年 10 月 14 日起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德意志奥地利是 1918 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在奥地利本土上成立的国家。1918 年 11 月 12 日，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根据 1919 年 9 月 10 日签订的圣热尔曼和约的规定，该共和国改称奥地利共和国。——383。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1919 年 3 月）

1 代表大会开幕词

同志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第一句话必须谈到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同志们，如果对全党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象许多同志今天在葬仪上所说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最主要的组织者，那么，对党的代表大会来说，他就更宝贵和亲切得多了。在这里，我们失去了一位把自己最后的时日全部贡献给了代表大会的同志。在这里，他的离去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整个进程，代表大会将特别尖锐地感觉到他的离去所带来的影响。同志们，我提议大家起立为他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是在俄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十分困难、复杂和很不寻常的时刻举行我们的党代表大会的。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党的力量和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几乎完全用来直接保卫祖国，直接抗击敌人，直接抗击那些根本不让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期存在的国内外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毕竟逐步巩固起来，并开始把建设任务和组织任务提到首位。我觉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当完全在这种建设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标志下进行。党纲中那些在理论上难于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建设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议程又专门列入了组织问题、红军问题、特别是农村工作问题，——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问题即组织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又是一个能收到最大成效的任务。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一个小农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对待中农的任务**。

同志们，最初，当我们必须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权利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能广泛地提到首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进行的无情的斗争，把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到了首位。但对于一个要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牢固基础的党来说，下一步要提出的任务就是正确地解决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更高的任务。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基础还没有得到保障之前，我们不能广泛地提出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人数众多、势力很大的阶层确定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不能用斗争或支柱这样简单的回答来确定的。如果说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的任务是用“斗争”、“镇压”这样的词来表述，在对待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态度上，这一任务是用“我们的支柱”这样的词来表述，那么，在对待中农的态度上，毫无疑问，任务是更复杂了。社会主义者，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们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论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说到**中立农民**，就是说，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们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们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论上的提法，我们是十分清楚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检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以保证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使得那些屡次产生的偏向和错误再也不能发生，这些偏向和错误曾使中农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首先帮助俄国农民彻底摆脱了地主压迫并为他们建立起真正民主制度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本来是完全能够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的。这个任务不同于那类要求无情地迅速地镇压和进攻的任务。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任务。但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有了一年的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还想稍微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同志们，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成立，就确定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来说，是一个具有极重

大意义的事件。一支庞大的实在的军事力量——世界上一切最强大的国家，直到现在还全副武装反对我们。然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表面上庞大的、从物质方面看来比我们强得多的力量已经摇摇欲坠了。这已经不是一种力量。它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那种巩固性。因此，我们的任务和目的——在斗争中战胜这一庞然大物——并不是空想。相反地，尽管我们目前被人为地与整个世界隔开，但没有一天报纸不带来各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消息。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一高涨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这是一个保证，保证我们在实现苏维埃政权后就摸索到了**国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我们坚信：全世界无产阶级已走上了进行这种斗争的道路，走上了建立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工人和劳动者的政权）的道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向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前进。（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现在让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开始选举主席团。

载于 1919 年 3 月 20 日《真理报》第 60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8 卷第 127-130 页

2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伊里奇万岁！"、"列宁同志万岁！"）同志们，让我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谈起。要作上届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活动的总结报告，这实质上就是作一个关于我国整个革命的总结报告。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要一个人来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在这样短短的期限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本是不能胜任的。因此，我决定只谈几点，在我看来，这几点不仅从我党在过去这段时期所做的工作来看，而且从当前的任务来看，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目前这样的时候，只注意历史，只回忆过去，而不想到现在和将来，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如果从对外政策谈起，不言而喻，占首要地位的是我们同德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布列斯特和约。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谈谈，因为它不仅是具有历史的意义。我觉得，苏维埃政权向协约国提出的建议，或者正确些说，我国政府对大家知道的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1]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我觉得，这个建议和我们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重申了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确定的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因为这样，我想，在事变迅速发展的现在来谈谈这段历史是必要的。

在解决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时候，苏维埃的建设（更不用说党的建设了）还处于开始阶段。你们知道，当时全党的经验很少，还不能确定（哪怕是大概地确定）我们沿着已走上的道路前进的速度。由于过去必然遗留下来的某种混乱状态，当时要观察事变和确切了解发生的事情还非常困难。由于同西欧和其余一切国家隔绝，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客观材料，无法判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可能有多快，可能采取什么形式。由于这种复杂情况，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便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不少的分歧。

但是事变证明，被迫在德帝国主义面前退却，在这个用极大强制性的、令人愤慨的、掠夺性的和约作掩饰的帝国主义面前退却，从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世界帝国主义（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半）的态度来看，是唯一正确的。当时，我们刚刚推翻了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除了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面前退却，绝对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那些从革命家的观点来谴责这一退却的人，实际上是站在根本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们忘记了，我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困难的克伦斯基时代，在苏维埃内进行了多么巨大的准备工作，才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在严重的七月失败之后，在科尔尼洛夫叛乱[2]之后，终于在10 月间最后下定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决心，有了为此所必需的有组织的物质的力量。显然，当时在国际范围内根本谈不上有类似情况。因此，当时同世界帝国主

义作斗争的任务是这样的：继续进行工作来瓦解这个帝国主义，来启发和联合在各地已经开始骚动、但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行动目标的工人阶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布列斯特和约所采取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尽管这个政策在当时——不言而喻——是加深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仇视，而这些分子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是、可能是和必定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好好领会，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用得着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如何对待那些在各国都有而在俄国势力特别大、人数特别多的分子、阶层、集团和阶级，这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任务。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于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他们既不能成为旧社会的推动者，也不能成为新社会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对旧事物的留恋没有达到地主和资产阶级那种程度。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资产阶级比小私有者更国际化。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惨重）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种爱国主义。同时我们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当时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地主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后来他们又开始动摇了。

有些同志在这里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我们的党纲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这个问题，而且以后在讨论每一项议程时实际上还会涉及的。这个问题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已失去它的抽象性、一般性，成了具体的问题。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国际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无产阶级分子坚强和团结起来。这在当时就使小资产阶级政党离开了我们。我们知道，在德国革命发生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又动摇了。这些事变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成熟的时代，曾经用旧爱国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他们的看法不仅是非社会主

义的，而且是根本不正确的。现在由于粮食困难，由于要继续同协约国作战，我们又遇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的浪潮。我们事先也估计到了这种动摇，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就是旧的局势不会照样重复。新的局势是更为复杂的。如果我们用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武装起来，我们就会正确地估计这种局势，我们的政策就会正确。当我们对举行普林杰沃群岛会议的建议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缔结的是带极大强制性的和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也更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怎样在西欧高涨起来，那里的人心浮动怎样变成自觉的不满，它在怎样导致组织全世界的苏维埃无产阶级运动。如果说从前我们是摸索前进，我们是猜测欧洲革命会在何时爆发（这种猜测是以我们从理论上深信这个革命必定爆发为依据的），那么现在则有了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其他国家的革命正在成熟，这个运动已经开始。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待西欧和协约国的态度上，现在或将来还得重复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所实行过的许多东西。有了布列斯特的经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容易多了。当我们中央委员会讨论同白卫分子一起参加普林杰沃群岛会议问题（实质上是兼并白卫分子所占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停战问题在无产阶级中间并没有引起丝毫不平，而党的态度也是这样。至少我没有在什么地方听到不满或不平。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国际政策的教训产生了效果。

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方面，党的任务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列入日程的所有一切问题上，我们在过去一年内已为正确地解决这个任务，特别是对待中农的任务，打下了基础。在理论上我们一致认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农要求我们给予特殊对待；在这里，事情会怎样变化取决于革命中许许多多的暂时因素，特别要看拥护爱国主义还是反对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些次要的甚至是很次要的问题，但它们却使小资产阶级完全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分子在斗争中是动摇的，而且变

得毫无主见。他们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他们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灵活非常谨慎的策略，因为有时是需要一只手给东西一只手取东西的。这不能怪我们，这只能怪不能积聚自己的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我们在实际上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还从报上看到，拥有象考茨基和希法亭那样一些大人物的德国独立党[3]在开始追求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他们想把苏维埃制度纳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就是说，想使“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式结婚。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我国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日益成熟的波兰革命的常识的嘲笑，我们只有耸耸肩膀。我们可以说，最先进的国家都有这种动摇分子。有时，甚至在象德国那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教养的、开明的、有知识的分子的乱说乱叫要比我国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厉害百倍。这就给俄国上了一课，即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农。我们的任务在长时期内都将是复杂的和双重的。这些政党在长时期内必将是进一步退两步，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因为它们跟着社会主义走完全不是由于绝对相信资产阶级制度的无用。忠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本不能要求于它们的。指望它们的社会主义——这是笑话。只有当它们确信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只有当资产阶级被彻底打倒和镇压的时候，它们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我没有可能系统地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我只是根据明天或后天我们的政策需要什么这一点来回顾过去。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农和小资产阶级。这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在布列斯特的例子上体验到的。我们要经常改变行为方式，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这可能是奇怪的和不可理解的。他会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昨天你们向小资产阶级许下诺言，今天捷尔任斯基又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被枪毙。多么矛盾啊！……”是的，是矛盾的。但矛盾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行为，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好，试图脚踏两只船，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我们改变了对他们的策略，而每当他们转向我

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说："请来吧。"我们丝毫也不想剥夺中农，根本也不想用暴力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不是了不起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你们同他们沆瀣一气，那我们就不得不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你们。"

现在我来谈国内建设问题，并简略地谈谈能够说明政治经验的主要之点，即中央委员会这一时期政治活动总结的主要之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政治活动表现在每天发生的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没有象我说过的那样同心协力的紧张工作，我们就不会有已经采取的那种行动，就不能解决各项战斗任务。关于目前引起辩论并由代表大会作为专题列入议程的红军问题，我们曾经作出了许多零星的决定，这些决定是由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的。此外，各人民委员自己作出的重要规定为数更多，但这些规定都是有系统有步骤地贯彻一条总的路线的。

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5-226页。——编者注］。马克思说到公社战士的这些话是带有一定的讽刺性的，因为在公社内主要有两派，即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这两派的行动都违反了自己的学说的教导。但我们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来行动的。同时，中央委员会进行各项具体的政治活动都完全是出于十分迫切的需要。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这个事实将是每一个能够完整地阐明这一年来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活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工作的历史学家要特别强调指出的。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

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瓦解时，许多人最初以为这只是俄国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或者一次演习。当我们讨论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 1918 年 1 月初提出靖和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军队的这种瓦解现象会在什么时候、在其他哪些国家发生。我们试验了又试验，我们试图建立一支志愿军，我们摸索、寻求、尝试，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当时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任务是明显地摆着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生存。统治阶级决不会将自己的权力交给被压迫阶级。但是被压迫阶级应当用事实证明它不仅能够推翻剥削者，而且能够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不怕一切牺牲。我们一向说："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我们谴责**帝国主义**战争，但并不是**笼统地**否定**战争**。糊涂的是那些企图责备我们实行军国主义的人。当我看到关于黄色社会党人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道，知道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国主义的时候，我只有笑笑，耸耸肩膀。历史上真的有过一次不同战争相联系的大革命吗？当然没有！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一个迄今替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指挥官充当小卒的阶级，应当怎样培养自己的指挥官呢？这个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尽管是以最恶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科学技术）就不能掌握现代作战技术和现代作战方法，既然这样，它怎样才能解决既要发挥被压迫者的热忱和新的革命创造精神，又要利用资产阶级的那种科学技术这样一个任务呢？

在这方面，我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根据一年的经验概括出来的。当我们在我们党的革命纲领中写到专家问题时，我们总结了我党在一个重大问题

上的实际经验。以往的社会主义导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很多预见和设想，但我不记得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我们着手建设红军时才产生的问题。这就是说：要用过去充当小卒的被压迫阶级来建立一支满腔热忱的军队，并使这支军队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那些最残暴最可憎的东西。

我们在红军问题上遇到的这个矛盾也存在于我国建设的一切领域。就拿由工人监督工业转到工人管理工业这个研究得最多的问题来说吧。人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颁布了许多法令和决定，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政治经验，在这之后，老实说，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来加以总结。它未必能在这样的问题上进行名副其实的领导。只要想想我们的第一批关于工人监督工业的法令和决定是多么无力、盲目和偶然就够了。我们原来以为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实际做的结果，只是证明了建设的必要性，而完全没有回答怎样建设的问题。每一个国有化的工厂，每一个国有化的工业部门，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都最突出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的特点，都是按高度集中的原则建立在大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这一切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集中的经验，并给我们造成莫大的困难。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远没有摆脱这些困难。最初，我们完全抽象地看待这些困难，就象会宣传而根本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的革命家。当然，许多人曾责备我们，而且直到现在，所有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还在责备我们，说我们开始了这个事业，却不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但这是僵死的人的可笑的责备。好象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象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我认为我们的功绩在于，我们曾迎着极大的困难来着手解决对我们一直是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们曾使无产阶级群众独立进行工作，我们实行了工业企业的国有化等等。我们记得，

在斯莫尔尼宫我们是怎样通过法令的，往往一次就有 10 个或 12 个。这表现出我们让无产阶级群众创造经验和发挥主动性的决心和愿望。现在我们有这个经验了。现在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工业转到或就要转到工人管理工业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完全束手无策，而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并尽可能在我们的党纲中把它们总结出来。这在讲组织问题时要详细谈到。如果工会的同志不来帮助我们，不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在西欧，问题就不同了。在那里，同志们把工会看作一害，因为那里的工会被旧社会主义的黄色代表牢牢把持，所以共产党人认为工会的支持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西欧共产党人的许多代表，连罗莎·卢森堡在内，都宣布要取消工会[4]。这表明我们的任务放到西欧会是多么困难。而在我国，假如没有工会的帮助，我们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可以着手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拿专家问题来说，我们处处遇到这个问题，每决定一项任命都提出这个问题，国民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党中央委员会也得提到它。在目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不能按框框办事。如果不能抽出一些同志，让他们在本部门内独当一面工作，我们就根本不能进行工作。只是因为我们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的一些组织家，我们才能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地进行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而在这一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利用那些愿意用旧时学到的知识来为我们效劳的人的帮助。

我们就拿军事部门的管理问题来说。在这里，对司令部、对擅长组织工作的大专家不信任，就无法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局部说来我们有过意见分歧，但总的说来，猜疑是不可能有的。我们曾求助于资产阶级专家，他们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多次背叛过我们，而且今后还会背叛我们。然而，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

的想法。我们经过斗争锻炼，有力量，团结一致，因此，我们应当走组织工作的道路，利用这些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需要实际地进行建设，而且不得不用敌人的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看起来是矛盾的，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实际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经验，看到每天同这个问题接触的情况时，当我们看到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实际工作时，我觉得，我们的党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任务。这是极其困难的，但只有这样，任务才能解决。富有创造性的协调的组织工作一定会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行进，尽管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进行反抗和较量。我们应当把他们当作技术和文化人才来安排工作，以便保存他们，并使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变为一个有文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我认为，这一年我们已经学会建设，我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

我还想简略地谈谈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粮食问题一向是我们最困难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 1918 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不怕说出这一点。我们所以这样容易地完成十月革命，是因为全体农民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反对了地主，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一定会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因为我们以法律形式实现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刊载过的东西，即怯懦的小资产阶级许诺过但不能做到的那些东西。但是，自从贫苦农民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我们的革命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还远没有解决。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把它实际地提出来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是一个过渡阶段。关于由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第一个

法令，是在当时主持粮食工作的瞿鲁巴同志的倡议下通过的。当时必须把受饥饿折磨的非农业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只有依靠贫苦农民委员会这种无产阶级组织才能做到。当我们看到 1918 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时，只有那时，我们才站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基础上来，只有那时，我们的革命才不是在宣言上、许诺上和声明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即创造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的任务。不久以前，我到过彼得格勒，出席了召开较早的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我看到，我们还在摸索着处理这件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无疑会有进展的。我应当说，我们从这一年的政治领导中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要在这里找到组织支柱。我们已朝着这方面前进了一步，建立了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苏维埃，改变了粮食政策，当然在这方面也遇到了莫大困难。也许，在就要成为苏维埃边区的俄国边区，如乌克兰和顿河区，这种政策还需要作一些改变。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就把这些法令照搬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边区。我们才开始来执行真正建设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还只是迈出头几步，前面还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我曾一再指出，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第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是由粮食工作人员进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但为了把我们的任务彻底完成，需要的不是贫苦农民委员会这样的临时组织。在我国，与苏维埃并存的有工会组织，我们现在利用它们作为教育落后群众的学校。一年来实际管理俄国、执行全部政策而成为我们的主力的工人阶层，其人数少得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是深有所知、深有所感的。假如将来什么时候有位历史学家收集材料，研究哪些集团

在俄国管理了这 17 个月，哪几百人或哪几千人承担了这全部工作，负起了难以置信的管理国家的全部重担，那么，谁都不会相信这样少的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业绩。他们的人数所以微小，是因为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才能的政治领导者在俄国是为数不多的。这个阶层在俄国人数甚少，而在以往的斗争中却负担过多，劳动过度，做了他们力不胜任的那样多的工作。我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要找出实际办法，在工业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农村中，大量地使用新生力量，吸收中等水平甚至低于中等水平的工农参加苏维埃工作。在我们看来，没有他们的大量帮助，今后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我的发言时间快完了，因此，我只想简单地谈谈我们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对中农应采取什么态度，在革命开始以前我们就基本上是清楚的。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问题时，我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原话。［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202-227 页。——编者注］恩格斯不仅指出中农是我们的同盟者，他甚至表示相信，对待大农或许也可以不采取高压手段，镇压手段。在俄国，这种推想没有得到证实。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同富农进行直接的国内战争，将来也还会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实践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由于问题困难，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在这方面汇集起来的经验会帮助我们今后尽量避免这种错误。这就是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你们很清楚，这个任务是困难的。我们没有什么物资可以给中农，而中农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他们要求具体的物质资料，这种物质资料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而且国家也许还要在没有这种物质资料的情况下艰苦斗争几个月，虽然这一斗争现在可望取得彻底的胜利。不过现在我们在我们实际的行政工作中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改善我们的机构，纠正许多

违法乱纪的现象。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修改和纠正我们党的那条没有充分注意到和中农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实行妥协的路线。

我现在能够给你们提供的中央委员会一年来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现在我要极简略地谈谈中央委员会托付给我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即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这个任务只有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委员会本来是指定他担任这个问题的报告人的。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很好的记忆力，能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记在脑子里，同时他个人对地方上的组织工作很熟悉，所以他能够作这个报告。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我可以在这里提供一小部分摘自书面报告的现成材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没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它十分肯定地答应说，在下一周内，就要把书面报告写好，油印很多份，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这些书面报告将补充我在这里只能匆匆地谈到的片断的意见。在目前这份书面报告的材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关于收文的资料：1918 年 12 月有 1 483 件，1919 年 1 月有 1 537 件，2 月有 1 840 件。各类文件的百分比是有的，但我不准备念它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从即将分发的报告中会看到，例如在 11 月内到书记处来谈问题的有 490 人。而这里把这份报告交给我的同志说，这份报告未必能包括书记处所处理的问题的一半，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天要接见几十位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党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苏维埃负责人。

我要请你们注意关于外国人团体联合会[5]活动的总结报告。我对这方面的工作的了解，也只能以我所能浏览的有关外国人团体的材料为限。它们起初有 7 个，现在有 9 个。住在纯大俄罗斯人地区、没有机会直接了解这些团体和没有在报上看到报告的同志，最好看看报纸摘录，这些摘录我不准备全部念了。我应当说，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为成立第三国际所做的工作的真正基础。第三国际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为期很短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关于这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在有关国际的一切问题上的全部意见的详细报告，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来作。我们所以能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人代表大会上用很短的时间做了这样多的工作，是由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完成了巨大的准备工作。我们在留居俄国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和鼓动，组织了许多外国人团体。这些团体中有好几十个成员完全知道作为领导路线的基本计划和总的政治任务。从帝国主义者专为自己的私利而建立起来的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几十万战俘被调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以后，布尔什维主义病菌就扩散到了这些国家。如果说对我们表示同情的团体或政党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这是俄国的外国人团体做了工作的结果。这种工作在表面看不见，在组织报告中也只是概括而简短地提了一下，但这一工作却是作为世界共产党支部之一的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极重要的一页。

其次，在交给我的资料中，有关于哪些组织向中央委员会送报告和怎样送报告的统计数字，在这里我们俄国的无组织性真使我们丢脸。定期报告的有 4 个省的组织，不定期报告的有 14 个省，偶然报告的有 16 个省。这些省份的名称都列在表中，我就不念了。当然，我们的无组织性极其严重，我们的组织性非常淡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战争条件造成的，但这远不是全部原因。用这一点来掩饰问题、进行申辩和推卸责任，是完全不应该的。组织工作从来不是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所有俄国人的长处，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却正是**组织任务**。在这里组织问题被提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应当坚决而果断地，更加坚决更加果断地用一切办法进行斗争。不进行长期教育和改造，我们在这方面将一事无成。在这方面，有人在滥用革命暴力，滥用专政，我要警告你们防止这种违法乱纪现象。革命暴力和专政如果用的得当，该用的时候就用，该用于谁就

用于谁，那是很好的东西。但在组织方面是不能用它们的。这个教育、改造和长期组织工作的任务，我们根本没有解决，现在我们应当有步骤地来着手解决这个任务。

这里有一份详细的财务报告。其中最大的一项是（一个工人出版社和两个报纸）：100 万，100 万，100 万，一共 300 万。交给党组织的是 280 万。编辑部的开支是 360 万。在即将印发给全体代表的这份报告中列有更详细的数目字。同志们暂时可以通过代表团的代表来了解。这些数目字我就不念了。写报告的同志在这里提供了主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这就是从出版方面对宣传工作作了总结。共产党人出版社[6]出版了 62 种。《真理报》在 1918 年内提供了纯利 200 万，发行了 2 500 万份。《贫苦农民报》[7]提供了纯利 237 万，发行了 3 300 万份。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同志答应把他们掌握的详细数字重新加以整理，以便至少可以从两方面作一比较。到那时，任何人都会看到党所进行的巨大教育工作，这个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农来利用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人们千百万次非难我们，说我们破坏出版自由，不要民主。非难我们的人把资本收买报刊叫作民主，把富人可以利用出版事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叫作民主。我们不把这叫作民主，而把这叫作财阀统治。我们把资产阶级文化所创造的、被用来欺骗人民和维护资本家的一切东西夺了过来，以满足工人和农民的政治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到的，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个世纪也未能做到的。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还是比应当做的少得多。

政治局交给我的最后一宗材料是通告信，总共有 14 封。对这些信不了解或不够了解的同志们，请去看一看。当然，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应该注意到，我们必须在我们工作过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每天必须就一系列问题发出政治指示，只有在例外的甚至少有的场合才通过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来做，——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经常发出政治通告信是不可能的。

我再说一遍，在国内战争时期，作为战斗党的战斗机关，我们也不能用别种方式进行工作。否则，不是含糊其词，就是议会争吵，而靠议会在专政时期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导党或苏维埃组织。同志们，在我们利用资产阶级的印刷厂和报刊的时代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的意义缩小了。我们发送的只是那些不能发表的指示，因为我们的活动尽管很多是公开的，但秘密工作终究是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我们从不怕别人责难我们不公开，守秘密，不，我们是以此自豪的。既然我们的处境是推翻了我国资产阶级而又面对着欧洲资产阶级，我们的活动就仍然有秘密，我们的工作就仍然有不公开的。

同志们，我的报告到此结束。（鼓掌）

载于 1919 年 3 月 20 日和 21 日《真理报》第 60 号和第 61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8 卷第 131-150 页

注释：

[1]普林杰沃群岛会议是帝国主义国家计划召开的关于恢复俄国和平问题的会议。1919 年 1 月 22 日，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受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的委托发表呼吁书，建议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林杰沃群岛召开有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所有事实上的政府参加的会议，以便同协约国代表共同制定停止俄国内战的办法。2 月 4 日，苏维埃政府通电英、法、意、日、美各国政府，指出，苏维埃政府虽然没有收到直接邀请，但为了和平，愿意立即在普林杰沃群岛或其他任何地点同所有大国，或者同某些国家或政治集团举行谈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电报未予答复。而安·伊·邓尼金、亚·瓦·高尔察克和其他反革命政府的头子指望用武力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会议没有开成。——119。

[2]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 1917 年 8 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力恢复君主制

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叛乱于 8 月 25 日（9 月 7 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 3 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平定了这次叛乱。8 月 31 日（9 月 13 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120。

[3]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 年 4 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 年 4 月一 1918 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 年 10 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 1920 年 12 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 1922 年。——123。

[4]指罗·卢森堡在 1918 年 12 月 30 日一 1919 年 1 月 1 日举行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工会右派领导人实行叛卖政策的情况下，卢森堡支持了大会一些代表关于取消工会的错误主张，说德国工会“已经从工人的组织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巩固支柱”，“如果不提出取消工会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进行争取社会化的斗争”，并认为工会的任务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来担负。

列宁关于革命家必须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第 6 节。——128。

[5]外国人团体联合会是参加俄共（布）并在苏俄活动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团体的联合组织，根据俄共（布）中央 1918 年 5 月的决定成立。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羁留在俄国的战俘中就开始有了革命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战俘们开始建立自己的 t 革命组织，用各种文字出版报纸。1918 年在战俘中成立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团体。在 1918 年 3 月召开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会议上成立了外国共产党人团体中央常务局，其任务是领导这些团体的工作，负责同俄共（布）中央和有关各国的共产党人组织进行联系；还成立了一些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文部。外国人团体联合会于 5 月成立后，先后加入的团体有:俄共（布）匈牙利组、俄共（布）德国组、俄共（布）南斯拉夫组、俄共（布）捷克斯洛伐克组、俄共（布）法国组、俄共（布）保加利亚组、俄共（布）英美组、俄共（布）意大利组、俄共（布）罗马尼亚组、乌拉尔外国工农共产党和土耳其斯坦外国工农共产党。领导外国人团体联合会的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每一民族的团体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央联合会。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是中央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各个外国人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在战俘和侵犯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者的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联合会于 1920 年 2 月停止活动。——133。

[6]共产党人出版社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出版社，于 1918 年由浪潮出版社与生活和知识出版社联合组成；不久，波涛出版社也并入了共产党人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1919 年 5 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国家出版社，共产党人出版社并入了该社。——135。

[7]《贫苦农民报》(《Б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 年 3 月 27 日一 1931 年 1 月 31 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

来信综述。从 1931 年 2 月 1 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135。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

（开幕词，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闭幕词）

（1919 年 3 月上旬）

1 开幕词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代表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惊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2]，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出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例如，

今天我在一份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愿意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3]。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逞凶，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

载于 1920 年被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489—490 页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 1919 年 2 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8 页。——编者注］。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

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

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60 页。——编者注］。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 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 “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 1649 年的英国，或者在 1793 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

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12．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

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

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 年 2 月 10 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 年 2 月 11 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 Trager und Schützer der 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 年 4 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4]。

2 月 11 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 年 8 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 11 月 11 日和 1 月 12 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

月 9 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 2 月 9 日的事情。11 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

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博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 年 12 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5]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

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6]。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

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滕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7]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滕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象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 1917 年 10 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 1917 年 10 月 26 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

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

提纲载于 1919 年 3 月 6 日《真理报》第 51 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51 号 报告载于 1920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491—509 页

3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根据这个提纲和各国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声明，在一切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下：

（1）向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说明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它必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

（2）在一切工业部门工人中间，在陆海军士兵中间以及在贫雇农中间推行和组织苏维埃。

（3）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内部稳占多数。

载于 1919 年 3 月 11 日《真理报》第 54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510 页

4 闭幕词

我们之所以能够冲破警察的一切阻挠和迫害到这里集会，之所以能够在没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就目前革命时期的所有迫切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是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把所有这些问题实际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开始实际地加以解决。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争取到的东西记载下来。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苏维埃运动都在日益广泛地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尽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肆意横行，尽管他们驱逐、监禁、甚至杀害斯巴达克派和布尔什维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只能使群众受到教育，使他们摆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热烈鼓掌）

载于 1920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7 卷第 511 页

注释：

[1]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篇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 1919 年 3 月 2—6 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4 年 8—9 月，列宁在他起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战争中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6 卷）中提出了建立新的、排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列宁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8 年 1 月 24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左派社会党人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共产国际成立会议的问题，选举产生了筹备机构。1919 年 1 月，由俄共（布）发起，召开了有俄国、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五国的共产党、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共 8 个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创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向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 39 个政党、团体和派别发出了邀请信。

代表大会于 3 月 2 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 21 个国家的 35 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 52 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 3 月 4 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483。

[2]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 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

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484。

[3]列宁读的那份报纸可能有不确之处。那里说的大概不是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而是车间代表委员会。1919 年 3 月 3 日，英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约·法因贝格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一些工业地区成立了有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如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伦敦工人委员会、设菲尔德工人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成了各地的组织中心和相应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有一个时期，企业主和政府根本不想承认车间代表委员会，但他们终于不得不同这些'非官方的'委员会进行谈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承认伯明翰委员会为经济组织，这就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已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成为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的组织。"（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1933 年俄文版第 63 页）——484。

[4]指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 年 3 月 6—8 日）通过的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53—54 页）。——496。

[5]《印刷工人报》(《Гаэета Печатников》) 是受孟什维克影响的莫斯科印刷业工会的报纸，1918 年 12 月 8 日创刊，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于 1919 年 3 月被查封。——498。

[6]这里说的是当时匈牙利和瑞士的革命运动。

1918 年 10 月 30 日深夜，匈牙利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政权落入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以米·卡罗伊为首的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引起劳动群众的极大不满，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宣告成立

共和国以后，各资产阶级政党为召开立宪会议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匈牙利共产党于 1918 年 11 月 20 日正式成立后，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党的威信和声望迅速提高。原先由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苏维埃逐渐转到共产党方面来。3 月 20 日，卡罗伊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辞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当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协议建立苏维埃政权。3 月 21 日，布达佩斯工人占领了该市所有的战略据点，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同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917—1919 年间，瑞士工人运动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日趋高涨。1917 年 11 月 15 日，苏黎世举行了庆祝俄国革命的群众大会。会后，工人们喊着“决不再给交战国提供炮弹！”的口号，唱着《国际歌》，直奔两个弹药厂，迫使这两个工厂关闭。11 月 17 日，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工人在苏黎世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筑起街垒，政府调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群众，全市宣布戒严。政府的迫害并未能阻止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1918 年爆发了反对提高食品价格的群众性经济罢工，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同年 11 月，瑞士爆发了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总罢工。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瑞士社会党左翼革命分子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499。

[7]指载于 1918 年 11 月 18 日《红旗报》第 3 号的罗·卢森堡的《开端》一文。——500。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

（1919 年 3 月 18—23 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

1917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的十月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的发展进程，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推广，这一切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这种革命是目前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的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苦难加剧。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

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 20 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集中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包罗整个整个资本主义列强集团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化的金融资本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对弱小民族的统治权的战争。1914—1918 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这一切都使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向更高的社会经济类型的过渡成为不可避免。

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能由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根本没能由资产阶级政府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在资本主义现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我们眼看着正在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无产阶级日益猛烈的进攻，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国家内的胜利，使剥削者的反抗加剧，而且促使他们建立新形式的国际资本家联合组织（国际联盟等等），这种联合组织正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对各国人民的经常剥削，目前正在加紧直接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这一切必然会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进行自卫的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口号，不仅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公然欺骗劳动人民，其目的是解除无产阶级武装，诱使他们放弃解除剥削者武装的任务。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

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 1914—1918 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这个骗人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靠这种掠夺来的超额利润使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处于特权地位，从而把他们收买过来，保证他们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

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支队伍）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则是正式宣告成立。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的共产国际，不仅在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它的全部政治思想内容和全部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使之适应以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人数上占优势为主要特点的俄国情况，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一般政治方面

1. 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以全民意志、全民族意志或超阶级意志等口号来标榜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际上必然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剥削和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即苏维埃的民主，把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苦农民——即居民中的大多数人的群众性组织，变成由地方到中央、由下至上的整个国家机构持久的和唯一的基础。因而，苏维埃国家也就实现了比任何地方都广泛得多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切实地全部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为了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能，要求不断地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组织性和主动性。

2．同掩饰自己国家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反，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消失之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苏维埃国家，就其实质来说，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所以苏维埃宪法毫不犹豫地剥夺剥削者的政治权利，其出发点是：任何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一点相抵触，那就是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在思想上同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同时要解释清楚，剥夺政治权利并对自由作各种限制，只有作为制止剥削者维护或恢复自己特权的一种暂时办法，才是必要的。将来，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办法也将没有必要存在，因而党将努力缩小它们的范围，直至把它们完全废除。

3．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在形式上普及政治权利和自由，例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和出版的权利。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这些权利和自由。

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纸库等等，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

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4．资产阶级的民主几世纪以来一直宣扬：人们不分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允许真正地实现这种平等，而在它的帝国主义阶段，则使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达到极其厉害的程度。苏维埃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只有它才能够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破天荒第一次彻底地实现这种

平等，直到完全消灭妇女在婚姻和一般家庭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的最后痕迹。在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彻底消灭过去的不平等现象或成见的一切痕迹，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尤其要进行这一工作。

党不只限于使妇女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尽力使她们摆脱那些旧时家务的物质重担，方法是用家务公社、公共食堂、洗衣站、托儿所等等来代替。

5．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同时也就消灭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代表机关脱离群众等缺点。

苏维埃国家还用下述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党的任务是：在进行这方面的一切工作时，应以劳动群众在实践中日益严格、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为基础，特别是通过实行公职人员负责制和工作报告制的办法，使政权机关进一步接近劳动群众。

6．资产阶级的民主违背自己的宣言，把军队变成有产阶级的工具，使军队脱离劳动群众，并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使士兵不能或难于行使政治权利；而苏维埃国家则在工人和士兵的权利完全平等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机关——苏维埃中。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和发展工人和士兵在苏维埃中的团结，巩固武装力量同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的紧密的联系。

7．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劳动群众中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经受斗争锻炼最多的部分，它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表现在苏维埃的产生，也表现在苏维埃发展成为政权机关的全部过程。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反映了这一点，保留了工业无产阶级比农村中较为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某种优越地位。

俄共应当解释，由于以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农村比较困难而历史地形成的这些优越地位，是暂时性的，同时党也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

来消除资本主义在工人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以及中农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匆忙地吸收旧专家参加工作，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被调去担任军事工作，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俄共在与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时，坚持采取下列措施来彻底消灭这一祸害：

（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个委员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

（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以便能逐渐接触所有的管理部门；

（3）逐渐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彻底而全面地实行这些措施（这是沿着巴黎公社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在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同时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将导致国家政权的消灭。

民族关系方面

9．俄共在民族问题方面以下列原则为指针：

（1）把各民族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政策提到首要地位。

（2）为了消除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对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必须取消任何民族集团的一切特权，实行各民族完全平等，承认殖民地和不享有平等权利的民族有国家分离的权利。

（3）为了同样的目的，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

（4）对于谁是民族分离的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共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等。

在任何情况下，曾经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待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能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同民族的成员真正稳固的、自愿的团结一致创造条件，许多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在苏维埃俄罗斯周围团结起来的经验，正表明了这一点。

军事方面

10．党在军事方面的任务可表述为下列要点：

（1）在帝国主义瓦解和国内战争扩大的时期，既不可能保持过去的旧军队，也不可能在所谓超阶级的或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新军队。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即完全由无产阶级和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的农民阶层组成。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这类阶级军队才能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

（2）必须最广泛地使所有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学习军事，并在学校内开设相应的课程。

（3）对红军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是以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基础的。因此，除军事首长外，还必须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

（4）与旧军队的制度相反，必须尽可能缩短纯粹兵营训练的时间，使兵营接近于军事学校和军事政治学校的形式，尽可能使新编的部队与工厂、工会、贫苦农民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5）年轻的革命军队，只有依靠从觉悟的工农出身的指挥人员——起初即使是下级指挥人员——的帮助，才能具有必要的组织联系和稳固性。因此，训练最有能力和毅力的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士兵担任指挥职务，是建军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6）必须广泛利用和运用最近这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和技术经验。因此，必须广泛吸收过去受过旧的军队训练的军事专家参加组织军队的工作和军队作战的指导工作。而把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对指挥人员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则是进行这种吸收工作的必要条件。

（7）选举指挥人员这种要求，对于资产阶级的军队曾有过重大的原则意义，在资产阶级的军队里，指挥人员是作为对士兵进行阶级管辖（通过士兵再来管辖劳动群众）的工具被挑选和训练出来的；而对阶级的工农红军来说，这种要求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则意义。革命的阶级军队需要把选举和任命尽可能结合起来，这仅仅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并视已经达到的部队编制水平、团结程度和有无指挥干部等等而定。

司法方面

11．无产阶级民主派掌握全部政权并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旧式法院以后，抛弃“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公式，而提出“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同时，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为了吸引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群众来行使司法权，应实行由经常更换的临时的法院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并吸引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工会等来编制名册。

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法院，以代替以前那些数不尽的各种体制的多级法院，简化了法院的组织，从而使它成为居民绝对易于接近的机关，并消除了办案中的任何拖拉现象。

苏维埃政权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委托苏维埃选任的法官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没有法令或法令不完备时，则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

在惩罚方面，这样组织起来的法院已根本改变了惩罚的性质：广泛地实行缓刑，以社会的谴责作为处罚的办法，以保持自由的强制劳动代替剥夺自由，以教养机关代替监狱，并为采用同志审判会的办法提供可能性。

俄共主张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发展法院，应当力求使全体劳动居民人人被吸引来履行法官的职责，并且以一套教养性质的办法来最终代替惩罚办法。

国民教育方面

12．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 1917 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已为苏维埃政权所确定的下列有关学校及教育方面的基本原则：

（1）对未满 17 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建立学龄前的教育机关网：托儿所、幼儿园、日间托儿所等等，以改善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

（3）完全实现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各项原则：以本族语言讲课，男女儿童同校，使学校绝对成为世俗的，即摆脱任何宗教影响的学校，使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

（4）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鞋子、教材和教具。

（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育工作者骨干。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国家从各方面帮助工农自学自修（建立社会教育机关网：图书馆、成人学校、民众文化馆、人民大学、训练班，讲座、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对 17 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

（9）使高等学校的课堂对一切希望学习的人，首先是对工人广泛开放；吸引能在高等学校教书的人参加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消除科学的新生力量与教研室之间的一切人为的障碍；为了使无产者和农民有实际可能享受高等教育，对学习者给以物质保证。

（10）同样必须开放在剥削劳动者劳动的基础上所创造的、过去一直为剥削者所专有的一切艺术宝库，并使这些宝库为劳动人民所享受。

（11）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并为此利用国家政权的机构和资财。

宗教关系方面

13．在对待宗教方面，俄共并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自己纲领中提出的、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乡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俄共所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宗教偏见。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经济方面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要以大力提高全国生产力作为决定苏维埃政权全部经济政策的主要点和基本点。由于国家遭到极严重的破坏，应当使一切都服从于一个实际目的——立即尽一切力量增加居民最必需的产品的数量。每一个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成绩，都应当以这方面所获的实际结果来衡量。

同时必须首先注意下列几点：

3．帝国主义经济的解体为苏维埃建设初期所留下的遗产是，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方面的某种混乱状态。这就更加迫切地提出一个根本的任务——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即把一个部门或若干有关部门的生产联合起来，把它集中在一些最好的生

产单位，并迅速地完成经济任务；使全部生产机构保持最大的协调一致，合理地和节省地使用国内一切物质资源。

这里必须注意扩大与其他各民族的经济合作和政治联系，同时力求同它们当中那些已经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民族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

4．对于小工业和手工业，必须用国家向手工业者订货的方法广泛地加以利用；把手工业和小工业列入供应原料和燃料的总计划，同时在单个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劳动组合、生产合作社和小企业联合成较大的生产单位和工业单位的条件下，给他们以财政上的支持；用给予经济优惠的办法来鼓励这类联合，给予这种优惠的目的是，结合其他办法使手工业者不致向往变成小工业家，并促进这些落后的生产形式无痛苦地过渡到较高的、机械化的大工业。

5．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6．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现有的全部劳动力，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以及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中对劳动力实行正确的分配和重新分配，这应当是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最近时期的任务。苏维埃政权只有

与工会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个任务。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7. 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解体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劳动者的同志纪律、他们最高限度的主动性、责任心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互相严格监督，全国的生产力才能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巩固。

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有系统地重新教育群众，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比较容易了，因为群众看到资本家、地主和商人确被消灭，并从切身的实际经验中确信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完全取决于他们本身劳动的纪律性。

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纪律这项工作中，工会应当起最主要的作用。它在打破陈规旧套时，应当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并在实践中试验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建立报告工作的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实行特设的工人同志审判会，等等。

8. 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还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认为，由这一阶层有组织的怠工而引起的对他们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因为这种怠工行为大体上已经被克服了。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

同样，必须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9．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发展科学和使科学接近生产的办法：建立一整套新的实用科学研究所、试验室、实验站，并进行试验性生产，以检验新的技术方法、新的改进和发明，计算和组织所有科学方面的人力和物力，等等。俄共支持这些办法，尽力使这些办法进一步向前发展，并为科学工作与提高全国生产力相联系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农业方面

10．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1）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农场）；（2）支持共耕社和协作社；（3）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4）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才来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5）支持农业公社——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完全自愿的联合。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因此俄共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俄共特别主张：

（1）由国家大力支持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农业合作社，

（2）广泛实行土壤改良制；

（3）通过农具租赁站广泛地、有计划地供给贫苦农民和中农以农具。

俄共考虑到小农经济还将长时存在，因此力求实现旨在提高农民经济生产率的一系列办法。这些办法是：（1）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狭长等等现象）八2）供给农民改良种子和人造肥料；（3）改进农民的牲畜品种；

（4）推广农艺知识；（5）给农民以农艺指导；（6）由国营修理厂给农民修理农具；（7）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等等；（8）改良农民田地的土壤。

11．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一般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的活动等等。

12．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支部、贫苦农民组织、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分配方面

13．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现存的一般市民和工人合作社，是最大规模的消费者的组织，也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所充分准备好了的群众性的分配机构，这种合作社应当作为消费公社及其联合组织的基础。

俄共认为，这样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合作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金融和银行方面

14．俄国苏维埃政权避免了巴黎公社所犯的错误，立即掌握了国家银行，然后把私营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并着手把收归国有的银行、储金局、国库同国家银行合并，从而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人民银行的骨架，使银行由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中心和剥削者的政治统治工具变成工人政权的工具和经济变革的杠杆。俄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把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工作继续贯彻到底，因此它把下列原则提到首位：

（1）整个银行业由苏维埃国家实行垄断；

（2）通过把银行机构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公共簿记机关的办法，根本修改和简化银行业务手续。随着把有计划的公有经济组织起来，这将导致银行的消灭，使银行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会计中心。

15．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共产主义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还未完全组织起来，因此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

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人财产的纸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俄共将依靠银行国有化，竭力实行一系列扩大非现金结算范围、为消灭货币作准备的办法，如必须把货币存入人民银行，实行使用收支手册，以支票及短期领物证代替货币，等等。

财政方面

16．在已经开始的把资本家被剥夺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时期内，国家政权不再是凌驾于生产过程之上的寄生机关；它开始变为直接履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组织，因而国家的预算便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预算。

在这些条件下，只有正确进行国家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才能实现收支平衡。至于在过渡时期如何抵偿国家的直接开支，俄共将坚决主张把曾是历史上所必需的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也是合法的向资本家派款的办法，改为征收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办法。由于对有产阶级广泛实行剥夺，这种税收将自行失去作用，所以，国家的开支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的一部分收入直接变为国家收入的办法来抵偿。

住宅问题方面

17．苏维埃政权力求解决战时特别尖锐的住宅问题，因此剥夺了资本主义房产主的所有房屋，把这些房屋交给了市苏维埃，让大批的工人由城郊搬到了资产阶级的房屋中居住；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交给了工人组织，这些房产的维修费用由国家担负；开始供给工人家庭以家具，等等。

俄共的任务是按照上述方针办事，绝不触犯非资本家房产的利益，并尽一切力量来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消灭旧街区的人口稠密和不卫生现象，拆除不适用的住宅，改建旧住宅，修建适合于工人群众新生活条件的新住宅，使劳动者合理地分散到各处居住。

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第一次有可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政党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最低纲领。

苏维埃政权经过立法手续实行了并在《劳动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日最长为 8 小时，对未满 18 岁者，对在特别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工作的人，以及在地下工作的矿工，工作日不得超过 6 小时；所有劳动者每周都应有 42 小时的连续休息；作为通例，禁止加班加点；禁止使用童工及未满 16 岁的少年；禁止一切女工和未满 18 岁的男工做夜工、或在特别有害健康的部门中做工以及加班加点；妇女产前产后各给假 8 周，工资照付，医疗服药均予免费；并让哺乳的女工每隔三小时有一次至少半小时的喂奶时间，发给哺乳的母亲额外补助金；由工会委员会选出劳动检查和卫生检查组织。

苏维埃政权通过立法手续对于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实行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凡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失业的人，都由雇佣者和国家给予生活保障。同时这一工作完全由被保障者自行管理，并有工会的广泛参加。

此外，苏维埃政权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最低纲领，在同一《劳动法典》中规定工人组织得参与解决工人的雇用及解雇问题；凡连续工作不少于一年者给假一个月，生活费照付；由国家按照工会制定的各类工资等级表调整工资；一定的机关，即苏维埃和工会所属的劳动力的计算和分配部门，负责为失业者安排工作。

但由战争引起的极大破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进攻，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下述通融办法：在非常情况下，容许加班加点，但一年仅限 50 天；允许 14 岁至 16 岁的少年参加劳动，限定工作日为 4 小时；暂时将为期一个月的休假改为两星期；夜间工作时间增加到 7 小时。

俄共应当广泛地进行宣传工作，使劳动者自己积极参加有效地实现劳动保护的一切措施，为此必须：

（1）加强组织和扩大劳动监察工作，其方法是在工人中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并把这一工作推广到小工业和家庭工业中去；

（2）把劳动保护推广于一切种类的劳动（建筑工人、水陆运输工人、仆人和农业工人）；

（3）彻底解除幼年人的工作，并进一步缩短少年工人的工作日。

此外，俄共应给自己提出以下任务：

（1）今后，在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时，要确立至多 6 小时的工作制，而不减少劳动报酬，劳动者应另抽出两小时用于学习工艺理论和生产理论以及实际学习管理国家的技术和军事技术，不再另付报酬；

（2）实行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奖励制度。

在社会保障方面，俄共不仅对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而且对那些因不正常的社会关系而遭受损害的人们，都要组织广泛的国家救济，坚决与各种寄生行为和懒汉思想进行斗争，并规定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使每一个脱离劳动正轨的人回到劳动生活中去。

人民保健事业方面

俄共认为，首先采取以预防疾病蔓延为目的的广泛的保健和卫生措施是自己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工作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供了条件，可以实行一系列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不能实现的保健和医疗措施，如：使制药业、大的私营医疗机构、疗养地国有化，实行医务人员的劳动义务制，等等。

根据这一点，俄共认为自己的最近任务是：

（1）坚决实行有利于劳动者的广泛的卫生措施，如：

（一）改善居住区的卫生状况（保护地面、空气和水）；

（二）根据科学的卫生原则建立公共食堂；

（三）采取预防传染病发展和蔓延的办法，

（四）制定卫生方面的法令；

（2）防治社会疾病（结核病、花柳病、酒精中毒等）；

（3）保证人人都享受免费的、合格的医疗和药物。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

（1919 年 5 月）

1 贺词

同志们，我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向社会教育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并不期望我的讲话会象了解情况和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前一位发言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的那样，深入问题的实质。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并谈谈我在人民委员会多少接触到你们直接从事的工作时所稍微观察到和思考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未必找得到一个苏维埃工作部门，能够象社会教育那样，在一年半中就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在这个部门进行工作要比在其他部门容易些。在这里，我们过去是在排除种种旧障碍。在这里，工农群众特别迫切地要求获得知识、自由教育和自由发展，工作比较容易适合他们的这种要求。因为如果说依靠群众强大的压力，我们已经容易地清除了摆在他们道路上的外部障碍，摧毁了把我们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并使俄国遭到这次战争造成的最大困苦的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制度，如果说我们容易地摧毁了外部障碍，那么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在这里，完全要用另外的方法进行斗争。在这里，只有靠先进阶层的长期的有成效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可是我们常常感到惭愧，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些初步措施中，在推广社会教育即自由的、不受旧的框框和俗套限制的、为成年人所欢迎的教育的事业中，我们起初曾不得不首先同两种障碍作斗争。这两种障碍是我们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那里继承来的，这个社会直到现在还用千万条绳索和链条束缚着我们，把我们拖向后退。

第一个缺点，这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为数很多，他们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作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2]（鼓掌）不过在初期这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不能归罪于广泛的运动；我希望，我们终究会摆脱而且一定会摆脱这种状况。

第二个缺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追求知识、摧毁旧东西的时候，不能带来任何起组织作用和有组织的东西。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动员识字的人和成立图书馆司的问题时，我曾作了一些观察，根据这些粗浅的观察我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好的。当然，在贺词中照例是不大讲坏事情的。我希望你们摆脱这种俗套，如果我向你们谈到我所看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请你们不要埋怨我。当我们提出动员识字的人的问题时，就让人特别清楚地看到，我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让现有的力量有发展的自由，而这些现有的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它们的口号仍然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口号，除了导致高尔察克的统治和旧资产阶级复辟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看看我们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做的工作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总任务，就是要懂得需要无产阶级分子的组织性。问题不在于停留在纸上的可笑的辞藻，而在于现在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我们的法令已对这点作了明文规定[3]。然而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问题即图书问题时，我曾说，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够数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现在还说，这都是事实。的确，我们没有燃料，工厂停工，纸张很少，因而我们不能得

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我们未能掌握我们现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苦于农民的幼稚和无知；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藏书，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图书夺走，因为他还不能认识到，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东西不是一种令人可恨的东西，它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这不能怪不开展的农民群众，而且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农民只会把图书拿回家去，秘密地藏起来，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懂得全国的图书可以集合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将有足够的书籍来满足识字的人的求知欲并使不识字的人识字。现在必须同破坏行为的残余、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么这个革命将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资产阶级，则只满足于摧毁旧东西，给农民经济以自由，而农民经济，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既然我们叫作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彻底地提出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年半的实验之后，我们总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战胜那些一直使我们身受其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现象。（热烈鼓掌）

载于 1919 年 5 月 7 日《真理报》第 96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8 卷第 329—332 页

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整个苏维埃革命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并特别喜欢责备我们和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制的人们的疑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版物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出版物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出版物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当前一切政治性争论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我所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这两个文人集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查封，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的政权机关认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攻击我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

你们，他们背弃了民主。”关于背弃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继续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庸人们的每一次讲话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诲，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俄国和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进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正是谋求摆脱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作了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克里木半岛上有他们的志愿兵活动的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即使志愿兵对付不了你们，我们也不会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让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通路，使我们无法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雷击舰就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

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整个文明世界现在都在反对俄国，事实就是这样。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一事无成。"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他那样闭塞无知，不能结合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也许不能怪他；要不然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牺牲，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放下个别革命家来看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使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讲话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

句话。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他们的神经失常，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场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 1915 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同样是艰难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样的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时候，听到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庄稼汉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懂得存在着不同的战争，懂得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哪怕是一点点革命史。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派、社会党人自居，要公开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是称作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真正的社会党人或是伯尔尼国际[4]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这种人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愚昧，连各种不同的战争都不能区分呢？能不能设想，他竟不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而且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呢（在凡尔赛和约[5]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能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能不能设想，还有哪个识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夺性的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懂得我们的战争所以具有世界规模，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知

道这是一场同他们的决战呢？我们没有根据作这种种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作什么样的民主派或社会党人，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以和平，现在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难的战争，痛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很遗憾的是，你们不愿想通这个问题，也不想知道可以从中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冒这种风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削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极端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最险恶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所以我一点也

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二

对我们目前这个由于革命而必然出现的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

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 1000 人中至少有 999 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吧，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

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47—65 页。——编者注］中曾顺便指出，在 18 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

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象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

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象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象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

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1649 年在英国、1792—1793 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象 1848 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

吗？但是，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束缚劳动群众的手脚，因为我们很清楚，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就万事大吉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语报》[6]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你们最好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使千百万人继续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都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

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这个阶级许诺自由、平等和由多数人作决定。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

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17 页。——编者注］。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而把他们叫作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也许还愿意同意，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派'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7]。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作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渐地然后广泛地转到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 1 章的人，哪怕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

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确实，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样控诉高尔察克是愚笨的。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都因此而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还不懂这个道理，想不通这个问题。

高尔察克（不管他叫高尔察克还是邓尼金，不管军装如何不同，实质都一样）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么，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起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象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指出，许诺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国家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一个遭到完全破坏的国家的具体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党人”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低下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8]考茨基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要推翻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

生产”！不过，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能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涅茨煤田，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同样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当然不会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老爷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那里的粮食生产减少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者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象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而工人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完全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耳其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耳其斯坦运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没有煤陷于停顿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 60 个农民和 10 个工人来说。60 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 10 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衫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60 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 10 个工人应当服从吗？好一个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和由多数人作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在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之后，发现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这就是习惯势力。我们愈坚决地摧毁一切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即习惯的势力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交售”；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还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9]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党人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很清楚，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应情况作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作交易，这样做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牺牲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们，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被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挨饿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

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如果 60 个农民有余粮，而 10 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 60 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10 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 19 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 18 世纪和 19 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 19 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过错，农民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组织好亿万人的产品分配，——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

往坏处说则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吗？难道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是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说得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而反对他们的理智，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暴枪杀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已获得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派"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么，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派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多少话都可以。但这些话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帮助工人**得到粮食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替自己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按多数人意志作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作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作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军事手段得不到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而是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有些“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家”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 9 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295 页。——编者注］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象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 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一年半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现在就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

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纪律的任务。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人联合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现在，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乎意味着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政权时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他们知道，他们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劳动者沦为奴隶。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们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们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们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们只会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们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做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更高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纪律，联合组织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到了这一切，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去做。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象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作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派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特大号的字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

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又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终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在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全力以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这部宪法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载于 1919 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 年 5 月 6—19 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8 卷第 333—372 页

注释：

[1]这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致的贺词和在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19 年 5 月 6—19 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 800 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318]。

[2]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名义下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波格丹诺夫早在 1909 年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 1381 个，会员 40 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 20 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 年停止活动。——[319]。

[3]指 1918 年 12 月 10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动员识字者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该法令刊载于 1918 年 12 月 12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

报》第 272 号。法令规定对所有识字的人进行一次登记，从中选拔优秀的宣讲员，编成小组。这些小组第一要把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向不识字的居民传达，第二要通过宣读法令、文章和共产党的报纸来帮助全体居民提高政治觉悟。——[320]。

[4]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 1919 年 2 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 1914 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 年 2 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 年 5 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326]。

[5]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 50 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26]。

[6]《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 年 2 月 23 日（3 月 8 日）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 年 8 月最终被查封。——[339]。

[7]发表在 1919 年 5 月 13 日《真理报》第 101 号上的尔·格尔曼诺夫的《从克伦斯基向后退》一文，摘引了瓦·弗·舍尔的提纲《合作社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

舍尔在提纲中提出，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坚决实行一切定量食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342]。

[8]可能是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1919 年 4 月 15 日该报第 181 号刊登了卡·考茨基在全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代为宣读）。——[344]。

[9]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 1692 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 年 12 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 年被取缔。——[349]。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1919 年 6 月 23 日）

5 月 19 日我在社会教育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分析的关于平等特别是工农平等的问题，无疑是现时最尖锐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触到了小资产者、小业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种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否认工农平等！请想想，这是多么吓人的事情！当然，资本家的一切朋友，资本家的一切奴才，首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竭力抓住这件事情来“刺激”农民，“煽动”农民，唆使他们反对工人和共产党员。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事情既然是以谎言为基础，也就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农民是稳重踏实的人，是讲求实际的人。给他们解释问题，要实际，要用浅显常见的例子。怎样才算公平呢？是有余粮的农民不顾工人挨饿，把余粮藏起来，等待粮价暴涨呢，还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政权不按投机价格，不按生意人价格，不按掠夺性的价格，而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来收购全部余粮？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可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为资本家效劳，为恢复资本家的独裁而卖力的各种骗子们，却想用“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等言词来“规避”这个实质。

农民必须进行选择：

或者是赞成粮食自由贸易，——这就是赞成粮食投机，赞成富人有发财的自由，穷人有破产和挨饿的自由，赞成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独裁，赞成破坏农民同工人的联盟。

或者是赞成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即卖给统一的工人政权，——这就是赞成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消除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只能二者择一。

富裕农民即富农定会选择前者，想碰碰运气，同资本家和地主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贫苦农民，但这种农民在俄国只会是少数。大多数农民一定会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恢复资本家政权，反对“富人有发财的自由”，反对“穷人有挨饿的自由”，反对用“平等”（拥有余粮的饱食者同挨饿者的平等）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饿死的自由）。

我们的任务就是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自由”“平等”的响亮的美丽的词句所布置的狡猾的资本主义骗局作斗争。

农民们！摘下披着羊皮的豺狼的假面具吧，他们唱着关于“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甜蜜歌曲，其实是以此维护地主压迫农民的“自由”，维护有钱的资本家同工人或半饥饿的农民的“平等”，维护藏匿余粮的饱食者同那些因战争的破坏而挨饿和失业的工人的“平等”。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是劳动者最凶恶的敌人，尽管他们叫作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非党人士，实际上都是资本家的朋友。

“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我们进行斗争，只是保卫劳动的利益，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这就是我在那次讲话中谈到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为“平等”的响亮词句所搅混的地道的真理。绝大多数农民都知道这是真理，都知道**工人的国家**同投机者和富人作斗争，竭力帮助劳动者和穷人，而**地主的国家**（在沙皇统治下）**和资本家的国家**（在最自由最民主

的共和国中）则随时随地在一切国家**帮助富人掠夺劳动者，帮助投机者和富人靠穷人的破产来发财**。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这个真理。所以大多数农民愈觉悟，就会愈迅速愈坚决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赞成同工人政府妥协，反对地主的国家或资本家的国家；赞成苏维埃政权，反对“立宪会议”或“民主共和国”；赞成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妥协，反对支持资本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 * *

对于“有教养的”先生们，对于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等，我们则要说：在口头上你们都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你们恰好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把阶级斗争忘记了。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你们**在口头上**都是承认这本书的）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

从这个起码常识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阶级斗争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会用空谈“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

来支吾搪塞。事实上，一切都是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来决定的，而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包括全体小资产阶级，因而也包括全体“农民”）必然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

问题在于这些中间阶层归附哪一个主力——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形，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谁实际上就是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庸人和市侩。谁懂得这一点，谁就不会让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谈所欺骗，谁就会想到和谈到**实际问题**，就是说，会想到和谈到那些使农民同工人**接近**，使他们结成反对资本家的**联盟**，使他们达成反对剥削者、富人和投机者的**协议**的具体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议变为中立协议），这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只有腐朽的“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腐朽的英雄们，如考茨基和马尔托夫之流，才能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一般词句，即用商品经济时代思想行囊中的只言词组来支吾搪塞，而不去研究这种联盟的具体形式、条件和任务。

尼·列宁

1919年6月23日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1919 年 5 月 27 日）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 800 万人口，300 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可能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1 页。——编者注］。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

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象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加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牢固联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

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有希望但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制止这种动摇。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得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 年 6 月 28 日）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 月 17 日《真理报》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共产主义星期六）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263—266 页。——编者注]，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

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 月 7 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 月 10 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工作名称	工人数目	工作时数		完成工作量
			工作小时	合计	
莫斯科机车总修配厂	装载发往佩罗沃、穆罗姆、阿拉特里和塞兹兰的沿线所需材料以及修理机车用的装备和车辆部件	48 21 5	5 3 4	240 63 20	装车 7 500 普特，卸车 1 800 普特
莫斯科客车机务段	机车的复杂日常修理	26	5	130	总共修理车 1.5 台
莫斯科编组站	机车的日常修理	24	6	144	修理好机车 2 台，拆卸 4 台机车的应修部件
莫斯科车辆部	机车的日常修理	12	6	72	三等客车 2 辆
“佩罗沃”车辆总修配厂	车辆修理和小修				棚车 12 辆和平车 2 辆
	星期六	46	5	230	
	星期日	23	5	115	
	总计……………	205	—	1 014	共修好机车 4 台和客货车 16 辆，装卸车 9 300 普特

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 500 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 50%。

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 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

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 7 天至 3 个月的定活（紧急的）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

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 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 40 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阿·日·

5 月 20 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

“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

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 5 月 17 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

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 年 5 月 23 日《真理报》报道说：

“5 月 17 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 98 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 5 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

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 1—2 倍**。

例如：

5 个旋工在 4 小时内做了 80 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 213%。

20 个粗工在 4 小时内收集了 600 普特旧材料和 70 个各重 3．5 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 850 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 300%。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

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А．嘉琴科同志在 6 月 7 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

“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 30 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 600—700 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 1/4 或 1/3 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终于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

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帮着干吧！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着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 9 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 30 个人，6 小时内要完成 13 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干活。按照‘领头’同志的指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的肩膀和两个吊杆的推压下，轻快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对车轮撤掉之后，就换上一对新的。放好所有的轮对，我们就把那些磨损了的旧家伙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台旋转式铁吊杆吊到空中，轨道就腾出来了。那边，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又上油漆，还盖车顶，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都很高兴。那里的锻工们也需要我们帮忙。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根烧红了的‘导杆’，也就是车辆上用的钩杆，钩已经撞弯。白热的钩杆被钳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经验丰富的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灵巧的锤击使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放着红光就被我们迅速地抬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就把它安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导杆的构造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弹簧……

工作热火朝天，夜幕降临了，炉火烧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靠着一堆轮箍在‘憩息’，慢慢地‘品’着热茶。清凉的 5 月之夜，一钩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人们有说有笑，互相开着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 13 辆不少了！

但格·同志还没有心满意足。

喝完了茶，我们唱着庆祝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的地方，不只是莫斯科。6 月 6 日《真理报》报道：

“5 月 31 日在特维尔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 128 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 14 辆车，修好了 3 台机车，锯了 10 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 12 倍。”

接着，6 月 8 日《真理报》又写道：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 6 月 5 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 5 小时。”

※ ※ ※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1]到孟什

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3])，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 3 月 12 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4]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

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

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职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　※　※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雅科比（他在 1870—1871 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5]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话说得很对。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在建立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国究竟哪一个当霸主的问题。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1919 年 5 月 10 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 1914—1918 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在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产者老爷们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嘲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回答这班老爷们说：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来帮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么变革会进行得快一些，和平一些。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排除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

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个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个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一贯替资本服务，至今还在强词夺理，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以神奇的速度铲除过去的遗迹！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旧习俗残余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都清楚，现在不仅在俄国一国，

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出现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饥饿。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白卫分子）是生活极端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在饿肚子。可是，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度过四年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度过一年半更艰苦的国内战争的挨饿的工人，1919 年夏季尚且能在饥饿的莫斯科开始这件伟大的事业，一旦我们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并争得和平，它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呢？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非常可贵，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其难得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

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17 页。——编者注]。

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词句，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也迷惑了今日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英雄们。与这种冠冕堂皇的人权宣言针锋相对，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简单的提法提出问题。由国家规定缩短工作日，就是这种提法的一个典型。[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33—335 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就显得愈清楚，愈透彻。真正共产主义的“公式”与考茨基之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在伯尔尼国际中的亲爱“兄弟们”的华丽、圆滑、堂皇的辞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切归结于劳动条件。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制度”等等的空话吧。今天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浮夸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只要看到那种“贵人”修饰得十分“光滑的”面孔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无误地断定“这准是个骗子”。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多多努力使挨饿的工人和褴褛的农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通过奸商的交易，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象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劳动来获得。

我们大家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问题上崇尚空谈的遗风现在还到处都可以看到，甚至在我们队伍里也是这样。例如，我们的报刊很少向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些腐朽的残余开战，很少支持普通的、质朴的、平凡的但是生气勃勃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所有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没有异议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吗？当然没有。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还是这句话：没有，没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这些设施不是新的，它们（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质前提一样）是由大资本

主义造成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极少，第二，——这点特别重要——不是具有投机、渔利、欺骗、伪造等劣迹的营利性企业，就是理应受到优秀工人憎恶和鄙视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把戏”。

毫无疑问，在我国，这样的机构已经比过去多得多了，而且它们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毫无疑问，女工和农妇中有组织才能的人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倍，她们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和更多使用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空话连篇，无事奔忙，无谓争吵，空谈计划、体系等等。可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地护理这些新事物的幼芽。

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多么善于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资本家在他们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对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大肆赞扬，把资产阶级的“模范”机构当作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却不注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作宣传。至于模范的、共产主义的工作，在节省人力方面，在便利使用者、节约产品、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改善卫生条件等方面正在作出什么成绩，能够作出什么成绩，以及如何将这一切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报刊也没有详细报道。

模范的生产，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认真负责态度，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人和农民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管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还是在各方面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粮食的收购量从 3000 万普特（1917 年 8 月 1 日至 1918 年 8 月 1 日）增加到 1 亿普特（1918 年 8 月 1 日至 1919 年 5

月 1 日)；蔬菜业发展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铁路运输在燃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得到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一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 ※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由它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实际教训。

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创举，这是首先的、也是主要的教训。“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宣布为“公社”，而人们却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已经考虑成熟，决定废除人民委员会法令中涉及“消费公社”这一名称[6]的内容，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让名称普通一些，这样，新的组织工作在最初阶段上的缺陷和缺点也就不会推到“公社”身上，而将由不好的共产党员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好是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禁止动辄使用这个字眼，或者只承认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证明（并由附近全体居民一致公认）有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能力和本领的真正的公社，才有权使用这个名称。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无偿地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模范地进行工作，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例外，因为这里，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象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努力争取，而且一定要做到。今后不论是谁，只要未经艰苦劳动和长期劳动的实际

成效以及真正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模范事迹证实，就把自己的企业、机关或事业称作公社，都应当被看成骗子或空谈家，受到无情的嘲笑和羞辱。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伟大创举，在另一方面，即在清党工作中，也应当予以利用。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了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创举继续清党：非经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见习期”，不得接收入党。1917 年 10 月 25 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

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也非常鲜明地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质。党中央写过一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263—266 页。——编者注]这是拥有一二十万党员（我预料在严格清党后将留下这么多，目前党员人数是超过这一数字的）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响应。这样的工人在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有 400 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20 万和 400 万，这就是两个“齿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比例。此外，还有几千万农民，他们主要分成三类：人数最多的、同无产阶级最接近的一类，即半无产者，或者说贫苦农民；其次是中农；最后是人数最少的一类，即富农，或者说农村资产阶级。

只要还有可能买卖粮食和利用饥荒来干投机勾当，农民就仍是（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半劳动者和半投机者。作为投机者，农民是敌视我们，敌视无产阶级国家的，他们同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买卖粮食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直到孟什维克舍尔或社会革命党人波·切尔年科夫）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劳动者，农民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作为劳动者，千百万的农民大众是支持一二十万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并由几百万有组织的无产者所组成的国家“机器”的。

真正更民主的、同被剥削劳动群众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

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一定会彻底巩固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工作，而且只有这种工作，才会彻底使农民相信我们正确，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才会使农民成为我们无限忠实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才会把粮食困难完全克服，使共产主义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完全巩固起来。

1919 年 6 月 28 日

1919 年 7 月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9 卷第 1—29 页

注释：

[1]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 1905 年 10 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 1917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 年 5 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1。

[2]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 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 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 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

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 1917 年 12 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 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 年 6 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 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 1918 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 年 8 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1。

[3]指 1919 年夏尤登尼奇白卫军进攻彼得格勒期间潜藏在苏维埃军队后方的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阴谋活动。1919 年 6 月 12 日夜间，反革命组织"民族中心"的成员策动位于芬兰湾东端南岸的红丘、灰马等炮台的守备部队举行叛乱。叛乱分子企图使喀琅施塔得防区陷于瘫痪，然后与白卫军进攻相配合，攻占加契纳，切断彼得格勒同莫斯科的联系，进而夺取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主要由水兵和彼得格勒工人参加的海岸部队，于 15 日发动进攻，在海军舰艇和飞机配合下，迅速攻下了这些炮台，平定了叛乱。同时，15000 多名彼得格勒工人同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起在彼得格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拘捕了反革命分子数百人。——11。

[4]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 1919 年 2 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 1914

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 年 2 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 年 5 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2。

[5]萨多瓦会战亦称克尼格雷茨会战，是 1866 年普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于当年 7 月 3 日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和克尼格雷茨（今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进行，结果普军大败奥军，从而决定了这次普奥战争的结局。——15。

[6]人民委员会于 1919 年 3 月 16 日通过法令，将消费合作社合并、改组为统一的分配机关，名为“消费公社”。这一新名称在某些地方引起了对法令的一些误解。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19 年 6 月 30 日通过了《关于工农消费合作社的决定》，在对上述法令表示赞同的同时，决定用人民用惯了的“消费合作社”的叫法来代替“消费公社”这一名称（见 1919 年 7 月 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143 号）。——23。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

（1919 年 7 月 4 日和 7 日之间）

同志们！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危急关头、甚至可能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国内和国外（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维护剥削者地主资本家的人，拼命想使侵占人民劳动成果的地主和剥削者的政权在俄国复辟，以便巩固他们正在全世界崩溃的政权。英法资本家用自己的军队强占乌克兰的计划破产了；他们在西伯利亚对高尔察克的援助也失败了；红军在乌拉尔得到全体起义的乌拉尔工人的支援，正在英勇前进，逼近西伯利亚，将从当地统治者即资本家的空前的压迫和暴行下解放这一地区。最后，英法帝国主义者用反革命阴谋夺取彼得格勒的计划也已破产，参加这次阴谋的，有俄国的君主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现在国外的资本家拼命想借邓尼金的进攻来恢复资本的枷锁，他们也象过去帮助高尔察克那样，以军官、补给、炮弹、坦克等等帮助邓尼金。

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战胜邓尼金，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胜利进攻。这就是

当前的主要任务

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还有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接的战争任务上，转到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犯上，并减少和改变自己其余的一切活动，使之服从于这个任务。

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

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都要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

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管理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任何把实行集体管理的机关变为清谈馆的现象，都是极大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

实行集体管理，无论在委员会人数方面或处理的工作范围方面，都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通过交换意见互通情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只要有一点可能，集体管理就应限于在最小范围的委员会内仅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简短的讨论，至于对机关、企业、工作和任务的实际安排，则应委托一位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威胁着一切没有很多集体管理工作经验的人，而在军事上往往导致无法避免的灾难、混乱、惊慌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

组织上的忙乱或不切实际也是同样危险的祸害。为了战争，必须改造工作，但决不应改造机关，更不应匆忙地建立新的机关。这是绝对不许可的，这只能造成混乱。所谓改造工作，应该是使非绝对必要的机关暂停工作，或加以适当缩减。但是一切支援战争的工作，应当完完全全通过现有的军事机关进行，要整顿、巩固、扩大和帮助这些军事机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建立特别的“防卫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或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第二，要经过有关军事当局或苏维埃最高当局批准；第三，必须遵守上述条件。

向人民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和唯一严重的敌人。如果没有协约国（英、法、美）帮助，他们早就完蛋了。由于协约国帮助，他们才成为一种力

量。但是，他们对人民还是非欺骗不可，不时地作出姿态，佯装拥护“民主”、“立宪会议”、“民权制度”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甘愿受他们欺骗。

现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和他是一对双生子）的真相已被完全揭穿了。枪杀几万工人；甚至枪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鞭挞成县成县的农民；公开毒打妇女；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横行无忌；大肆掠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就是如此。即使在背叛过工人而站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一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真相了。

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使人民了解这些情况。要向他们说清楚，要么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么是苏维埃政权即工人的政权（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有些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曾经在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那里呆过，特别应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证词。应使每个工人和农民知道，究竟为什么进行斗争，假如高尔察克或邓尼金胜利，他们会遭遇到什么。

做好应征者的工作

为了帮助动员，做好应征者的工作，做好已应征者的工作，这是目前应当关心的大事之一。凡是已应征者集结的地方或驻有卫戍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地方，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应征者和当地驻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有的可以天天工作，有的可以每星期工作 4 小时或 8 小时，当然，要有严密的组织，每个人要由地方党组织和军事当局指定担负一定的工作。

居民中的非党员或其他党的党员，当然不能做反邓尼金或高尔察克的思想工作。但根据这一理由而不让他们做任何工作是不能容许的。应该想出各种办法，责成全体居民（首先是城乡较富裕的居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动员工作，或帮助已应征人员。

应采用一种特殊的办法，以便协助最迅速最好地训练已应征人员。目前，苏维埃政权正在征集所有的旧军官和士官等人。共产党以及全体同情分子和全体工人都应当来帮助工农国家：第一，尽力协助捕获一切逃避报到的旧军官和士官等；第二，在党组织的监督或领导下，把那些在理论上或实际上（例如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受过军事训练而能出一分力的人组织起来。

做好逃兵的工作

近来反逃跑的斗争显然出现了转折。在许多省份里，逃兵已开始大批返回军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逃兵已涌到红军中来了。原因是：第一，党内同志的工作做得更好更经常了；第二，农民日益意识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要恢复比沙皇制度更坏的制度，要使工农再度成为奴隶，遭鞭笞，受掠夺，受军官和贵族侮辱。

因此，各地都要用全力加紧对逃兵进行工作，使他们回到军队里去。这也是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顺便指出，能够用说服办法影响逃兵，取得成效，这表明工人国家同农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与地主国家和资本家国家完全不同。用棍棒或饥饿来进行压迫，这是后两种国家的纪律赖以维持的唯一手段。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用另外的手段来维持纪律，这就是工人说服农民，工农结成同志联盟。如果目睹者告诉你，某某省（例如梁赞省）有成千上万的逃兵自愿回来，群众大会上向“逃兵同志”发出号召，收到的效果有时简直难以形容，你才会了解，工农的这种同志联盟蕴藏着多少未被我们利用的力量。农民有一种偏见，使他们赞成资本家，赞成社会革命党人，赞成“贸易自由”；但农民也有一种明智，使他们日益同工人结成联盟。

直接帮助军队

我们军队最需要的供应品是：衣服，鞋靴，武器和炮弹。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必须作巨大的努力才能满足军队的这种需求。英、法、美资本家掠夺者给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慷慨援助，才使他们没有因缺乏供应而遭到必然崩溃。

不管俄国受到怎样的破坏，但是国内还有不少的资源，这些资源我们还没有利用，而且往往不善于利用。还有很多军用物资仓库尚未发现或未经查清，还有大量生产潜力尚未挖掘，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官吏们故意怠工，部分是由于办事拖拉，文牍主义，漫无条理，笨拙无能，——所有这些“往日的罪过”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威胁着任何一个向新社会制度“跳跃”的革命。

在这方面直接帮助军队是特别重要的。主管这件事情的机关特别需要“革新”，需要从旁协助，需要当地工人农民自愿的、有力的、英勇的创举。

要号召全体觉悟的工人农民、全体苏维埃活动家尽量广泛地参加这种创举，要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试行各种办法在这方面帮助军队。在这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比在别的部门差得多，而“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需要却迫切得多。

收集居民中间的武器也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在经过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两次人民革命的国家内，农民和资产阶级藏有很多武器，这是自然的不可免的现象。但是，在目前邓尼金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必须用全力清除这种现象。如果有人隐藏或帮助隐藏武器，那就是对工人农民犯下滔天大罪，就应该被枪决，因为他是使成千上万的优秀红军战士往往只因缺乏武器而阵亡的罪人。

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组织严密的大搜查，找到了成千上万的枪枝。俄罗斯的其余地方不应落在彼得格勒之后，无论如何要赶上并超过它。

另一方面，枪枝藏得最多的无疑是农民，他们往往没有任何恶意，不过是出于对任何“国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等等。我们已用说服、巧妙的鼓动和恰当

的办法做了很多很多的（在最好的省份里）工作，使逃兵自愿回到红军中去，毫无疑问，我们也能够而且应当做同样多的或者更多的工作，使人们自愿交回武器。

工人和农民们！把暗藏的枪枝找出来交给军队！这样你们才能使自己不受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毒打、枪杀、大规模的鞭挞和劫掠！

缩减非军事工作

上面简略提到的工作，即使是执行其中的一部分，也需要成批的新工作人员，而且是要最可靠、最忠实、最有毅力的共产党员。可是到处都在抱怨，说缺少这样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过度疲劳，那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工作人员呢？

毫无疑问，这种抱怨是颇有道理的。如果有谁精确地计算一下，近 20 个月来，在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下管理俄国的先进工人和共产党员为数之少，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我们管理得很有成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克服空前的困难，战胜直接或间接与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到处蠢动的敌人。除了一个敌人，即除了协约国，除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战胜了一切敌人，而且我们已经打断了这个敌人的一只手——高尔察克；现在威胁我们的只是它的另一只手——邓尼金。

管理国家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新生力量在迅速地成长，这就是青年工人和农民。他们都在一心一意地、紧张地努力学习，体会由新制度得来的新印象，抛掉原先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成见，把自己锻炼成比他们的前辈更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可是，不管这支新生力量成长得如何迅速，不管它在国内战争和资产阶级疯狂反抗的烈火中如何迅速地学习和成熟起来，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还是得不到现成的国家管理人员。而问题正在于最近这几个月，即 1919 年的夏秋两季，因为我们与邓尼金的斗争需要而且必须立刻解决。

要得到大量现成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军事工作，就要缩减许多非军事的，确切些说，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苏维埃工作的部门和机关，就要按这个方针（即缩减的方针）来改组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企业。

就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作例子。为了充分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正确计算和分配一切科学技术力量，这是一个极有用的必要的机关。但这样的机关是否绝对必要呢？当然不是。有些人可以而且应当立即用来在军队中和直接为军队服务的部门中做迫切而绝对必需的共产主义工作，目前把这种人交给这种机关，那简直是犯罪。

这样的机关和部门在我们中央和地方都很不少。我们要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立即着手建立这类机关。但如果我们在面临邓尼金的大举进攻时竟不能很好地改编队伍，暂时停止和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会是傻瓜或罪人。

我们不应当陷于张皇失措、一片慌乱的境地，不应当把什么机关都改组和完全关闭，不应当开始建立新机关（匆匆忙忙地去做，特别有害）。我们应当在中央和在各地把一切非绝对必要的机关和部门，暂时停闭三五个月，如不能完全停闭，则在这段时间内（大致的时间）尽量加以缩小，只留下绝对必要的工作。

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立刻得到大批现成的、有经验的、忠诚的、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或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来做军事工作，那我们就可以冒一下险，使很多大大缩减的机关（或机关的某些部门）暂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把这些机关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工作人员去料理。这个风险并不大，因为所指的只是非绝对必要的机关，自然，削弱这些机关（处于半停顿状态）的活动，会受到损失，但这种损失不会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灭亡。而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加强（而且是立即大大地加强）军事工作，那我们就会灭亡。必须认识清楚这一点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

如果各省县等等的主管部门或所属部门的每个领导者，每个共产党支部，都立即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某机关或某部门是否绝对需要？它的工作暂时停止或缩减 9/10，不留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否就会灭亡？如果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后，随即迅速而坚决地缩减工作，把共产党员（以及同情分子和非党人士中绝对可靠的助手）调出，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最短期间派出成百上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象战胜更强大的高尔察克那样战胜邓尼金。

前线地区的工作

最近几星期来，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内，前线地区已经惊人地扩大，并且非常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这是战争快到决定关头和接近总解决的征兆。

一方面，由于红军的胜利和高尔察克的瓦解，由于高尔察克占领区中革命的发展，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这一辽阔地带已经成为我们的前线地区了。另一方面，由于我方的损失，由于敌人大量逼近彼得格勒，并从南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进犯，在彼得格勒近郊和南方，前线地区更扩大了。

于是前线地区的工作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红军迅速前进的乌拉尔地区，我们军队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人员等等，以及当地的工人和农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在新收复地区安居下来，进行创造性的苏维埃工作；人们愈疲于战争，高尔察克的破坏愈严重，这种愿望就愈自然。但是，如果照这个愿望去做，那就最危险了。这会减弱我们的进攻，使进攻停顿下来，使高尔察克有恢复元气的机会。从我们方面来看，这简直是对革命的犯罪。

决不从东线部队中多抽调一个工作人员来做地方工作！[注：没有绝对必要，就不抽调他们，可从中部省份调遣！] 决不减弱我们的进攻！要取得完全胜利，只

有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尝过高尔察克“民主”的可怕滋味的居民人人参加作战，并且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直到革命在西伯利亚取得完全的胜利。

让乌拉尔和乌拉尔地区的建设工作推迟一下，让这种建设完全由当地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较弱的人去慢慢地进行吧。我们并不会因此灭亡。如果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那我们就会灭亡，我们应当用乌拉尔起义工人的力量，用乌拉尔地区农民的力量来加强这个进攻；他们现在已经亲身认识到孟什维克马伊斯基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的“立宪”诺言是什么货色，认识到这些诺言的真正内容即高尔察克是什么货色。

减弱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进攻，就是背叛革命，就是背叛把工农从高尔察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

在刚解放的前线地区进行工作时，要记住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不仅赢得工人而且赢得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用事实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权这一工农政权的实质，一开始就采取党根据 20 个月工作的估计所定下的正确方针。我们在乌拉尔不应该重复我们曾在大俄罗斯犯过而正在迅速纠正的那些错误。

在彼得格勒近郊的前线地区，在急速扩大的乌克兰和南方的广大前线地区，要把一切转入战时状态，使一切工作、一切努力、一切考虑完全服从于战争，而且只服从于战争。否则就不能击退邓尼金的进犯。这是很明显的。要清楚地了解和完全实现这一点。

顺便说说，邓尼金军队的特点是军官多，哥萨克多。他们没有巨大力量作后盾，却非常善于奔袭、冒险和死拼，以此散布惊惶情绪，为破坏而进行破坏。

在同这样的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最高度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警惕性。贻误时机或张皇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党或苏维埃的每个负责的工作人员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在军事上，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有军事纪律！

要有军事警惕性和严格性，要不屈不挠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

对军事专家的态度

以出卖彼得格勒为目的的红丘炮台大阴谋又一次特别紧迫地提出了关于军事专家和肃清后方反革命的问题。毫无疑问，由于粮食状况和军事状况的尖锐化，必然使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会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猖獗起来（参加彼得格勒阴谋的有“复兴会”[2]，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只是个别人参加，但终究是参加了）。毫无疑问，最近期间，在军事专家中象在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一样，一定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变者。

但因此就主张改变我们的军事政策的原则，那就是不可挽回的错误和不能饶恕的怯懦。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背叛我们，而且将来还会背叛我们。我们会把他们抓起来，枪毙掉，但我们这里也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长期正常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就无法建立起目前这样一支红军，这支军队克服了叫人想起来就憎恨的游击习气，并在东部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军事部门中富有经验的领导人说得对，只要严格执行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严守纪律，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一般说来，蓄意叛变的军事专家就最少见，他们的阴谋也难以实现，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好些，胜仗也就多些。游击习气及其残存的痕迹和流毒给我军和乌克兰军队所造成的祸害、瓦解、失败、灾难以及人员和军用物资的损失，比军事专家的一切叛变所造成的要大得无法计算。

在我们的党纲中，无论对于一般资产阶级专家问题，还是对于其中的一种专家即军事专家的问题，都十分明确地规定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党现在反对，将来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

和资产阶级制度”［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9、110页。——编者注］。

不用说，党同时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党现在镇压而且将来还要“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自然，当这类“阴谋”出现或刚露苗头的时候，“无情镇压”所要求的气质，就不同于“长期锻炼”要求学生养成的那种从容不迫和小心慎重的气质。有人在经受同军事专家“共事的长期锻炼”，也有人专事直接“无情地镇压军事专家反革命阴谋”，他们心理上的矛盾，很容易引起而且正在引起摩擦和冲突。必要的人事变动，有时由某种反革命“阴谋”事件引起的、尤其是由大阴谋案引起的大批军事专家的调动，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要通过党的途径来解决，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也都这样做，务必使实际工作不受任何损失，在采取必要办法时毫不迟延，在实行我们所规定的军事政策的原则时毫不动摇。

如果党的某些刊物对军事专家发出不正确的论调（象不久前在彼得格勒有过的那样），或在个别情形下对军事专家的“批评”变成了直接干扰，妨碍我们坚持不懈地利用这些专家，党应当立即纠正这种错误，今后也要不断纠正这种错误。

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手段是加强军队和待应征者的政治工作，抓紧军队政治委员的工作，改善他们的成分，提高他们的水平，要他们实际执行党纲所要求的而往往执行得非常不够的东西，即“把对指挥人员〈军队〉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站在一旁批评军事专家，企图“一举”纠正，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而也是毫无希望的和有害的。让所有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关心我军缺点的人都加入队伍，当红军战士或指挥员，当政治工作人员或政治委员，让每一个人（每个党员都会找到适合他的才能的工作）都到军事组织内部去为改善这种组织而工作吧。

苏维埃政权早就非常注意使工人以及农民，尤其是共产党员能够认真地学习军事。许多学校、机关和训练班都在这样做，但做得还远远不够。在这里，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毅力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应当努力学习操作机枪、大炮、装甲车等等的技能，因为这方面我们落后得更明显，这方面拥有大量军官的敌人占有更大优势，这方面不可靠的军事专家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这方面共产党员能起极其巨大的作用。

肃清后方的反革命

象去年 7 月一样，反革命在我们后方，在我们中间又抬头了。

反革命已被击败，但远未被消灭，它当然要利用邓尼金的胜利和粮食困难的严重情况。那些动摇的、无气节的、靠言语来粉饰自己行动的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是跟着直接的和公开的反革命走，跟着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走，这些反革命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拥有资本，同协约国帝国主义有直接联系，知道专政不可避免，而且有实现这种专政的能力（按高尔察克的方式）。

在这方面不要有丝毫的幻想！我们知道产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乱和反革命阴谋等等的“温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农村中则是富农，还有各地的“非党”人士，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这个温床要加倍、十倍地严密监视。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为从这方面来的反革命阴谋，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此，不断发生炸毁桥梁、组织罢工、进行种种间谍活动等事件，也是很自然的。在反革命“温床”稍有可能“存身”的一切中心，都必须采取各种最有力的、系统的、反复的、大规模的和出其不意的预防措施。

在对待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要考虑到最近的经验。在他们的“外围”中，在倾向于他们的人们中，毫无疑问，有一种动

向：脱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靠拢苏维埃政权。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动向，每当这种动向有某种实际表现的时候，我们就采取某种相应的步骤。我们决不改变自己的这种政策，一般讲来，脱离倾向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投奔"倾向于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这样的人数无疑是会增加的。

但在目前，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无气节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然在看风使舵，倒向胜利者邓尼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他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领袖们"（如孟什维克中的马尔托夫之流，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切尔诺夫之流）更是如此。这些"文人集团"的成员，除了别的原因，还因他们在政治上的完全破产而大为恼怒，所以，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冒险的"嗜好"未必是能够根除的。

决不要被他们领袖的言论和思想以及他们个人的诚恳或伪善所欺骗。这些东西对他们每个人的履历是重要的。但从政治上看，也就是从阶级关系、从千百万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马尔托夫之流"代表中央"郑重地斥责自己的"积极派"[3]，并以开除他们的党籍相威胁（永远不过是威胁！）。但这丝毫没有消除下述事实：这个"积极派"是孟什维克中最有力量的人，他们藏在孟什维克后面，干着他们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式的勾当。沃尔斯基之流斥责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之流，但这毫不妨害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比沃尔斯基更有力量，毫不妨害切尔诺夫说："我们现在不推翻布尔什维克，何人何时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能不与反动派即切尔诺夫之流进行任何勾结而"独立地""进行工作"，但他们实际上也是邓尼金的同盟者和他任意摆布的小卒，正象死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一样，这位前任司令由于"思想"原因曾向捷克斯洛伐克军[4]和高尔察克开放战线。

马尔托夫和沃尔斯基之流自以为“高于”交战双方，自以为能够建立“第三种势力”。

这个愿望即使是真诚的，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从 1848 年到现在，70 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学会这一基本常识：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存在任何第三种专政。马尔托夫之流大概至死也不会放弃这种幻想。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们要记住，在实践中，这班人总不免今天倒向邓尼金，明天倒向布尔什维克。而我们今天就该按今天的情况办事。

我们的任务是直接提出问题。怎样做才更好呢？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非党人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中“起来”（有的用武器，有的搞阴谋，有的鼓动反对动员，如参加孟什维克组织的印刷工人或铁路员工那样，等等）反对苏维埃政权即拥护邓尼金的几百个叛乱分子一律逮捕，关进牢狱甚至枪毙呢，还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把几万工人和农民斩尽杀绝，一律枪毙，一律打死？作出抉择并不困难。

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

谁要是至今还不了解这一点，谁要是只会哭诉这样的决定“不公正”，那就不要理睬他，让他去受公众的嘲笑和羞辱好啦。

动员全民参战

苏维埃共和国是被世界资本包围的要塞。只有那些积极参加战争并尽力帮助我们的人，才有权把这个要塞作为躲避高尔察克的避难所，才有权在其中居住。因此，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动员全民参战，有的去直接作战，有的去参加配合作战的各种辅助工作。

要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理想的组织。既然我们的国家组织还很不完善（如果考虑到它还年轻，还是新事物，它的发展遇到特殊的困难，那就不足为奇

了），要想大张旗鼓地立即着手彻底实现或者哪怕很广泛地实现这个目标，那是极有害的不切实际的组织计划。

不过，为了接近这个理想，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党的工作者和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创举”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同志们注意就够了。没有必要作出某些具体的指示或规定。

我们只是指出，那些最接近苏维埃政权而通常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例如“左派”孟什维克之类的某些人，最爱对扣押人质这种在他们看来是“野蛮的”手段表示愤慨。

让他们去愤慨吧，但不这样就不能进行战争，而且在危险激增的情况下，从各方面来说都必须经常大量地使用这种手段。例如，孟什维克的或卖身投靠的印刷工人，铁路“管理人员”和暗中搞投机活动的铁路员工，富农，城市（和乡村）的有产者，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对抗击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工作往往采取极端罪恶、极端无耻的冷漠态度，并进而实行怠工。应该开列这类人的名单（或强迫他们自己编成连环保小组），不仅要他们去挖战壕，象有时做的那样，而且要他们从各方面给红军以各种物质帮助。

如果我们更广泛、更多方面、更巧妙地运用这种办法，红军战士的田地就会耕种得好些，红军战士的食品、烟草以及其他必需品就会供给得好些，成千上万的工农因某些阴谋事件等等遭到死亡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共产党员，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立即在最近几个月内空前地紧张地行动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既然饥饿和疲惫的莫斯科铁路员工，不分技工和粗工，能够为了战胜高尔察克，在彻底战胜高尔察克以前一直坚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每个星期无报酬地做几小时的工作，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比平时高许多倍的劳动生产率，那也就证明，我们还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应当做出很多的事情。

那时我们一定会胜利。

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

载于 1919 年 7 月 9 日《俄共（布）中央通报》第 4 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9 卷第 44—63 页

论国家[1]

（1919 年 7 月 11 日）

同志们！根据你们拟订并通知我的计划，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国家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没有弄错，你们的训练班刚开课，你们是第一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困难的问题的第一讲，就很可能做不到使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充分明白，充分了解。要真的是这样，我请你们不要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此，绝对不要指望在一次短短的讲课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课以后，你们应该把不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三番五次地加以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中进一步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所有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在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极为混乱，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别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在不论哪天哪份报纸上，只要涉及经济或政治，你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

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又是什么。你们每天都会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遇到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你们要从阅读中，从听国家问题的讲课中，学会独立地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每个细小问题上，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在谈话中，在同论敌争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作了这几点小小的说明之后，现在我来谈本题，谈谈什么是国家，它是怎样产生的，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应当是怎样的。

我已经说过，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象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不仅宗教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以为没有宗教偏见的人，也往往把专门的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并且企图建立某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是赋予或可能赋予人们某种并非来自人本身而来自外界的东西的力量，说国家是上天赋予的力量。必须指出，这个学说同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有极密切的联系，处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深深浸透了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的一切习惯、一切观点和全部科学，因此，你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一学说的残余，甚至那些愤慨地否认自己受宗教偏见支配并且深信自己能够清醒地看待国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也不例外。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

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当你们熟悉了和充分钻研了国家问题的时候，你们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到这个斗争在各种国家观点的争论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的估计上都有反映或表现。

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7—203 页。——编者注]。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还要重复说，如果这部著作你们不能一下子读懂，那也不必懊丧。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读懂，也一定能读懂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人对人的剥削怎样产生，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一样，要正确地分析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考察。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父权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家族，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生活在家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民族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遇到比较明确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作国家。

在人们还在不大的氏族中生活的原始社会里，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蒙昧的状态，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到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我们看到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妇女在当时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不到一种特殊等级的人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大家知道，现在就是武装队伍、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编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见解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监狱、特殊队伍即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往往不仅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有时还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构成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

只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不发达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作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作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在 18 世纪（更正确些说，从 18 世纪末起）和 19 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取代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 1861 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

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后者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许多世纪，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你们根据这种基本划分来观察国家，就会看出，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国家也产生和巩固起来。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虽然有过巨大的历史变化，虽然发生过各种与人类从奴隶制经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到现在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政治变迁和革命，但你们总可以看到国家的出现。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

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 20 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费力地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产生而且不可能产生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所有奴隶的机构。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

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构来强迫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性的强制机构不可。当没有阶级的时候，也就没有这种机构。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划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共和制是不存在任何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所有这些区别在奴隶制时代就产生了。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不管是谁讲古代史课，你们都会听到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斗争的情况，但基本的事实是奴隶不算是人；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的法律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不适用于奴隶，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只把他们看作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们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杀死奴隶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奴隶占有制国家可以是君主国，贵族共和国，甚至可以是民主共和国。管理形式确实是多种多样，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禁锢在土地上，这就是农奴制这一概念的由来。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一定的天数，其余的日子则替老爷干活。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能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实际上，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宽广了，因为农奴制农民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农奴制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了。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农奴制社会有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因素，这在当时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虽然远不如前者明显），但始终只有地主－农奴主才被认为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无论在奴隶制下或农奴制下，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非采取强制手段不可。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压迫的接连不断的尝试。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多次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2]，就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完全建立于奴隶制

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许多年中一直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这种国内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整个农奴制时代也同样充满着不断的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也多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地主－农奴主的起义。

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种机构能使大多数人统统服从他们，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权力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政，——这就是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巨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手段，货币周转使得一些人能够掌握巨量财富。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全体公民似乎一律平等了；以前那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划分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是何种资本，是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也不管他是不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

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农奴制，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被摧毁时（这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以前的事；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到 1861 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起来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经摧毁，农民已有可能把土地作为名副其实的财产来占有了。至于这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靠支付代役租得来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都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用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在宣称它保护真正的私有权，并对私有权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庇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其实，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在目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建立的国家是以一部分人强制和镇压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且恰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候，在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我们观察一下俄国的或无论哪个更文明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看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象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议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制度。如果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心地纯朴（也许不是由于纯朴，也许这种纯朴，如俗语所说的，比盗窃还坏），认为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和民权制度是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吓人的责难，在全世界重复着。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

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就讲到，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凡是在 1905 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农奴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

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君子、学者和神父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使命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人，不仅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父等等），就是那些只是受资产阶级自由这种偏见影响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这种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作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象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但是愈往后，工人的眼睛就愈亮，苏维埃政权

的思想就传布得愈广泛，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以后。工人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无情的斗争。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讲课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还会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载于 1929 年 1 月 18 日《真理报》第 15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9 卷第 64—84 页

注释：

[1]《论国家》是列宁 1919 年 7 月 11 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的记录，最初由苏联列宁研究院于 1929 年 1 月 18 日发表于《真理报》。按照该校学员 Я. Я. 别尔兹 1929 年给列宁研究院的信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的说法，列宁还于 1919 年 8 月

29 日在该校作了第二次讲演，题目是《关于国家，国家的意义、产生及阶级的产生》，可是第二次讲演的记录至今没有找到。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这所大学的前身是 1918 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1919 年 1 月，训练班改组为苏维埃工作学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又改组为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1919 年 7 月 3 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决定。——59。

[2]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 年 4 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聚在这个杂志的周围。1916 年 1 月 1 日，在柏林召开了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1918 年 10 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 年 4 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 年 11 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 月 14 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 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 1918 年 12 月 30 日—1919 年 1 月 1 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69。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19 年 7 月 31 日）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能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在国民教育方面，我们在长时期内不得不同苏维埃政权各个工作部门和组织部门都经常遇到的那些困难作斗争。我们看到，那些曾被认为是唯一的群众性的组织，一开始就是由长期为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人领导的。甚至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我们就看到，1917 年 10 月间军队怎样向我们彼得格勒接二连三提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声明，扬言要进攻彼得格勒，并表示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团结一致。那时我们就确信，这些声明是军队组织的上层分子写的，是当时的集团军委员会写的，他们代表的完全是我国军队过去的情绪、信念和观点。从那时起，这类现象在一切群众组织中都发生过，既在铁路部门的无产阶级中间发生过，也在邮电部门的职员中间发生过。我们一直看到，起初旧事物总还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和对群众组织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于教师持久的顽抗也一点不感到奇怪，因为教师向来就是一支大多数成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队伍。我们看到，旧的资产阶级偏见怎样逐渐被克服，同工人和劳动农民有着密切联系的教师怎样在反对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取权利，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去真正接近劳动群众，真正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到目前为止，你们比任何人都更多地领教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偏见、他们常用的手段和论据、他们替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辩护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不是直截了当地进行的，而是在种种表面上听来悦耳但实际上是在这样或那样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

同志们，你们也许记得马克思是怎样描写工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马克思在分析有纪律的、文明的和“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奴隶地位时是怎

样探究劳动者遭受资本压迫的原因的，他是怎样说明生产过程的原理的，他是怎样描述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使得资本主义工厂能掠夺剩余价值、奠定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造成少数人致富而群众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当马克思在他那部著作中谈到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地方即着手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要引你们去的地方，乃是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场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①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要强调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宣扬所辩护的思想，因为在战胜了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看来，在以资本的统治、金钱的统治、对劳动者的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自由、平等和边沁"。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他们所说的平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边沁的统治就是小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的统治。

如果我们看一看周围，看一看旧教师联合会的代表昨天和今天用来反对我们的那些论据，看一看我们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思想敌人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至今还在引用的那些论据，看一看还不了解社会主义意义的农民群众每天同我们交谈时无意中引用的那些论据，——如果对这点细加观察并仔细想想这些论据的含义，就一定会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着重分析的那种资产阶级论调。所有这些人都想证实这个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谁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反对我们，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是自由平等的破坏者，我们就要介绍他去看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去研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原理。我们说，你们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资本的自由，是粮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数握有余粮的人牟取暴利的自由。人们经常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出版自由，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什么是出版自由呢？谁都看到过我们"自由"俄国的出版事业是什么样的。那些直接观察过或接触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因而对它很熟悉的人，在这方面看

得更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拿报刊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来作交易的自由，出版自由就是靠资本来维持报刊这一影响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工具。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破坏的出版自由，布尔什维克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第一次使出版事业摆脱资本家而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在一个大国里创办了不依赖于一小撮富人和百万富翁，全力从事反资本的斗争（我们应当使一切服从于这个斗争）的出版事业。在这个斗争中，劳动者的先进部队，他们的先锋队，只能是能够领导尚未觉悟的农民群众的工人无产阶级。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有人向我们提议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我们说，这是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动摇，倒向资产阶级。我们已经有过两次经验，一次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得到了协约国的帮助，就是说，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帮助，得到了法、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结果怎样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所许诺的那种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呢？没有，我们看到的是破产，是帝国主义者的完全统治，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切妥协主义幻想的彻底破灭。

如果这次经验还不够，那我们来看看西伯利亚。我们在那里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西伯利亚的政权曾经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初，所有从苏维埃政权下逃亡出来的资产者都去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苏

维埃政权的暴动。欧美最强大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来帮助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财政上军事上帮助他们。结果怎样呢？这种所谓的立宪会议的统治，这种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所谓的民主政府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造成了高尔察克的冒险。为什么这种统治遭到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破产呢？因为这里反映了我们敌人营垒中的所谓社会党人不愿意了解的一个基本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管它在发展的时候，在很巩固的时候，还是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反正都一样，都只能有一种政权，或者是资本家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一切中间政权都是幻想，谁想尝试建立第三种政权，即使出于真心诚意，也会不是滚向这边，就是滚向那边。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只有工人的统治，才能把靠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人团结到自己这边来，因为农民群众虽然是劳动群众，但从某个方面来说又是小经济组织的所有者，粮食的所有者。这就是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斗争，这个斗争表明：无产阶级怎样在长期的政治考验中，在俄国各个边疆地区政府的更换过程中，逐渐清除一切为剥削制度服务的东西；它怎样给自己开辟道路，并在镇压和消灭资本的反抗中日益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名副其实的领袖。

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的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人，即建议同那些动摇不定、在俄国革命史上两度倒向资产阶级的分子实行联合的人，很喜欢责备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在管理国家中实行恐怖的办法；他们说，为了拯救俄国，就要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恐怖手段。我想起了一位聪明的法国资产者，他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谈到废除死刑的问题，他说："让杀人犯老爷们先来废除死刑吧。"每当人们说"让布尔什维克放弃恐怖手段"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来。让俄国的资本家老爷们以及他们的盟友美、法、英三国，即那些迫使苏维埃俄国采取恐怖手段的人放弃恐怖手段吧！他们就是那些过去进攻我们、现在还在用比我们强大千倍的军事力量来进攻我们的帝国主义者。所有的协约国，所有英、法、美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首都都拥有国际资本的奴仆（不管他们叫

作萨宗诺夫还是马克拉柯夫都一样），这些奴仆收罗了成千上万心怀不满、愤愤不平的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的代表人物，难道这不是恐怖吗？你们听到了军界的阴谋，从报纸上看到了最近险些把彼得格勒出卖的红丘炮台阴谋事件，试问，这不是全世界资产阶级施行的恐怖手段又是什么呢？全世界资产阶级为了使剥削者在俄国复辟和扑灭现在甚至已经威胁到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正在干种种野蛮的、罪恶的、横暴的勾当。这就是恐怖的根源，这就是应对恐怖负责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信，那些在俄国鼓吹放弃恐怖手段的人，无非就是施行恐怖手段的帝国主义者手中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工具或代理人，这些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封锁、用他们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帮助来扼杀俄国。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俄国是第一个执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使命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承担了这样多的斗争和苦难。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知道，俄国已全副武装起来，在俄国不仅决定着俄国资本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国际资本的命运。这就是他们在所有的报刊上，在被亿万金钱收买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上骇人听闻地大肆散布诽谤布尔什维克的谎言的原因。

他们也是为了“自由、平等和边沁”的原则而起来反对俄国的。我们这里有人认为，谈论自由平等，谈论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平等，就是在维护某种独立的东西，维护一般民主原则。你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就请他们去看看欧洲资本主义的报刊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在什么掩盖下行动的呢，欧洲的资本和资产阶级是在什么掩盖下来扼杀俄国的呢？他们口头上讲的都是自由和平等！当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侵占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候，当他们把军队派往南俄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保卫自由和平等。这就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的口号，这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全世界资本的原因。这就是这些自由平等的口号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口号被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欺骗人民，彻底粉碎这

种口号乃是真正同工农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看到，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愈是顽强凶狠地试图扼杀俄国，就愈激起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7 月 21 日，英、法、意三国工人作了举行国际罢工反对三国政府的第一次尝试，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停止对俄国内政的一切干涉，同俄国缔结真诚的和约。这次尝试没有成功。在许多国家里，如在英、法、意等国，只是爆发了个别的罢工。在美国和加拿大，只要是能使人想起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我们在最近这些年经历了两次大革命。我们知道，1905 年俄国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起来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是何等的费力。我们知道，从 1905 年 1 月 9 日即第一次流血的教训到 1905 年 10 月俄国群众性罢工第一次获得胜利，罢工运动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当时是很困难的。两次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俄国的形势比其他国家更革命一些。我们知道，为了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在一系列的罢工中把力量组织起来是多么困难。因此，我们对 7 月 21 日第一次国际罢工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我们知道，欧洲各国革命所遇到的反抗要比我们大得多。我们知道，当英、法、意三国工人决定在 7 月 21 日举行国际罢工时，他们不知克服了多少困难。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验。遭到失败是不足为奇的。可是我们知道，尽管欧洲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对我们，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的劳动群众是同我们在一起的，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是了解的；不管在革命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不管人们为了资本的“自由和平等”、挨饿者和饱食者的平等而制造什么样的谎言骗局，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因此，这个事业将肯定无疑会战胜国际资本。

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1919 年 8 月 24 日）

同志们！红军从高尔察克手里解放了乌拉尔全境，并已开始解放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苏维埃政权，因为它正在用铁扫帚扫除用苛捐杂税、凌辱、鞭挞和恢复沙皇压迫来折磨人民的所有地主资本家坏蛋。

红军解放乌拉尔和进入西伯利亚，使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掉以轻心。敌人还远没有被消灭。敌人甚至还没有被彻底打垮。

必须竭尽全力把高尔察克、日本人和其他外国强盗赶出西伯利亚，必须更加努力地消灭敌人，决不允许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来为非作歹。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痛苦经验，以及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弄得困苦不堪的世界各国的经验，我们是不应当白白放过的。

下面就是全体工农、全体劳动者为了防止高尔察克叛乱的灾难重演，应当从这一经验中汲取的五大教训。

第一个教训。为了捍卫工农政权，使它不被地主资本家强盗颠覆，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红军。我们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证明了：我们能够建立强大的红军，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指挥红军并战胜资本家，尽管资本家从世界最富有的那些国家得到武器和装备的慷慨援助。布尔什维克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所有工人和农民，如果是有觉悟的话，就应当不是根据言论（相信言论是愚蠢的）而是根据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千百万人的经验信赖布尔什维克。既要武装工农，又必须让多半同情地主资本家的旧军官来指挥，这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只有非常善于进行组织工作，只有实行严格的自觉的纪律，只有广大群众信任工人政治委员这些领

导人员，才能解决这个任务。布尔什维克已把这个极困难的任务解决了。旧军官叛变的事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但红军不仅仍在我们手中，而且学会了如何战胜沙皇的将军和英法美等国的将军。

因此，凡是真正想摆脱高尔察克叛乱的人，都应当把一切人力物力、一切聪明才智完全贡献给建立和巩固红军的事业。真心诚意地执行一切关于红军的法律和命令，竭力维护红军的纪律，尽自己所能帮助红军，——这就是一切不愿意受高尔察克蹂躏的觉悟的工农所应尽的第一个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义务。

最令人焦虑的是清除游击习气，是某些队伍的擅自行动和不服从中央政权的指挥，因为那会招致灭亡，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

谁不全心全意地帮助红军，不用全力维持红军中的秩序和纪律，谁就是卖国贼和叛徒，就是高尔察克叛乱的支持者，谁就应该被无情地消灭。

我们有了强大的红军就会是不可战胜的。没有强大的红军，我们必然会成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牺牲品。

第二个教训。国家没有大量的粮食储备，红军就不能巩固，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自由调动军队，也不能好好训练军队。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维持为军队工作的工人的生活。

一切有觉悟的工农应当知道和记住，现在我们红军的胜利不够迅速和巩固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国家的粮食储备不足。谁不把余粮交给国家，谁就是帮助高尔察克，背叛和出卖工农，谁就是使红军中几万工人和农民遭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的罪人。

骗子、投机者和一些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都这样议论：我宁可按自由价格出卖粮食，这样得到的会比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出卖要多得多。

而问题正在于自由出卖粮食使投机活动猖獗，使少数人发财，使有钱的人才吃得饱，而工人群众仍然挨饿。这是我们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地区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资本家洋洋得意，劳动者受穷挨饿。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粮价涨到几千卢布一普特，货币贬值，少数投机者获利，人民愈来愈穷。

在自由出卖粮食的条件下，国家储备空虚，军队软弱无力，工业奄奄一息，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必然取得胜利。

只有富人，只有工农政权的死敌才蓄意主张自由出卖粮食。凡因愚昧无知而主张自由出卖粮食的人，应当从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例子中得到教训，从中懂得为什么自由出卖粮食就意味着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胜利。

还有一些愚昧无知的农民这样议论：让国家按战前价格用上等货物来换我的粮食，那我就交出余粮，不然我就不交。骗子和地主的帮凶常常利用这种论调“引诱”无知的农民上钩。

资本家为争夺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四年强盗战争之后，工人国家已受到严重破坏，后来又被高尔察克、邓尼金在全世界资本家帮助之下为了进行报复而大肆破坏，不难理解，工人国家目前是无法向农民提供商品的，因为工业停顿了。既无粮食，又无燃料，又无工业。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以将来得到工业品为条件把余粮借给挨饿的工人。

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除骗子和投机者以外，一切觉悟的有理智的农民都会同意把所有的余粮全部借给工人国家，因为这样一来，国家就能恢复工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

有人会问我们，农民是否会相信工人国家而把余粮借给它呢？我们回答说：第一，国家给予借券即纸币。第二，所有农民根据经验知道，工人国家即苏维埃政权是帮助劳动者而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才叫作工农政权。第三，农民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要么相信工人，要么相信资本家；要么信任工人国家，把粮食借给它，要么信任资本家的国家。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农民都没有别的选择。农民愈觉悟，就会愈坚定地拥护工人，愈坚决地尽力帮助工人国家，使地主资本家政权无法复辟。

第三个教训。为了彻底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必须遵守极严格的革命秩序，必须恪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和命令，并监督所有的人来执行。

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取得过胜利，这一例子使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稍微出现混乱，稍微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稍有疏忽或懈怠，都会立即使地主资本家的力量得到加强，造成他们的胜利。因为地主资本家还没有被消灭，还不承认自己遭到失败。凡是有理智的工人和农民都看见、知道和懂得，地主资本家只是被击溃和躲藏起来了，他们暂时潜伏起来了，还往往涂上了“苏维埃的”“保护”色。许多地主钻进了国营农场，许多资本家钻进各种“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变成苏维埃职员；他们时刻窥伺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和弱点，以便把它推翻，以便今天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明天帮助邓尼金。

必须用全力把这些隐蔽起来的地主资本家强盗从他们的一切藏身之处查出来，揭露并无情地惩治他们，因为他们是劳动者的死敌，是有本事有经验的奸猾的敌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施展阴谋的有利时机；他们是怠工者，他们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危害苏维埃政权。对付地主、资本家、怠工者和白卫分子这些劳动者的敌人必须毫不留情。

为了能够捕获这些人，就必须机敏、审慎、有觉悟，必须极细心地注视每一个极小的混乱现象，注视每一个不老实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的细小行为。地

主和资本家是有力量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经验，不仅因为他们有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因为存在着广大群众的习惯和愚昧这样一种势力，这些群众想“照老样子”生活，而不了解必须严格地认真地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

极小的违法行为，极小的破坏苏维埃秩序的行为，都是劳动者的敌人立刻可以利用的漏洞，都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高尔察克叛乱就是起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稍欠审慎，起于个别团队稍微违反命令，忘记这一点就是犯罪行为。

第四个教训。忘了高尔察克叛乱起于小事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样，忘了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促成高尔察克叛乱并直接支持这次叛乱也是一种犯罪行为。现在是学会不按言论而按行动来评价各个政党的时候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称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白卫分子的帮凶，是地主资本家的帮凶。实际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个别的事实，而且有俄国革命历史上的两大时期：（1）克伦斯基执政时期，（2）高尔察克叛乱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口头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实际上则起了白卫分子的帮凶的作用。现在，他们提出再允许他们“试验一下”并把这种允许叫作实行“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统一战线”，难道我们竟愚蠢到相信他们的地步吗？在高尔察克叛乱以后，除个别人以外，难道农民还不懂得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就是同高尔察克的帮凶讲统一吗？

有人会反驳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也不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了。但这不是事实。第一，右派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没有放弃这种联盟，而同这些“右派”又没有确定的界限，其所以没有，应归咎于“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也只是口头上“斥责”他们的“右派”，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上对右派却软弱无力。第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甚至最好的分子所拥护

的恰恰是高尔察克的主张，这种主张帮助了资产阶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掩盖了这些人的肮脏的血腥的资本主义事业。这种主张就是：民权制度，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立宪会议，出版自由等等。我们看到，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共和国正是用这种“民主”谎言来为资本家的统治辩护，为奴役殖民地的战争辩护。我们看到，在我国，无论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或任何一个将军都乐意许下这种“民主”诺言。能信任这些有了诺言就帮助明显的匪徒的人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无例外地都在帮助明显的匪徒，帮助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用假民主的口号粉饰他们的政权，粉饰他们对俄国的进攻，粉饰他们的统治，粉饰他们的政策。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向我们提议缔结“联盟”，条件是我们向资本家及其领袖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让步，例如“放弃恐怖手段”（当我们面对着整个协约国即富国联盟的亿万富翁在俄国策划阴谋，采用恐怖手段的时候），或者我们容许粮食自由贸易等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些“条件”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要倒向资本家方面，还要同资本家利用一切让步来反对的布尔什维克结成“统一战线”！不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现时别想在俄国找到能够相信你们的人了。在俄国，有觉悟的工人农民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的帮凶，其中一些人是自觉地恶意地这样做，另一些人是由于缺乏理智，由于坚持旧错误才这样做，但他们都是白卫分子的帮凶。

第五个教训。为了消灭高尔察克及其叛乱，不让他们卷土重来，所有的农民都必须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拥护工人国家。有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全体，甚至其中的“左派”）把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当作稻草人来吓唬农民。从高尔察克的实例中，农民学会不怕稻草人了。

要么是地主资本家专政（即铁的政权），要么是工人阶级专政。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只有公子哥儿、蹩脚的知识分子和卑劣的绅士这些连一本糟糕的书都没有学好的人，才会凭空幻想中间道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间道路。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关于民权制度、立宪会议、自由等等的漂亮词句掩盖着的），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没有从整个 19 世纪的历史中学会这一点，谁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而在俄国，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在高尔察克统治下，我们大家都看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幻想中间道路的。

这些幻想是为谁效劳呢？这些幻想帮助了谁呢？帮助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幻想中间道路的人就是高尔察克的帮凶。

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农民已根据经验把资产阶级专政和工人阶级专政作过比较。工人阶级专政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实现的，这个党早在 1905 年，甚至在这以前，就已同整个革命无产阶级融为一体了。

工人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工人国家要毫不动摇地镇压地主和资本家，镇压帮助这些剥削者的叛徒和卖国贼，并战胜他们。

工人国家是地主和资本家、投机者和骗子的无情的敌人，是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的敌人，是货币权力的敌人。

工人国家是劳动者和农民的唯一忠实的朋友和援助者。决不倒向资本方面，劳动者结成反资本的联盟，工农掌权即苏维埃掌权——这就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用这些话来恐吓农民。这是不会成功的。在高尔察克叛乱后，甚至处在穷乡僻壤的工人和农民都懂得，这些话恰恰包含着摆脱高尔察克灾祸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切动摇的人，无气节的人，走上帮助资本的错误道路的人，为资本的口号和诺言所俘虏的人，统统滚开！同资本作无情的斗争，结成劳动者的联盟即结成

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这就是高尔察克叛乱给予我们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1919 年 10 月 30 日）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曾打算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是为某些部分做了初步的准备。[注：见本卷第 253—262、428—437 页。——编者注] 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人讨论。

一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听到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忘掉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

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二

由于我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为如下双方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指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是指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 年 3 月通过的我们的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所有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凡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用革命的打击一下子都办到了。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 1917 年 10 月 26 日（1917 年 11 月 8 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同样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即工厂、股份企业、银行、铁路等等的占有者。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办“国营农场”，即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办的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协作社这一

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也刚刚开始实行。[注：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 3536 个，“农业公社”大约有 1961 个，农业劳动组合有 3696 个。我国中央统计局现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统计。1919 年 11 月间就会陆续得到统计结果。]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总之，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三

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原理，我们来引用一些具体的数字。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资料，从 1917 年 8 月 1 日到 1918 年 8 月 1 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 3000 万普特。下一个年度约为 11000 万普特。再下一个收购年度（1919—1920 年）头三个月的数字看来可以达到 4500 万普特，而在 1918 年同时期（8—10 月）只有 3700 万普特。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情况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总是不断地在改善着。尽管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动用世界列强的全部力量来组织国内战争，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情况还是在改善着。

所以，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

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时期内，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下述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统计局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苏维埃俄国 26 个省（不是全国）粮食生产情况和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准备发表。

统计结果如下：

苏维埃俄国26省	人口（单位百万）	粮食产量（不包括种子和饲料）（单位百万普特）	粮食供应量（单位百万普特） 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	由投机商贩供应的	居民的粮食拥有量（单位百万普特）	每人的粮食消费量（单位普特）
产粮省	城市……4.4	—	20.9	20.6	41.5	9.5
	乡村……28.6	625.4	—	—	481.8	16.9
消费省	城市……5.9	—	20.0	20.0	40.0	6.8
	乡村……13.8	114.0	12.1	27.8	151.4	11.0
总计（26省）	52.7	739.4	53.0	68.4	714.7	13.6

由此可见，城市的粮食大约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另一半是由粮贩供应的。根据 1918 年的精确调查，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的比例正是如此。不过工人购买国家的粮食比购买粮贩的粮食要少付九成的钱。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价格。这是精确研究工人收支情况所得出的结果。

四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准确的材料勾划出了目前俄国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农民的政策中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以下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等等）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并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 1918—1919 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 4000 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尽管这些机关还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 4000 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

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某种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而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强行拿走余粮等等事情，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大叫大嚷：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不承认前者有掠夺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五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

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他们遭到失败，他们反抗的劲头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说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

最后，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带领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

蠢。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具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重复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意味着全面地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原则立场上去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16—118 页。——编者注］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起码真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待续）［注：本文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919 年 12 月 16 日）

社会革命党人[1]出版的文集《俄国革命的一年（1917—1918 年）》（1918 年莫斯科土地和自由出版社莫斯科版）里，载有尼·瓦·斯维亚季茨基的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序言）》。总共 79 个选区，作者列举了其中 54 个选区的数字。

作者考察的范围差不多包括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各省。没有包括的省份有：奥洛涅茨、爱斯兰、卡卢加、比萨拉比亚、波多利斯克、奥伦堡、雅库特和顿河区。

我们先引证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所发表的主要结果，然后再来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政治结论。

一

54 个选区在 1917 年 11 月份投票的总数是 36262560 票。作者按 7 个地区（外加陆军和海军）开列的选票总数是 36257960 票，但是，他开列的各党派的得票数，加起来就同我所指出的正好一致。

各党派得票情况如下：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得 1650 万票，如果加上其他各民族（乌克兰、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革命党人所得的票数，则为 2090 万票，即占总票数的 58％。

孟什维克得 668064 票，如果加上与它相类似的各个集团如“人民社会党人”[2]（312000 票）、“统一派”[3]（25000 票），合作社派[4]（51000 票）、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95000 票）、乌克兰社会党人（507000 票），德意志社会党人（44000 票）和芬兰社会党人（14000 票）所得的票数，那么总共是 170 万票。

布尔什维克得 9023963 票。

立宪民主党人[5]得 1856639 票。如果加上“土地所有者和占有者联盟”（215000 票）、“右派集团”（292000 票）、旧教徒[6]（73000 票）和各种民族主义者，即犹太民族主义者（55 万票）、穆斯林民族主义者（576000 票）、巴什基尔民族主义者（195000 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67000 票）、波兰民族主义者（155000 票）、哥萨克民族主义者（79000 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13 万票）、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12000 票），以及“各种团体和组织”（418000 票）所得的票数，那么各地主和资产阶级党派所得的选票总共是 460 万票。

大家知道，从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的整个革命时期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始终是结成联盟的。此外，无论这个时期或这以后事态的整个发展都清楚地证明：这两个党共同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也和第二国际所有的党一样毫无自知之明，竟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

我们把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三大类党派合起来计算，便得出如下结果：

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	902 万＝25%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其他）………………………………	2262 万＝62%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	462 万＝13%
共　计 ……………………	3626 万＝100%

现在我们把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按地区计算的数字列举如下：

选　票　数　目（单位千）

地　区（军队单列）	投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票者	百分比		役布尔什维克票者	百分比	投立宪民主党人票者	百分比	共　计
北部地区………	1140．0	38		1177．2	40	393．0	13	2975．1
中部工业地区………	1987．9	38		2305．6	44	550．2	10	5242．5
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	4733．9	70		1115．6	16	267．0	4	6764．3
西部地区………	1242．1	43		1282．2	44	48．1	2	2961．0
东乌拉尔地区………	1547．7	43	(62%)	443．9	12	181．3	5	3583．5
西伯利亚地区………	2094．8	75		273．9	10	87．5	3	2786．7
乌克兰………	1878．1	25	(77%)	754．0	10	277．5	4	7581．3
陆军和海军………	1885．1	43		1671．3	38	51．9	1	4363．6

从这些按地区计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是农民的政党。在纯农业地区即大俄罗斯的纯农业地区（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东乌拉尔地区）和乌克兰的纯农业地区，社会革命党人得了选票的62—77％。在各工业中心，布尔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列举的那些按区域计算的数字中是被过于缩小了，因为他把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和工业不发达的以及非工业的区域合在一起了。例如，斯维亚季茨基按省列举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各民族集团和其他集团”所得的票数，说明如下情况：

布尔什维克在北部地区所占的优势似乎微不足道：40％对38％。但是，这个地区既包括非工业区，又包括工业区，在非工业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而在工业区的情形是：首都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得45％（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16％；彼得格勒省，布尔什维克得50％，社会革命党人得26％；里夫兰省，布尔什维克得72％，社会革命党人零票。

在中部工业地区各省：莫斯科省，布尔什维克得56％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25％；莫斯科首都区，布尔什维克得50％，社会革命党人得8％；特维尔省，布尔什维克得54％，社会革命党人得39％；弗拉基米尔省，布尔什维克得56％，社会革命党人得32％。

顺便指出，关于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只得到无产阶级“少数人”的拥护的说法，在这些事实面前该是多么可笑啊！而这种说法，我们无论是从孟什维克（668000票，再加上外高加索的70—80万票，对布尔什维克的900万票）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叛徒们那里，都可以听到。

二

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因为现在，在协约国[7]——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帮助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敌人两年之后，再要否认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事实，那简直太可笑了。

现在的情况是，那些遭到失败的人们，包括第二国际的所有拥护者，由于怀有疯狂的政治仇恨，甚至不能严肃地提出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胜利这个极有意味的历史的政治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从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才是“怪事”，而上面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彻底揭穿这种民主派的无知和偏见。

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被第二国际抛弃了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无疑是可以得到解答的。

布尔什维克所以获得了胜利，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最有觉悟、最坚决、最革命的部分即这个先进阶级的真正先锋队的拥护。

我们拿两个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来看。在这两个地方，选举立宪会议时总共投了 1765100 票。其中：

社会革命党人	218000 票
布尔什维克	837000 票
立宪民主党人	5154000 票

尽管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切尔诺夫分子、马尔托夫分子、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麦克唐纳分子等等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平

等”、“普选”、“民主”、“纯粹民主”或“彻底民主”这些女神面前磕得头破血流，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平等这一事实并未因此而消失。

这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事实。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

1917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得到了无产阶级极大多数人的拥护。同布尔什维克在无产阶级中竞争的党——孟什维克党，这时已被击溃（布尔什维克以 900 万票对孟什维克的 140 万票，140 万票是把 668000 票和外高加索的 70—80 万票加在一起而得的数目）。而且这个党是经过 15 年的斗争（1903—1917 年）才被击溃的，这一斗争锻炼、教育并组织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它锤炼成了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同时，1905 年的第一次革命还为进一步的发展作好了准备，在实践中决定了两党的相互关系，对 1917—1919 年的伟大事变起了总演习的作用。

自称为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喜欢用什么无产阶级“统一”有好处这类甜言蜜语来回避极其严肃的历史问题。他们搬弄这些甜言蜜语时，却忘记了机会主义在 1871—1914 年工人运动中逐渐滋长起来这一历史事实，忘记了（或者是不愿意）考虑一下机会主义在 1914 年 8 月破产的原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 1914—1917 年发生分裂的原因。

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没有在各方面极认真地作好驱逐和压倒机会主义的准备，那么连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也是荒唐的。那些现在想以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来摆脱困境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8]、法国社会党[9]等等的领袖们，必须牢牢记住俄国革命的这个教训。

其次，布尔什维克不仅有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不仅有在反对机会主义的顽强的长期斗争中经过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拥护，而且在两个首都还有——如用军事术语来说——强大的“突击部队”。

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在力量上占压倒优势，这个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特别是在残酷的、激烈的、称为革命的阶级战争中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

首都或大工商业中心（这两个概念在我们俄国是一致的，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自然，其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地方力量、农村力量支持这些中心，哪怕这种支持并不是马上得到的也好。

在两个首都，在俄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占决定性的压倒优势。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差不多比社会革命党人多三倍。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比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加在一起的还要多。此外，我们的敌人已经四分五裂，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不论在彼得格勒或在莫斯科，都只获得了 3%的选票）的“联合”在劳动群众中间已经名声扫地。当时，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真正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注：值得指出的是，上面引证的数字也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和团结一致，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却四分五裂。] 大家知道，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农民相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是非常接近于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的，但是到 1917 年 11 月，连这些领袖都想撇开立宪民主党人而同布尔什维克联合（并且就此向我们讨过价钱）！[10]

1917 年 10 月至 11 月，我们把两个首都夺取过来是有十分把握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政治上又有最充分的准备，无论是从集合、集中、训练、

考验和锻炼布尔什维克“军队”方面来说，或是从分化、削弱、拆散、瓦解“敌军”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既然有十分把握能用迅速的、决定性的打击夺取两个首都，夺取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这两个中心（无论从经济上或从政治上讲），我们就能够不顾官僚和“知识界”疯狂反抗，不顾怠工等等，而通过中央国家政权机关用事实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证明，无产阶级是他们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朋友和领导者。

三

但是，在谈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之前，还应该谈一下军队。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军队吸取了人民力量的全部精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混蛋们（不仅包括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公开主张“保卫祖国”的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而且包括“中派分子”[11]）通过他们的言行使军队更加服从德国集团和英法集团的帝国主义强盗的指挥，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从来没有忘记马克思在 1870 年说过的话：“资产阶级将教会无产阶级掌握武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69 页。——编者注］只有奥德和英法俄的社会主义叛徒们才会在帝国主义战争即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中谈什么“保卫祖国”，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则集中全部注意力（从 1914 年 8 月起）来使军队革命化，利用军队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强盗，把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进行的非正义的和掠夺性的战争变成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劳动群众反对“本国的”、“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正义的和合理的战争。

社会主义叛徒们在 1914—1917 年没有做好利用军队去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准备工作。

布尔什维克从 1914 年 8 月起，就通过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秘密组织活动做好了这种准备工作。对这一点，社会主义叛徒们，各国的谢德曼、考茨基之

流，当然只能支吾搪塞，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的鼓动瓦解了军队。但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瓦解了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力量，从敌人那里把武装的工农群众争取了过来，去同剥削者作斗争。

我们工作的成就，还反映在俄国这次连军队也参加的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投票上。

下面就是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列举的这次投票的主要结果：

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投票数目

（单位千）

陆海军部队	投社会革命党人票者	投布尔什维克票者	投立宪民主党人票者	投各民族集团及其他集团票者	共计
北方面军……………	240.0	480.0	?	60.0②	780.0
西方面军……………	180.6	653.4	16.7	125.2	976.0
西南方面军…………	402.9	300.1	13.7	290.6	1007.4
罗马尼亚方面军……	679.4	167.0	21.4	260.7	1128.6
高加索方面军………	360.0	60.0	?	—	420.0
波罗的海舰队………	—	(120.0)①	—	—	(120.0)①
黑海舰队……………	22.2	10.8	—	19.5	52.5
总　计…	1885.1	1671.3 +(120.0)① 1791.3	51.8 +?	756.0	4364.5 +(120.0)① +?

结果是：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有1885100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1671300票。如果后者加上波罗的海舰队的12万票（大概的数字），那么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1791300票。

可见，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比社会革命党人略微少一点。

可见，到1917年10月、11月，军队已有一半拥护布尔什维克。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不能获得胜利的。

但是，由于我们在全部军队里拥有差不多半数的选票，所以我们在两个首都附近乃至离两个首都不很远的各个方面军中已占压倒的优势。如果除开高加索方

面军不算，那么布尔什维克一般说来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来说，布尔什维克得选票 100 万以上，而社会革命党人得 42 万票。

可见，在军队方面，布尔什维克到 1917 年 11 月也有了政治上的“突击部队”，而这就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在决定性地点和决定性时机占压倒优势。既然布尔什维克在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中已有巨大优势，而在远离中部地区的其余方面军中又有时间和可能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方面争取过来（这一点到下面再谈），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军队方面对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何反抗。

四

我们根据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考察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不能把他们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那么这些条件就只能提供一种极短暂的和极不巩固的胜利。

主要之点就在这里。

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应读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以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不理解：

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

满脑子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忘掉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精髓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先生们，把国家政权当作一种圣物，当作一种偶像或者是正式投票产生的合力，当作“彻底民主”的绝对物（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政

权不过是一个工具，各个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并应该善于利用）它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

资产阶级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这样。只有马克思主义叛徒才“忘记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应该（在集结了足够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突击部队”之后）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它的国家政权，以便运用这个工具来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是什么呢？

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中立”农民，并尽可能把农民——至少是不从事剥削的劳动农民中的大多数——吸引过来。

用从资产阶级那里剥夺来的工厂和全部生产资料来组织大机器生产。

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

※ ※ ※

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嘲弄马克思的学说，他们“教导”人民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得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人的投票表决来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这个“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而我们却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说：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为自己争得国家政权，然后用这一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本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

※ ※ ※

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怎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影响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阶级斗

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即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的阶级斗争工具呢？

第一，无产阶级做到这一点，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是彻底摧毁它、粉碎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叫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机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构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构，新的国家政权类型就是苏维埃政权。

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小时后，便立刻宣布解散旧的国家机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机构经过几个世纪逐渐成为适合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机构，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也是如此［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214—217 页和第 22 卷第 225—229 页。——编者注］），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苏维埃只允许被剥削的劳动者参加，而不容许任何剥削者插足。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之后，立刻用这个办法，一举而把小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中拥护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因为这些群众都是被剥削劳动者，他们受过资产阶级（包括它的应声虫切尔诺夫之流、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及其他人在内）的欺骗，他们获得了苏维埃政权，也就第一次获得了维护自己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性斗争的工具。

第二，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立刻或者至少是很快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把“它们的”群众即跟它们走的群众争取过来，争取的方法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满足群众最迫切的经济需要。

资产阶级无论掌握多么“强大的”国家政权，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的第二天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有做到这一点的机构（苏维埃），又有做到这一点的经济手段（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

俄国无产阶级正是这样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争取过来的，确实可以说，是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个小时之后就争取过来的。这是因为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战胜了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几小时之后，就颁布了《土地法令》[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8—21 页。——编者注]，在这个土地法令中以革命的速度、毅力和果敢精神立刻完全满足了大多数农民的全部迫切的经济需要，用非赎买的办法完全剥夺了地主。

为了向农民证明无产者不是想用多数票压他们，向他们发号施令，而是要帮助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在《土地法令》中并没有加上自己的片言只字，而是逐字逐句照抄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所公布的农民委托书（当然是最革命的委托书）[12]。

社会革命党人曾大发雷霆、愤愤不平、怒气冲天、大喊大叫，说“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纲领偷去了”；但是，这只会使人嘲笑社会革命党人：好一个出色的政党，为了实现它的纲领中一切革命的，一切有益于劳动者的东西，竟要先把它打败，把它从政府中赶出去才行！

第二国际的叛徒、蠢才和书呆子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这个辩证法就在于：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进行的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或者认为这种争取工作只取决这一点，那就是愚不可及或是对工人的公然欺骗。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

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自然，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做到。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既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也不能在罢工、游行示威、羞辱和驱逐机会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中，得到长期的有效的锻炼、教育、训练和考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那些中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这种作用表现在无产阶级一经掌握这些中心，也就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些说，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命脉、心脏和枢纽。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的状况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状况也就不可能那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而这种关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是无产阶级影响这些群众、有效地诱导他们所必需的。

五

我们再往下谈。

无产阶级能够夺得国家政权，实现苏维埃制度，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劳动者的经济需要。

这样是否就足以保证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呢？

还不够。

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单凭投票表决就可以决定或者不需要长期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

这是幻想。这是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的书呆子和甜言蜜语的社会党人所制造的甜蜜的神话。

如果资本主义不是一方面使群众必然处于饱经折磨、备受压制、胆战心惊、分离涣散（农村!）和愚昧无知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把专事造谣欺骗、处处愚弄和蒙蔽工农等等的庞大机构交给资产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在一起还是和资产阶级在一起”这个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他们必然要通过亲身的实际经验，才能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出比较。

正是这种情况经常被崇拜“彻底民主”的人们忽略过去，他们以为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可以用投票表决来解决。其实，这些问题如果很尖锐并且为斗争所激化，就要由国内战争来解决，而在国内战争中，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的经验，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加以比较、对照而得到的经验，有巨大的意义。

在这方面，把 1917 年 11 月俄国立宪会议选举同 1917—1919 年的两年国内战争加以对照，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教益。

请你们看一看，究竟哪些地区布尔什维克获得的选票最少。首先是东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投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分别占 12％和 10％。其次是乌克兰：投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 10％。在其余地区，投布尔什维克票的百分比最小的是大俄罗斯农业区，即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但是在这个地区投给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 16％。

我们看到，正是在 1917 年 11 月间布尔什维克得票百分比最小的地区，反革命活动、暴动以及反革命力量的组织最得势。正是在这些地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支持了好多个月。

凡是无产阶级影响最小的地区，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起初，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给了他们土地，而复员的士兵又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的消息。后来，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为了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为了保存俄国这个革命策源地，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13]，“伤害了”小资产阶级最浓厚的情感即爱国主义感情。当布尔什维克表明将严格地不容违抗地要求农民按照固定价格把余粮交给国家的时候，那些余粮最多的地方的农民就特别讨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乌拉尔、西伯利亚、乌克兰的农民就倒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

再后，农民体验了高尔察克统治区和邓尼金统治区每个办报人在每号白卫分子报纸上所鼓吹的高尔察克“民主”和邓尼金“民主”，看到关于民主和“立宪会议”的言论，事实上不过是在掩盖地主和资本家的专政罢了。

于是又开始重新转向布尔什维主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后方的农民起义蓬勃发展起来。农民把红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归根结底，正是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主要代表者农民的这些动摇，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和高尔察克、邓尼金政权的命运。但是，在这个“归根结底”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严重斗争和痛苦考验的时期，这种斗争和考验在俄国经历了两年还没有结束，即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一带还没有结束，而且不能担保再过一两年就会完全结束。

拥护“彻底”民主的人们不去仔细想想这个历史事实的意义。他们过去和现在都给自己臆造出一种童话，仿佛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说服”大多数劳动者，并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把他们牢牢地争取过来。而现实证明，只有在长久的残酷的斗争中，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沉痛经验，才会使他们在比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家专政之后得出结论：前者比后者好。

在理论上，所有学过马克思主义并愿考虑 19 世纪各先进国家政治历史经验的社会党人，都承认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摇摆不定是不可避

免的。这种动摇的经济根源已被经济科学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来了，而这个经济科学的种种道理又是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在报纸、传单和小册子上重复过千百万次的。

但是，人们不善于把这些道理运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时代。他们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和幻想（关于阶级“平等”，关于“彻底的”或“纯粹的”民主，关于用投票表决来解决重大的历史性问题等等的偏见和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不愿理解，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些手段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长久的经验、根据许多实际例子来向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证明，对他们来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要比拥护资产阶级专政有利，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关于 1917 年 11 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此后两年国内战争发展进程所展示的情况的基本背景。这场战争中的基本力量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就已经了了分明，无产阶级军队的“突击部队”的作用、动摇不定的农民的作用、资产阶级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取得最大胜利的地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最大胜利的地区，即北部地区和中部工业地区。”（第 116 页）自然，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那些中心，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分子力量最弱。自然，在这些中心，阶级斗争最剧烈。资产阶级的主力正是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些地方，也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粉碎资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把它彻底粉碎之后，才能利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最终获得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情和拥护。

关于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要是我们善于利用它，善于阅读它的话——向我们一次再次地说明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道理。

另外，这些材料也说明了民族问题的作用和意义。试拿乌克兰来说吧，在近来几次讨论乌克兰问题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责难本文作者过分“强调了”乌克兰的民族问题。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表明，还在1919年11月，在乌克兰获得多数的是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党人（340万票加50万票，共390万票，投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的有190万票，而全乌克兰的总票数是760万票）。在西南方面军和罗马尼亚方面军中，乌克兰社会党人获得的选票分别占总票数的30％和34％（投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票的分别占总票数的40％和59％）。

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乌克兰的民族问题的意义——大俄罗斯人时常犯这种毛病（犹太人也犯这种毛病，也许比大俄罗斯人稍少一些）——就是犯严重而危险的错误。在乌克兰的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早在1917年就发生了分裂，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们既然是国际主义者，第一，就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第二，就应该正是在民族问题这个比较不大重要的问题上（对国际主义者说来，国界问题是次要的，甚至是极其次要的）作出让步。重要的是其他问题，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利益，重要的是正在同邓尼金作斗争的红军的统一和纪律这一利益，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至于乌克兰是否要成为一个单独的国家，那是一个极其次要的问题。如果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尝试一下各种制度，比方说他们在若干年内既实际试一下同俄罗斯联邦合并，又实际试一下与它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又试一下同它结成各种形式的亲密联盟，如此等等，即使出现这样的前景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慌。

如果企图预先一劳永逸地、“果断地”和“坚定不移地”决定这个问题，那就是见解狭隘，或者简直是愚蠢了，因为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这样的问题上摇摆是十分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是毫不足惧的。一个真

正称得上国际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代表，对待这种摇摆应该极其审慎和容忍，应该让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自己根据亲身的经验来克服这种摇摆。而对其他的、比较根本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我在上面已经提出），我们则应采取不容忍、不留情、不调和、不动摇的态度。

六

把 1917 年 11 月立宪会议的选举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从 1917 年 10 月至 1919 年 12 月的发展加以比较，就能作出一些有关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现在让我们试把其中主要的结论简略叙述一下，或者至少提一提也好。

1．普选制是测量各个阶级对自己任务的理解是否成熟的标尺。它表明各个阶级想要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本身不是用投票表决所能达到的，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直到进行国内战争才能达到的。

2．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上，赞同它的偏见，以为投票表决能够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

3．为了通过选举和各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倒向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4．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人物和拥护者以及德国的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所有领袖，实际上正在这样倒向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却在自己的宣传中向无产阶级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为了以后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首先在形式上反映大多数居民的意志（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取得多数选票）。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之类的腐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根据这一前提所发出的反对“少数人专政”等等的一切号叫，只是说明这班领袖不理解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专政在统治，不理解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摧毁这种专政的条件。

5．这种不理解特别表现在下面这点上：他们忘记了各资产阶级政党所以能统治下去，在极大程度上是靠它们对民众的欺骗，靠资本的压迫，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各小资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特点，这些政党通常总是想用多多少少隐蔽的阶级调和的形式来代替阶级斗争。

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仆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应当让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条件下，即在保存资本权力和资本压迫的条件下——公开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并且应当夺取政权。”

我们说：“首先应当让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压迫，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那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迅速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相反的情况将是历史上罕见的例外（象芬兰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这种例外的情形下，资产阶级也可能发动国内战争[14]）。

6．或者换一种说法：

资产阶级和它的应声虫即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首先我们保证在保存私有制和资本压迫（即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条件下承认平等或彻底民主这一原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争取由大多数人来作出决定。”

我们则说："首先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破坏事实上不平等的柱石和基础，然后由战胜了剥削者的无产阶级带领所有劳动群众去消灭阶级，也就是去实现并非骗局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平等。"

7.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无产阶级，或除了无产阶级中已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任务并能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那一部分人以外，还有人数众多的没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者阶层，他们跟资产阶级走，跟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其中包括跟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走），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欺骗，因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认识到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可能性。

这些被剥削劳动者阶层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提供同盟者，无产阶级先锋队和这些同盟者加在一起，就在居民中占了可靠的多数，但是，无产阶级只有用国家政权这样的工具，即只有在推翻了资产阶级并破坏了它的国家机构之后，才能争取到这些同盟者。

8．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命脉，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人数众多的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中把许多同盟者吸引过来，因为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9．最后，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总是有很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必然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摇摆不定。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胜利，首先应当正确地选择

对资产阶级举行决定性进攻的时机，并且要考虑到资产阶级与它的小资产阶级同盟者分道扬镳或这种联盟不稳固等情况。其次，无产阶级应当在自己胜利之后利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摇摆来中立他们，阻止他们站到剥削者方面去，应当善于在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坚持一个相当时期，如此等等。

10．要使无产阶级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在 1903—1917 年预先学会战胜孟什维克，即战胜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并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那么它就不能在 1917—1919 年战胜资产阶级。

现在最危险的自我欺骗（有时简直是愚弄工人），就是德国的“独立党人”领袖们和法国的龙格派[15]等等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在继续推行那种旧的惯用的政策，即向机会主义作大大小小的让步，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态度，百般迎合资产阶级民主（即他们所说的“彻底民主”或“纯粹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等等的偏见。

注释：

[1]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 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

1917 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 年 5 月已达 50 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该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该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

1917 年 12 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 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 年 6 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 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 1918 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 年 8 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

[2]人民社会党人是 1906 年从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1917 年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同年 6 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版乱，1918 年后不复存在。——2。

[3]统一派是俄国极右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和一些前取消派分子联合组成的集团，1914 年产生，1917 年 3 月正式成立。除彼得格勒外，莫斯科、巴库等地也有它的组织。统一派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有胜利的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到最后胜利”，并与资产阶级和黑帮报刊一起肆无忌惮地诽谤布尔什维克。统一派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1918 年夏在组织上瓦解。——2。

[4]合作社派指合作社工作者。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1917 年 1 月，俄国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 63000 个，社员 2400 万人。1917 年二月

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7 年 9 月，合作社派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的工作。十月革命后，合作社派的领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拒绝同苏维埃政权合作。他们的行为受到中、下层合作社人员的反对。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革命前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逐步转变为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2。

[5]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于 1905 年 10 月成立。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 1917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1 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 年 5 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

[6]旧教徒是 17 世纪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旧教派（旧礼仪派）的成员。旧教派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是大商人和工业家。1906 年以前，旧教徒受沙皇政府迫害。——2。

[7]协约国（三国协约）是 1907 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 20 多个国家加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5。

[8]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 年 4 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 年 4 月—1918 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

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 年 10 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 1920 年 12 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 1922 年。——7。

[9]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 1902 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 1910 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 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 1920 年 12 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7。

[10]指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操纵下，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后要求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并出面召开了关于政府组成问题的会议。——8。

[11]中派是第二国际各党中的一个思想政治派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中派分子挂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他们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屈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力图通过在工人运动的重大纲领和策略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来调和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派宣传抽象的和平主义，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中派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共产国际抱敌视态度，曾成立第二半国际。中派在国际上的主要代表是卡·考茨基；在俄国，中派的代表人物是

尔·马尔托夫和尼·谢·齐赫泽，列·达·托洛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持中派立场。

关于列宁对中派的批判，可参看《第二国际的破产》、《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等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6、29 卷）。——9。

[12]指刊登在 1917 年 8 月 19 日和 20 日（9 月 1 日和 2 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 88 号和第 89 号上的《根据 1917 年彼得格勒第一次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带来的 242 份委托书拟订的示范委托书》。列宁在这个文件发表时写了《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一文（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2 卷第 104—112 页）加以评论。——15。

[13]布列斯特和约是 1918 年 3 月 3 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 月 15 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 14 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上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 100 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 1904 年的关税税率。1918 年 8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 60 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1918 年德国十

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 年 11 月 1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8。

[14]指芬兰反动资产阶级对芬兰无产阶级革命的镇压。

芬兰革命是 1918 年 1 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 月 27 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 月 28 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芬兰革命政府在斗争初期还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主要着眼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这一革命从性质上说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国内战争以后，于 1918 年 5 月初被镇压了下去。——23。

[15]龙格派是以社会改良主义者让·龙格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党内的少数派，于 1915 年形成。该派持中派观点，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并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25。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1]

（1919 年 12 月 20 日）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 40 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

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

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263—266 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注释：

[1]这是列宁在 1919 年 12 月 20—21 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问题所作的报告。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这次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走向实际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同时也指出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缓解运输、燃料、粮食等危机方面有巨大作用，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代表会议还听取了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批准了有关的工作细则。随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制定并批准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载于 1919 年 12 月 27 日《真理报》），并成立了负责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专门机构。

这次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燃料、关于流行病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关于普遍军训和特种任务部队等问题。——[35]。

[2]共产国际是在 1919 年 3 月 2—6 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 21 个国家的 35 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 52 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 3 月 4 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37]。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

（1920 年 4 月 8 日）

我们这张报纸[1]是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的报纸。

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很清楚，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只有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只有在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那些进行拼死反抗、组织反革命暴动和国内战争的剥削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在实际上提出来。

在 1918 年初，这个时刻似乎就已来到了，在 2 月（1918 年）那次德帝国主义对俄国的武装进攻之后，它确实是来到了。但在当时这个时刻出现得异常短促，新的更汹涌的反革命暴动和侵略的浪潮来得异常迅猛，苏维埃政权根本没有可能比较专心致志地着手研究和平建设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熬过了前所未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饥饿、穷困和苦难的两年，同时这也是红军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匪帮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

现在我们确有很大希望（如果法国资本家唆使波兰作战不成）取得比较稳定、比较持久的和平了。

两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建设的经验。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认真提出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确切些说，不是共产主义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因为这里指的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新社会制度的低级发展阶段即初级发展阶段，而不是高级发展阶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

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即推翻资本家所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也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具体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方式。

在具体实行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

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新形式，创立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式和新方法——这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是最能收效最崇高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推翻了资产阶级，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抗，为自己争取到了使这种工作有可能进行的基地。

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韧性，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修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品质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经过 10 年、15 年以至 20 年的磨炼才得到的，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在两年

中历尽空前未有的穷困、饥饿、破坏和苦难，使这些品质受到了进一步磨炼。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

注释：

[1]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Субботник》)是根据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倡议出版的联合特刊。这张报纸是莫斯科各报（《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经济生活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部和撰稿人在 1920 年 4 月 10 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编辑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刷厂的工人排印，于 4 月 11 日（星期日）发行。列宁、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亚·米·柯伦泰、杰·别德内依、亚·绥·绥拉菲莫维奇、克·阿·季米里亚捷夫等参加了这张报纸的工作。——[342]。

土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1920 年 6 月）

现在已经成为黄色国际的第二国际为什么不仅不能确定革命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甚至不能恰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对于这一点的原因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在他的论文[1]中作了很好的分析。接着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提出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土地纲领的理论原理。

根据这些原理，能够（而且我觉得应当）拟出即将在 1920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个总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初稿如下：

1．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

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面奔走，那他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许多先进国家中的“工人贵族”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人是第二国际中那些所谓的社会党的基础，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市侩沙文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作为他们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不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

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是完成不了的。

2．城市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至少也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有以下几个阶级：

第一，农业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他们靠受雇于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来获得生活资料。把这个阶级和其他各类农村居民分开来单独进行组织（政治、军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等方面），加紧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这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二，半无产者或小块土地农民，他们一方面依靠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或工业企业中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依靠在仅能给他们家庭生产一部分食物的小块私有的或租来的土地上耕作，来获得生活资料。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农村劳动居民的人数是非常多的，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第二国际的黄色"社会党人"掩盖这类农民的存在及其特殊地位，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欺骗工人，另一方面是由于盲目接受了陈腐的世俗观念，竟把这类农民同一般"农民"群众混为一谈。资产阶级愚弄工人的这种手法，在德国和法国表现得最明显，其次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共产党的工作得当，这类农民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拥护者，因为这些半无产者的境遇非常艰难，他们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能够立刻得到很大的好处。

第三，小农，他们拥有自己的或租来的一块不大的土地，可以应付他们全家以及经营上的需要，并不另外雇用劳动力。这一阶层从无产阶级的胜利中肯定会得到好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能立刻而充分地给他们以下几种利益：（a）免除向大土地占有者交纳地租或一半收成（例如法国的 métayers，即分成制农民，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b）免除抵押债务；（c）免除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

式的压迫以及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林地及其使用等等）；（d）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允许他们使用无产阶级剥夺来的大资本主义农户的农具和部分建筑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替富裕农民和中农服务的组织，如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协作社，变成首先帮助贫苦农民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等的组织）。还能给他们其他许多利益。

同时共产党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必然会动摇而去追求无限制的贸易自由和无限制的使用私有权的自由，因为这一阶层是出卖消费品的（虽然数量不大），所以受到投机倒把和私有者习惯的侵蚀。但是只要实行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十分坚决地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农，这一阶层的动摇不会很大，并且也不会改变这个阶层整个说来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这一事实。

3．上述三类农村居民的总和，构成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人口的多数。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是有充分保障的。有一种相反的意见还颇为流行，但是，第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和统计不断进行欺骗，极力掩盖农村上述各阶级同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之间，以及半无产者和小农同大农之间的巨大区别；第二，是因为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和各个先进国家中被帝国主义特权腐化了的“工人贵族”，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在贫苦农民中进行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机会主义者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关心怎样去同资产阶级，包括大农和中农（关于他们的情形见下文）作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妥协，而不关心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第三，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的），是因为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了的真理：上述三类空前愚昧、十分分散、备受

压抑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4．“中农”从经济上来说是小农，他们也拥有一小块自己的或租来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不仅够维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些剩余至少在好年头可能变为资本；第二，往往（例如两三家农户中就有一家）另外雇用劳动力。拥有 5 至 10 公顷土地的德国农户，可以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农的具体例子，据 1907 年的普查，这类农户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雇有农业工人的。[注：确切数字如下：拥有 5 至 10 公顷土地的农户有 652798 户（农户总数为 5736082 户）；他们所雇用的各种雇佣工人为 487704 人，本户工人（Familie-nangeh?rige）为 2003633 人。在奥地利，据 1902 年的统计，这类农户有 383331 户，其中有 126136 户是使用雇佣劳动的；雇佣工人 146044 人，本户工人为 1265969 人。奥地利的农户总数为 2856349 户。] 在法国，特种农作物比较发达，象葡萄种植业就需要在土地上花费大量的劳动，大概这类农户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要更广泛些。

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个阶层必不可免地要动摇于这两种势力之间，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阶层中，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是占优势的；投机倒把活动、贸易“自由”和私有制对他们眼前有好处；他们与雇佣工人是直接对

抗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废除地租和抵押债务，会直接改善这个阶层的生活状况。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应该立即完全废除私有制，并且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小农和中农不仅保留他们原有的土地，而且使他们的土地扩大到他们平素租种的全部面积（废除地租）。

把这些办法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结合起来，就可以充分保证中立政策获得成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只能十分谨慎地逐步前进，运用榜样的力量，而不能对中农施用任何暴力，才能实现向集体农业的过渡。

5．大农（“Groβbauern”）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雇有几个雇佣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归入“农民”之类，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中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集中主要注意力去同这个阶层进行斗争，把多数农村居民即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等等。

无产阶级在城市中获得胜利以后，这个阶层必然会进行各种反抗，或暗中破坏，或公开采取反革命性质的武装行动。所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立刻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必要的力量，以便彻底解除这个阶层的武装，在推翻工业资本家的同时，只要这个阶层的反抗一露头，就给予最坚决最无情的歼灭性的打击，为此需要武装农村无产阶级，组织农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里，决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而应当保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占据优势。

即使是对待大农，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决不能把剥夺列为直接的任务，因为还没有具备物质条件，特别是没有具备技术条件，更没有具备社会条件来实现这类农场的社会化。在个别的、显然是例外的情况下，将没收他们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分或附近小农特别需要的部分；同时还要保证小农根据一定的条件可以无偿地使用大农的一部分农业机器，等等。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当保留

大农的土地，只在他们反抗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时才加以没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大农的斗争由于若干特殊情况而复杂起来，并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但是这个革命的经验终究表明，这个阶层稍一试图反抗就得到很好的教训之后，能够规规矩矩地执行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的任务，甚至开始（尽管非常缓慢）对捍卫一切劳动者而无情对待富人寄生虫的政权表示尊重。

在俄国，使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大农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持久的特殊情况，主要是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的革命以后，俄国革命经历了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一般民主的”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阶段；其次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文化低，数量少；再次是幅员辽阔，交通极不方便。各先进国家既然没有这些造成阻碍的情况，欧美的革命无产阶级就应当更积极地准备并且更迅速、更坚决、更有成效地取得镇压大农反抗的完全胜利，彻底消除他们进行反抗的一切可能性。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取得这种完全的最彻底的胜利以前，农村中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群众不会相信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十分稳固的。

6．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即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土地，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直接地或通过租地农场主不断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一部分中农），他们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他们大半是封建主（如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的贵族，法国复辟了的领主，英国的勋爵，美国的前奴隶主）的后裔，或者是特别富有的金融巨头，或者是这两类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混血儿。

在各国共产党队伍中，决不容许宣传剥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要给予补偿，也决不容许给他们补偿，因为在现代欧美各国的条件下，这样做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就是向遭受战争苦难最深重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征收新贡赋，而这场战争产生了更多的百万富翁，使他们大发横财。

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怎样经营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的问题，由于俄国的经济落后，主要是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使用，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土地留作办所谓“国营农场”，由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经营，并把以前的雇佣工人变成执行国家委托的工作人员和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成员。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大农业企业，并且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一条，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夺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有时也分给中农，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一，通常用来反对这一点的理由是说大农业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这种说法往往是以最恶毒的机会主义和背叛革命的行为来偷换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无产阶级为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因为生产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就象奴隶占有制的敌人——北美资产阶级没有因为 1863—1865 年内战所引起的棉花生产的暂时下降而裹足不前一样。对资产者说来，重要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对被剥削劳动群众说来，最重要的是推翻剥削者，保证劳动者有条件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无产阶级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

第二，不仅提高农业大生产，就是维持农业大生产，也先要有眼界开阔、富有革命觉悟、在职业上政治上组织上受过很好锻炼的农村无产者。凡是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或者还没有可能把这一事业适当地交给有觉悟而又内行的产业工人来做的地方，如果企图把大农场急忙转交国家经营，那么只能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威信，在那些地方建立“国营农场”必须特别谨慎，必须极其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

第三，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保留着大土地占有者对附近小农所施行的中世纪的、半徭役式的剥削制残余，例如德国的租房农民，法国的分成制农民，美国的分成制佃农（在美国南部，不仅黑人多半受这样的剥削，而且白人有时也受这种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把小农所承租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原租地者使用，因为没有别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基础，并且也不能立刻建立起这种基础。

大农场的农具必须加以没收并转归国家所有，这些农具，在保证大国营农场的使用需要以后，应当让附近的小农在遵守无产阶级国家所规定的条件下无偿地使用。

如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最初一个时期，不仅绝对必须立即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田庄，而且绝对必须把他们这些反革命头子和残酷压迫全体农村居民的人一律驱逐出去或加以关押，那么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在城市和乡村的巩固，必须不断努力使这个阶级中具有宝贵经验、知识和组织能力的人，都能被用来（在最可靠的工人共产党员的特别监督下）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

7．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完全能够实施领导，根据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算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这个为全体社会党人口头上一致公认的无可争辩的理论真理，实际上却被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中以及在德国和英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等等领袖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所曲解。这种曲解就在于他们把注意力移向比较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而忽视了过渡到和达到这一美好未来的困难而具体的当前任

务。这在实践中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鼓吹“社会和平”，即完全背叛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现时正在战争到处造成的空前破产和贫困的条件下，正在战争使一小撮百万富翁大发横财并变得肆无忌惮的条件下进行着斗争。

要使农村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获得成功，就要求：第一，各国共产党教育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忍受牺牲和具有承担牺牲的决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和引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意味着这个先锋队也善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承担最大的牺牲和表现出英勇精神；第二，要取得成功，还要使农村中受剥削最重的劳动群众能从工人的胜利中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刻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法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

8．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劳动群众异常闭塞而分散、往往处于半中世纪式的依附状态，所以组织和教育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罢工斗争，加紧援助和全面开展农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群众性罢工。为德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现时的经验所证实所丰富了的俄国 1905 年和 1917 年革命的经验表明，只有日益开展的群众性罢工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而且应当争取农村中的小农参加罢工斗争）才能打破农村的沉睡状态，唤醒农村被剥削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才能使他们明显而实际地看出他们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意义。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痛斥那些背叛和变节的社会党人，遗憾的是这种社会党人不仅在黄色国际即第二国际里存在，而且在退出了这个国际的欧洲极其重要的三个大党里也存在，他们不仅对农村罢工斗争采取冷淡的态度，而且借口有降低消费品生产的危险来反对这种罢工斗争（例如卡·考茨基）。假如不是在实践中用行动证明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能够把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及夺取这一革命的胜利看

得高于世上的一切，能够为这一革命作出最大的牺牲（因为要免除饥饿、破产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没有别的出路的），那么任何纲领和最庄严的声明都是一钱不值的。

特别需要指出，旧社会主义的领袖和“工人贵族”的代表为了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群众中保持自己的声誉，现在常常在口头上向共产主义让步，甚至在名义上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这些人必须在工作中，在革命意识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进行得最猛烈、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大农，富农）反抗得最激烈、社会党人妥协分子和共产党人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受到考验，以便证明他们是不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和能不能担任领导职务。

9．各国共产党应当竭力尽快地在农村中建立代表苏维埃，首先建立雇佣工人和半无产者的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只有同群众性罢工斗争和最受压迫的阶级联系在一起，才能执行自己的使命，才能大大巩固起来，使小农接受它的影响（然后把他们吸收到它的组织里）。但是，如果因为土地占有者和大农的沉重压迫，以及没有产业工人及其工会的援助，罢工斗争还没有展开，农业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还很薄弱，那么建立农村的苏维埃就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其方法就是建立共产党支部（即使是比较小的也好），加紧进行鼓动工作，用最通俗的方式说明共产主义的要求，用突出的剥削和压迫的实例来阐明这些要求，经常派产业工人去农村工作等等。

注释：

[1]指尤·马尔赫列夫斯基的论文《土地问题和世界革命》。该文发表于 1920 年 7 月 20 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 12 期。在这本杂志出版以前列宁已读过这篇文章。——167。

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

（1920 年 7 月 4 日）

1．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充分懂得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并且满腔热情地站到共产国际方面来了。一个更重大的进步，就是在各地，不仅城市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群众，而且先进的农业工人，都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条件地赞同这些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发展得异常迅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错误或弱点。一种是很严重的并且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大的直接危险的错误，那就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老领袖和旧政党，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群众的愿望和压力让步，另一方面为了继续在工人运动内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手而有意欺骗群众、声称他们愿意有条件地甚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全部实践中，依旧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水平上。这种情形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会直接腐蚀群众，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像匆忙改名为共产党人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叛变，有再度重演的危险。另一种小得多的错误，更正确地说是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病症，就是“左”的倾向，就是不能正确地估计党在对待阶级和群众方面的作用和任务，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必要性。

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为此必须做到：第一，更具体地，特别是根据已有的实际经验来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二，指出在一切国家内为了实现这两个口号，可以而且应该立即有步骤地进行哪些准备工作；第三，指出纠正我们运动中的缺点的途径和方法。

一、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

2．要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一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完成下面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推翻剥削者，首先是推翻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彻底粉碎他们；镇压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恢复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任何尝试都不能得逞。第二个任务是：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在反对剥削者的英勇忘我、坚决无情的斗争的进程中，启发他们，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纪律性；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几乎在一切先进国家里人数还相当多的（虽然只占人口的少数）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小业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地位相当的知识分子、职员等阶层保持中立，或者使他们不起有害的作用。

第一个和第二个任务都是独立的任务，它们要求对待剥削者和对待被剥削者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法。第三个任务则是由前两个任务产生的，它要求根据每一次表现动摇的具体情况，把前两种方法都能巧妙地、及时地、灵活地结合起来。

3．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这种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具体形势下，凡是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都不仅是市侩的极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实情况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最文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

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关押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便同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尝试作斗争，只有这种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服从我们。

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旧政党和老领袖总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在资产阶级压迫下（这种压迫具有层出不穷多种多样的形式，某个资本主义国家愈文明，这些压迫形式就愈巧妙，同时也就愈残酷，愈厉害），多数被剥削劳动者自己能够培养出十分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品格，这种看法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粉饰，同样是对工人的欺骗。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革命阶级的全体或多数人的支持下，推翻剥削者，镇压剥削者，使被剥削者摆脱奴隶地位，立刻靠剥夺资本家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有在这以后，只有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才能启发和教育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在无产阶级周围，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领导，使他们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私、散漫、劣根性和软弱性，使他们结成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4.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为数不多的被资本主义腐

蚀的工人贵族、老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有时的反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最后，只有真正摆脱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压迫，只有取得了真正自由地（不受剥削者的束缚）组成自己的苏维埃的可能性，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才能在历史上第一次发挥受资本主义压制的千百万人的全部主动性和活力。只有在苏维埃成为唯一的国家机构时，全体被剥削者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而在最文明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他们事实上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仍然一直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工作之外。只有在苏维埃里，广大被剥削者才开始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真正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学习建立新的社会纪律，建立自由工作者的自由联盟。

二、应该如何立刻在各处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

5.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特点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还没有为建立本阶级的专政作好准备，甚至往往还没有有步骤地着手这种工作。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在最近的将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革命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整个经济政治情况包含着非常多的可能突然起火的易燃物和导火线；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以外，革命的另一条件就是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都处于普遍危机状态，现在这个条件也已经具备了。但是从上面所说的情况中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并不在于加速革命的到来，而在于加强无产阶级的准备。另一方面，上面已经指出的许多社会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因此，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看，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

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做好准备。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集团和政党通常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作，还远没有充分地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要使这种工作成为共产主义的工作并且能与无产阶级专政前夕的各项任务相适应，那就必须经过根本的改造和革新。

6．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会使这种斗争变得特别广泛、尖锐和残酷。凡是完全或部分持有改良主义、“中派”等等观点的集团、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由于斗争极端尖锐化，都不可避免地或者站到资产阶级一边，或者置身动摇者之列，或者成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靠的朋友（这是最危险的）。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和“中派”倾向的斗争，而且要改变这种斗争的性质。这种斗争不能只限于弄清这种倾向的错误，而且应当不断地和无情地揭露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出这种倾向的—切活动家，否则无产阶级就无从知道，它将要同谁一道去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可能（而且经验已经表明确实是在）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在揭发那些改良主义者或“中派分子”时，任何不彻底或软弱的表现都会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因为有些分歧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明天就会被资产阶级用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7．特别是不能只限于像通常那样从原则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合作，否认任何“同敌人合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还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永远不能一下子完全消灭私有制）的时候，单纯地维护“自由”和“平等”，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直接破坏工人阶级的政权。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通过整个政权机构来巩固和维护剥削者的“不自由”，使他们不能继续干压迫和剥削的勾当，就是巩固和维护私有者（即把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一定的生产资料据为已有的人）同无产者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胜利以

前，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的看来似乎是理论上的分歧，在明天，在胜利后，必然会成为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根本改变对“中派分子”和“民主制的维护者”的斗争的全部性质，甚至使群众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初步的准备都是不可能的。

8．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带领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就不仅要说明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任何改良主义、任何维护民主制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仅要揭露实际上等于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资产阶级的那些倾向的各种表现，而且要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中（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工会、合作社、教育等等组织中）用共产党人去代替老领袖。在一个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的统治愈长久、愈彻底、愈巩固，资产阶级就愈能把他们培养的、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观点和偏见的、往往是他们直接或间接收买的人物安置在这种领袖的地位上。必须比过去大胆百倍地把这些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从他们所占据的一切岗位上赶走，宁愿用最没有经验的工人去代替他们，只要这些工人同被剥削群众息息相关，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就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任命这些没有经验的工人去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一些职务，不然工人政府这种政权就会没有力量，而这个政府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9．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折磨、压制、恐吓、分裂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应该立即在各处用下列办法开始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

在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其次是非无产阶级被剥削劳动群众的一切组织、协会、团体（政治的、工会的、军事的、合作社的、教育的、体育的等等）中，无一例

外都应该成立共产党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小组或支部大多数是公开的，但是也有秘密的（在凡是考虑到资产阶级可能取缔这些小组或支部、逮捕或驱逐它们的成员的情况下，都必须成立秘密的小组或支部）。这些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并同党中央也有密切联系的支部，应该互相交流经验，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各类劳动群众的情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

同时，在实践中创造出必要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小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毒害很深以致往往不可救药的“领袖”或“负责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揭露，把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赶出去；另一方面，对于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多半愿意倾听和接受关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学说的群众，则必须学会采取特别耐心和谨慎的态度，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和特性。

10．作为共产党员的小组或支部之一的议会党团，也就是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首先是全国的、其次是地方的、地方自治的等等代表机构）中当议员的党员的小组，是特别值得党加以注意和关心的。一方面，在最广大的落后的或满脑子都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劳动群众的心目中，议会讲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员正应该从这个讲坛上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在俄国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资产阶级议会是合理的（任何国家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也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已经把议会讲坛，特别是先进国家的议会讲坛变成进行闻所未闻的营私舞弊、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欺骗人民、升官发财、弄虚作假、压迫劳动者的主要场所或主要的场所之一。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对议会深恶痛绝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各国共产党和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特别是那些不是通过与旧党分裂，不是通过与旧党进行长期顽强斗争，而是通过由旧党采取（往往只是在名义上采取）新的立场而成立

的政党，就尤其需要严格对待自己的议会党团：使议会党团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指示；议会党团的成员必须主要是革命工人；在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极其认真地分析这些议员的发言是否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议员派到群众中去进行鼓动工作，把那些表现出第二国际倾向的人从议会党团中开除出去，等等。

11.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植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优厚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市侩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而在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如果不立即有步骤地、广泛地、公开地同这个阶层作斗争，那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做任何初步准备工作，如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的，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这个阶层无疑还会给资产阶级的白卫军提供不少的人力。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是指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最少受教育、最受压迫、最难组织的劳动者。

无产阶级只有不局限在狭隘的行会范围内，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是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阶级。假如无产阶级没有决心，又不能够为战胜资产阶级作出极其巨大的牺牲，那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的经验在这方面既有原则意义又有实际意义。在世界资产阶级举行进攻、发动战争、实行封锁的最艰苦的时期，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作出最大的牺牲，不是比其他各阶层的劳动群众挨饿得更厉害，那么，它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赢得全体劳动群众一致的尊敬和信任。

具体地说，共产党和整个先进的无产阶级尤其必须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广泛的和自发的群众罢工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压迫下，只有这种运动才能真正唤醒、推动、启发和组织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充分信任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没有这样的准备，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队伍里，绝对不能容许有像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这类公开反对罢工的人。当然对于那些经常出卖工人的工联领袖和议会领袖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利用罢工的经验教工人实行改良主义，而不是教他们进行革命（例如，近几年在英国和法国就是这样）。

12．目前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最“合法”、最“和平”即阶级斗争最不尖锐的国家里，共产党绝对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合法组织和不合法组织结合起来的时期已经完全到来了。这是因为在最文明、最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制最“稳固”的国家里，政府都已经不顾它们种种骗人的虚伪声明，经常开列共产党人的黑名单，不断违反它们自己的宪法，半秘密地和秘密地支持白卫分子，杀害各国共产党人，暗中准备逮捕共产党员，派遣奸细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此等等。只有最反动的市侩（不管他们用什么“民主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或者否定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必须立即建立不合法组织，以便经常进行不合法工作，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资产阶级的一切迫害。特别需要在陆军、海军和警察中进行不合法工作，因为在这次帝国主义大厮杀以后，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工农可以参加的全民军队不放心了，开始秘密地采取各种办法，专门从资产阶级中挑选人员，来建立专门用特别精良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

另一方面，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只是从事不合法工作，而应该同时也从事合法工作，为此就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具有各种名称（必要时名称可以经常改变）的合法刊物和合法组织。芬兰、匈牙利的不合法的共产党正在这样做，德国、

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部分地在这样做。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也应当这样做，只要检察官想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借口提出起诉，现在一切合法的共产党就都应当这样做。

在原则上绝对必须把不合法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当前这个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前夕有着种种特点，也是因为必须向资产阶级证明，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党人不能夺取的工作部门和场所，尤其是因为到处都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和更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合法性，而说服他们放弃这种信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13．尤其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报刊的状况特别明显地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下的自由和平等完全是假的，说明必须经常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无论在战败国德国或在战胜国美国，为了取缔工人报刊，资产阶级国家机构都使尽了全部力量，金融大王施展了一切伎俩：司法追究，逮捕编辑（或雇用凶手来杀害他们），禁止邮寄，没收纸张，如此等等。此外，日报所需要的新闻资料都掌握在资产阶级通讯社手里，广告又由资本家“自由”支配，而大型报纸没有广告是弥补不了亏空的。总之，资产阶级正在用欺骗，用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来取缔革命无产阶级的报刊。

针对这种情况，各国共产党应当创办一种在工人中间大量发行的新型的定期刊物：第一，发行合法的出版物，不要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不要说它是属于党的，要学会像 1905 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那样来利用甚至最小的合法机会；第二，散发不合法的小报，虽然这种小报篇幅极小，出版不定期，但它可以由工人在许多印刷所翻印（秘密地翻印或在运动壮大时用革命手段夺取印刷所来翻印），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报道革命的消息和提出革命的口号。

不进行有群众参加的争取共产主义报刊出版自由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做好准备。

三、纠正加入或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的路线以及部分地改变其成分

14．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都已经退出这个黄色国际，决定（前三个党是有条件的，后一个党甚至是无条件的）加入第三国际，这个事实极其客观地确切地说明了，在那些从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来看都是最重要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对于实现本阶级专政的准备程度如何。这一事实证明，不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革命无产阶级的多数在整个事态发展的启迪下，都开始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现在主要的事情是完成这种转变，切实地从组织上巩固既有的成就，以便毫不动摇地全线前进。

15．上面提到的这些政党（如瑞士社会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的消息属实，还应加上瑞士社会党）的全部活动证明，并且它们的每一种定期出版物也明显地证实，它们的活动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往往直接违背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否认资产阶级民主。

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议：大会认为还不能立即吸收这些政党；批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党人的回信；重申准备和任何一个退出第二国际并愿意靠拢第三国际的政党进行谈判；允许这些政党派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为这些政党（以及类似的政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规定如下条件：

（1）在党的一切定期出版物上公布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2）党的各个支部或地方组织必须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这些决议；

（3）讨论以后，必须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

（4）清除党内仍然按照第二国际的精神从事活动的分子。

（5）把党的一切定期机关刊物移交给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编辑部。

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该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审查上述及其他类似的政党，如查明它们确实已执行上述条件，确实已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活动，那就可以正式接受它们加入第三国际。

16. 关于在上述和其他类似的政党的负责岗位上至今仍居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作出决定，说明鉴于这些政党中的工人愈来愈衷心拥护共产生义，共产主义者退出这些政党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些政党内部目前还能够本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进行工作，还能够对留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进行批评。

同时，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赞成英国共产主义的或者同情共产主义的小组和组织加入“工党”（Labour Party），尽管“工党”是参加第二国际的。这是因为这个政党还能让加入进去的组织像现在这样自由地进行批评，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自由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个政党还具有工人阶级一切工会组织的联合会的性质。只要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必须采取一切步骤，作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能够影响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从群众容易看到的更高的讲台上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使政权更快地从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手里转到“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手里，使群众尽快地抛弃这方面的最后的幻想。

17. 至于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设，即刊载在 1920 年 5 月 8 日《新秩序》（L'Ordile Nuovo）杂志上的向意大利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第三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建议和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以纠正党的路线，清除党内特别是议会党团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

18．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门决议中遭到详尽驳斥的关于党和阶级以及群众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共产党不必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极反动的工会的观点是错误的；竭力维护这些观点的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多少持有这些观点的有“瑞士共产党”，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在维也纳出版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Kommunismus》）、现在已经被解散的阿姆斯特丹书记处和某些荷兰同志，以及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组织，如“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等等，此外还有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mittee）等。

但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这些组织中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可以而且最好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在这方面，特别是拿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来说，涉及一个深刻的无产阶级和群众的运动，而这个运动事实上主要是以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这些组织对于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所以采取错误的观点，主要不是因为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了自己的、实质上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因为完全革命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无产者在政治上缺乏经验。

因此，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和小组，即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没有立即加入第三国际的情况下，也要对这些组织采取如下的政策；极其友好地对待它们，接近它们，接近同情它们的群众，根据历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根据 20 世纪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善意地向它们说明它们的上述观点的错误；不要放弃反复争取同这些组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尝试。

19．因此，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同志，特别是罗马语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志们注意：战后在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分化。对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

的义愤，过去往往使无产阶级分子转向无政府主义，现在很明显，他们对这些原则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他们愈熟悉俄国、芬兰、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德国的经验，这种认识就传播得愈广泛。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全体同志都有责任全力支持一切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第三国际方面来。代表大会指出，衡量各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作成就的标志之一应该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从无政府主义方面争取了过来。

青年团的任务[1]

（1920 年 10 月 2 日）

（大会向列宁热烈欢呼）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的组织。

这个问题应当讲一讲，尤其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任务，至多是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的和最本质的问题——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而这里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在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将来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就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青年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只有把青年的训练、组织和培养这一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做到：青年一代努力的结果将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教给青年什么；真正想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称号的青年应当怎样学习；以及应当如何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够彻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

我应当指出，看来首先的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青年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但是“学习共产主义”这个回答未免太笼统了。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呢？为了学到共产主义知识，我们应该从一般知识的总和中吸取哪些东西呢？这里我们可能遇到许多危险，如果把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得不正确，或者对这一任务理解得太片面，往往就会出现危险。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里所讲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领会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讲话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讲话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样的书本知识仍然会保持旧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特征。

如果我们只求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全力来消除这种危险，那么 50 万至 100 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将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

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学习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一切结合起来？从旧学校和旧的科学中，我们应当吸取一些什么？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在否定旧学校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种学校中只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

这里我要谈谈经常听到的人们对旧学校的斥责与非难，从这些话中，往往会得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有人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这说得对，但是，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 19 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他们已经运用这个学说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

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里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2]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那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对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该掌握知识，而且应该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不是用一堆无用的垃圾来充塞自己的头脑，而是用对一切事实的了解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没有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有学识的人。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巨大的工夫，不弄清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实，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悲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但是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扎实的知识，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我们应当废除这样的学校，摧毁这样的学校，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所积累起来而为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去区别哪些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哪些是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散居在辽阔国土上的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的自觉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战胜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就会连基础也不能巩固，更谈不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了。同样，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要摧毁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

当了解，废除以前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和强迫纪律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并要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我们在谈论学好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时就应该这样来提出基本任务。

为了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谈谈怎样学习的问题，让我举一个实际例子。你们都知道，紧接着军事任务即保卫共和国的任务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经济任务。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必须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只有全国电气化，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你们面临的任务是振兴全国的经济，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你们自己必须学会这一点，而且还要教会全体劳动青年。这就是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就是每一个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青年，每一个明确地认识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就负起了帮助党建设共产主义、帮助整个青年一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责任的青年的任务。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提高团结自己力量的本领。新一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比较复杂了。你们不只是应当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支持工农政权抗击资本家的侵犯。这一点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你们完全了解，每个共产主义者

都非常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一半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旧东西应该摧毁，而且已经摧毁了，它应该变成废墟，而且已经变成了废墟。地基已经清理好，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块地基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你们在教育、培养和发动整个青年一代的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你们应该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建设者。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你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自然要讲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教授共产主义，我们的方法应该有什么特点。

我在这里首先要谈谈共产主义道德问题。

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实际活动：使团员青年在学习、组织、团结和斗争的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和那些以他们为带头人的人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但是，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给我们加上一个罪名，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骗工农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否定道德，否定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

或者他们不是从道德的要求，不是从上帝的意旨，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否定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出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旧社会建筑在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体工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摧毁这个社会，应该打倒这些压迫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而上帝是不会创造这种团结的。

只有工厂，只有受过训练的、从过去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种团结。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群众运动才开展起来，才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极弱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个国家三年来抗击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的进攻。同时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引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受住了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那是一种欺骗。在我们看来，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这种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

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赶走沙皇并不困难，这总共用了几天的工夫。赶走地主也不很困难，这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赶走资本家同样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余粮，即他本人及其家畜都不需要的粮食，而别人却没有粮食吃，那么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至于别人，就让他们挨饿去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规章，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厂中工作。这容易做到吗？你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象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容易。这里需要无产阶级去重新教育和改造一部分农民，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以便消灭那些富裕的和专靠别人贫困来发财致富的农民的反抗。可见，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是要来完成这项任务。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它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交给了个人。而在我国，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出超过我的需要一倍的粮食，然后用余粮来投机倒把，那又怎样呢？如果我这样盘算：饿肚子的人愈多，我出卖

粮食的价钱就愈高，那又怎样呢？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私有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如果听之任之，那一切都会开倒车，回复到资本家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象过去一些革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因此，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恢复，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某些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基本任务的主要特征。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共产主义者就不能有这种心理和情绪。当工人和农民已经证明我们能用本身的力量捍卫自己并且创造新社会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

这就是对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

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的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这也就是对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只要工农还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只要学校还操纵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青年一代就仍然是愚昧无知的。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培养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称号。你们很清楚：目前俄国还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国，世界其他各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旧制度，我们还比它们弱；我们随时都有遭到新的进攻的危险；只有学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而我们得到巩固之后，就会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

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把全体青年都组织和团结起来，要在这个斗争中作出有教养和守纪律的榜样。那时你们才能着手建设并彻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厦。

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 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如果每个人都单独经营一块土地，那劳动能是共同的吗？共同劳动不是一下子就能实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同劳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创造，要在斗争进程中才能实行。这里不能靠旧的书本，书本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里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邓尼金从南方进攻时，农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当时农民不欢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但是农民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尝到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的滋味之后，就认清了农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者投奔资本家，那么资本家就要你去给地主当奴隶；或者跟着工人走，虽然工人没有许愿让你过天堂般的生活，而且还要你在艰苦的斗争中遵守铁的纪律并具有坚强的意志，可是他们却能使你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奴役。甚至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只要根据亲身的经验懂得和认识了这一点，也就成了自觉的、经过艰苦磨炼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应当把这种经验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础。

我已经回答了我们应当学什么，应该从旧学校和旧科学中吸取什么的问题。现在我还想来回答一下应当怎样学习这些东西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培养、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我要从某些青年组织的工作经验中举出几个例子，向你们具体说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共产主义教育。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

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项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一代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体现在参加青年团的男女青年自己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很快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能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么这个团结着 40 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务还在于：除了掌握各种知识，还要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只有在这样的工作中，青年男女才能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这种工作中取得实际的成绩时，他们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就拿城郊菜园工作来做例子吧。难道这不是该做的事吗？这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之一。人民在挨饿，工人在挨饿。为了不再挨饿，应该发展菜园，但是耕作还在按旧的方式进行。因此必须让觉悟较高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菜园数目会增加，面积会扩大，效果会更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每个青年团组织，每个青年团支部，都必须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青年团应当成为这样的一个团体，使每个工人都感觉到，这个团体中人们所讲的学说也许是他不了解的，也许是他还不能一下子就相信的，但是从这些人的实际工作和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真正是能给他指明正确道路的人。

如果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各方面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说明它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老路。我们的教育应当同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以便帮助劳动者完成共产主义学说提出的任务。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入团的青年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代之以自觉的纪律，看到每个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要在农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帮助做些事情，我举一个小例子，象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的工作。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这些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那时每个人只为自己工作，谁也不注意这里有没有老人或病人；或者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因而妇女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谁应当来反对这种现象呢？青年团。青年团应当出来说：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组织青年队经常到各家各户去，协助搞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正确地调配力量，有组织地为全社会的利益工作，让大家看到，劳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劳动。

现在 50 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 15 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在旧社会中，是各家各户单独劳动，除了压迫老百姓的地主和资本家外，谁也没有组织过劳动。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怎样脏，怎样吃力，我们都应当把它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需要

地主和资本家，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注：1920 年 10 月 7 日的《真理报》第 223 号上刊印的不是“从小”，而是“从 12 岁起”。——编者注］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完成现在所提出的任务。我们应该估计到，要全国实现电气化，使我国贫瘠化了的土地能采用最新的技术来经营，至少要花 10 年工夫。因此，现在是 15 岁、再过 10—20 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在每个乡村和城市里，青年每天都能实际完成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能否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竞赛开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组织自己的劳动本领怎样。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建设的成绩来检查自己的每一步骤，只有经常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团结一致的自觉的劳动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把自己的 50 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并且赢得普遍的尊敬。（掌声如雷）

注释：

[1]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10 月 5、6、7 日《真理报》第 221、222、223 号，当年用《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书名印成小册子出版。讲话的这一最早的单行本经列宁审阅过，是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丛书第 1 种。这个版本印了 20 万册，仍不能满足需求，因而出现了一些打字本和手抄本。此后，各出版社曾用《学什么和怎样学》、《共青团员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伊里奇的遗训》、《伊里奇对青年的遗训》、《青年的任务》、《青年怎样学习共产主义》、《论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等书名多次重印这个讲话。1930 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了《青年团的任务》出版十周年纪念版，这个版本的注释经娜·康·克鲁普斯卡

娅审阅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中，这个讲话是按 1920 年出版的单行本刊印的，删去了小册子编者所加的小标题。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10 月 2—10 日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约有 600 名代表。大会议程如下：共和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青年共产国际；俄国共青团中央的工作报告；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民兵和青年体育；团纲；团章；选举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列宁于 10 月 2 日晚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回答共青团和俄共（布）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时，列宁指出，共青团如果真正愿意成为共产主义的青年团，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遵循党的总的指示。列宁强调共青团的活动应成为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的楷模。列宁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反对一切剥削者的斗争中形成的。“这是长期的事业，它要求组织、学习、培养。”

根据列宁的指示，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对劳动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这一教育中要把理论教育与积极参加劳动群众的生活、工作、斗争和建设紧密结合起来。”——293。

[2]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人物。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 1381 个，会员 40 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

级文化》（见本卷第331—33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299。

关于“出版自由”——给Г.И.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1921年8月5日）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今天才看完您的两篇文章。您在彼尔姆（似乎是彼尔姆？）组织中说了些什么，在哪一点上同它发生冲突，我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无从谈起。这件事将由组织局来处理，我听说组织局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

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即把您的信当作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

多么有趣的文献啊！

在我看来，《伤脑筋的问题》一文特别明显地表明了您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尽力说服您。

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但正因为您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所以我奇怪您怎么在作结论时竟忘记了您自己正确运用过的辩证法。

“……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妙得很！但是，对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考虑过四年来我国革命的经验的工人都一定会说：我们倒要弄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

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是事实。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

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

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

您怎么会从阶级估量出发，即从估量一切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堕落到采取温情主义庸人的观点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在“国内和平还是国内战争”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问题上，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根本的、世界性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您的两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两个问题的），您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温情主义的观点。您在那两个问题上能够切实地、冷静地估计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

但突然间您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据我对您那两篇文章的分析，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了迷途。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

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象 1920 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 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他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是一下子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有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去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十月革命四周年

（1921 年 10 月 14 日）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的四周年快到了。

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

这种意义和这种经验可以极其简要地（当然是极不充分极不精确地）说明如下。

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

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种清除工作比 125 年多以前的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

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对社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对一个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落后国家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可是，我不准备多谈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懂得这一内容指什么。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

到 1917 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1]——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 125 年和 250 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 1649 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 1917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 年 1 月 5 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2]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

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鄙俗之徒在这些问题上空谈了八个月。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我们一向在认真地同宗教进行斗争。我们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在我们俄国，妇女无权或少权这种卑鄙、丑恶、可耻的现象，这种农奴制和中世纪制度的可恶的残余已经没有了，而这种现象却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被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愚蠢的吓怕了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

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在 150 年和 250 年以前，这一革命（如果就同一类型的每一民族形式来说，可以说是这些革命）的先进领袖们曾向人民许愿，说要使人类排除中世纪的特权，排除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排除国家对这种或那种宗教（即“宗教思想”、“宗教信仰”）的种种优待，排除民族权利的不平等。许了愿，但没有兑现。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的，障碍在于要“尊重”……“神圣的私有制”。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对倍加可恶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的私有制”的可恶的“尊重”。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但是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 1914 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关系到在我们眼看着资产阶级正准备的、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会有 2000 万人死亡（而在 1914—1918 年的大战和附加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小”战中是 1000 万人死亡），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如果有资本主义存

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有6000万人残废(而在1914—1918年是3000万人残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奴仆和应声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嘲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是唯一的真理，虽然听起来令人不愉快、粗暴、赤裸裸、无情，的确如此，但同无数极其精巧的沙文主义与和平主义谎言相比，终究是一个真理。这些谎言被戳穿了。布列斯特和约被揭露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糟糕的凡尔赛和约的作用和后果，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情地被揭露出来。千百万人都在思考着昨天战争的起因和行将到来的明天战争的问题，他们愈来愈清楚地、明确地、必然地认识到一个严峻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还用老的正字法，我就会在这里写上两个含义不同的“мир”[注：“мир”一词是现代俄语，有“和平”与“世界”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在旧的俄语中是两个词，即“миръ”和“мiръ”，前者意为“和平”、“和约”，后者意为“世界”。——编者注])，就不能摆脱这个地狱。

让资产阶级和和平主义者、将军和市侩、资本家和庸人、一切基督教徒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所有骑士们疯狂地咒骂这个革命吧。不管他们怎样不停地泄愤、造谣和诽谤，都不能抹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千百年来奴隶们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

这个口号千百年来第一次由一种模糊渺茫的期望变成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实际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消灭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全世界工人联盟对各国资产阶级

联盟的第一次胜利，而资产阶级无论是和是战，无非都是牺牲资本奴隶的利益，牺牲雇佣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以便学会改正这些错误。但事实总是事实：用奴隶反对一切奴隶主的革命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诺言，千百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并且还在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得到实现。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保卫祖国”即保卫日本反对美国侵略、或保卫美国反对日本侵略、或保卫法国反对英国侵略如此等等的各国资本家先生们，请继续玩弄你们伪善的把戏吧！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骑士先生们以及全世界所有和平主义的市侩庸人，请继续用新的“巴塞尔宣言”（仿照 1912 年巴塞尔宣言的式样）来“敷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手段的问题吧！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个世界。

我们最后的一项事业，也是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开始这样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

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作“硬骨头”和“碰硬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三四年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

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同个人利益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我们首先需要和绝对需要的是增加生产。批发商业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实现生产中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就要从这门新“学科”的预备班毕业了。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注释：

[1]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 3000 头，30 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170。

[2]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

（1920 年 10 月 20 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毫无例外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要透彻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历史。在国际范围内，革命专政学说的历史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同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吻合的。其次，——这一点自然是最重要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者的一切革命的历史，是我们对专政问题的认识的最主要材料和来源。谁不懂得任何一个革命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实行专政，谁就对革命史一无所知，或者说根本不想获得这方面的知识。

就俄国的范围来说，如果要谈理论的话，1902—1903 年由《曙光》和《火星报》的编辑部拟订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或者确切些说是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拟订并经该编辑部加工、修改和定稿的纲领，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得很明确，而且是针对伯恩施坦、针对机会主义提出来的。然而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经验，即俄国 1905 年的经验。

这一年的 10 月、11 月和 12 月这最后三个月，是非常强大的、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时期，是革命斗争的两种最有力的方式——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时期。（附带指出，早在 1905 年 5 月，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已经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并且责成各级党组织“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88 页。——编者注]）

革命斗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具有这样的力量，使武装起义同无产阶级特有的武器——群众性罢工结合起来，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明显，这个经验对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曾十分仔细、十分认真地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研究这个经验。这里可以举出对 1905 年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对当时这两种罢工结合的形式、对罢工斗争达到的空前的发展水平等逐月的情况所作的分析。我在 1910 年或 1911 年的《启蒙》杂志上就作过这样的分析，在当时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书刊上又概括地重述了这个分析。[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9 卷《论俄国罢工统计》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编者注]

群众性罢工和武装起义自然而然地把革命政权问题和专政问题提上了日程，因为采用这两种斗争方式必然导致（首先在地方范围内）驱逐旧政权、无产阶级和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驱逐地主，有时还会夺取工厂，如此等等。这一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后来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等等。这一事实表明，现在全世界觉悟工人所注意的一些基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1905 年末就已经在实践中提出来了。象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一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在各种会议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这个经验，可是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大多数正式代表，包括改良主义者和后来的“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以及美国的希尔奎特的信徒之类的人，却完全不能了解这个经验的意义，完全不能尽到革命家的责任，即研究和宣传这个经验教训。

在俄国，1905 年 12 月武装起义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马上着手总结这个经验。特别是 1906 年 4 月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大大推进了这项工作。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

和孟什维克都派了代表，两派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两派都非常积极地为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准备。在 1906 年初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两派都公布了他们就一切重大问题所拟的决议草案。这些草案曾经附在我那本题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的小册子里（1906 年莫斯科版，约 110 页，其中两个派别的决议草案和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这是了解当时问题的提法的最主要材料。

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已经关系到专政问题了。早在 1905 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提出了专政问题（见我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年 7 月日内瓦版，曾转载于《十二年来》文集）[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编者注]。孟什维克对“专政”这个口号的态度是否定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着重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是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就是明确地这样说的（《报告》第 92 页）。孟什维克虽然承认苏维埃的意义，主张“协助建立”苏维埃等等，但是他们不承认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根本不谈这种类型或相似类型的“新的革命政权”，干脆否认专政的口号。不难看出，现在我们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所有分歧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上已经露出了苗头。也不难看出，孟什维克（不论俄国的或别国的，如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等等）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问题的提法上表现出他们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否认革命这个概念中最本质和最基本的东西的改良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

早在 1905 年革命以前，在前面提到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中，我就已经分析过孟什维克对我的责难，即所谓我“悄悄地调换了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十二年来》第 459 页［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编者注]）。我详细地论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一责难正好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暴露出他们真正的政治面貌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无产阶级内部自由派资产阶级影响

的传播者。当时（1905 年夏）我以主张君主立宪的俄国自由派为例说过，当革命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时，反对革命的人也会“承认革命”的。现在，到了 1920 年，还可以补充一句，不论德国或意大利的自由派资产者，或者说至少是他们中间最有学识和最圆滑的人，都准备“承认革命”了。但是，当年俄国的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以及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派、屠拉梯分子、考茨基分子，都是“承认”革命而又不肯承认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这恰恰就暴露了他们的改良主义，表明他们完全不配做革命家。

在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自由派也“承认”革命，统治阶级不仅看到而且感觉到被压迫群众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的时候，无论对理论家或实际的政治领导者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给革命下一个确切的阶级定义。而不用“专政”这个概念，就不可能下这个确切的阶级定义。不为实现专政作准备，就不可能在实际上成为革命家。不懂得这个真理的，在 1905 年有孟什维克，在 1920 年有意大利、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那些害怕共产国际的严格“条件”的社会党人，他们害怕这个真理，他们口头上能够承认专政而实际上却不能为实现专政作准备。因此把我在 1905 年 7 月对马克思的观点所作的详细说明再重述一遍，是不无益处的，我作的这个说明当时是针对俄国孟什维克的，但是对 1920 年西欧的孟什维克也同样适用（我去掉了报纸等等的名称，干脆指明讲的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

“梅林出版了 1848 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2]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 3 卷第 53 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

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国的孟什维克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 103 号第 3 版第 2 栏）。为了向孟什维克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 年 9 月 14 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 年 3 月 18 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75 页。——编者注］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个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扼要的几点。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规避专政口号的孟什维克无论如何不能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所清楚地指出的，而是孟什维克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 1848 年 6 月 6 日《新莱茵报》的论文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含义。

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

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45 页。——编者注］

专政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如此……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 1 月 9 日[4]起在全国各地还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立宪幻想和象小学生作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者注]

1905 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论述专政问题的。

有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我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1906 年彼得堡版，小册子上注明是 1906 年 3 月 28 日出版）中又详细地探讨了专政问题，现在我把这本小册子中的一切重要的论点摘引出来。不过我得声明一下，我去掉了一些人名，干脆指明这里讲的是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孟什维克。一般说来，这本小册子是针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部分也是针对无党派的自由派、半立宪民主党人和半孟什维克的。其实，这些关于专政的言论正是针对孟什维克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滚到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上去了。

“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 月 17 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

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3节《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编者注］

其次，我把针对鲁·布兰克先生的关于专政问题的说明摘引出来，将是非常适时的。1906年，这个鲁·布兰克在一家实质上是孟什维克的、但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5]上，表达了孟什维克的观点，称赞他们，说他们“致力于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

换句话说，鲁·布兰克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把孟什维克说成是“有理性的”，与此相反，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没有理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犯上作乱等等的革命家，并且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说成是孟什维主义的党。这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等国际流派的惯技，这班人称赞一切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是“有理性的”社会党人，而以此来反证布尔什维克“丧失理智”。

我在1906年写的那本小册子中，这样回答了鲁·布兰克先生：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布兰克先生说，思想和理性的时代又来临了，又可以恢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活动了。相反，布兰克先生说第一个时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消失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一向鼓吹的策略被遗忘了，甚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基石本身也整个被挖掉了。

布兰克先生的这个基本论断，完全是一个涉及到事实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同革命旋风时期的‘实践’脱节了。

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它在一切革命中都是先进的阶级。试问革命旋风把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这块‘基石’整个挖掉了吗？恰恰相反，这革命旋风十分出色地证实了它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在开始时几乎是唯一的战士。纯属无产阶级斗争工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这甚至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前未有的。当司徒卢威之流和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的时候，当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号召大学生埋头读书的时候，无产阶级起来进行了直接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为俄国争得了全部‘宪制’（如果可以叫作“宪制”的话），后来这个‘宪制’一直遭到破坏、弄得残缺不全和面目全非了。1905 年 10 月，无产阶级采用了半年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谈到的那种斗争策略手段，这个决议特别注意群众性政治罢工同起义相结合的重要性，而整个‘革命旋风’时期，即 1905 年最后三个月的特点，也就是实行了这种结合。可见，我们的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最无耻地、最可恶地歪曲了现实。他没有提出一个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旋风’的实践经验脱节的事实；他企图抹杀这个旋风的基本特点，即出色地证实了‘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原则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全部基石’是正确的。

然而，布兰克先生所以产生这种错得离奇的见解，好象‘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已经消失，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小市民的真正政治本质向我们暴露出来。

从政治活动的各种方式来看，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各种方法来看，‘革命旋风’时期和现在‘立宪民主党’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首先而且主要在于，‘旋风’时期采用了其他政治生活时期没有采用的某些创造历史的特殊方法。

其中最根本的就是：（1）人民‘夺取’政治自由——不要任何法律，也不受任何限制来实现这种自由（集会自由，至少是大学里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开代表大会的自由等等）；（2）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人、士兵、铁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新的城乡政权等等。这些机关纯粹是由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不顾一切法律、准则，完全用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最后，它们确实是政权机关，虽然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带有自发性，还没有定型，成分和职能还不明确。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例如它们夺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阻碍革命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警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在彼得堡找到，当时那里的新政权机关很弱而旧政权则很强）。它们象政权一样行动，号召全体人民不要交钱给旧政府。它们没收了旧政府的钱（如南方铁路罢工委员会），转给新的人民政府使用，当然，这无疑是新的人民政府的萌芽，或者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的萌芽。按这些组织的社会政治性质来说，这是萌芽状态的人民革命分子的专政。你们觉得奇怪吗，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资产者认为和专政同义的‘强化的警卫’吧？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对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一窍不通。我们马上就要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先要指出‘革命旋风’时代的第三种行动‘方法’：人民用暴力对付压迫人民的暴力者。

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政权机关是萌芽状态的专政，因为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不承认任何人制定的任何法律和任何准则。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但是这个新政权所依靠的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根本不是这些。新政权的新机关既没有武器，又没有金钱，也没有旧机构。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

捷尔先生，你们能想到吗？这些新机关的力量同旧的强力工具丝毫没有共同之点，如果指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强化的警卫’，使他们不受旧政权的警察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压迫，那么同‘强化的警卫’也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这个新政权同过去一切旧政权的旧机关的基本区别。后者是少数人压迫人民、压迫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前者则是人民即工人和农民压迫少数人，压迫一小撮警察暴力者，压迫一小撮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吏的政权机关。这就是压迫人民的专政同革命人民的专政的区别，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请好好记住这一点！旧政权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警察的手腕，只有靠排斥和排挤人民群众，不让他们参加政权，不让他们监督政权，才能维持下去。旧政权一贯不信任群众，害怕光明，靠欺骗来维持。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根本不拘什么条条和形式。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力者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会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它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回避群众，群众很容易接近它；它直接来自群众，是直接代表人民群众及其意志的机关。这就是新政权，或者确切些说，是新政权的萌芽，因为旧政权的胜利过早地摧折了这棵新生的幼苗。

布兰克先生或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也许会问，这里为什么要‘专政’，为什么要‘暴力’？难道广大群众对付一小撮人还必须使用暴力吗？难道几千万、几万万人能够做压迫几千、几万人的专政者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往往是那些第一次见到别人在他们感到新奇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术语的人。他们看惯了的只有警察的政权，只有警察的专政。他们觉

得很奇怪，居然可以有根本没有警察的政权，居然可以有非警察的专政。你们说千百万人不需要用暴力来对付几千人吗？你们错了，错就错在你们不从现象的发展中去观察现象。你们忘记了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现在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以便你们能领悟这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使立宪民主党人‘头昏目眩的’奥妙道理。假设阿夫拉莫夫要毒刑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假定站在斯皮里多诺娃一边的有几十、几百个手无寸铁的人，站在阿夫拉莫夫那一边的有几个哥萨克。如果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地点不是在刑讯室里，众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用暴力来对付阿夫拉莫夫和他的喽罗。他们也许会遭到阿夫拉莫夫枪杀而牺牲几个搏斗者，但是他们终究会用强力解除阿夫拉莫夫和哥萨克的武装，并且很可能当场杀死他们几个人（如果可以把他们叫作人的话），而把剩下的人关进监牢，使他们不能再猖狂，并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

布兰克先生和基泽韦捷尔先生，你们看，当阿夫拉莫夫率领哥萨克拷打斯皮里多诺娃的时候，这就是压迫人民的军警专政。当革命的人民（他们不是只会劝导、训诫、叹惜、责难、哭诉、埋怨，而是会同暴力者作斗争，他们没有小市民的狭隘性，而是有革命的精神）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时候，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这就是专政，这是人民对阿夫拉莫夫实行压迫的政权，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小市民也许会反对用强力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里夺过来，他们会说，这是不合“法”的！我们有一条允许打死阿夫拉莫夫的“法律”吗？小市民的某些思想家不是创造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吗？）。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专政’这个概念无非就是这个意思，立宪民主党人先生

们，好好地记住吧。其次，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专政；因为人民即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该地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和惩处，行使权力，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最后，这就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说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饱受惊吓；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俗、陈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会逃避激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可别卷进这场搏斗挨了揍！）。这就是为什么说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和行动的细节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不仅来参加国家管理，而且来参加政权，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本身的建设。

可见，我们举出的这个简单的例子，包含着‘革命人民专政’这个科学概念以及‘军警专政’这个概念的一切要素。关于这个连博学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也能领会的简单例子就谈到这里，下面来谈谈社会生活中更复杂的现象。

就革命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革命正是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对阿夫拉莫夫之流的业绩的仇恨，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迸发出来了，而且不是通过个别人物的行动而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迸发出来了。人民正在觉醒，奋起挣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压迫。人民把俄国生活中无数的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之流的魔掌中拯救出来，使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夺取用来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这个过程自然不会象我们为基泽韦捷尔教授先生所举的简化了的例子那样简单，那样‘迅速’，人民同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斗争（就斗争这个词的狭隘的原意说），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是一种长达若干月若干年的‘革命旋风’。人民摆脱阿夫拉莫夫之流的过程，也正是

所谓俄国大革命的实际内容。从创造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个过程是以我们刚才谈到革命旋风时所描述的那些形式进行的。这些形式就是：人民夺取政治自由，即夺取阿夫拉莫夫之流阻挠实现的那种自由；人民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压迫阿夫拉莫夫之流的政权，压迫旧警察系统的暴力者的政权；人民用暴力对付阿夫拉莫夫之流，以便消灭一切阿夫拉莫夫、杜尔诺沃、杜巴索夫、米恩等等之流这样的恶狗，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再为非作歹。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

为什么布兰克先生说在‘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用不着证明呢？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布伦坦诺主义[6]，认为人民夺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权、使用暴力这些‘原则’都不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见解在布兰克先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而且具有这种见解的不止布兰克一个

人，还有所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营垒中所有那些现时因普列汉诺夫爱慕立宪民主党人而对他大加颂扬的作家，包括《无题》杂志[7]的伯恩施坦主义者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之流。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见解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一定会产生。

这种见解直接来自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得广一点，来自这些党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已被西欧'正统派'系统地全面地揭穿过的错误观点，现在又改头换面，另打旗号，'悄悄地'转运到俄国来了。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只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转运到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对这种歪曲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说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甚至认为这已用不着证明了。

为什么必然产生这种见解呢？因为这种见解完全符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家，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斗争方法时，是把'旋风'时期革命人民所采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赞许并且帮助人民采用的那些方法除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无产阶级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参加倒是可以参加，但不能让无产阶级和农民变成领导者，不能把旧的专制农奴制的警察的政权机关完全撤销。资产阶级想保存这些机关，它只求把这些机关置于它的直接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要用这些机关来对付无产阶级，而完全消灭这些机关只能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非常有利。因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既有君主制，又有上院，要求不允许革命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去同专制制度斗争吧，但是不要触动旧的政权机关，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机关。

进行'议会'斗争吧，就是说，不要越出根据我们同君主政府取得的协议给你们划定的框框。通过组织进行斗争吧，不过不要通过罢工委员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之类的组织，而要通过我们同君主政府商定颁布的法律所承认的、所限定的、不危及资本的组织。

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一谈起'旋风'时期，就轻蔑地嗤之以鼻，咬牙切齿，而一谈起杜巴索夫所保卫的立宪制度的时期，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表现出小市民对……反动时期的无限迷恋。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始终不变的品性：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主动性。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怕'旋风'的再起比怕火还要厉害，为什么它要无视和抹杀新的革命危机的因素，为什么它要在人民中支持和散布立宪的幻想。

现在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布兰克先生和他那一流的人要说在'旋风'时期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思想都被遗忘了。布兰克先生同一切小市民一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撇开它的革命的一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手段而撇开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布兰克先生对'旋风'时期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表明，资产阶级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害怕尖锐的决定性的斗争，资产阶级憎恶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时采用任何摧毁旧制度的、严厉的、革命的（按该词的原意说）方法。布兰克先生露出了马脚，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资产阶级局限性。他听到和读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旋风时期犯了'错误'，就急忙自负地、武断地、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则'（他对这些原则本来就一窍不通！）都被遗忘了。谈到这些'错误'，我们要指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难道有过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时期吗？难道有过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或右或左的偏向的时期吗？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时期（全世界一切带着局限

性的资产者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的历史不也充斥着这一类错误吗？如果布兰克先生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不是一窍不通，他就会很容易地想起米尔柏格、杜林、航运补助金问题[8]、‘青年派’[9]、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对布兰克先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实际进程，他需要的只是贬低无产阶级的斗争气魄，借此褒扬自己的立宪民主党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浅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偏离它的通常的、‘正规的’道路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在‘革命旋风’时期所表现的团结和思想上的一致，也比过去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旋风’时代的策略，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两翼疏远，而是使它们接近了。在武装起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代替了以往的分歧。两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革命政权的萌芽——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独特的机关中工作，都在吸引士兵、农民参加苏维埃，都同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一起印发了革命宣言。实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代替了以往的革命前的争执。革命浪潮的高涨，使分歧退到一旁，战斗的策略得到承认，杜马问题消除了，起义问题提上了日程，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当前紧迫的工作中接近了。在《北方呼声报》[10]上，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号召举行罢工和起义，号召工人不争得政权就不停止斗争。革命形势本身提示了实际行动口号。引起争论的只是对事变估计的一些细节：例如，《开端报》[11]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革命的自治机关，《新生活报》[12]则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联合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权机关的萌芽。《开端报》倾向无产阶级专政。《新生活报》则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然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或类似的分歧，在欧洲任何一个社会党发展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不也都存在过吗？

不，布兰克先生所以颠倒是非，荒谬地歪曲昨天的历史，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是自负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典型，在他看来，革命旋风时期就是丧失理智（“一

切原则都被遗忘了”、“思想本身以及普通理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镇压革命和小市民式‘进步’（受杜巴索夫之流保护的“进步”）的时期，则是有理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活动时代。布兰克先生的全篇论文很明显地贯串着这种对于两个时期（“旋风”时期和立宪民主党时期）的对比评价。当人类历史以火车头的速度向前飞驰的时候，这就是‘旋风’，‘洪水’，一切‘原则和思想’的‘消失’。当历史以牛车的速度前进的时候，这才是理性，才是计划性。当人民群众怀着十分纯朴的心情、略嫌鲁莽地下决心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去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哀叹‘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事情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历史上吗？群众的理性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生动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吗？）。当群众的直接运动因遭到枪杀、拷打、鞭笞、失业、饥饿而被压制下去的时候，当杜巴索夫出钱养活的教育界的臭虫从壁缝中爬出来，开始用群众的名义替人民行事，也就是把群众的利益出卖给少数特权者的时候，——在小市民骑士们看来，是平安宁静的进步时代来到了，‘思想和理性又复苏了’。资产者随时随地都忠于自己，无论拿《北极星》[13]或《我们的生活报》来看，无论拿司徒卢威或布兰克的作品来读，到处都是一样，到处都可以遇到对革命的时期和改良主义的时期的这样一种带有局限性的、迂腐教授的、僵死官僚的评价：前者是丧失理智（tolle Jahre）的时期，思想和理性消失的时期，后者则是‘自觉的、有系统的’活动的时期。

可别误解我的话，别以为我讲的是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偏爱这个或那个时期。问题完全不在于偏爱，历史时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爱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布兰克之流先生们在分析两个时期的特点（它完全不以我们的偏爱或同情为转移）的时候，无耻地歪曲了真相。问题在于：正是革命的时期比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进步的时期，规模更广，更丰富，更自觉，更有计划，

更有系统，更勇敢和更鲜明地创造着历史。可是布兰克之流先生们正好颠倒了黑白！他们硬把贫乏说成是历史创造活动丰富。他们把被压迫被束缚的群众的无所作为看作官吏和资产者‘有系统的’活动的胜利。他们看到各种官场小吏和自由主义的卖文为生的下流作家（penny-a-liner）糟蹋法律草案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平民’开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开始不迟疑地、不留情地直接破坏压迫人民的机关，夺取政权，夺回过去被认为是属于各种人民掠夺者的东西的时候，一句话，他们看到千百万受压榨的人们的思想和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他们觉醒起来不是去读死书，而是去行动，去从事人类的活的事业，从事历史的创造），就大嚷大叫，说什么思想和理性消失了。”［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2 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 5 节《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和《题外话。对立宪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的谈话》。——编者注］

1905—1906 年俄国关于专政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样。

德国的迪特曼、考茨基、克里斯平、希法亭之流先生们，法国的龙格先生及其党羽，意大利的屠拉梯及其同伙，英国的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先生们在专政问题上的论调，实质上同 1905 年俄国的鲁·布兰克先生以及立宪民主党人的论调一模一样。他们不懂专政，不会为实现专政作准备，不能了解和实现专政。

注释：

[1]《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的手稿于 1920 年 10 月 20 日寄给彼得格勒《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随同手稿寄去的还有列宁的《十二年来》文集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这本小册子。文章寄出的第二天，列宁就写信通知该编辑部，并要求他们将寄去的文章立即核对、发排，然后将材料全部退回。列宁亲自校对了文章的长条样，并作了许多修改。——367。

[2]《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 年 6 月 1 日—1849 年 5 月 19 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 年 9—10 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 年 5 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371。

[3]法兰克福议会是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后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1848 年 5 月 18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正式开幕。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由各邦自行办理，代表中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由于自由派的怯懦和动摇以及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不坚定和不彻底，法兰克福议会不敢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也没有能建立人民武装来粉碎反革命，以克服德国的分崩离析状态。法兰克福议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制定全德宪法为其唯一重要任务。在制宪过程中，代表们竞相发表演说，无休止地空谈和争辩。直至 1849 年 3 月 27 日，议会才通过了帝国宪法，而这时反动势力已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得胜。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尽管很保守，但毕竟主张德国统一，有些自由主义气味，因此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等邦纷纷宣布予以拒绝，并从议会召回自己的代表。留在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左派不敢领导已经兴起的人民群众保卫宪法的斗争，于 1849 年 5 月 30 日把法兰克福议会迁至持中立立场的符腾堡的斯图加特。6 月 18 日，法兰克福议会被符腾堡军队解散。——372。

[4]指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 1905 年 1 月 9 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 1000 多人被打死，2000 多人受

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 月 9 日成了 1905—1907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点。——373。

[5]指《我们的生活报》。

《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是接近立宪民主党左翼的自由派报纸（日报），1904 年 11 月 6 日（19 日）—1906 年 7 月 11 日（24 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375。

[6]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383。

[7]《无题》周刊(《Без Заглавия》)是俄国政治性刊物，1906 年 1 月 24 日（2 月 6 日）—5 月 14 日（27 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 16 期。该杂志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参加编辑部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主编）、叶·德·库斯柯娃（出版者）、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383。

[8]指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1884 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 年 3 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

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 页）。——385。

[9]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产生于 1890 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的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81 页）。1891 年 10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385。

[10]《北方呼声报》（《Северный Голо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法的联合机关报，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政府封闭以后于 1905 年 12 月 6 日（19 日）—8 日（21 日）在彼得堡出版，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的编辑部编辑。该报出版第 3 号后被查封。此后还曾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于 1905 年 12 月 18 日（31 日）出了一号。——386。

[11]《开端报》（《Начало》）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5 年 11 月 13 日（26 日）—12 月 2 日（15 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 16 号。该报由达·马·赫尔岑施坦和Ｃ．Н．萨尔蒂科夫担任编辑兼出版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

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列·格·捷依奇、尼·伊·约尔丹斯基等。——386。

[12]《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实际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 年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12 月 3 日(16 日)在彼得堡出版。正式编辑兼出版者是诗人尼·明斯基，出版者是女演员、布尔什维克玛·费·安德列耶娃。从 1905 年 11 月第 9 号起，该报由列宁直接领导。参加编辑部的有：列宁、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彼·鲁勉采夫。马·高尔基参加了《新生活报》的工作，并且在物质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生活报》发表过列宁的 14 篇文章。该报遭到沙皇政府当局多次迫害，在 28 号中有 15 号被没收。1905 年 12 月 2 日该报被政府当局封闭。最后一号即第 28 号是秘密出版的。——386。

[13]《北极星》杂志(《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周刊)，1905 年 12 月 15 日(28 日)—1906 年 3 月 19 日(4 月 1 日)在彼得堡出版，总共出了 14 期。主编为彼·伯·司徒卢威。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尼·亚·别尔嘉耶夫、亚·索·伊兹哥耶夫等。1906 年 4 月改称《自由和文化》杂志。——387。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1]

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1920 年 12 月 30 日）

同志们，首先，我应当请你们原谅我违反了常例，因为要参加讨论，当然应当先听取报告、副报告和讨论，可是很遗憾，我的身体不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昨天我已经把刊印出来的基本文件读了一遍，并且准备了自己的意见。我刚才说的那种违反常例的情况自然会给你们造成一些不便：我不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所以就可能重复他们说过的话，而对应当答复的问题，却没有答复。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基本材料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我把这本小册子同他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个提纲加以比较，并且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发现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既然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党内大辩论，就应该拿出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来，怎么能够写出这样一篇不象样子的东西呢？现在我把在我看来带有根本性理论错误的几个主要问题简单地谈一谈。

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却经常忘掉这一点，不从这一点出发，不重视这一点。你看，他提出来的题目——《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就是一个过于广泛的题目。

根据前面所说，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

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谈工会的作用而不考虑到这些真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一系列的错误。

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政党的作用的提纲。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这些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工会，就是这样。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

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这样，就象是一组齿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的实质本身的结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同志在提纲第一条里指出“思想混乱”，特别和专门谈到工会的危机，这基本上是一种带有原则性错误的东西。如果要谈危机，那只有在分析了政治局势之后才可以谈。事实上，“思想混乱”的正是托洛茨基，因为他正是在工会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来看）这个基本问题上，忽略了一点，即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在俄国，这样的劳动群众就是农民。在别的国家里，这样的劳动群众是没有的，但是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有非无产阶级的或非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产生了思想混乱。而托洛茨基却毫无道理地责备别人思想混乱。

当我研究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老是在讲“一般原则”。他的整个提纲都是从“一般原则”来谈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这里更不用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谈得已经够多了［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2—17、18—23 页。——编者注］。更不用说，托洛茨基本人在自己的提纲里就引证了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两人讲得十分明白的话，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两人一定是德国人所说的“替人挨打的孩子”或练习论战的对象。原则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本人还引用过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写的东西，他选中这两个人作为练习论战的对象是很笨拙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去找，从这里也找不出

任何严重的原则分歧。总之，重大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就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现在“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就是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拉回到过去。感谢上帝，我们已经从原则转到实际的切实的工作上来了。在斯莫尔尼，我们曾经大谈原则，而且无疑是谈得过多了。现在，经过三年之后，关于生产问题的所有各点，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的组成部分，都已经有了法令。然而这些法令的命运不佳：我们虽然签署了这些法令，但是随后我们自己把它们忘了，我们自己没有加以执行。然后又虚构出一些关于原则问题的论断，虚构出一些原则分歧。我在后面就要说到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的法令［注：见本卷第 221—222 页。——编者注］，这个法令大家都忘记了，也包括我在内，这是应当引咎自责的。

如果不算我列举过的分歧之点，那么现有的真正的分歧根本不涉及一般原则问题。我所以要把前面所列举的我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分歧”指出来，是因为照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就应当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呢（我们是非常需要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工会的特点也就在这里，这个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必然存在，再往后是否会存在则是一个问题。不过，工会的存在会成为问题，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孙子去谈论吧。而当前的问题是怎样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怎样调整好工作（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中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工作中的复杂的传动装置，并不是指苏维埃机关而言。那里还会有些什么样的复杂的传动装置，那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只是抽象地和原则地谈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那里有无产阶级，有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有小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苏

维埃政权机关中没有官僚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情况，传动装置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如果要提出工会“任务”的困难何在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想到这一点。再说一遍，真正的分歧，根本不在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地方，而在如何掌握群众的问题上，在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上。我应当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即使是小范围的），那么充斥在托洛茨基同志这本小册子中的许多不必要的“意见分歧”和原则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这本小册子中有好几条提纲，都是在同“苏维埃工联主义”进行论战。麻烦还嫌不够，又发明了一个唬人的新词！这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梁赞诺夫同志。我认识梁赞诺夫同志有 20 多年了，你们认识他的时间虽然比我短，但是在工作上对他的了解并不比我少。你们很清楚，他不擅长于理解口号的意义（当然他有别的长处）。梁赞诺夫同志有时说了不十分恰当的话，而我们却在提纲中把这些说成是“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做难道严肃吗？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会有“苏维埃工联主义”、“苏维埃反对签订和约”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名堂。拿任何一点都可以造出一个苏维埃的什么“主义”。（梁赞诺夫：“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对，完全正确，“苏维埃反布列斯特主义”。

而托洛茨基同志采取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时，自己又犯了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这是一个错误。托洛茨基同志说什么“工人国家”。对不起，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在 1917 年提工人国家，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如果人们向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既然国家是工人国家，为什么还要保护工人阶级呢？保护工人阶级免受谁的侵犯呢？”那就犯了明显的错误。不完全是一个工人国家，问题就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错误之一也就在这里。目前我们已经从一般原则转到切实的讨论和法令上来了，可是有人却把我们拉回到过去，不让我们接近实际的切实的东西。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

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布哈林：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在后面喊："什么国家？工农国家？"可是我不打算答复这个问题。谁愿意的话，只要回忆一下刚刚闭幕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可以找到答案。

不仅如此。从我们的党纲（这是《共产主义 ABC》的作者十分熟悉的文件）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08 页。——编者注］。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光彩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一种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没有工会，能够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它把我们带到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理想里面去了。这种理想，我们要再过 15 年至 20 年才能实现，而且在这个时间内是否就一定能实现，我还不能肯定。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只要我们不陶醉于、不迷恋于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抽象的议论，或者那种看起来有时象"理论"，而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是对过渡的特点作了错误估计的东西，那么，对于这种现实，我们是能够很好地认识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关于这种结合，我在后面还要谈到。但光是这一个词就足以表明，在这里给自己捏造出象"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的敌人，就是犯了错误。这是因为"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联合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

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已经融合，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切实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理论的概念了。企图找出与托姆斯基同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把他们说成是工会的“官僚”，至于在这场争论中究竟哪方面有官僚主义倾向，我在后面还要谈到）的原则分歧，同样是白费力气。我们很清楚，如果说梁赞诺夫同志有时会犯一个小毛病，喜欢杜撰个口号而且几乎是原则性的口号，那么，托姆斯基同志虽然有很多毛病，却没有这个毛病。因此，我认为在这里对托姆斯基同志展开原则性的斗争（象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那样），未免太过分了。这实在使我觉得奇怪。有一个时期，我们大家在派别上的、理论上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歧方面犯了许多错误——自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说是长大了。现在已经到了从虚构和夸大原则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的时候了。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基本上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听人说过托姆斯基奢望当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在工会运动中工作得很好的托姆斯基，应当反映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他总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应当在他所处的地位上反映出这种复杂的转变，如果群众感到痛，却不知道哪里痛，而托姆斯基也不知道他们哪里痛（鼓掌，笑声），如果他在这时号叫起来，那么我肯定地说，这是功劳，而不是缺点。我完全相信，可以发现托姆斯基有很多局部性的理论错误。不过，如果我们能坐下来深思熟虑地起草决议或者提纲，那么我们是能把它们全都改正过来的；也许我们不会去改正这些东西，因为生产工作比纠正理论上的小小分歧更有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生产民主”；这可以说是对布哈林说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有些小毛病，就是大人物也有小毛病，布哈林也不例外。他只要一看到标新立异的词儿，就忍不住要表示赞成。在 12 月 7 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起草关于生产民主的决议时简直是热情奔放。我愈深入地考虑这个“生产民主”，

就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提法在理论上的荒谬，看到这样的提法过于轻率。这样提只会把人弄糊涂。至少在党的会议上应当用这个例子再一次指出：“尼·伊·布哈林同志，少在名词上标新立异吧，这对于您，对于理论，对于共和国，都会有好处的。”（鼓掌）生产是永远需要的。民主只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范畴。我们不能反对在讲演和文章里使用这个词。一篇文章不过是探讨和清楚地说明一种关系。但是，如果您要把这变成提纲，把这作为口号去联合“同意者”和不同意者，如果象托洛茨基那样，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这就十分奇怪了。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谈谈，党是否应当“作出选择”，以及使党陷于非“作出选择”不可的境地，究竟是谁的过错。事情既然已经这样，我们就应当说：“无论如何，应当尽可能少选择象‘生产民主’这样在理论上错误的、除了糊涂观念之外毫无实际内容的口号。”托洛茨基也好，布哈林也好，显然都没有从理论上周密地考虑过这个术语，因而把自己也搞糊涂了。“生产民主”使人想到的完全不是他们两人所醉心的那些观念的含义。他们想要强调生产，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生产。在文章或演说中强调，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把这变成提纲，要党加以选择，那我就要说：作出反对这个东西的选择吧，因为这是一个糊涂观念。生产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个人管理制还不久，一双靴子还没有穿破[2]。决不能把人搞糊涂，造成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个人管理制，什么时候需要独裁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裁制，——我听见布哈林在后面吼：“完全正确。”（笑声，鼓掌）

其次。从 9 月起，我们就谈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的问题，我们在全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谈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决议。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必须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

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三年半来，我们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了起来。

显然，应当非常慎重而周密地对待这个问题。在那两次不幸的中央全会[注：这里是指 1920 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中央全会。这两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全文，见《真理报》1920 年 11 月 13 日第 255 号和 1920 年 12 月 14 日第 281 号；对决议的介绍，见 1920 年 12 月 20 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3]第 26 期。] 上（当时产生了七人派、八人派以及布哈林同志的有名的“缓冲派”[4]），我们就谈过这些原则问题，就已经认定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为了执行九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决定，我们还应当努一把力。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实行重点制，这就是在一切必要的生产部门中，优先照顾最急需的某一生产部门。优先照顾什么呢？可以优先照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并且我应当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是努力工作还不够，这里就是有英雄人物也还不够，因为一个英雄人物可能有很多优良品质，但是他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得很好；而在这里，需要善于处理非常特殊的问题。因此，如果提出重点制与平均制的问题，那首先就应当对它作充分的考虑，而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中恰恰是看不到的；他愈是修改他原来的提纲，错误论点也就愈多。请看他现在的提纲是怎样写的吧：

“……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的方针。在生产方面，重点制原则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对我们还是有决定意义的……”（托洛茨基小册子第 31 页提纲第 41 条）

这在理论上是十足的糊涂观念。这是根本错误的。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如果给我这样一种照顾，每天给我八分之一磅的面包，那我是不胜感激之至。重点制的优先照顾也包括消费方面的优先照顾。否则，重点制就是幻想，就是空中楼阁，而我们毕竟是唯物主义者。工人也是唯

物主义者；如果你提出重点制，那就请你给我们面包、衣服和肉吧。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曾经在国防委员会里几百次地讨论过这些具体问题；有人争着要皮靴，他说“我是重点部门”，而另一个人说，“给我皮靴吧，否则你的重点工人就坚持不住了，你的重点制就要垮了”。

由此可见，提纲中关于平均制和重点制问题的提法根本错了，而且提纲是从经过实践检验的已经取得的成就倒退回去了。这是不行的，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

再次，是“结合”的问题。关于“结合”，目前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闭口不谈。开口为银，闭口是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实际上实行结合了；在我国，每一个大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等单位的每一个大的部门，都在实际上实行了结合。效果是不是都很好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去研究一下如何进行结合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的实际经验吧。在这个或那个机关中用以实行结合的法令，简直是多得看不完。而我们却没有实际地研究清楚，这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某某工业部门的某种结合，究竟得到了怎样的结果，省工会的某某委员担任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一职务，其结果如何，他实行这种结合已经有几个月等等——我们还没有能够切实地研究清楚我们自己的这些实际经验。我们倒是制造了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并且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干这个我们挺在行，而研究和检验我们自己的经验却不行了。如果我们将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除了从这样或那样地贯彻改进农业的法令的角度去研究农业区的小组以外，还有研究结合，研究萨拉托夫省面粉工业、彼得格勒五金工业、顿巴斯煤炭工业等实行结合的结果的小组，如果这些小组都搜集了许多材料，并且宣称：“我们已经研究清楚了某某问题和某某问题”，那我就要说：“好，我们开始研究实际问题了，我们已经变成大人了！”然而，在我们为了实行结合已经费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如果有人却向我们提出一个“提纲”，制造出关于结合的原则分歧，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更为错误的呢？我们已经开始实行结合了，

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是实行得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好好研究我们的经验。因此，在结合问题上，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闭口不谈。

需要研究实际的经验。我签署了一些法令和决定，对实际结合作了指示，而实践比任何理论都重要百倍。所以，当人们说，“让我们来谈谈‘结合’吧”，我就回答说，“让我们把我们做过的事情研究清楚吧”。我们犯过很多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法令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改，这也是可能的。我同意这一点，对于法令，我没有丝毫的迷恋。但是应当提出实际的建议：某点某点应当修改。这才是切实的提法。这才不会是无效的工作。这才不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当我读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的第六节即《实际的结论》时，我觉得这些实际的结论恰恰都犯有这种毛病。因为那上面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应当有 1 / 3 到 1 / 2 兼任这两个机关的委员，而在其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中则应当有 1 / 2 到 2 / 3 兼任，如此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完全是想当然，是“大致估计”。自然，在我们的法令中，时常是根据“大致估计”确定这样的比例的，但为什么这在法令中是无法避免的呢？我不是为一切法令辩护，也不想把法令说得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好。法令中常常有这样的比例数字，如 1 / 2 或 1 / 3 的兼任人员等等，这都是根据大致的估计确定的。如果法令中写着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说，你们试着这样做吧，我们随后再来衡量你们“试验”的结果。我们随后再来研究真正的效果。等我们研究出结果，我们就会前进了。结合我们正在实行，并且将日益有所改进，因为我们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实际和更加实事求是了。

也许，我已经开始在谈“生产宣传”了吧？这有什么办法呢！讨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时，是必然要牵涉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生产宣传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实际工作问题，并且我们也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已经有专门管理生产宣传的国家机

关，它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们好不好，我不知道，应当加以考验；关于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写什么“提纲”。

如果完整地论述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那么关于民主的问题就用不着谈什么别的，只谈通常的民主就够了。玩弄“生产民主”之类的花招是错误的，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这是第一。第二是生产宣传。机关已经建立了。托洛茨基的提纲谈到生产宣传。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提纲”在这里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这个机关好不好，暂时还不知道。这要等我们在实践中考验它之后再说。让我们来进行研究和调查吧。我们假定，在代表大会上建立十个小组，每组十人。然后就可以问：“你进行过生产宣传工作吗？情形如何？结果怎样？”研究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便可以奖励那些成绩特别好的人，而抛弃那些不成功的经验。我们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虽然很少，很不成熟，但终归是有了，可是有人要我们离开这些经验朝后退，把我们拉回到“原则性的提纲”上去。这与其说是“工联主义”，不如说是“反动的”运动。

再有，第三，是奖励问题。实行实物奖励，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任务。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已经有进展了。已经拨出50万普特的粮食用作实物奖励，其中有17万普特已经用掉。用得好不好，恰当不恰当，我不知道。在人民委员会里，曾经有人指出说分配得不好，说不是作为奖励，而是成了附加工资。工会工作者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都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研究出结果。17万普特的粮食已经拿出去了；应当合理地进行分配，应当用来奖励那些英勇奋斗、努力工作、才干出众和忠心耿耿的经济工作者，一句话，奖励那些具备托洛茨基所夸奖的品质的人。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提纲里夸奖，而是要给他们面包和肉。譬如说取消发给某一类工人的肉，把它奖励给别的、“重点的”工人，这是否更好些呢？我们不拒绝实行这样的重点制。这种重点制是需要的。我们要仔细地研究我们实行重点制的实际经验。

还有，第四，是纪律审判会。如果我们没有纪律审判会，那么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生产民主”——请布哈林同志别生气——就都完全不值一提了。可是你们的提纲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原则上、理论上、实际上，对于托洛茨基的提纲和布哈林的立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别叫我难受了！

当我想到你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的时候，我就更要得出这个结论了。提纲中不仅包含着许多理论错误。在估计“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时所采取的方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谈论这样广泛的问题而不从政治方面去考虑目前局势的特点是不行的。我们同布哈林同志一起，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中提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18—19 页。——编者注]，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只有分析目前的政治局势，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时期。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可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新的过渡时期：军队的复员，战争的结束，获得比以前长得多的和平喘息时机的可能性，比较扎实地从军事战线转到劳动战线的可能性。单是由于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化。怎样变化呢？对这个问题应当仔细地加以研究，然而从你们的提纲中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没有研究出结果以前，要善于等待。人民是过度疲劳了，应当用于某些重点生产部门的许多储备，已经用完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正在变化。战争造成的疲惫现象非常严重，各种需要增加了，但是生产没有增加，或增加得不够。而另一方面，我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已经指出过这种情况，即只有当我们善于先把强制建立在说服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行强制［注：参看本卷第 138—139 页。——编者注］。我应当指出，对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一点也没有加以考虑的。

我们是否已经为一切新的生产任务建立了足够广泛和坚固的说服基础呢？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把群众吸引过来。可是群众能不能一下子转到这些新的任务上来呢？不能，因为譬如说关于应不应当推翻地主弗兰格尔的问题，应不应当为这一目的而不惜牺牲的问题，象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特别的宣传的。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如果我们指的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是关于“苏维埃工联主义”的议论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论，而是问题的实际方面，那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只是刚刚建立起生产宣传机关；我们还没有经验。我们实行了实物奖励，但是还没有取得经验。我们建立了纪律审判会，但是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而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使群众有所准备。这个问题是否已经准备好，是否已经从这方面研究、考虑和斟酌好了呢？远远没有。这就包含着根本的、极其重大的、危险的政治错误，因为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需要按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办事，而这里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裁起来了。有人说，“党应当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然而他们却一次也没有量过就虚构出了“生产民主”这样一个荒谬的口号。

应该看清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局势下的作用，现在群众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官僚主义，而我们已经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说，关于工人民主的问题，代表大会“只要一致批准”就行了。这是错误的。单是批准还不够；所谓批准，是说把已经充分斟酌过和考虑好了的东西确定下来，实际上呢，生产民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经过充分斟酌、权衡和检验。请你们想一想，提出“生产民主”的口号，群众对此会作出怎样的解释。

“我们是普通人，是做群众工作的，我们说，必须实行革新，必须改正错误，必须赶走官僚主义者；而你却转移人们的视线，说什么要进行生产，要以生产成就来表现民主。但是我不想同管理委员会、总管理局等等的官僚主义者一起搞生产，我们要别的人。”你们没有让群众说话、领会和思考，你们没有让党取得新的

经验，就迫不及待，搞过了头，创造出一些理论上荒谬的公式。而那些过于热心的执行者，又会使这种错误更加严重多少倍呢？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如何领导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他有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也往往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是责任要由他来承担。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11 月 9 日）和十二月全会（12 月 7 日）。在这两次全会上，所有这些错误已经不是表现为逻辑分析、前提和理论推论，而是表现为行动了。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搞得乱七八糟；这是革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危险的。关键在于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缓冲”派。这一派带来的危害和混乱最大。

请大家回忆一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5]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吧。在 1920 年 4 月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一个“临时的”机关，它“在最短［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13—14 页。——编者注］期间”必须转入正常状态。9 月间，是这样说的：“要转入正常状态。”［注：见《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第 26 期第 2 页所载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的决议第 3 点：“其次，中央认为，运输工会曾经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当时有必要成立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水运政治部[6]，作为帮助和调整工作的临时的杠杆。目前，这种困难状况已经大大地改善了。因此，现在可以而且应当着手把这些组织并入工会作为工会的机关，使它们适应并溶化于工会机构。”］11 月（11 月 9 日）举行了全体会议，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提纲，发表了关于工联主义的议论。尽管他谈到生产宣传的有些话讲得很好，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切完全是不知所云，文不对题，是开倒车，中央委员会目前是不能讨论这样的东西的。布哈林说：“这是很好的。”可能是很好的，然而这是答非所问。经过一场激烈的论战之后，以 10 票对 4 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用客气的同志式的口吻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

自己“已在日程上提出了”要“在工会内部加强并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决议中还说，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应当“积极地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作为它的一个从属机构，与其他工会联合组织享有同等的权利”。

中央委员会这个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思想是很明显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要仅仅在形式上，而要在实际上执行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便使你们的工作对一切工会都有帮助，以便彻底肃清官僚主义、优先照顾以及那种认为‘我们比你们好，比你们富，比你们得到的帮助多’的高傲自大的思想。”

在这以后，我们便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7]，公布了委员会的名单。托洛茨基退出了委员会，破坏了它，不愿意干。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卢托维诺夫喜欢玩反对派的游戏。的确，奥新斯基也是这样。坦白说，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游戏。但是难道这就是理由吗？奥新斯基备种运动搞得很好。虽然奥新斯基也喜欢搞“反对派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同他一起工作。而象破坏委员会这种手段，则是官僚主义的，非苏维埃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的，政治上有害的。在目前，当我们应该区分“反对派”中的健康因素和不健康因素的时候，这种手段更是加倍错误的，政治上加倍有害的。当奥新斯基进行“反对派运动”时，我对他说，“这个运动是有害的”，然而当他进行备种运动时，那人们会连声叫好。卢托维诺夫搞“反对派运动”犯了错误，我决不会象伊先科和施略普尼柯夫那样否认这一点，但是决不能因此而破坏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已经从知识分子的那种空谈虚构的分歧转到切实的工作上来了。生产宣传、奖励、纪律审判会——这些就是应当讨论的问题，就是委员会应当研究的问题。这时候，“缓冲派”的首领布哈林同志，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看到中央委员会危险地分成两派，就起来缓冲，对这种缓冲，我很难找到一个客气的字眼来形容。如果我象布哈林同志

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布哈林同志是想做点什么；没有疑问，他的愿望是十分真挚的和“缓冲”的。然而结果得到的并不是缓冲，而只是表明他没有估计到政治局势，此外，他还犯了理论错误。

把所有这些争议提出来进行广泛辩论，应不应当呢？从事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应不应当呢？在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前占去我们所需要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应不应当呢？在这期间，我们本来可以研究研究奖励的问题，纪律审判会的问题，以及结合的问题。我们本来可以在中央委员会所组织的委员会里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布哈林同志想缓冲，而不想成为那种“本来要进这间屋子，[8]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的人，那他就应该主张并且坚持要托洛茨基同志留在委员会里。如果他这样主张而且这样做了，那我们也许可以走上切实的道路，也许可以在这个委员会里把个人管理制的实际情况、民主制、被委派者等等情况研究一下了。

再往后，在 12 月（12 月 7 日的全会），同水运员工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了，这就使得冲突愈加尖锐，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 8 票对我们 7 票的局面。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地写成了十二月全会决议的“理论”部分，力图“调和”和实行“缓冲”，然而，在委员会遭到破坏之后，这显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呢？完全不在于它们采用了强制手段。这反而倒是它们的功劳。它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能够根据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及时地、不引起冲突地转到正常的工会工作上去，没有能够很好地同各个工会相适应，没有能够站在同各个工会平等的地位上来帮助它们。在军事方面有宝贵的经验：英雄主义、雷厉风行等等。但是也有军人中不良分子的坏经验：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纲，同他的想法和愿望相反，支持的不是军事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最坏的东西。应当记

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昨天不得不骂自己是个蠢人，这就是我忽略了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鲁祖塔克有个缺点，就是讲话声音不响，不那么引人入胜，不那么动听。稍不注意，就会把他忽略过去。昨天我没有能够参加会议，翻阅了一下自己的材料，发现其中有一份提交 1920 年 11 月 2 日至 6 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铅印件，标题是：《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文字不多，我把它的全文给你们读一下：

提交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

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

（鲁祖塔克同志的报告提纲）

1. 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工会几乎成为除实行工人监督外，能够而且应当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生产的工作的唯一机关。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关还没有组织好，由于企业主和高级技术人员的怠工，工人阶级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是保护工业和恢复国家整个经济机构的正常职能。

2. 此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取消私人企业并且组织对这些企业的国家管理，这个时期，工会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平行地和共同地进行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机关力量薄弱，这种平行现象在当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工会和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建立了充分联系这一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

3. 以后国家经济机关开始进行管理，它们逐步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这一切就使工业管理工作和生产计划的制订工

作的重心，转移到这些机关了。这时，工会在组织生产方面的工作就是参加组织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以及工厂管理委员会的集体管理机构。

4．目前必须尽量合理地利用每一个劳动单位，吸引全体生产者自觉地参加到生产过程中来；同时，国家经济管理机关逐渐增加和复杂化，已经变成同生产本身不相称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工会直接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并且不仅是通过工会在经济机关中的代表，而且是作为整个组织来参加这项工作，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机关和工会之间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的问题，又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来了。

5．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根据现有的生产的物质因素（原料、燃料、机器的状况等等）来规定总的生产计划，那么工会就应当是从为完成生产任务而组织劳动和合理地使用劳动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在制定总的生产计划时，无论是计划的各个部分还是整个计划，都一定要有工会参加，以便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劳动的利用最合理地结合起来。

6．要实行真正的劳动纪律，要有效地同逃避劳动的行为进行斗争等等，就必须使所有参加生产的人都自觉参加以实现这些任务。靠官僚主义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命令，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巨大的。它应当教会每个车间、每个工厂中的工会会员注意发现由于技术设备使用不当或行政管理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而引起的劳动力使用上的一切缺点。必须利用各个企业和生产上的全部经验来同拖拉作风、怠惰习气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7．为了特别强调这些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工会应当在组织方面，在一定的日常的工作中，把这些任务放在一定的地位。根据全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工

会下面设立的经济部，在开展本身的工作时，必须逐渐地规定和确定整个工会工作的性质。例如，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整个生产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本身的需要，因此工资和奖励应当同生产计划的完成程度有最密切的联系，并取决于后者。实物奖励和部分工资用实物支付的制度，应当逐步改成对工人按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供应的制度。

8．工会工作的这种安排，一方面能够取消平行机关（政治部等等），另一方面能够恢复群众同经济管理机关的密切联系。

9．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工会参加国民经济建设的纲领大部分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战时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会本身组织上的弱点以及它同经济机关的领导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脱节。

10．因此，工会应当为自己规定最近的实际任务如下：（一）最积极地参加解决生产问题和管理问题；（二）会同有关的经济机关，直接参加组织有权威的管理机关；（三）密切注意不同类型的管理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四）必须参加草拟和确定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五）根据经济任务的轻重缓急来组织劳动；（六）发展广泛的进行生产鼓动和宣传的组织。

11．工会和工会组织下面的经济部，必须切实地变成工会有计划地参加生产组织工作的灵活的有力的杠杆。

12．在对工人实行有计划的物质供给方面，工会必须转而对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机关发挥影响，实际地切实地参加所有的分配机关，并且在其中实行监督，对中央及省的工人供给委员会的活动，应当特别注意。

13．由于个别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等的本位主义倾向，所谓“重点制”已经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因此，工会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支持在经济中真正实行重点制，应当坚持根据生产的重要性和国家现有物质资源情况来修订现行的确定重点单位的办法。

14．对所谓的模范企业必须特别注意，要通过建立有权威的管理，通过劳动纪律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把它们变成真正的模范企业。

15．在组织劳动方面，除了建立一套严整的工资制度，全面修订生产定额之外，工会必须坚决地担负起同各种逃避劳动的行为（旷工、迟到等等）进行斗争的全部工作。直到现在，纪律审判会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必须使它成为同破坏无产阶级劳动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有力工具。

16．执行上述任务，制定生产宣传的实际计划以及制定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各种办法，都应当由经济部负责。因此，必须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经济部，在最近期间召集一次全俄经济部特别会议，讨论与国家经济机关工作有关的经济建设上的实际问题。

我想，现在你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要骂自己了。这才是一个好的纲领，它比托洛茨基同志经过多次考虑之后所写的和布哈林同志根本没有经过考虑就写出来的（12 月 7 日全会的决议）要强过百倍。我们所有的多年来没有做过工会运动工作的中央委员，必须向鲁祖塔克同志学习，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也应当向他学习。这个纲领已被工会采纳了。

我们大家都把纪律审判会忘记了，而离开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来谈“生产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现在我把鲁祖塔克的提纲同托洛茨基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比较一下。托洛茨基提纲第 5 条末了这样说：

“……现在必须着手改组工会，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要着手选拔领导人员……”

请看这种真正的官僚主义吧！托洛茨基与克列斯廷斯基要选拔工会的“领导人员”呢！

再说一遍：这就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说明。它的错误并不在于它采取了强硬措施；这正是它的功劳。它的错误在于它没有能够处理好所有工会的共同任务，自己没有更正确、更迅速、更有效地运用同志纪律审判会，也没有帮助所有的工会这样做。当我读了鲁祖塔克同志提纲中关于纪律审判会的话之后，我就想：好象已经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了。果然，是有过这样的法令的。那就是 1919 年 11 月 14 日颁布的《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9]例》（《法令汇编》第 537 号）。

在这种审判会上，工会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这种审判会的好坏，它们的工作成绩如何，能不能经常起作用，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实际经验加以研究，那要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所写的一切有益百万倍。

现在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我在总结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材料时，应当指出，把这些分歧提出来在党内广泛辩论，提交党代表大会讨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在委员会里，也只有在委员会里，我们才能进行切实的讨论，才能前进，可是现在我们却在后退，而且在今后几个星期中还会继续后退，退到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上去，而不去切实地解决问题。至于说到我，我对这已经讨厌到极点了，不管我有没有病，我都非常希望能够躲开它，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就都愿意。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提纲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错误，一系列的原则错误。从政治上说，整个对待问题的态度都是极不妥当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东西。总之，他的政策是对工会进行官僚主义的干扰的政策。我相信，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是会斥责并且否定这种政策的。（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注释：

[1]《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是列宁就工会问题的争论向俄共（布）积极分子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是列·达·托洛茨基在 1920 年 11 月 3 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挑起的（参看注 10）。最初争论仅限于俄共（布）中央内部。托洛茨基 12 月 24 日在济明剧院发表的演说和 12 月 25 日发表的纲领性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把争论扩大到了全党。12 月 30 日在大剧院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是专门为讨论工会问题而召开的。除列宁的讲话外，会议听取了格·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报告，尼·伊·布哈林、维·巴·诺根、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达·波·梁赞诺夫的副报告。这次会议以后，争论扩展到彼得格勒、乌拉尔、乌克兰、西伯利亚等地。争论开始后，各派纷纷提出纲领和提纲。但多数纲领在争论过程中陆续撤回。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还剩下 3 个主要的纲领，这就是：代表列宁观点的《十人纲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联合纲领、工人反对派的纲领。1921 年 3 月 8—16 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十人纲领》，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列宁的《党内危机》一文（见本卷第 231—237 页）分阶段地分析了这场争论的过程。——198。

[2] 靴子还没有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意为时间十分短暂。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第 1 幕第 2 场）。——207。

[3]《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报》是根据俄共（布）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创办的，1919 年 5 月 28 日在莫斯科创刊。最初是《真理报》的附刊，从 1920 年 10 月起成为独立的刊物。《通报》刊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指示、通报以及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报告、中央各部工作情况、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文章和评论等。最初几年是不定期刊物，1924 年起为周刊，1928 年起为旬刊。1926 年改名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1929 年 10 月，该刊改组为《党的建设》杂志，1946 年 6 月以后又改组为《党的生活》杂志。——208。

[4]“缓冲派”是 1920—1921 年工会问题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派别性集团，其首领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者有尤·拉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瓦·尼·雅柯夫列娃等。“缓冲派”以缓和列宁与列·达·托洛茨基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上的分歧为名，行帮助和掩护托洛茨基进行的派别活动之实。布哈林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纲领，公开附和托洛茨基的立场。——208。

[5]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是直属俄共（布）中央的运输业方面的临时政治工作机关，1919 年 2 月建立，当时叫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处，1920 年 1 月改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建立交通总政治部的目的是：采取非常措施防止运输业遭到彻底破坏；加强对运输工人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铁路工会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运输业的工具。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铁路上实行了军事纪律。1920 年，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 12 月 7 日的决定，交通总政治部被撤销。——215。

[6]水运政治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运总政治部）成立于 1920 年 4 月，是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的分支机构。它的职责是：对行政业务部门实行政治监督；领导政治教育工作以迅速恢复水路运输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顿劳动纪律而斗争。1920 年 12 月被撤销。——215。

[7]指 1920 年 11 月 8 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选出的由格·叶·季诺维也夫、米·巴·托姆斯基、列·达·托洛茨基、扬·埃·鲁祖塔克、阿·伊·李可夫组成的工会问题委员会，不是中央委员的工会领导干部阿·洛佐夫斯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

尤·赫·卢托维诺夫也是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拒绝参加该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本卷第 233 页。——216。

[8] 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 1 幕第 4 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217。

[9]《工人纪律同志审判会条例》是苏俄早期的同志审判会条例之一，由劳动人民委员部拟订、人民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1919 年 11 月 14 日颁布。条例规定，审判会负责审理各种违反纪律的案件，设于产业工会地方分会之下，由地方或中央工厂管理处、工会理事会和发案企业的工会会员大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企业的工厂管理处、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产业工会及其机关有起诉权。审判会在非劳动时间公开开庭，可判处训诫、暂时（不超过 6 个月）剥夺在工会组织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暂时（不超过 1 个月）调任较低职务和降低工资等级、送往公共工程服重劳役等处分。顽抗同志纪律、屡受处分者，将作为不劳动分子从企业开除并送集中营。诉讼双方都有权就地方审判会的判决向省级审判会上诉。省级审判会设于省劳动局，由省劳动局，省工会理事会、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其判决为终审判决。条例还规定，工厂管理处、机关、企业的行政技术人员有玩忽职守等行为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各人民委员就其所辖范围分别作出决定，给予各种处分，直至逮捕和送集中营监禁。——222。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1921 年 1 月 25 日）

一场带有大会序幕性质的党内辩论和派别斗争，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前，由于选举即将举行而激烈起来了。在第一次派别活动之后，即在托洛茨基同志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表了“纲领性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序言注明日期为 1920 年 12 月 25 日）之后，接着就是俄共彼得格勒组织措辞激烈的（读者从后面可以看到，措辞这样激烈是完全应当的）宣言（《告全党书》，1921 年 1 月 6 日发表于《彼得格勒真理报》[2]，以后又在 1921 年 1 月 13 日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莫斯科的《真理报》）。此后，莫斯科委员会又发表了反对彼得格勒组织的宣言（载于同一天的《真理报》）。以后又出现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俄共党团委员会发表的关于 1920 年 12 月 30 日辩论的速记记录，这次辩论是在一次规模巨大而且由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上，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的会议上进行的。这个速记记录的标题是《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序言注明日期为 1921 年 1 月 6 日）。自然，这远不是辩论的全部材料。现在几乎到处都在举行党的会议，讨论有争论的问题。1920 年 12 月 30 日，我曾经不得不象当时声明的那样，在“违反常例”的条件下，即在不能参加讨论、不能听到前面和后面的发言的条件下作了发言［注：见本卷第 198 页。——编者注］。现在我想恢复一下被违反的常例，比较“正规地”谈谈我的意见。

派别活动对党的危害

托洛茨基同志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是不是派别活动呢？这种活动，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是不是对党有害呢？认为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进行了派别活动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们（当然，托洛茨基同志除外），对这个问题特别喜

欢保持沉默，布哈林同志也是这样，不过，他在 1920 年 12 月 30 日以“缓冲派”的名义发言时，却认为自己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

“……当火车有某种倾覆趋势时，缓冲器就不是那么不好的东西了。”（1920 年 12 月 30 日辩论记录第 45 页）

这样说来，是存在着某种倾覆趋势的。然而，对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存在着这种倾覆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有觉悟的党员怎么能漠不关心呢？

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一开始就声明，说“它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说参加编写小册子的是“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说这是一本“纲领性小册子”。而在提纲第 4 条末了，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本次党代表大会必须在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

如果这还不算是一个中央委员在建立派别组织，如果这还不算是“某种倾覆趋势”，那就请布哈林同志或他的任何一个同道者向党解释解释：俄文中“派别活动”和党的“倾覆趋势”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含义？？有的人愿意“缓冲”，却又故意无视这样的“倾覆趋势”，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奇特的失明吗？？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在中央委员会两次全体会议（11 月 9 日和 12 月 7 日）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初稿及其所主张的党对工会的整个政策，作了空前详细的、长时间的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一个在 19 个中央委员中至今仍独持己见的委员，竟然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拉帮结伙，把他们的“集体”“著作”当作“纲领”发表，并且建议党代表大会在“两种趋势之间作出选择”!！托洛茨基同志在 1920 年 12 月 25 日宣告说有两种趋势而且只有两种趋势（虽然布哈林在 11 月 9 日已经以“缓冲者”的姿态出现），这就非常明显地揭露了布哈林派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说明它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这一点就用不着我说了。这是

附带的话。不过我要问问随便哪一个党员：要求对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作出选择”，搞这样的进逼和袭击岂不是头脑发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吗？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三年之后的今天，党内竟会有一个党员，就工会运动方面的两种趋势问题发动这样的“袭击”，这岂不是太令人吃惊了吗？

不仅如此。请再看看这本小册子里的比比皆是的派别攻击吧。在提纲第 1 条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工会运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这些工作人员被说成是“倒退到原则上早已为党所肃清的工联主义立场上去了”（大概，在 19 个中央委员中，代表党的只有 1 个人）。提纲第 8 条危言耸听地谴责“工会工作者领导层中的工会保守主义”（请注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层”上，这才是真正的官僚主义态度呢！）。提纲第 11 条一开始就极其委婉地、有根有据地、切实地（怎样才能说得更客气一点呢？）“暗示”出，“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即在口头上承认”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大多数（！！）工会工作者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党的决议——我们面对的是何等有权威的法官啊！

提纲第 12 条说：

“……许多工会工作者日益激烈地和不妥协地反对结合的前景…… 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两位同志就属于这样的工会工作者。不仅如此，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小团体的排他情绪和敌视本经济部门的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因而实际上支持了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行会习气的残余。”

请读者仔细地再把这些论断看一遍，并且好好地想一想吧。这里面“妙语”可真是多得惊人。首先，从这种言论的派别性的角度来给它一个评价吧！设想一下，如果托姆斯基发表一个纲领，责备托洛茨基和“许多”军事工作者培养官僚主义习气、支持野蛮制度的残余等等，那么托洛茨基会怎样说呢？会采取什么样

的行动呢？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既然没有看到——简直没有注意到，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词句的激烈性和派别性，没有看到这里的派别性要比彼得格勒同志们的宣言严重好多倍，那么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其次，请仔细考虑一下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吧：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情绪……” 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态度。请看，全部问题在于托姆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的是什么“情绪”，而完全不在于群众、千百万群众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意中道出了他和“缓冲派”布哈林等人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和掩盖的全部争论的实质。

全部争论的实质和斗争的根源，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并且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

还是在于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群众理所当然地提出抗议并且不可避免地决心要抛弃那些不愿意纠正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新工作人员呢？

争论的实质，是在于有人不愿意了解“新任务和新方法”呢？

还是在于有人空谈什么新任务和新方法来拙劣地掩饰他对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庇护呢？

读者应牢牢记住全部争论的这个实质！

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所谓“集体工作的成果”的提纲中写道：“工人民主不懂得偶像”，“它只知道对革命的适宜性”（提纲第 23 条）。

托洛茨基同志这个提纲的遭遇是不愉快的。提纲中的正确的东西，不仅不是新的，而且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而提纲中的新的东西，却又全都是不正确的。

我摘录了托洛茨基同志几个正确的论点。这几个论点，不仅在提纲第 23 条里所涉及的那个问题（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倒转过来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

从形式上的民主来看，即使是反对整个中央的派别纲领，托洛茨基也是有权发表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1920 年 12 月 24 日中央关于辩论自由的决议承认了这种形式上的权利，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缓冲派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有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却不承认彼得格勒组织有这种权利，这大概是因为布哈林在 1920 年 12 月 30 日甚至说出了“工人民主这个神圣的口号”这样的话（速记记录第 45 页）……

然而，对革命的适宜性如何呢？

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头脑健全、神志清醒、没有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缓冲”派的那种派别自尊迷了心窍的人，却会认为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权威的领袖就工会运动问题发表这种言论对革命是适宜的，这样的人能找到一个吗？？

就算托洛茨基指出的“新任务和新方法”非常正确——实际上他指出得完全不正确，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然而单是托洛茨基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无论对于他本人，对于党，对于工会运动，对于几百万工会会员的教育工作，或者对于共和国，都是有害的，这一点难道还能否认吗？？

好心肠的布哈林和他的伙伴自称为“缓冲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不考虑采用这个称号必须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吧。

工会运动中的分裂在政治上的危险性

大家都知道，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

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倾覆的话，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

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而工会运动（我在 1920 年 12 月 30 日的发言中曾经极力强调，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组织在工会内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注：见本卷第 198—199 页。——编者注］）中的分裂，正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

正因为如此，在 1920 年 11 月 2 日至 6 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风波掀起”（风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掀起的）的时候，当会议刚刚结束……不，我说错了，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非常激动的托姆斯基同志跑到政治局来，在非常冷静的鲁祖塔克同志的全力支持下，叙述了托洛茨基同志在会议上讲要“整刷”工会，而他，托姆斯基，与之争辩的情形，——当这件事发生时，我立刻毫不踌躇地断定，争论的实质正是在于政策（就是说在于党对工会的政策），而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和他提出的针对托姆斯基同志的“整刷”政策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因为，即使“整刷”政策部分地被“新任务和新方法”（托洛茨基提纲第 12 条）证明是对的，然而，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也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因为它有造成分裂的危险。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认为，把“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归罪于他，“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列·托洛茨基《答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载于 1921 年 1 月 15 日《真理报》第 9 号）。但是“整刷”这个词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惯用语”，倒并不是仅

仅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用了这个词，可以说它已经“传遍了”全党和工会。不是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从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说来，这个词还依然是很确切的。这就是说，这一个词就非常简练地表现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纲领性小册子的全部精神、全部倾向。托洛茨基同志这本纲领性小册子，从头到尾贯穿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整刷”政策的精神。回忆一下他对托姆斯基同志或“许多工会工作者”的责难，说他们“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就什么都清楚了！

但是，如果说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1920 年 11 月 2 日至 6 日）还只是刚刚开始形成可能导致分裂的气氛，那么到了 1920 年 12 月初，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中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评论我们的争论的政治实质时，这一事件是基本的，主要的，根本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以为对此沉默会有所帮助，那是枉费心机。在目前情况下，沉默非但不是“缓冲”，而且是火上加油，因为问题不仅已被现实生活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中强调地指出来了。正是这本小册子，在我所引证的几段话中（特别是在提纲第 12 条中），再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情的实质究竟是在于“许多工会工作者在自己一伙人中间培养敌视新工作人员的情绪”呢，还是在于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例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引起群众理所当然的“敌视”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 1920 年 12 月 30 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很有根据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托洛茨基同志的极端拥护者”造成了分裂。也许布哈林同志正是因为这句话而责骂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是“废话”吧？然而现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他读一读 1920 年 12 月 30 日辩论的速记记录，都会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道的，因为他会发现，援引确切事实和依据确切事实的正是季诺

维也夫同志，而毫无事实根据、满嘴知识分子“空话”的，正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是泥足的，它现在已经分裂成三截”的时候，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立刻打断他的话，喊道：

“而你们还曾加以鼓励呢。”（速记记录第 15 页）

这是一种严重的指控。这个指控如果被证实，那么这个被指控为鼓励分裂——哪怕分裂的只是一个工会——的人，不论在中央委员会内，在俄国共产党内，或是在我们共和国的工会内，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了。幸而这一严重的指控是由一位同志以不严肃的方式提出的。遗憾的是，这位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论战时表现出这种不严肃的“狂热”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对他自己的好文章，例如生产宣传方面的文章，有时也能添上“一勺焦油”，毁掉生产宣传本身的全部优点。常有一些脾气好的人（如布哈林），他们甚至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也能尽量少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但是也常有一些脾气不太好的人，他们动辄就在自己的攻击中使用恶毒言词。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如果能注意一下，或者请他的朋友帮他注意一下，那对他是会有益处的。

人们会说，虽然指控采取了不严肃的、不妥当的、显然是“派别的”方式，但毕竟是提出来了。既然事情严重，那么与其缄默不言，倒不如实话实说，哪怕说得不妥当也好。

事情无疑是严重的，因为，我再说一遍，整个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这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好在我们有十分确凿、十分客观的具体材料，足以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性的答复。

第一，在速记记录的同一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声明，他不仅回答了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不对！”，并且还确切地举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本来想提出（我可以补充说：这显然是出于

派别狂热）的，决不是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这种指控，而是要指控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九月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促成了或引起了分裂。（我附带指出，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在九月的发言，事实上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赞同，而且一次也没有看见有谁正式提出过反对。）

季诺维也夫同志回答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鲁祖塔克同志已经用他手里的记录证明，“这个问题〈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里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的问题〉远在我〈季诺维也夫〉作任何发言之前，远在全国代表会议举行之前，就已经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方和南方都讨论过了”。

这是一个十分明白、确切和符合事实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几千名担任负责工作的俄共党员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所作的，而无论是在季诺维也夫这次发言之后曾经两次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或是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也曾经发过言的布哈林同志，都没有驳倒过他所指出的事实。

第二，对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所提出的指控，还有一个更确切和更正式地驳斥他的材料，那就是载于同一速记记录中的 1920 年 12 月 7 日通过的俄共中央全会关于水运员工共产党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关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鉴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水运员工之间发生冲突，中央委员会决定：（1）在联合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水运员工部。（2）在 2 月份召开铁路和水运员工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新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正常选举。（3）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常行使职权。（4）立即撤销水运总政治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把它们所有的人员和资财转交给工会组织。”

读者由此可以看到，这里不但没有责备水运员工，而且相反，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承认他们是对的。不过，在 1921 年 1 月 14 日的共同纲领上署名的中央委

员，没有一个人（除了加米涅夫）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这里所说的共同纲领就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是由一批中央委员和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提交中央委员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草案。非中央委员而以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名义签名的是洛佐夫斯基。其余的人是：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和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

这个决议的通过是针对上面所列举的这批中央委员，即针对我们这一批人的。这是因为我们当时本来是会投票反对暂时保留旧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看到我们这一批人必然要获胜，托洛茨基才不得不去投票拥护布哈林的决议，因为不这样做，就会通过我们的决议。11 月间曾经拥护托洛茨基的李可夫同志，在 12 月间参加了工会问题委员会处理水运员工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的工作，也相信水运员工是正确的。

总起来说，中央委员会十二月会议（12 月 7 日）的多数，是由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等等同志组成的，就是说，是由不可能被任何人怀疑是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抱有成见的一些中央委员组成的。而这个多数，就其决议的实质看来，所责备的并不是水运员工，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只是拒绝立即加以撤换罢了。这就是说，索斯诺夫斯基的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之处，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点。我屡次提到的“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一指控有没有凭空虚构或言过其实的地方呢？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 1920 年 12 月 30 日的第一次发言里同样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回答是十分准确的。季诺维也夫同志[3]从印就的佐夫同志关于水路运输的命令（1920 年 5 月 3 日）中援引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乱设委员会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季诺维也夫同志正确地把这叫作根本性的错误。这也

就是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又立刻作了说明，认为有些被委派的同志“从受过的考验和具有的经验来说都远远不如”佐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我曾听到过对佐夫同志的评价，说他是很可贵的工作人员，我在国防委员会中观察到的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任何人想损害这样的同志的威信，也没有任何人想使他们成为“替罪羊”(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报告第 25 页，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想这样做)。破坏“被委派者”威信的，不是那些纠正他们错误的人，而是那些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想袒护他们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工会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险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的。我们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并没有加以夸大的分歧实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它就在于反对袒护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的和委派制的极端行为，反对为它们辩护，而力求纠正它们。全部问题就是这样。

论原则分歧

但是，也许有人会这样对我们说：如果存在着根本的和深刻的原则分歧，那么这种分歧难道不足以证明甚至发表最激烈的派别言论也是有理由的吗？如果需要说些不容易理解的新的东西，那么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有时甚至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吗？

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托洛茨基同志力图指出这样的分歧，但是指不出来。如果说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12 月 25 日）之前，还可以（而且应当）用有条件的或和解的口吻来说话（“即使有未被意识到的新任务，有分歧，也不能这样对待问题”），那么，在这本小册子发表之后，就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小册子里所有的新东西，实质上都是错误的。

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拿来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 月 2 日至 6 日）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一下，就能最明显不过地看出这一点。我在 12 月 30 日的发言中和在 1 月 21 日的《真理报》上，都援引过鲁祖塔克同志的提纲[注：见本卷第 218—221 页。——编者注]。这个提纲比托洛茨基的提纲正确、完备。托洛茨基的提纲与备祖塔克的提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托洛茨基错误的地方。

先从布哈林同志急急忙忙塞进 12 月 7 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有名的“生产民主”说起吧。如果这个笨拙的、知识分子生造的术语（“标新立异的词儿”）是用在一篇演说或一篇文章中，而我们却对它加以挑剔，那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正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可笑的境地：他们正是在提纲中坚持用这个术语，坚持用这个把他们的“纲领”跟工会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区别开来的术语！

这个术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的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请看一看布哈林自己在他起草的 12 月 7 日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吧。在这个决议中，布哈林这样写道：“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你们看：“这就是说”！布哈林在向群众说话时，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必须特别加以解释的深奥的术语。我认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这是非民主的；写给群众看的东西，不应当用这种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新术语；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白费时间来解释无用的术语〉，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

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管理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心程度。”

这种论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民主的意义不仅是“进行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选人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进行一切选举都要考虑到政治坚定性和经济工作能力。和托洛茨基的愿望相反，在拥有百万群众的组织中，还应当有一定百分比的调停人和官吏（在今后许多年内，没有好的官吏是不行的）。但我们并不说什么“调停人”民主或“官吏”民主。

第三，只注意被选举者，只注意组织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是错误的。这些优秀人才终究只是少数。应当注意普通人，注意群众。鲁祖塔克的提纲对这一点不仅说得比较简洁，比较明了，而且在理论上也比较正确（提纲第 6 条）：

“……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懂得他所执行的生产任务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必须使每个参加生产的人不仅能参加执行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而且能自觉地参加纠正生产方面的一切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缺点。”

第四，“生产民主”是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术语。可以把它理解成否认独裁制和一长制，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要延缓实行或不愿实行普通的民主。这两种解释都是有害的，要想避免这种解释，就非加上冗长的和特别的注解不可。

鲁祖塔克简洁地表述了这些思想，他的表述比较正确，而且避免了所有这些毛病。而托洛茨基在 1 月 11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生产民主》一文中，不但没有对存在着这些错误和毛病这一点提出反驳（他完全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把自己的提纲拿来同鲁祖塔克的提纲比较），反而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个术语的错误和毛病，因为他把“军事民主”同“生产民主”相提并论。幸而，就我记得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为这类术语掀起过派别争论。

托洛茨基提出的“生产气氛”这样的术语，就更不妥当了。季诺维也夫很正确地讥笑了这个术语。托洛茨基气愤地反驳道：“我们曾经有过军事气氛……

现在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深入工人群众，而不仅是在表面上——造成生产气氛，这就是说，要使他们对生产全力以赴，切实关心，就象过去对前线那样……”问题就在于对“工人群众”说话时，“深入工人群众”说话时，要象鲁祖塔克的提纲那样去说，而不要使用“生产气氛”之类的字眼，这种字眼只会引起误解或者传为笑谈。实际上，托洛茨基同志使用“生产气氛”这个说法所表明的思想，正是生产宣传这个概念所表明的思想。但正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在深入工人群众进行生产宣传时，应当避免这一类说法。如果要说明对群众不该怎么进行生产宣传，这个说法倒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进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也许我的政治估计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可以

（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见解，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您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您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您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更具体些说吧。季诺维也夫说：“你们在工会中造成分裂，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至于提高生产的问题我早在 1920 年 1 月就已经谈过，并且写过文章，那时我曾经举修建澡堂作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说：“写了一本小册子，举了个澡堂的例子，真是了不起〈第 29 页〉，可是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您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第 22 页〉。”

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澡堂的例子，正好是对群众，在“深入群众”时简单明了地说明了工会应该做什么，而“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却是迷了工人群众眼睛的沙子，使他们对问题难以理解。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 66 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因此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要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总结发言

所说的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意义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重要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中主义的规定。

（2）为贯穿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这种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切实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活生生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了一步，退到抽象的、不具体的、“空洞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最切实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为一方，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读到托洛茨基同志 12 月 30 日对我的反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第 65 页）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正中要害”。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

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即看看谁更好地更成功地根据 11 月 2 日至 6 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分配了实物奖，组织了纪律审判会，实行了结合：是萨拉托夫面粉业工人，是顿巴斯煤矿工人，还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如此等等。

拿“广泛辩论”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我曾经反对所谓的“广泛”辩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工会问题委员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本来是可以进行切实的辩论的。我认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的政治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缓冲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从“缓冲”的观点来看，他们正应当全力反对广泛的辩论，争取把辩论转到工会问题委员会里去进行。请看一看当时的情形吧。

12 月 30 日，布哈林竟说：“我们宣布了工人民主这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集体管理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大型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 45 页）这个人还责备过季诺维也夫净说废话和夸大民主呢！这才是十足的废话和“胡言乱语”，他根本就不懂得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丝毫也不高明一些。他指控说："列宁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第 65 页）他说："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象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第 69 页）

结果如何呢？从 12 月 25 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辩论"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在 100 个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对这场辩论不感到头痛，不认为这场辩论毫无益处（甚至更坏些）的，恐怕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使党浪费时间去对字眼、对糟糕的提纲进行争论，还骂委员会里那种正好是切实的对经济方面的研究是"小圈子里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为了研究和检查实际经验，以便从中学习在真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后退，不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样的"生产气氛"这类僵死的经院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结合"来说吧。在 12 月 30 日我曾劝告大家对这个问题采取沉默态度，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好我们本身的实际经验，而不具备这个条件，关于结合的争论就必然会变成废话，使党的力量脱离经济工作而瞎忙一气。托洛茨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占 1 / 3 到 1 / 2，或占 1 / 2 到 2 / 3，我把这个提纲叫作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注：见本卷第 210 页。——编者注］。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向我大发脾气。我从记录第 49 页上看到，布哈林很周密详尽地向我证明："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聋作哑的。"（这一页上印的就是这样的话，一字不差！）托洛茨基也发火了，他喊道：

"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作官僚主义；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大家就都会知道，都会奉为准则，那

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等组织里，都会有 1／3 到 1／2 的兼职工作人员……”（第 68 页）

我读过这段话之后，就请米柳亭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把现有的关于结合问题的印好的报告给我送来。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吧，因为光是说空话，既没有材料又没有事实根据，只是凭空编造分歧，炮制各种定义和“生产民主”，这样来从事“全党讨论”（布哈林在第 47 页上用的词，这大概也会成为“惯用语”，不亚于有名的“整刷”），实在是枯燥无味到了极点。

米柳亭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20 年莫斯科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 1920 年 12 月 19 日）。该报告第 14 页上，载有一个表明工人参加管理机关情况的表格。我现在把这个表格照抄在下面（只包括一部分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

由此可见，就在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经达到 61．6％，就是说，已经超过半数，而接近 2／3 了！这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关于“1／3 到 1／2”或“1／2 到 2／3”，不管你是说也好，争论也好，写成纲领也好，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全党讨论”，都是使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间脱离生产工作，都不过是没有重要内容的政客的空谈。而如果是在委员会里——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在这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写提纲——那我们就可以有成效地从事检查经验的工作，例如，找一二十个人（从 1000 个“兼职工作人员”中）问一问，把他们的印象和结论同客观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设法对未来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实际的指示：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式和方法，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让我也来作些“生产宣传”吧！）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象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托洛茨基在他 12 月 30 日的发言中喊道：“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第 29 页）这样来对待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这就象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师里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有，还是没有？

甚至再过十年，我们一定还会说：所有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受过足够的生产教育。这正象再过十年，所有党、工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还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一样。但是生产教育的基础，我们已经奠定了，因为现在已有近千名的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参加了管理机关，管理着企业、总管理局以及更高的机关。“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这些从前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自己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极其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切实认真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认真地改进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办法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准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

的整个态度，都正好违反了这个准则。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正好是用自己的错误使党的注意力和力量脱离切实的“生产”工作而去进行空洞的、毫无内容的争论。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

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

由于布哈林同志好在理论上钻研问题，所以他从 12 月 30 日的辩论开始（可能还更早些），就把争论转移到这方面来了。

布哈林同志在 12 月 30 日说道：“我认为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里所说的“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此），而且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第 47 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已经用政治与经济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以“缓冲”为例，这一点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么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中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了一点。布哈林作为一个“缓冲者”，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发表派别言论的错

误，还是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理解他的这种“缓冲”任务。下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是同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 1921 年 1 月 3 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 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经说，必须撤换工会的领导人员，必须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以前，他甚至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据，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第 5 页）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 11 月 2 日至 6 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是托洛茨基在他 11 月 8 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 5 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 12 月 25 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种想法，那种精神。他的“放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中主义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 1920 年 12 月 30 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 1921 年 1 月 3 日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两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根

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小册子中的整刷政策的观点。他干脆就不提它。这样扮演缓冲者的角色，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

其次，从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同一篇讲话的第7页上，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点辩护。”

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布哈林说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论点不正确或第二个论点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论点都是对的，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也是对的。”（第48页）

在布哈林和他那一“派”或“派别”的提纲第6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起来阐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他说：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46页）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中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注：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些话都已经离开了“宣传”而转向“行政手段”了。]。）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暂时这些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一点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一点”。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即辩证逻辑绝对要求这样做），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提出问题的整个方向。布哈林丝毫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么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席卷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某乙则说起义是一门艺术。我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就能写出象布哈林写的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一点"，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一点"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注：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目前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此等等。布哈林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根据，丝毫没有作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派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性的错误，是折中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的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 12 月 25 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象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作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

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 900 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 10 倍、甚至 100 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的根本性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为 600 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象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 98．5％的会员（600 万减 9 万等于 591 万，等于总数的 98．5％）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 12 月 30 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指控季诺维也夫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进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他说："……季诺维也夫过分从宣传员的观点去对待每个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忘记了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第 27 页）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性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

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的（确切些说，是胡乱对付），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员的态度来对待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讲话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的不成功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分在工会问题委员会里进行切实的“经济性的”工作，发表讲话和文章，那他本来会给工作带来（并且无疑一定会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种趋势”，对待对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谈到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对待这些问题的正确态度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掌握的材料——只能是宣传员的态度。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诱导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 5 条是这样说的）。

对这个问题整个提法的错误，对这种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就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对待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900 件“结合”中的 90 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 90 件事，跟抽样调查的统计材料，跟工农检查院及有关的人民委员部的检查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么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就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当撤换谁、调动谁、委派谁、现时对“领导层”提出些什么要求等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一些人印的布哈林 1 月 3 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讲话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折中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还要进行行政管理，就是说，还要管理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放弃而且也不能放弃“整刷”，即放弃撤职、调职、委派、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在争论的，全党在争论的，并不是“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 4 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来讲，要象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中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辩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切实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切实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种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传动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么他们的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中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完全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玻璃杯是饮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

结论

现在我还要简单地谈几点，要是不谈，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纲领”第 6 条里，重述了俄共党纲经济部分的第 5 条，即关于工会问题的一条。再往下两页，在提纲的第 8 条里，托洛茨基同志宣称：

“……工会在失去了旧的生存基础即阶级的经济斗争以后〈这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轻率的夸大，因为工会虽然失去了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但是从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来说，从采取苏维埃机关所办不到的办法和手段去保护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说，以及从其他等等方面来说，工会却远远没有失去——而且，很遗憾，在很多年之内都不会失去——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这样的基础〉，由于种种条件，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能够有效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向它提出的、在我们党纲中规定下来的新任务：组织生产。”（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提纲第 9 页第 8 条）

这又是一种可能发展成重大错误的轻率的夸大。党纲并没有“组织生产”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就按照我们党纲原来的次序，逐步地来探究其中所包含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论点：

（1）“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不是一切机构〉应当首先〈而不是仅仅〉依靠工会”。（2）“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如何摆脱呢？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进行教育及其他各种诱导的过程中〉，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这是党纲讲到工会的那一条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一下子就给今后提出了很“严格的”和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才能实现的“条件”。往下又说：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看，这里用词是很慎重的：只是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请注意：应当做到切实集中的，不是各个工业部门的管理，也不是工业的管理，而是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并且是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这是一个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小生产者在全部人口中和国民

经济中已经少于半数的时候，才算是实现了〉。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即逐步实现上述的各种条件〉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即群众，即人口的大多数〉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看到，最后一句里的"参加经济管理"，用词又是很慎重的；这里又指出了吸引广大群众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末了又十分慎重地指出：为"人民"，即工农的而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把这一切归结为我们党纲给工会"规定了""组织生产"的任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持这种错误，把它写进纲领性的提纲，那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反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倾向。

附带说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还这样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接近了党纲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离它更远了。"（提纲第 7 页第 6 条）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不能象托洛茨基在辩论中那样，用指出工会"自己"承认这个事实的办法来证明这一点。对党来说，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一般说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大量事实进行极其严肃的客观的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就假定这一点得到了证明，也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离得更远了？是象托洛茨基所想的那样，由于"许多工会工作者""拒绝接受新任务和新方法"呢，还是由于"我们""还来不及在自己队伍中集合起必要的力量，并且规定出必要的方法，以便"阻止和纠正某些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呢？

说到这里，应当提一下布哈林同志 12 月 30 日对我们提出的责备（昨天，1 月 24 日，在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托洛茨基也重申了这一点）。他责备我们“放弃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12 月 30 日辩论记录第 46 页）。据他说，列宁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主张劳动军事化，而讥笑别人拿民主当借口，可是现在，他却“放弃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他 12 月 30 日的总结发言中，可以说是给这种责备又撒上了一把胡椒面。他说：“列宁是估计到工会里正在形成……一个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的派别这一事实的”（第 65 页）；列宁的态度是“着眼于外交手腕”（第 69 页）；是“在党内派别中间看风使舵”（第 70 页），等等。托洛茨基同志这样来叙述事情，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自然是很舒服的，而在我听来，则比不舒服还要坏些。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就在 12 月 30 日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都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早在 7 月间（1920 年）就向中央提出了我们在工人组织内部生活方面应当转到新的轨道上去的问题”（第 25 页）。8 月间，中央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扩大民主的信。9 月间，在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12 月间，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被提到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这就是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党和整个工农共和国，都认为有必要把官僚主义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放弃了”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呢？不能。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放弃的问题。关于劳动军事化等问题的决定，是无可争辩的。我毫无必要收回我对那些拿民主当借口来反对这些决定的人的讥笑。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将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是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我们将极其注意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对于任何无用而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无论是谁指出的，我们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纠正。

最后，对重点制和平均制这个小问题，再谈一点意见。在 12 月 30 日的辩论中，我曾经说过，托洛茨基同志提纲第 41 条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照他说来，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而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我曾经答复说，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托洛茨基同志因此责备我，说我“过分健忘”，说我用“恐吓手段”（第 67 页和第 68 页），我很奇怪，他怎么没有说我看风使舵、玩弄外交手腕等等。托洛茨基对我的平均路线作了“让步”，而我还在向托洛茨基进攻。

实际上，关心党的事业的读者，都可以查到确切的党的文件，那就是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第 4 点，以及托洛茨基的纲领性提纲第 41 条。无论我怎样“健忘”，无论托洛茨基同志的记忆力多么好，事实总是事实：提纲第 41 条中有理论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在中央 11 月 9 日的决议中是没有的。这个决议说：“中央认为，在经济计划的执行上，有保留重点制原则的必要，同时也完全赞同最近一次〈九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在各种工人和相应的工会的地位方面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并且不断加强整个工会组织。”显然，这是针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而言的，这个决议的确切含义是曲解不了的。重点制并没有废除。对于重点的（在经济计划的执行方面）企业、工会、托拉斯和主管部门，仍然要优先照顾；但同时，“平均路线”（这条路线不是“列宁同志”要坚持，而是党代表会议和中央，也就是说，全党已经批准了）又明白地要求：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执行中央十一月的这一决议，这从中央十二月的（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决议再次提到了“正常的民主制原则”。提纲第 41 条的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它说应当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制，在生产方面实行重点制。这从经济上来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这样就把消费和生产割裂开了。我决没有说过而且也不能说出这一类的话。一个工厂不需要了，那就把它关闭；所有不是绝对需要的工厂都要关

闭。在绝对需要的工厂当中，优先照顾重点。例如，代先照顾运输业。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为了使这种照顾不至于过分，并且鉴于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照顾已经过分，党（而不是列宁）才指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转到平均制。如果托洛茨基在十一月全会已经作了确切的、理论上正确的决议之后，还要发表关于“两种趋势”的派别性小册子，还要在提纲第 41 条中提出他自己的、从经济上来说是错误的提法，那就只好怨他自己了。

今天是 1 月 25 日，自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他的派别言论以来，刚好过了一个月。现在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形式上不恰当的和实质上不正确的言论，使党脱离了切实的、实际的经济生产工作而去纠正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古语说得好：“因祸得福。”

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创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

中央内部的分歧使我们不得不把问题交给全党。辩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本质和范围。这样，谣言和诬蔑就破产了。党正在同派别活动这种新的病症（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已经把它忘记了）作斗争中学习和受到锻炼。实际上，这是一种旧病，在今后若干年内，它大概免不了还要复发的，然而现在是能够而且应当更快更容易地把它治好的。

党在学习不夸大分歧。在这里不妨把托洛茨基同志在谈到托姆斯基同志时提出过的正确意见重述一下：“我在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论战时，总是说，

我十分清楚，只有象托姆斯基同志这样有经验有威信的人，才能当我们工会的领导者。在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团中，我曾经这样说过，最近在济明剧院，我也这样说过[4]。党内进行思想斗争，并不是要互相排挤，而是要互相促进。”（12月30日辩论记录第34页）不用说，党是会把这一正确的论断同样也用于托洛茨基同志的。

在辩论期间，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即所谓“工人反对派”，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了工团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背离党、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这种倾向必须特别注意，必须特别加以讨论，必须特别注意向大家宣传和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以及这种错误有什么危害。布哈林同志曾经讲出“必须接受的人选”（即工会参加管理机关的人选）这种工团主义的话，今天又在《真理报》上为自己的话作了很笨拙的并且显然是错误的辩解。你们看见了吧，他在其他几点上又说到了党的作用！当然罗！否则的话，这就等于退党了。否则的话，这就不仅仅是一种需要纠正和易于纠正的错误了。如果说到“必须接受的人选”，而不立即补充说，这些人选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么这就是工团主义的倾向，这就同共产主义不相容了，就同俄共党纲不相容了。而如果补充说：“对党并不是必须接受的”，那就是用扩大工人权利的幻影去欺骗非党工人，而实际上却丝毫不会改变现状。布哈林同志愈是为他那种理论上显然错误、政治上带有欺骗性的背离共产主义的倾向辩护，这样固执己见的结果也就愈可悲。要为无法辩护的东西辩护，总是不会成功的。党并不反对任何扩大非党工人权利的措施，但是只要略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什么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什么办法是不能采取的。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辩论中，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虽然得到了在这一工会里特别有威望的基谢廖夫同志的支持，还是遭到了失败：137

票赞成我们的纲领，62 票赞成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8 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纲领。工团主义的倾向是应当治好而且也一定能够治好的。

一个月来，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一些外省城市已经表明，全党对辩论作出了反响，并且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在“上层”、“地方领导”、委员会和机关里显然有过摇摆的话，那么普通党员群众、工人党员群众的多数而且是绝对多数，却是反对这条错误路线的。

加米涅夫同志告诉我说，1 月 23 日在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的辩论会上，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声明收回他本人的纲领，而在新的纲领基础上同布哈林派联合起来。可惜，无论 1 月 23 日或 24 日，当托洛茨基同志在矿工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反对我时，我都没有听到他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又改变了他的主张和纲领，或者这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 1 月 23 日的声明表明，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仅仅反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少数省会的意见，就已经坚决、果断、迅速而毫不动摇地一下子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纠正过来了。

党的敌人只落了一场空欢喜。他们想利用党内有时不可避免的分歧来危害党、危害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没有得逞，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得逞。

注释：

[1]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 1921 年 1 月 21 日或 22 日开始写的，当时列宁正在哥尔克休养。1 月 22 日晚，列宁返回莫斯科时，小册子已写了大半部分。1 月 25 日，小册子完稿，当天付排。1 月 26 日夜，印好的一部分小册子就分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1 月 27 日，小册子全部印出。小册子封面上标明仅供俄共党员阅读。——263。

[2] 《彼得格勒真理报》(《》)于 1918 年 4 月 2 日创刊，最初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19 年 4 月 12 日起是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1924 年 1 月 30 日改名为《列宁格勒真理报》。——263。

[3] 水运总管理局局务委员会委员维·伊·佐夫 1920 年 5 月 3 日的命令载于《玛丽亚区水运管理局公报》第 5 期。命令说："这样一来，水运方面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手工业方式、乱设委员会的做法、无组织和无权威状态已经成为过去，水运工作成为国家的了。担任领导的将是有相应权力的政治委员。委员会、工会以及选举产生的代表对技术和行政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已被废除。"这一命令把工会同已经过时的军队中的委员会相提并论，并以命令方式不让它们参加整顿水运的工作。——274。

[4] 1920 年 12 月 24 日，苏俄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在过去的济明剧院召开了工会运动工作者积极分子和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挑起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争论。——304。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1921 年 3 月 13 日或 14 日）

1. 最近几个月来，在党内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清洗和健全党的队伍。

2．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主要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共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特别猖獗，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3．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和其他著作，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最完整和形式上最完备的表现（或者说：是这种倾向的……最完整……的表现之一）。例如，他们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这种主张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主张所依据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一切半无产阶级革命和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

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

第二，上述论点中所表现出来的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说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 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45]中正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贯穿在“工人反对派”的全部观点之中。

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上述这个派别以及其他人想援引俄共党纲经济部分有关工会作用的第 5 条来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辩解的一切尝试也是根本错误的。这一条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吸引”这些群众“直接参加经济管理”。

俄共党纲的同一条指出，“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把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把全体”劳动者都包括进来，这个过程是工会做到“应当做到”的这一步的先决条件。

最后，俄共党纲的同一条还着重指出，“根据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注：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15 页。——编者注]

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考虑这种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不严格地根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纠正的错误的教训去进一步发展这一经验，却直接提出由“各级生产者代表大会或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选举”经济管理机关的口号。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了和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继续进行和改进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创建新经济形式的实际工作，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来破坏这一工作，而这样做只能促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获得胜利。

5．俄共代表大会认为，上述派别及其他类似的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是理论错误，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采取根本错误的态度，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祸频仍、经济破坏、疫病流行、连年歉收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 18、19 和 20 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6．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

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

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

（1923 年 1 月 16 日和 17 日）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2]，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 1856 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3]，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象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之后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硬充革命家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而且他们对于这种“正常”的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试问，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1856 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二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o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 1917 年 10 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注释：

[1] 《论我国革命》一文是1923年1月16—17日口授的，评论了著名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一书第3卷和第4卷（1922年柏林—彼得堡—莫斯科格尔热宾出版社版）。《列宁值班秘书日志》有几次提到这件事（见本卷第463—464页）。文章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真理报》编辑部，无标题。标题是报纸编辑部加的。——369。

[2] 显然是指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巴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和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中称赞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369。

[3] 指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369。